

亚洲大趋势

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英] 乔·史塔威尔 / 著 蒋宗强 / 译

HOW ASIA WORKS

《经济学人》2013年最佳图书

畅销书《亚洲教父》作者最新力作
全面分析亚洲国家经济成败原因，预测未来发展道路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亚洲大趋势

——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英] 乔·史塔威尔 著

蒋宗强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 (英)史塔威尔著；蒋宗强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

书名原文：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ISBN 978-7-5086-4478-3

I. 亚... II. ①斯... ②蒋... III. 亚洲经济 - 经济发展模式 - 研究 IV. F1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8244号

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Copyright © Joe Studwell,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

著者：[英] 乔·史塔威尔

译者：蒋宗强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飞书App：<http://m.feishu8.com> (中信电子书直销平台)

目录

作者按

前言

第一部分 农业：土地政策到底有多重要？

案例一：从东京到新潟

案例二：西内格罗省

第二部分 制造业：历史学家的胜利

案例三：从首尔到浦项和蔚山

案例四：走遍马来西亚各地

第三部分 金融业：金融管制的意义

案例5：雅加达

第四部分 中国何去何从

后记 学会说谎

致谢

注释

在激烈的时代环境中，怀着苦涩的心情，我离开了.....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中洛锡安区竞选演说

作者按

我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起始年份是1980年），另一个是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起始年份为1960年），如果未做特殊说明，则出自其中一个数据库。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引用的数据没有逐一给出注释，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减少注释的数量。

世界银行改变了一些术语的说法，现在把“国民生产总值”（GNP）改称为“国民总收入”（GNI）。虽然一些读者可能习惯于原来的术语，但本书中还是采用了“国民总收入”这个说法。根据世界银行介绍，这两个术语在统计方法上没有差异，但读者应该注意到国民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前者指一个国家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既包括国民在境内获得的收入，也包括在境外获得的收入，而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只包括国民在国内经济中的收入。

虽然我努力控制注释的数量，但还是加了很多注，它们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对某一点进行解释，或表明我说的话有真实来源。我不期待，也不打算让读者们阅读所有注释。如果你觉得某一点特别重要或者存在争议，最好读一读相关的注释。我希望在另外一个独立的附录中，为那些感兴趣的读者发布我的一些研究成果，以佐证我的观点，这项工作的进展将会以报告的形式发布在网站上，网址是 www.howasiaworks.com。

如果没有另做说明，本书涉及的汇率都是采用当时或当年的汇率。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为满足中国相关的出版规定，本书中译本的部分段落有所删改。但是，就本书而言，相关的删改并不多，也没有显著影响本书的主旨。

前言

本书论述了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指出了政府可以采取三个关键的干预措施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对这些措施运用得最为有效，结果均迅速地从贫穷状态过渡到了富裕状态，其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之最。与这些成功的经济体相比，其他一些亚洲经济体虽然具有同样的发展愿景，而且拥有同样的或者更好的资源禀赋，却没有采取同样的发展政策，它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事实表明，这种成就是不可持续的。

第一个干预措施是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在贫穷国家中，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农业生产，但提高农业产出却是最容易遭到忽视的。成功的东亚国家通过自身发展历程表明，要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一条必由之路就是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形成劳动密集型的家庭农业，这类农业模式需要精耕细作，实际上就相当于规模较大的园艺业。在这种农业模式下，虽然人均收益微薄，但能够让一个贫穷经济体内的可用劳动力找到用武之地，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业效益和农业产出。结果就是出现了初步的生产过剩，刺激了人们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

第二个干预措施是引导投资和企业进入制造业。从很多方面来讲，也可以把这个措施称为第二个“发展阶段”，这是因为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开始退出农业领域时，可用的生产技能及资源是有限的，发展制造业可以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那些技术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就在工厂里利用机器创造价值，这些机器在世界市场上是很容易买到的。此外，在东亚，成功的国家或地区率先根据制造企业的出口业绩给予一定的补贴，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政府补贴与我所说的“出口纪律”[\[1\]](#)结合在一起，把工业化的速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最后一点就是干预金融部门的运行，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让金融业服务于小规模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以及制造业的发展，这是加快经济转变的第三个关键要素，也是第三个发展阶段。前两个发展阶段肯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此时，在第三个阶段，国家的作用是确保金融业能够一如既往地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推动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学习先进技术，为未来获得高收益奠定基础，而不应该

思考如何利用前期积累的财富去获得短期收益或扩大个人消费。这种发展战略可能让国家与很多商人以及消费者处于对立状态，因为这些人有可能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在亚洲，曾经有一些国家虽然没有遵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策处方”，但也实现了快速增长，结果一度导致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问题上出现了困惑。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世界银行研究了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两个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道路，并分析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些突然实现较快增长的东南亚国家的发展道路，提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极小的。由于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两个离岸金融中心面积狭小，人口密集，不存在农业部门拖累整体生产率的问题，所以正常的国家和地区无法与这两个地方相比。但世界银行依然在198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将中国香港、新加坡纳入了其案例研究范围，提出“金融振兴经济”的观点，引发了极大争议，导致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¹后来，到1993年，世界银行又提出了一份名为《东亚奇迹》的报告。该报告虽然承认工业政策以及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在某些国家的存在，但低估了这些政策的作用，而且对农业问题避而不谈，并把中国香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放在一起，共同界定为“表现卓越的亚洲经济体”，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则被置于次要地位（该报告未谈及中国大陆的经济）。²

在当时那个年代，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对那个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一致认为，风靡美、英两国的自由市场政策必定适用于所有经济体，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可以采用自由市场政策。³当时关于发展政策的争论中经常出现尖锐激烈的言辞，以至于损害了学术严谨性，世界银行的报告就能说明这一点。事实上，虽然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一些学术界专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不认同“华盛顿共识”，但他们在论证自身观点时偶尔也会发表一些与“华盛顿共识”相似的言论，这种情况下，各国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只会更加困惑。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曾经研究了日本的发展历程，并于1982年出版了一部颇具新意的学术专著，即《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今天，日本的发展模式正在被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经济体所复制。”曾经从结构角度分析韩国经济的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在一本专著的序言中也提到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泰国模式”之类的字眼，艾丽斯将这几个经济体

放在一起研究了。即便沃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 也在1991年新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的序言中提到，马来西亚和泰国正在遵循韩国及中国台湾的路子，方法日臻成熟，虽然这本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早论述经济发展的著作之一，而且是最具有历史借鉴意义的著作之一，但也把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放在了同一尺度下进行衡量。⁴由此可见，在关于东亚发展模式的争论中，专家们为了赢得争论而各抒己见，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只有在各经济体都维持快速增长之时，人们才会去研究经济发展的性质，才会产生分歧。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巴西以惨痛的现实说明了仅仅依据增长率评判经济发展是多么危险。巴西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实现了快速增长，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可谓是一枝独秀。除了东亚国家之外，只有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维持在7%以上。⁵但到了1982年，由于爆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巴西经济轰然崩溃，陷入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长年零增长的困局。事实表明，巴西在早年的增长中，过度依赖债务的驱动，导致其经济并不是真正具有了生产力和竞争力。

在东亚，虽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7个经济体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维持了不低于7%的增长速度，但从1997年开始，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反思阶段。此时，日本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但实现了充分发展之后，日本也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似乎比如何脱贫致富更富有挑战性，而这似乎并没有引起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注意，它们仍然继续努力追赶那些成功经济体。这些国家或地区要么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要么很快就恢复元气，并重新走上了快速发展、技术进步的道路，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却被彻底击倒，陷入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增长率低位徘徊的困局。目前，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 000美元和5 000美元，而且这两个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贫穷程度非常高，相比之下，韩国与中国台湾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2万美元左右。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所有这些经济体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境地。⁶

亚洲金融危机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政府的政策干预对东亚经济体是实现长远成功还是归于失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政府在“二战”之后对农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调整，把现代化努力集中在制造业，并让其金融体系服务于这两个目标。因此，它们彻底地改变了经济结构，使其再也无法倒退到早期发展阶段水平。某些东南亚经济体虽然在长期内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没有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不过它们却听从了某些已经富裕起来

的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过早地开放了金融部门。日本经济学家义原国雄（Yoshihara Kunio）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发出警告说，东南亚国家存在可能变成缺乏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风险。不料这种警告果真变成了现实，当投资资金被耗尽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倒退到了原来的贫穷状态。简而言之，不同的政策选择造就了亚洲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⁷

现实的东亚：冰火两重天

亚洲经济体在谋求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主要是由其政府的发展战略决定的，这些战略既包括农业战略和制造业战略，也包括金融业战略。其实，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亚洲奇迹”的大辩论开始之前，这些发展战略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之久。本书探讨的就是这些战略。我先论述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开展的彻底的农业用地再分配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土地问题成了东亚最大的政治问题，而且承诺土地改革对中国、朝鲜和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小农经济很快让位于农业集体化，结果导致农作物产量陷入了停止增长甚至减少的状态。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再分配改革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并且改革成果得到了延续，正是这一点才催生了长期的农业繁荣，促进了全面的经济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很多国家也开始探讨如何进行更加公平的土地再分配改革，如何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和可负担的信贷服务。很多东南亚国家的确启动了很多改革方案，但这些方案落实之后，实际效果远远不如东北亚国家那么明显。东亚国家间的差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既导致总体性的发展步履维艰，又为其他政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甚至60年后的今天，土地问题仍然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马来西亚的土地问题也比较突出，只不过程度没有上述几个国家严重，因为马来西亚资源禀赋较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业部门薄弱带来的不良影响。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为什么农业如此重要，其中的部分探讨方式就是考察日本和菲律宾的情况。

第二部分转而论述制造业的作用，研究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在扶持

制造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如何一步步地把“加强补贴和保护”与“促进竞争和出口”相结合。政府通过出口纪律，逼迫企业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进而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这样一来就能克服政府补贴和保护政策带来的传统问题，即企业家只愿把政府补贴当作财政激励的资金装进自己的腰包，却不注重提高产品竞争力，而一旦有了出口纪律，政府就会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增长情况来决定是否为企业提供保护、补贴和信贷，企业就不能只躲在关税、技术等壁垒后面，只考虑如何在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上销售产品，因为如果一个企业达不到政府制定的出口业绩评价标准，就无法继续享受政府的财政激励，就会被成功的企业兼并，有时甚至会直接破产倒闭。因此，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世界一流的企业，政府利用公共资金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也得到了回报。

上述这点就体现出了东南亚与东北亚及中国之间巨大的政策差异。在东南亚国家里，主流的企业家在能力方面绝不逊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但政府没有引导他们从事制造业，也没有对他们实行出口纪律。相反，这些国家只是建立了一些国有制造企业，而这些国企几乎没有遭遇多少同业竞争和出口压力。因此，政府各种政策性投资的收益率非常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期，政府虽然没有在本国培育出强大的制造企业，也没有大幅提高本国制造业的技术能力，但由于大批外国直接投资的到来，这些问题都被掩盖住了。这些外来资金大部分都集中在先进制造业内部的加工业务。然而，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之后，东南亚国家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产业差异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能得到普遍认可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如果非要说东南亚国家有什么国际知名的产业品牌，那么我们充其量也只能说出类似于新加坡虎牌啤酒（Tiger Beer）以及泰国胜狮啤酒（Singha Beer）、大象啤酒（Chang Beer）之类的品牌，但这些酿酒企业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企业。由于自身没有成功的、大型的、知名的企业，东南亚国家在技术上就不得不依靠跨国企业，依靠在国际产业链中利润率较低的环节充当跨国企业的承包商而艰难地谋求生存。我们在第二部分将前往韩国与马来西亚，通过实地考察和拜访来深入分析这些国家在技术学习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包括但不限于钢铁、汽车制造技术），进而分析这些国家能够主宰或不能主宰本国工业命运的背后因素。

在第三部分，我们分析了各国的金融政策。在成功的东亚国家中，建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架构，优先考虑的事情往往都是如何才能发展好产量高、规模小的集约型农业，如何才能促进国内制造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因此，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这些经济体中，金融体系会受到严密监管，在金融业达到高级发展阶段之前，政府会

一直严格控制国际资本流动。让金融业服务于国家政策目标主要是借助银行信贷机制加以引导，具体讲就是国家可以通过控制银行信贷机制来逼迫制造企业提升出口业绩，企业要想获得信贷，必须向银行出示出口订单。此外，出口业绩也能帮助银行确定自己最终能否收回贷款，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企业的出口业绩较好，则其资信状况就会优于那些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东北亚国家以及中国制定了低于市场利率的储蓄利率，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对公众征收了一种隐性的税，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农业和工业的补贴能力，另一方面也催生了非法的吸收存款机构，即所谓的“场外交易市场”。不过，虽然“场外交易市场”会从银行手中抢走一部分存款，却不足以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东南亚国家的储蓄水平很高，这与东北亚国家比较相似，但东南亚各国政府利用这些储蓄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过程中找错了方向，这些投资资金的流向主要包括规模大、效率低的种植园农业、非制造业务类企业以及仅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后来，东南亚国家又听从某些富裕国家提出的拙劣建议，过早地解除了对本国金融业的管制，开放了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比如股市），并取消了资本流动管制政策，结果导致本国发展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日本、韩国以及中国也曾经在早期发展阶段收到了同样的建议，不过它们都很明智地拒绝了，而且尽可能延长政府管制的时间。东南亚国家过早地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导致家族企业控制的银行纷纷涌现，但这类银行根本无助于扶持出口导向型的出口企业，而且过多地从事关联方借款，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被狭隘的私营部门把持了，而私营部门的目标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几乎完全不一致。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曾经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最近俄罗斯也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区。我决定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考察，仔细研究一下为什么金融自由化在东南亚国家行不通。

本书的论述范围

为了能在有限的篇幅内把问题讲清楚，我在本书中做了很多简化，但核心要义并未淡化。在考虑需要简化哪些内容时，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略去哪些东亚国家。因为这本书旨在论述那些最起码获得了些许成功的发展战略，所以，一些失败的东亚国家就略而不谈了。朝鲜、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⁸排行榜上

较为靠后的国家也不在讨论范围。这些国家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格外引人瞩目的：它们的政治和经济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内向性，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它们重蹈了历史的覆辙，因为1978年前的中国、1989年前的苏联以及1991年前的印度都以惨痛的经历给人们上了沉重的一课：如果一个国家不与世界开展贸易和互动，则其断然不可能领先于世界发展潮流。

因为本书论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所以忽略了东亚两个主要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或许可以更加准确地将它们两个描述成“口岸式离岸金融中心”，因为它们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是国际航运中心。）文莱这个袖珍的石油富国以及澳门这个东亚传统的博彩中心，因为其发展战略具有特殊性，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也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样，过去这么多年里，很多人拿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做对比，或者拿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做对比，进而争论什么才是正确的发展战略，其实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在人口、地理、资源等方面差异十分显著，这就决定了其发展战略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关于这类争论，世界银行可以说是始作俑者，我不想搅和进这类争论中。离岸金融中心在很多方面与正常的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在世界舞台上，它们凭借着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其他国家与地区进行竞争，而且其结构性的成本远远低于正常的国家，因为在正常的国家中，人口规模较大，而且居住地点较为分散，农业部门也拖累了整体生产效率。⁹离岸金融中心的低成本也意味着它们享有内在的财务优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它们永远不可能孤立存在，严格来讲，它们是寄生性的，因为它们必须找到一个或多个主顾，依靠这个或这些主顾谋求生存。¹⁰

我在本书中讨论了中国台湾的情况。从政治角度来看，不能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却可以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自从1949年以来，台湾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台湾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被日本统治了大约半个世纪。台湾人口总数约为2 300万，中国台湾与大陆的发展政策既存在诸多差异性，又表现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折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家和官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共同经历。本书深入分析了台湾经济史的这种两面性。

略去了几个失败的国家 and 离岸金融中心，再对中国台湾的情况做出一些调整之后，我们就剩下了9个主要的东亚经济体，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东北亚组，包括日本以及其两个前殖民地（韩国、中国台湾）；第二组是东南亚组，包括泰国、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第三组是社会主义组，包括中国（这里专指大陆）和越南。然而，为了进一步简化本书结构，越南也略去不谈了。请越南的读者朋友们原谅我这么做，但越南与中国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两者都是正在进行渐进式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某些相似相通的经济结构和框架，除此之外，很难看出二者还有其他的共同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更加引人瞩目，成就更加突出，所以，只能留下中国，略去越南不谈。

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关于中国的问题，关于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差异，主要放在第四部分进行探讨，但与中国发展历程有关的一些问题在前几章也有提及，因为这些方面只能与东亚历史进程结合起来讲。第一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早期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以及后来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1978年以后的农业发展历程在第四部分也有所体现。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前的工业政策在第二部分得到了集中论述，因为这一部分与台湾在国民党败退之后的发展历程具有直接联系。第四部分论述了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的工业化历程。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金融政策只在第四部分有所涉及。

发展的背景因素

在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时，本书只是直接分析了农业、制造业和金融业这三个领域的政策，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或许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口因素了。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年龄分布对其发展潜力具有巨大的影响。如同资金一样，劳动力也是一种经济投入，可以说是一种形式的“资本”。在人口总量中，除去尚未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人群和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群，剩下的就是达到劳动年龄的人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越大，其实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越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医疗条件和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尤其是婴幼儿、儿童的死亡率下降速度更快，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规模迅速增加。这些人口变化趋势对东亚地区实现空前快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人口红利”。但如同任何一枚硬币都具有正反两面一样，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它还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事实上这就意味着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率越来越高。当这个比率突破临界点之

后，劳动人口的规模就会随之迅速缩小，退休的老年人口依靠积蓄维持生计，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变成了消耗者，从而减少了原本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的数量。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作为一个刚刚成熟的工业国，面临着重重问题，这与人口因素的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具有密切联系。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状况，伴随着经济腾飞，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也迅速增加，但到目前为止似乎已经增加到了最高水平，并开始呈现出减少趋势，人口红利也呈现出了弱化趋势，在今后10年，人口因素的变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大。

人口问题非常重要，而许多东亚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并没有特意针对人口问题采取过什么调控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学的一切变化都是顺其自然的。但中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努力把人口问题纳入经济政策范畴的国家。不过，这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时期，中国人口原本就在不断增长，他告诉中国人说人多力量大，从而导致中国人口数量激增。后来，到邓小平时代，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原本已经开始下降了，但邓小平及其继任者仍然努力控制人口出生率，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以限制新生儿的数量。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并没有对中国的发展状况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的发展状况仍然取决于政府在农业、制造业和金融业领域的政策选择，这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情况是一样的。归根结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其有多少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而是怎么运用好这些人口。

另外一个能够影响发展的因素就是教育。本书认为教育只是发挥了一种背景性的作用，因为虽然教育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都会对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我们能公开获取的信息表明，开展教育的年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状况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显著。¹¹在统计教育情况时，我们搜集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比较注重小学阶段。小学阶段是人们培养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最关键的阶段，但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经济腾飞时，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有55%的人都是文盲，1960年降低到45%。1950年，韩国人的文盲率甚至比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还要高。与其说是教育催生了经济发展，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促使家庭加强子女教育，从而使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具有了可能性。

20世纪初，菲律宾还处于美国殖民统治之下，美国的殖民政府就高度重视教育投资。即便今天，菲律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本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但菲律宾却在一些重大政策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最后沦

为一个失败国家。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放得远一些，就会发现古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位居世界第二，其入学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自从1960年以来，教育一直是古巴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但该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仅排在第95位。古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非常大，但工作机会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有25 000名古巴医生被派到国外从事政府资助的工作的原因。¹²前苏联也是如此，经济发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口以增加的速度。

对于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这种不协调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两个相关解释，其中最常听到的一种解释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错误的教育太多。在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模式存在鲜明的对比，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在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都相对比较重视职业培训，而那些曾经沦为欧美强国殖民地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则不是那么重视建立职业培训系统。在初级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具有工程资质的台湾学生可能比一个具有会计资质的马来西亚学生更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的高等教育中有55%都是职业培训（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而攻读人文学科的学生所占比重还不到10%。20世纪80年代，就工程人员在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而言，中国台湾比美国高出了70%。¹³韩国与日本的教育体系为整个东亚树立了典范。台湾的教育体系越来越类似于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工业国的教育体系，而反观东南亚国家的教育体系，则更加重视人文学科以及“纯科学”，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

但我们绝对无法以缺少职业培训和工程人员，去解释东南亚国家的落后。首先，在东北亚，大多数工程人员也都是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之后才培训出来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刚刚拉开帷幕之际，虽然工程人员奇缺，但仍旧成功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才着手加强职业培训和科技教育。¹⁴相比之下，虽然古巴、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培养了大批工程人员，但并没有产生多么明显的积极结果。正规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之所以没有出现协调关系，还有第二个原因（此原因比第一个原因还重要），即在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关键的知识都不是在正规教育中学到的，相反，是在企业中学到的。

这种“企业内学习”（intra-firm learning）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苏联在发射卫星上很成功，却在发展经济上一败涂地的原因，即它的教育和科研投资主要集中在精英式的大学和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里，而不是集中到企业里。东南亚国家也是这种情况，一方面遵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教育传统，大力发展精英式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公共部门设立的研究机构迅速增加。相比之下，日本、韩国、中

国台湾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在教育 and 科研方面的投资就比较务实和有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都是一些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的大企业。这一点与前苏联的情况是不同的，有利于这些国家迅速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虽然该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本国的技术水平仍然没有得到提高，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日本学者近藤雅之（Masayuki Kondo）如是说：“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环境是企业，而不是公立研究机构。”¹⁵对工业而言，在早期发展阶段，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科学政策，而是技术政策。因此，一个政府的工业政策是决定其工业发展成就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制性地建立并扶持一些企业，让企业充当技术学习的平台，那么在正规教育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是徒劳无功的。我要提出的唯一忠告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制造业方面达到技术前沿时，其最佳的教育组合就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正规教育机构和企业内学习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但这不是本书讨论的焦点，在这里，我们讲的首先是你如何才能摆脱贫穷并跻身富人俱乐部。

其他不做论述的因素

因此，本书并没有对人口和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只是在有必要而且合适的情况下论述了一下。除此之外，人们经常会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能影响到经济发展，但本书也不做论述。这些因素如下所示。

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很多人竭力论证民主会阻碍经济发展，也有很多人竭力论证民主会促进经济发展，但纵观东亚地区，所谓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就国家层面而言，既有民主促进发展的国家（日本），也有专制促进发展的国家（韩国）。在19世纪，日本开始以缓慢而稳定的步伐迈向更加民主的政治架构，日本普通公民开始享有选举权，并且成功地实施了东亚地区第一个现代化改革方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仍然是唯一一个实施这种方案的国家，日本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于日本后来陷入了军事独裁，那是因为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大萧条，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白人”强国的种族主义压力，才导致日本的政治体制陷入一片混沌，以至于后来军国主义有所抬头。相反，很多人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例，指出专制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和中国台湾的蒋介石都曾经实行专制统治，而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经济体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他们可能忘了一个事实：在1949年之前，蒋介石在中国

大陆也曾经实行专制统治，而经济治理状况却一团糟。这就表明，专制统治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归根结底，经济状况取决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府虽然建立了民主制度，但也混乱不堪，后来到1956年后期，苏加诺为消灭异己，解散国会，提出制定“指导下的民主”和“指导下的经济”的政策，实际上却是实行独裁统治，以至于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混乱局面。后来，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加诺的统治，虽然继续实行专制统治，但他给印度尼西亚带来了更大程度的稳定和发展，不过他的家族最后贪腐成风，大肆掠夺国家经济。在菲律宾，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在1972年宣布，为了进行关键的改革，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他需要实行“军事管制”，实际上就是实行专制统治，并对国家进行了空前严重的掠夺。

从微观的、次国家的层面上看，同样很难发现一个国家是专制或民主，与其经济发展政策之间有什么一致性。有时候，极端专制的行为也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成就，比如韩国的朴正熙将军曾经临时性地监禁过一批商界领军人物，并于1961年再度对韩国银行体系实行了国有化改革，但韩国经济仍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有时候要促进发展，就必须采取民主的政策。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中晚期的中国，处于共产党控制下的地区成功地实施了土地改革，这与经由选举产生而且民主运作的土改委员会具有密切关系。与此相似的是，日本、中国台湾那种代议制的、通常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土地改革委员会也对其经济取得空前成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¹⁶韩国的土地改革是以更加专制、更加集权的方式开展的，在效果上则逊于中国大陆及台湾、日本的土地改革，而且在东南亚，各国土地改革遭遇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过程缺乏民主。总而言之，民主和专制并无法有效地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

关于民主究竟是促进发展还是阻碍发展的问题，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的推理或许是不可忽略的，他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分清民主与发展的关系。民主和制度建设是发展的结果，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把民主视为促进发展的一个驱动因素。因为我曾经在中国和意大利生活过，而这两个国家的共同之处就是，与经济发展相比，制度建设往往相对滞后，都是先实现经济发展，然后才逐步开展制度建设，所以，无论是从原有的知识积累来看，还是从20年的个人经历来看，我都认同阿马蒂亚·森等人对于民主与经济发展究竟孰先孰后的观点。在实际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之后不重视民主制度的建设，以至于本国人民承受了种种苦难，这些国家的确应该正确地思考一下如何建设民主。虽然本书的主题是探讨经济发展之策，但仅

仅依靠经济发展是无法增进人类福祉的。

对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除了前面提到的民主程度差异之外，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解释就是法治程度差异。我认为，法治如同民主一样，也是发展的结果，是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把法治视为促进发展的一个因素。最近这些年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向中国共产党建言献策，使其相信法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它们的论点在东亚地区找不到足够的论据来支撑，有的国家虽然没实现法治，但在经济发展上的确成功了，而有的国家虽然实现了法治，经济却一团糟。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但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没有制定专门用于保护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只是在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发生之后才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虽然中国的法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但中国的确实实现了繁荣发展。韩国也是一样。韩国的法律制度、警察机构和特工机构在很长时期内都愿意服从大企业的命令，满足大企业的需求，去恐吓、殴打、监禁工会领袖以及其他试图维护劳工权益的活动人士，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说，这与19世纪晚期的美国以及稍早一些的英国出现的情况比较相似。）另一方面，日本在财产权保护方面做得稍微好一些，而且日本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得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很多司法案件的结果就是谁行贿得最多，最终的判决就对谁有利，它们的经济状况欠佳与法治不健全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通过上面各种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即法治并非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而是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发展中国家能够把谋求经济发展同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

最后一个解释，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解释，就是地理和气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很多人都认为东南亚之所以相对落后，是因为那里太热，而东北亚处于领先地位，是因为那里像北欧一样具有温和的气候。面对这种有失偏颇的认识，我不禁想起了8世纪初一位信口开河的评论人士所说的话。当时，阿拉伯地区和中国唐朝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比较热，并且声称欧洲、北美、日本和朝鲜将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因为这些地方的气候太冷了。那种认为地理因素和气候条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的观点在后来的历史中找不到多少论据。从地理角度来看，虽然一个国家存在效仿邻国的倾向，但用地理因素去解释东亚各国的成败得失是苍白无力的，所以本书没有长篇大论地论述地理因素的影响。从台湾去东京，乘坐飞机需要三个半小时，虽然台湾位于亚热带气候区，但本书根据其经济发展政策和发展成就将其归入东北亚组。同样的道理，虽然从地理角度来看，越南和泰国、马来西亚一样，同属东南亚国家，但我在本书中也没有纯粹从地理角度进行分类，

而是根据政治经济状况将其同中国划到了同一组中。可能是因为东亚某些地理相近的国家存在偶然性的经济趋同现象，才导致某些人笃信地理因素先决论，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一切，而人的作用无关紧要。

但本书却指出人们在发展进程中可以做很多事情。本书重点关注政府在农业、制造业及金融业的政策选择，因为这三个领域的政治决策对发展结果的影响是最大的。接下来的内容并不是一套详细的政策建议，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情况不同，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政策未必适用于另一个国家。但本书对于东亚发展历史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准确的。虽然这段历史的时间跨度是短暂的，但它提醒了我们一个道理，即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掌握在其政府手中。

[1] 作者所说的“出口纪律”指的是政府通过出口信贷、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商品倾销、货币贬值、央行再贴现等政策渠道，引导或逼迫本经济体内部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大力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出口业绩，以期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不断实现产业升级。——译者注

第一部分

农业：土地政策到底有多重要？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农村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要报复的原因，我从不后悔。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

刺杀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者¹

为什么土地政策对发展如此重要呢？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在一个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里，往往有75%的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依靠土地谋生。“二战”后的东亚也不例外，即便在日本也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日本刚开始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之际，农村人口占据总人口的75%，到“二战”爆发时，仍然有50%左右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劳动。因为贫穷国家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农业部门，因此，农业能为这些国家提高经济产出提供最直接的机会。

对于人口不断增加而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而任由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农业产出往往会停滞不前，甚至会下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土地需求量的增速远远超过了土地供应量的增速，所以土地所有人能够以越来越高的地租将土地出租出去。他们还从事高息放贷活动。而雇农面临着严苛的地租、高息的债务以及没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即便有心提高产出，也无力进行投资，比如改进灌溉系统、购买肥料等。虽然土地所有人具备投资能力，但他们通过最大限度地榨取地租以及放高利贷能更轻松地把钱挣到手，而且如果债务人无力还债，那么作为债权人的土地所有人就可以把对方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这样一来，土地所有人就能拥有更多的土地。所以，仅

仅依靠市场力量并无法实现产出最大化。“二战”时期，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人口不断增加、土地使用权无保障、收租行为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土地市场就会令增加土地持有量成为土地所有人增加收入最便捷的渠道，而通过投资提高产出对增加土地所有人收入的作用就会相形见绌。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的农业。“二战”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它们彻底变革了土地分配格局，建构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农业市场。新的农业制度安排有利于实现农业产出的最大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出现过具有类似规模和影响的政策变革。

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出现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系列土地改革。虽然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者主导的，另外三个是资本主义者主导的，但其目标是一致的。大体来讲，这些土地改革的目标就是国家收回现有的农业用地，然后平均分配给农业人口（一度兼顾了土地肥力的差异）。同时，为了支持土地改革，政府大力支持农村信贷机构、农资营销机构、农业培训项目等配套服务，进而催生了一种新型农业市场。在这个新型市场上，小型家庭农场的所有者动力十足地投入自己的劳动力及生产盈余，以期实现产出最大化。上述四个经济体土地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产出大幅提高。

在上述四个经济体中，农业产出大幅提高的前提条件是土地均分之后得到了园艺式的精耕细作。一家5口、6口，甚至7口人共同打理不到1公顷的土地，这种农业模式在本质上就相当于规模较大的园艺业。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都认为这种农业制度安排必然是低效的。所谓的“自由市场论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定规模是效率之本。在中国、朝鲜、越南及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规模农业就意味着把家庭农场转化为大型合作社，这将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带来严重影响。

其实，农业效率问题取决于决策者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结果。资本家的大农场可以为其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率，但这种“农业效率”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贫穷国家劳动力过剩，最好是先利用这个优势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直到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益为零时为止。换言之，即便每人每小时的产值非常低，也不妨尽量把劳动力投入农业部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过剩的劳动力。任何一个园丁都知道，精耕细作的园艺式耕作模式能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

在家里尝试一下园艺式耕作方法

果农和菜农会告诉你用心耕作一小块儿土地会带来多么高的产量，实际上，他们可能已经亲身实践过了，但有一点他们可能会忽略不提，即要提高一块儿土地的产出，必须付出大量的劳动。如果一些技术可以让一个100平方米的家庭菜园实现产出最大化，那么其同样也能让一个10 000平方米（相当于1公顷）的家庭农场实现产出最大化。所以，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这种园艺式耕作方法。

在家庭菜园尝试这种园艺式耕作方法时，可以采取很多干预措施，但很多措施都需要付出大量时间，要挑选比较有效的方法，其中最有效的一种就是刚开始可以在室内使用播种盘育种，等到进入成熟期之后再移植到土地中。苗圃床的温度也会极大地影响产出水平，在温带气候条件下可以通过提高苗圃床来调节，如果在热带气候下，则可以通过减少土坑的深度来调节。勤施堆肥能有效提高产量，很多瓜农、菜农都是通过一棵棵、一株株地对作物进行施肥才实现了高产。有针对性的灌溉（比如较高的作物往往需要更多水分）以及经常除草也会极大地提高产量。²发展立体农业也能大幅提高产量，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可以进行合理的密植，从而缩小栽种的行距或株距，将水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杂草的生长，但这样一来，农业机械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要发展立体农业，就需要各种架子、网子、绳子和竿子，因为无法使用机械，所以这些都必须用手工来完成，但这种方法能实现产出最大化，比如，在这种模式下栽培西红柿，单株产量最高可以达到20千克。对于成熟期不同的作物，可以实行“间种”，这样就能充分节省空间而获得高产。（很多农业高手都把小萝卜和胡萝卜间种，因为小萝卜的生长期比胡萝卜的生长期短，所以在胡萝卜开始产生排挤效应之前，小萝卜就成熟了，但这样一来，小萝卜只有通过手工去采摘。）同样，耐阴性蔬菜，比如菠菜或芹菜，可以栽种在一些较为高大的树木或作物之下，以确保不浪费空间，但这样一来，就必须通过手工栽培和收获了。

在家庭菜园里栽培瓜果蔬菜，包括当代那些富裕国家里栽培有机蔬菜的家庭菜园，与“二战”后东亚地区的小型家庭农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只不过亚洲家庭农场的面积是富裕国家家庭菜园的30倍甚至更多。但提高产出的逻辑是相似相通的，即在一块儿给定的土地上，利用园艺式方法精耕细作，付出的劳动越多，这块儿土地的产量肯定也越大。

我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如果家庭菜园能得到精心打理，那么每年每平方米的产出大约是5~10千克，如果按照蔬菜市场价格来计算，每平方米菜园产出的作物大概能卖到11~22美元，2009年，热门网站“国际厨房菜园”（Kitchen Gardeners International）的知名博客写手罗杰·多隆（Roger Doiron）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了相关问题。他家里有一个面积为160平方米的菜园，产出了380千克的水果和蔬菜，他仔细查询了这些水果和蔬菜的零售价格，结果发现，按照零售价计算，每平方米菜园的产出可以卖到16.5美元，这就意味着他这片家庭菜园的总产出可以卖到2200美元，相当于每公顷13.5万美元。在美国实行机械化耕作的大规模农场中，最常见、最成功的一种作物就是玉米，如果大体上按照上文提到的那种标准去计算，则2010年每公顷土地产出的玉米可以卖到2500多美元。³

那么，既然园艺式的精耕细作可以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为什么并非每个人都这么做呢？问题就在于，要维持这么高的产量，需要投入的劳动量特别大。如果罗杰·多隆先生全身心地打理1公顷土地，在不采用农业机械的前提下，他可能需要付出10倍于当前的努力才能维持上文提到的那种产量，产出的作物才能卖到13.5万美元，而且这还没有扣除劳动成本。因为美国的大型农场平均面积为170公顷，所以，美国农民都很明智地使用大型拖拉机去种玉米。事实上，在19世纪早期，也就是当移民开疆拓土的时候，除了南方种植园之外，美国北方的农场面积一般都很小，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随着农场面积越来越大，劳动成本也随之提高，这就迫使农民逐渐采取了机械化耕作的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远远超过了19世纪美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而且随着其人口总量迅速增加，这些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数量肯定还会越来越多。这些国家非常适合发展精耕细作的、高产出的园艺式农业。我们以台湾这个经济体为例。在均田制的土地改革前后进行的调查显示，农民在改革之后，在每公顷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天数增加了50%以上。⁴虽然台湾岛仍然维持着较高的稻米和甘蔗产量，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期，芦笋和蘑菇的产量大幅增加，而这两种作物正是种植起来最费时费力的作物，这就说明，农民在分到土地之后，投入了大量劳动去种植这两种劳动密集型的作物。就整个亚洲而言，台湾的农业发展堪称亚洲的成功典范，菜园经营者都可以以此为借鉴。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武断的自由市场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指出，虽然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有时候行得通，但其管理方式不适用于亚洲某些地区种植“经济作物”的种植园，这些经济作物包括糖类作物（甜菜、甘蔗

等)、香蕉、橡胶和棕榈等。经济作物与玉米、稻米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方式不同。比如,甘蔗从播种到成熟,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而且适合深耕种植,这样就必须使用拖拉机了。似乎甘蔗这种作物应该在规模较大的、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种植园中进行种植。然而,传统上,中国台湾或大陆的小规模家庭农场上的甘蔗产出,比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那些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种植园的甘蔗产出还要高出50%。⁵事实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香蕉市场上,台湾的小农经济模式比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种植园模式更有优势。调查显示,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马来西亚正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的时候,该国小农的天然橡胶产出远远超出了种植园的天然橡胶产出。在农业发展进程中,虽然很多问题最好是采用种植园模式去克服,但如果仔细去分析,就会发现,采用小农经济模式同样可以克服这些问题,比如,在种植甘蔗或橡胶树时需要利用拖拉机进行深耕,如果农民租赁拖拉机或者通过合作社去共享拖拉机,同样能够像种植园那样克服难题。因此,我对马来西亚、肯尼亚、津巴布韦等亚非国家的情况感到很惊讶,因为在这些国家,欧洲殖民者引入了大规模农业,千方百计地阻止小农经济的发展,阻止当地的小农生产者对种植园构成竞争,反而直接或间接地为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提供补贴(主要是间接补贴),比如,利用税收收入为种植园修建基础设施。⁶如果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果真那么高效,那么殖民者的这种补贴与扶持就没有必要了。

那种对小规模农场的效率提出质疑的言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等经济体的小型农场之所以能够实现高产,并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农场的规模小,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小规模农场在肥料、种子、储存、销售等方面享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配套基础措施。如果没有合适的配套基础设施,小农场在任何地方都会举步维艰,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土地改革的同时,没有为改革催生的小规模农场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虽然东北亚国家开展的彻底的土地改革导致农作物产出实现了惊人的提升,但谁也不能肯定地说这种改革适用于东亚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作物。但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韩国这些经济体所发生的事情有力地说明,以均田制改革为基础的土地政策开创了“二战”后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发展图景。

农产品充裕的益处

在东亚经济体成功地转向小规模家庭农业模式之后的10~15年间,农业总产出纷

纷提高了50%（日本）到75%（中国台湾）。传统上来讲，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农业产出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导致这个经济体内的储蓄随之增加，而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储蓄为工业投资提供资助了。⁷

然而，农作物产出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农村消费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从而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东亚地区，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到“二战”后的韩国，再到当代的中国大陆，很多知名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都根据农村市场的迫切需求及时调整了自己的产品，从而赚到了上百万美元。立足于农村地区的企业与农村人口具有天然的文化认同感，能够从农村市场上学到很多营销经验。比如，日本的这类企业就包括丰田、日产以及本田等。在“二战”结束之后，丰田和日产为了满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利用小型载重汽车底盘制造了适合在土路上行驶的汽车，而本田公司为了解决农村市场的需求，则利用50 cc的引擎把自行车转变成了摩托车。最近，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立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大力开发可以安装在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或者利用现有的通信基础设施生产廉价手机，从而获得了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桶金，企业的规模也逐渐扩大。⁸

农业产出最大化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刚开始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肯定面临着外汇不足的问题，而如果本国农业不够发达，无法实现本国粮食的自给自足，必然会被迫拿出一大笔外汇储备去进口粮食，从而导致本已不足的外汇储备更加捉襟见肘，那么这个国家引进技术与设备（通常是制造机械）的能力也就进一步削弱了，而这些机器对于实现发展、学习先进技术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开始大力推行工业化战略，但最终来看，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业基础薄弱，一味注重增加制造业领域的出口，而忽略了提高农业产出，结果，随着本国居民收入增加以及随着肉类、粮食等消费量的提高，这些国家要么开始削减制造业的出口，要么开始努力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无论是哪种情况，最后的结果都是导致工业出口创造的外汇一点点地流失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遭遇严重创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Michael Lipton）所说的“城市偏向政策”，或者说管理贫穷国家的城市精英往往忽略农民的价值。⁹所谓“城市偏向政策”，准确地讲，指的是政府在投资取向、财政分配、价格制定、土地利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制定上均有利于城市，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合理地向城市倾斜，这种政策最终会极大地影响城市化进程。总而言之，拉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不够，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通

病。今天，东南亚很多国家也都因为采取了城市偏向政策而损害了本国发展，结果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还不利于实现全面发展。¹⁰

最后，家庭农场还承担着社会福利的部分作用，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贫穷国家无法为本国人民提供失业救济或其他社会福利。在经济衰退时期，很多到城市工厂打工的农民很可能失去工作，而此时如果他们有一个家庭农场，能回乡务农，则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中国台湾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工厂工人回乡务农。近年来，中国大陆凡是出现经济萎靡的情况，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¹¹在土地改革比较成功的亚洲国家里，往往能够避免城市地区出现大批贫民区或棚户区，而那些实行大规模农场模式的国家，从18世纪的英国到当代的菲律宾，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东北亚国家从一开始就注重农业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就占据了优势。但只有当它们成功地实现了农业产出最大化之后，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推动力。政府实行了均田制的土地改革之后，每个农民家庭都拥有一块儿土地，这样就为农民创造了一种几近完美的竞争环境，在这种竞争环境下，有多个竞争主体，没有准入障碍，信息可以自由获取，这是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非常类似于经济学教科书里假设的那种完美的竞争环境。

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一块儿土地，也就拥有了资本，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接触到技术、信贷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能够在一个非常平等的基础上同其邻居展开竞争。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实行的土地改革，美国政府是支持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国内很多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支持这些经济体的改革，认为这是在变相支持它们搞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这种改革意味着东北亚地区将建立起发展中经济体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仅仅通过这场改革，就解决了地主阶层一出生就拥有大量土地的问题，让贫穷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以及资本，每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克劳斯·丹宁格（Klaus Deininger）是世界上研究土地政策与发展的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他曾经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搜集数据，研究贫穷国家的土地分配政策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影响。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土地调查数据计算出，只有一个大国在没有平均分配土地的情况下长期保持了不低于2.5%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国家就是巴西。当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袭来的时候，巴西之所以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注重提高农业产出，没有农业基础做

支撑的经济增长是虚幻的增长。克劳斯·丹宁格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是，土地分配不公导致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位徘徊；低增长减少的是穷人的财富，而不是富人的财富。¹²

简而言之，如果贫穷国家要变成富裕国家，那么在发展初期平均分配土地能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三个经济体都是这么做的。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平均分配土地，更无法为农民提供各类扶持性的资源。要想弄明白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失败了，而东北亚某些国家和地区却成功了，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去研究一下土地政策的历史。

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

亚洲最发达的文明古国早在1 000多年前就进行过土地改革。作为7世纪和8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中国在唐朝时期就建立了管理土地事务的官方机构，负责农田的分配与流转，并确保农民能平等地获得自然资源，但当时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都归国家所有。即使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农作物产量也是很高的。¹³日本在7世纪进行的大化改新运动试图效仿唐朝的土地政策，但其成效十分有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取得的成就也逐渐消失了。虽然平均分配土地、让农民公平竞争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当时两个国家既得利益的精英阶层都对改革施加了重重阻碍。到了13世纪，宋朝统治者试图对一些农田实行国有化改革，侵犯了地主的利益，结果到成吉思汗等蒙古侵略者践踏中原时，很多地主宁愿选择与这些外族侵略者站在一起。

近代以来，东北亚国家的土地改革都是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探索出来的智慧为基础的。德川幕府的崩溃标志着明治维新的开始。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建立了进步的新政体，即君主立宪政体。在当时的日本，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土地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但国家已经很久没有对普通农民提供过任何保护了，也没有创造一个公平的土地流转制度。相反，倒是一些封建时代的大领主（即大名）操纵了大量的土地和庄园，这些土地被出租给了农民，这些农民实际上就沦为了大名的佃农。大名还控制着粮食交易体系，因此也有能力操纵农产品交易市场。

初级阶段的改革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时期，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明治天皇采取了非常慷慨的措施来安抚大名阶级，给他们发放了巨额的养老金，或者让他们进入

日本新成立的贵族院担任职务，以保证这些大名“辞官纳地”之后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日本政府还承认农民土地私有权，为农民发放地券，在明治维新的前三年，发放了1.09亿张地券。这个时期，土地第一次可以合法地用于抵押与买卖。地税也是根据农田规模确定的，而不是根据作物产量确定的，这样在产量较高的土地上，农民就可以把更多的农产品留为己用，而不是像之前的分成制那样同地主分享劳动成果。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促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土地上。此外，日本还形成了一个流动性非常好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到19世纪晚期，日本农民遭到的剥削变得十分严重，甚至要将80%的收入交给政府，但即便如此，这也比农民在幕府时期遭受的压迫缓和了一些。¹⁴

总体来讲，这些变革带来的结果就是，从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之内，农产品的效益与产出大幅提升，这种提升幅度比人口的增长幅度还要大一些。在工业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之际，由于日本农业基础较好，就没有必要进口农产品。¹⁵农业不仅养活了更多人口，很多农产品还可以用来出口，比如蚕丝。日本在大多数偏远的、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山丘地带都栽种了桑树，桑叶可以喂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丝的产量，不仅能满足本国需求，还可用于出口创汇。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日本中央政府还雇用了美国专家来传播新的、先进的耕作方法。同时，日本政府还着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培训服务网络，按照一些农业专家的话说，就是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肥料的广泛使用以及高产水稻品种的栽培是农业产出大幅提升的重要驱动因素。此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包括很多梯田在内的几乎每一寸可开垦的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因为日本政府在土地清理、修建梯田和灌溉设施上投入了巨额资金。

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在农村人口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开启工业化时代。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在富裕的欧洲和北美国家，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至少达到了35%。¹⁶然而，由于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封建统治，实行了以农民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并且政府采取多重措施支持农业发展，所以日本能够在农业人口占据总人口75%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工业化时代。20世纪初，日本已经以举世罕见的速度实现了经济变革，与日本相比，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变革速度都显得相形见绌。可以说，坚实的农业基础为日本实现这么迅速的变革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明治维新开启30年后，日本就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现代化水平，甚至能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1895年），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1905年），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也欣然同日本缔结双边军事同盟（1902年），日本商品开始销往

世界各地。如果没有农村地区提供的粮食、税收和外汇，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明治政府发现的这种发展秘诀，借用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的名言来说，就是“如果你渴望工业化，就要做好发展农业的准备”¹⁷。

日本土地改革的局限性

虽然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农村改革并不彻底，改革广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这次改革扫除了封建时代中那些“在外地主”（absentee landlord）对农民的剥削，而且小农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在农村还存在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随着人口越来越多，而政府为农民提供的资金、销售等方面的支持有限，所以存在农民因无力交租、无力还贷而丧失土地的问题，这样一来，很多原本应该用来投资的资金就流失了，影响了农业发展。

而这种情况就发生在现实中。现在我们还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数据来精确地追溯农村变化的整个历程，但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存在一个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新增农业用地的产量不再增长，而人口总数却继续增加。与此同时，所谓的“农工产品贸易条件”也逐渐开始倾向于保护工业的利益，因为这种贸易条件规定了一个单位的农产品能买多少工业品，或者一个单位的工业品能买多少农业产品，所以，当这种贸易条件的倾斜开始损害农业利益时，农村人口的生活成本就提高了。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很多农村地区的妇女选择到城镇的纺织厂打工，挣点额外收入，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新的工作机遇都是由城市地区大型工厂提供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农民的可耕地面积平均每户仅有1.1公顷。对于拥有土地面积较小或者家庭强壮劳力较少的农户，外界环境的变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逐渐开始显现。比如，如果一个农户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就会选择借贷，农村借贷变得越来越常见，而如果农民无力还贷，他们的土地就会被债主没收。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数量微乎其微，即便到1940年，这类地主数量也不算多，在170万个地主中，占有土地面积超过5公顷的地主数量还不到10万个。¹⁸他们占有的土地面积每一两年也只是增加0.01公顷左右，这些新增土地都是从无力还债的农户那里没收过来的。那些拥有或租种土地面积较小的农户，不得不在刚刚过了收获季之后就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结果导致市场上的农产品数量突然增加，从而降低了价格，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地主们趁火打

劫，买下稻米等农产品囤积起来，然后择机以高价卖出。由于很多农民当初卖完农产品之后就把收入用来还债了，所以等到他们迫切需要粮食时，就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农民债务规模增加了8倍。¹⁹

在明治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前几年，佃耕地在所有耕地中所占的比重大约是20%。到“二战”爆发之际，这个比重几乎提高到了50%，70%的农民都会将自己拥有的部分或全部土地出租出去。到20世纪20年代，虽然遭遇了全球性的大萧条，但佃农的地租并没有减少，他们必须拿出50%到60%的收成交地租。此外，佃农还必须自己承担种子、肥料、农具的费用，还要给政府纳税。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农业产出停止增长也在情理之中。1928年，日本农业省的一位高级官员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言论：“自耕农的土地与佃农的土地在生产率上存在巨大差异。我下面的官员虽然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儿，但他们只要到农村走一走，随便看一眼地里的庄稼就知道一块儿地是属于自耕农还是属于佃农。”²⁰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军队才在20世纪30年代把自己标榜成饱受剥削的农村人口的利益代言人，最狂热的那部分军人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招募的。封建社会刚刚结束之际，日本农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农业产出增长迅猛，农产品非常充裕，但到了此时，农民却遭遇了极其残酷的压迫，引发了日本农业由盛到衰的转折。

案例一：从东京到新潟

在日本，你只需开车转一圈，就可以对该国农业史有一个总体性的了解，因为日本农业的发展对地形特征具有深刻的依赖关系。我第一个旅程是从东京出发，朝着西北方向走，穿越本州岛，最后到达新潟县。这个县出产的大米在整个日本算是品质最好的。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日本农业发展进程中面临很多根本性的挑战。

要观察农业的发展，你必须先逃离东京的影响，但东京这个城市扩张得非常厉害，以至于很多郊区城镇都成为了它的卫星城。当你看不到东京那些安静而奇怪的郊外住宅区、公路和维护得非常仔细的道路标志时，你只是在理论上离开了东京，实际上东京的影响范围不止于此，很多更加偏远的郊区也有很多低矮的隔板房、购物中心、折扣店、快餐店以及汽车展厅，在这些地方，根本观察不到农业发展的痕迹。日本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本来就小得可怜，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又无情地抢走了许多可耕地，再加上日本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不喜欢高层楼房，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可耕地资源的紧张态势。可悲的是，日本人虽然坚持修建低层建筑，但这丝毫不利于增加日本现代建筑物的魅力。

为了观察地形特征，我们刻意避开了高速公路，结果花了两三个小时，一路朝着东京的西北方向开了40公里，经过了美国的横田空军基地，才终于看到了一些农村地区的景象，实在令人感到精神沮丧。最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非常陡峭的山脉，因为太陡了，不适合修建建筑物，当然也不适合耕种。日本到处都是被森林覆盖的山丘和高山，这也是日本可耕地资源稀缺的原因所在。我们的车是在向山上爬行，坐在车内，我能闻到一股股松树的气息扑鼻而来。在东亚各经济体内，日本可耕地面积在国土面积中的比重是最小的，只有14%，而韩国的比重是20%，中国台湾的比重是25%。²¹

进入了东京西北的森林地带，第299号公路在山间蜿蜒而上，最后到达秩父市，这似乎是一个沉睡中的城市，一切显得那么静谧，城市的布局是那么随意，以至于你根本看不出市中心在哪里。这个地方曾经爆发了明治时代规

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直到1884年才被国家军警镇压下去。如同在其他偏远农村地区一样，这里的农民也几乎无地可种。这个地区的四周全是陡峭的山岭。只有在当地一些河流和小溪流经的地方有少量田野，在比较陡峭的山坡上，勉强可以种植一些桑树，但无法种水稻。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为了解决通胀问题而出手打压农产品价格，导致农产品价格出现短暂的暴跌，再加上物价高涨，丝绸税等负担沉重，这个地区的农民直接被推入了绝望的境地，面临着被饿死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几千名走投无路的穷苦农民揭竿而起。最后，起义的领导人被绞死，其他数以百计的人被判以重罪。在秩父北部，在一个名叫皆野町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向一片由波纹状的薄铁皮搭建的棚户区，看上去像是有些年代了。这条小路还与一条铁路线交汇在一起。路的尽头是一个重修过的神社，农民们经常在这里集会。²²

在秩父市和皆野町北部有一条通往新潟和本州岛西海岸的高速公路，即关越高速公路。这条公路蜿蜒曲折地穿行在本州岛中部的崇山峻岭之间，沿途的山间修建了不少隧道。疾驶在这条高速上，你会注意到这样一番景象：在山岭密林间，只要是平整的地块，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城市建筑和工业设施。这种景象足足绵延了百余公里。继续沿着这条公路向西北方向行驶，我们便来到了一个名叫小千谷市的地方。这是一个市区面积只有155.12平方公里、人口略超4万的小城市，因为这里属于信浓川流域，距离日本海只有30公里之遥，所以能够看到海岸三角洲的痕迹，视野豁然开阔了许多。

在这里，放眼四望，除了必要的人类建筑物之外，视野中只有连绵不尽的稻田。这里背山面海，是日本最负盛名的“米篮子”。信浓川三角洲是新潟周围面积最大的可耕地，在其他地方，稻田都位于数公里之宽的海岸地带。在明治时代，新潟县曾经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起初有利于农业产出的大幅增加，到明治时代后期，过多的人口又为地主在提高地租和贷款利息创造了条件。今天，你在这里看到的房屋都是农民在过去50多年里，也就是日本在“二战”后开展更加深入的土地改革之后修建的。这些房屋是用混凝土建造的，房顶是用本地的瓦片铺成的，窗户使用双层玻璃，如果质量低劣的建筑材料完全脱落了，农民甚至会用棕色的、看起来像木头的塑料去替代。

然而，在一座村落的边缘，非常完整地保留着一处“二战”前农村生活历史纪念遗址。其中伊藤家族的房屋生动地展现了第二轮土地改革之前日本

农村土地日益集中、小地主日益普遍的社会现实。事实上，日本人保留这些纪念遗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铭记当年的苦日子。现在，这里成了一个农村剥削纪念馆。通过收取高地租、放高利贷，伊藤家族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地主之一。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这个家族控制的土地面积迅速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该家族拥有1 370公顷稻田，另外拥有1 000公顷林地，拥有2 800名佃农。这个家族并不是典型的地主，但反映了地主阶层日益兴起的社会现实。他们的故居包含60个房间，占地面积多达3公顷，相当于今天两个家庭农场那么大。²³

与欧洲那些城堡或豪宅相比，日本这些地主的庭院似乎并没有恃强凌弱、咄咄逼人的权力意涵。在这个庭院里，曲径通幽的大花园可供散步消遣，精致优雅的茶室可供小憩品茗，造型优美的谷仓上刻有俳句诗，一条遍布锦鲤的小溪与周围的美景相得益彰，正对着小溪的是主人的待客之处，一条潺潺作响的小瀑布愈加衬托出庭院的静谧。从美学角度看，所有这一切都折射了主人的高雅志趣，乍一看去，你不禁会嘀咕，这样一个高雅的人怎么会去压迫别人呢？但仔细推敲起来，还是能发现一些端倪的，比如，主人会用不同等级的待客室去接待不同级别的人物，什么级别的人走什么样的门，也是有明确规定的，还能发现一摞摞的账簿，仔细地记录着佃农的地租和向他们放高利贷的情况。伊藤家族还雇用了大约80名管理人员，代替自己去监督佃农。当时日本的那些地主与今天东南亚的大地主一样，都不会直接同佃农打交道，而是建立了一套森严的等级体系，佃农的一切请求，比如减租的请求，都会逐级上报。庭院之美的确令人惊讶不已，但这并不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美的、缓和的。伊藤家族之所以能在1885年左右建成这个庭院，就是因为其佃农数量不断增加，家族收入也随之增加。事实上，这个庭院见证了当时日本农村市场的失灵，这种失灵导致一个开明自由、渐进改良的日本逐渐陷入窒息状态，从而为之后的军事独裁统治埋下了伏笔。最后，存在种种局限的土地改革归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走在了土地改革的前列

1946年，日本实行了较为深入的土地改革，为农业生产关系带来了更加持久的革命性变化。伊藤家族也在这场改革中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和庭院。但在日本这次改

革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农村开展了更加深入的改革，从而走在了亚洲各国的前列。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农民在短时期内摆脱了饥馑困顿的处境，而到了20世纪初期又面临着重返这一状态的风险，但与中国农民相比，日本农民算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的普通农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承受着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与最深重的苦难。

20世纪20年代，85%的中国人都居住在农村，农村居民出生时的平均寿命预期非常低。75%的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不到1公顷，而10%的人口控制了全国70%的可耕地。但与日本类似的一点是，中国当时也几乎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但土地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的问题，而且人口压力太大，容易促使地主提高地租，进而导致农业产出陷入停滞状态。那个时代一个相当典型的地主便是邓文明。他的儿子邓小平后来成为了中国的领导人。邓文明居住在村头，他居住的房子拥有22个房间。他把2/3的土地出租了出去。与其他很多地主一样，他也并非拥有无限的财富，但他控制着不少于6个普通农户的土地。²⁴

英国的经济史专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托尼（R. H. Tawney）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过中国，后来他在1932年完成了《中国的土地和劳工》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中国农业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以至于在一些地区，农民的处境就好像是永久性地站在深及脖颈的水中，即便一个涟漪就足以淹没他们.....一位著名的中国官员曾经提到，1931年之前的那几年里，仅仅中国山西省就有300万人死于饥荒，40万名妇女和儿童被卖。”²⁵

如果说有一个局外人能以亲历者的身份深入描述中国的农村生活，那么这个人就是韩丁（William Hinton）。他于1945年来到中国，1953年回到美国。其间，在1948年，他曾经以观察员的身份前往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东厂镇），亲历半年土改，深入考察，后来根据所见所闻创作了著名长篇纪实文学著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他写到了青黄不接时发生饥荒的惨象，写到了很多人被迫卖身为奴（大多数都是女孩儿），写到了地主的暴虐、家庭暴力、高利贷、猖獗的黑手党式黑社会以及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悲惨遭遇。在关于各方面的描写中，最令人震惊的便是人们对粪肥的重视。儿童和老人不停地搜寻动物粪便。地主要求为其打零工的人只能在地主家的厕所里解手。一些地主比较喜欢雇用其他村的人为自己打零工，因为这些人离家较远，无法偷偷溜回自己家的厕所解手。²⁶

韩丁把这本书命名为《翻身》，本意是“翻转身体”，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用这个词语来表示土地改革带来的影响，比喻农民从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自己控制的地区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大范围实行了这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而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即减轻佃农的地租和借款的利息。这个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国民党达成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国民党依靠许多地主来获得政治支持。

然而，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国共重新爆发内战），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往往存在自下而上的、强烈的土地再分配的吁求，以至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这种改革。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因为大部分地主同日本占领者及日伪政权沆瀣一气。因为报复日本的情绪非常强烈，农民对土地再分配的吁求十分强烈，再加上农民在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动员下变得政治化了，所以，农村地区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以至于当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12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时，在韩丁所在的那个张庄村以及在许许多多类似的村庄里，地主的土地已经被瓜分完了。²⁷

然而，《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而不加以补偿，同时废除乡村中在土地改革以前的封建性剥削债务。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有几句简明扼要的话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次土地改革的时代背景，很值得在这里提一提。这几句话如下所示：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改革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旧中国一般的土地情况来说，大体是这样：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我们民族屡受侵略、压迫及贫困、落后的根源，亦是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

为了改变这些情况，有必要根据农民的要求，废除封建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²⁸

不是请客吃饭

韩丁在张庄村研究的那些没收地主土地的案例往往涉及暴力行为，这与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致的。在大约250个地主或富农成分的家庭中，有26个家庭的土地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立即就被没收的。从前的地主遭到了反复批斗，批斗大会的组织者是村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被批斗者的土地和财产也被贫困农民瓜分一空。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还有一些人被饿死。到1946年春季，张庄村大约1/4的土地已经易主了，此外，地主、富农的一切家产，包括粮食、牲畜、家具、衣服和房子，也都易主了（因为这些房子是用木材建造的，所以可以拆掉并运走。）村民们还挖地主、富农家的房子和院子，把地主、富农为了安全起见而埋藏的财产全部挖了出来。

上面这段描述的所有现象都发生在1946年4月之前，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农村地区建立正式的党支部。1946年夏季，国共内战再次爆发，同时地主、富农开始遭受新一轮批斗，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甚至有人被活活打死，而且由于一小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滥用新获得的权力，引发了一些暴力、盗窃、强奸事件。当地民兵组织的一些成员为了庆祝1947年的农历新年，便轮奸了一位前“坏分子”的儿媳妇。这些情况发生在1947年末《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前。

就全国而言，与中国土地改革有关的死亡人数，估计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之间。²⁹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一直持续到1952年，因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方在1948年、1949年得到了大幅扩张，这些地方后来都进行了土地再分配改革。总体来讲，正如韩丁所观察到的那样，土地改革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在内战期间为了确保能够源源不断地招募到新兵，首先会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那些没有土地耕种的农民，然后组织支持者们去耕种土地，然后招募年轻人到前线去。韩丁写道：“只有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内战阶段鼓舞士气，增强凝聚力，凝聚力的作用类似于抗日战争期间那种为了避免亡国灭种所发扬的精神的作用。”³⁰

虽然战争对经济起到了破坏作用，但土地改革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快就能感觉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推行了一套更加进步的税收制度，改变了以往那种“不论产量多少，一切农产品一律按照固定比例缴纳地税”的政策，而是设定一个初始的免税配额，其余部分的税率根据当地的平均农业产出水平来确定。这样一来，谁家

土地的产出超过了当地的平均水平，谁就能多留一部分作为私人财产。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制定了更加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建立了共享农具和牲畜的农业互助组，大力组织劳动力开垦农村土地资源并兴修水利，还在农村建立了合作银行，这些在之前的租佃制度下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些因素形成了一股合力，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出。

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和20世纪50年代前半叶，中国的农业产出实现了大幅增长。我们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的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增幅应该在40%到70%之间，中国农业产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最高水平是1.4亿吨，此时提高到了接近于2亿吨的水平。³¹此外，农村纺织业、手工业和制造业的产出也都实现了较好的发展。中国农民在短时期内告别了粮食匮乏的状态。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理由不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但是，人们对规模经济的执着，很快就破坏了中国通过小农经济创造的成就。

1956年，继苏联、朝鲜之后，毛泽东领导了一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运动，无数家庭把土地、农具和劳动力集合在公社、生产队等“生产单位”里。这些变革，加上工业化运动，被称作中国的“大跃进”。事实上，农业产出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以至于1959~1961年发生了饥荒，死亡人数估计多达3 000万~4 000万（略微少于人口总量的10%）。

在那场饥荒之后，中国推出了一个修订版的集体农业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劳动者会得到报偿，即由官僚负责发放的“工分”。但农业集体化之下的粮食产出增速几乎无法赶上人口增速，中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的营养标准几乎比20世纪30年代的营养标准好不到哪里去。³²一直等到1978年邓小平掌权之际，中国才再次发现了家庭农业模式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美国对土地改革的反应

中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土地改革的成果逐渐开始丧失。在此之前，也就是“二战”之后的10年间，中国因为进行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制，导致农业产出大幅增加，所以一直是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榜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军队开进了当时的北朝鲜，1946年，以金日成为首的共产党在北朝鲜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实现了预期的目标，而且与土地改革有关

的暴力行为比中国少。至少在朝鲜于1954年实行农业集体化之前，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非常受农民欢迎的，因为他们进行的农业改革打破了这些地区的政治枷锁。因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美国需要对亚洲地区面临的挑战做出反应。

在如何应对东亚土地改革的问题上，美国的政客、官僚进行了激烈争论，试图达成一致意见。一方面，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个人财产应该得到法律保障，强制再分配其他人的私有财产断然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法律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华盛顿一些较为高瞻远瞩的外交政策专家就主张，土地改革对于提高亚洲社会的公平性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在冷战刚刚拉开帷幕之际，农民得到土地后就不会渴望由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了，这样有助于稳定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有利于遏制日渐兴起的共产主义潮流，有利于削弱共产党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到1945年的时候，还没有大量的证据来表明土地改革肯定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正反两派之间的紧张对立一直都没有解决，结果导致在好几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政策反复无常，到最后，虽然一些国家的土地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美国还是取消了对土地再分配的支持。

经历了导致5 000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政府能出台大胆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当美国国内的正反两派在1945~1946年争论是否应该支持日本进行土地改革时，正方暂时占了上风。驻日盟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说服，主张在日本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然而，虽然土地改革在其他深受美国影响的国家得到了落实，但在南朝鲜却触礁了。美国在南朝鲜的军事指挥官坚决反对进行土地再分配，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对这个问题也不太感兴趣，没有采取强硬态度。但金日成于1946年春季在当时的北朝鲜进行的土地改革让美国及美国在南朝鲜的政治代理人李承晚感受到了压力，后来南朝鲜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但李承晚落实起来踌躇不前，华盛顿方面也不强迫他，而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再次让他们感觉到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最终，南朝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进行了实质性的土地再分配改革，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对于中国大陆在内战期间开展的土地改革，美国做出反应的时机已经太晚了，晚得令人绝望，令人尴尬。1948年10月，美国政府同中国国民党建立“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方大多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在内战的最后一年里，农村复兴联合委

员会在仍然处于国民党控制下的华中某些地方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小规模试点改革。³³虽然美国之前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少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但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美国干预台湾改革的政治意志强化了不少。1949年8月，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工作迁往台湾，之后其工作范围在台湾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当蒋介石推行私有财产再分配改革的决心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动摇时，是他的美国盟友坚持建议他应该继续进行下去。然而，这是美国最后一次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东亚地区的土地改革。美国从来没有给东南亚地区的盟友施加过这么大的压力。

在亚洲土地改革问题上，美国的干预并不是连续的，而是断续的、间歇性的，这反映了该问题在美国政客及军事指挥官心中引发的复杂情感。在日本这个战败国的土地改革问题上，美国干预的时间是最早的，也是最果断坚决的。对南朝鲜的干预则出现了反复动摇的情况，直到一些外部事件（朝鲜土地改革、朝鲜战争）让美国感到了压力，美国才开始强力推进南朝鲜的土地改革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问题上，美国则干预得太少、太晚了，但在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问题上，美国却采取了强力干预，虽然这种干预姗姗来迟，却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和北朝鲜的胜利，显然刺激美国在这个地区担负起领导职责。最后，美国的确充分担负起了领导职责，影响了东北亚的政治局势，为刚刚拉开帷幕的冷战划定了界限。但美国的这种领导职责，是迫于外在形势的无奈之举，对于这个地区进行的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美国并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认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支持土地改革的动力才转瞬即逝，导致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根本没有获得美国支持下的土地再分配带来的利益。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支持土地改革的政治意愿并非源自美国整个政界的共识，而是来自一些思想开明的个人，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是沃尔夫·拉德津斯基（Wolf Ladejinsky）。

一些勇敢的人

在亚洲农业的问题上，拉德津斯基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顾问。他于1899年出生于乌克兰，后来为逃离俄国革命而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的一位归化公民。他曾经回忆说：“我之所以做这个工作，主要原因是我在1921年初离开苏联之前的经历让我总结出了一个教训，即共产党如果没有果断地处理好农业问题，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力。”³⁴然而，拉德津斯基同时还提到，苏联共产党虽然因为领导了向小农经济的过渡而受到欢迎，但之后强制推行农业集体

化。他准确地预测说中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早在1949年，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经作为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美国成员而被美国农业部派往中国，研究中国的土地改革问题。³⁵

在被派往中国的4年前，也就是在1945年，拉德津斯基曾经被派到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充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幕僚。当时，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承担着管理日本这个战败国的职责。在担任幕僚的过程中，拉德津斯基深入研究了日本土地改革问题，并协助美国国务院拟定了一份致麦克阿瑟将军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于1945年10月发出，深入阐明了在日本没收一切佃耕地并实行土地再分配改革的理由。³⁶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身边的很多人都主张采取一项略微缓和一些的政策，即要求地主减轻佃农的地租，但拉德津斯基坚持认为，必须采取一项彻底的政策，才能削弱日本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支持，并且认为如果强制要求地主减轻地租，将会导致很多地主转而选择自己耕种土地，因此就会导致更多的农民无地可种。麦克阿瑟将军原本倾向于保守态度，而且之前他对要不要在日本推进土地改革的问题也不感兴趣，但最终拉德津斯基及其盟友成功地说服了麦克阿瑟，使其向日本政客施压，逼迫日本通过土地改革法案。

麦克阿瑟发给日本政府的《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与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宗旨体现出了高度一致性：

俾使日本帝国政府扫除妨碍复兴之经济桎梏，巩固民主大势，确立对于人类尊严之尊重，打破致使日本农民惨遭数世纪封建压迫之经济枷锁，兹令日本帝国政府采取措施确保日本的土地耕种者具有更加公平的机遇以享受其劳动成果……故此，日本帝国政府须于1946年3月15日或之前向本部（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提交农地改革方案。³⁷

事实上，日本早在1945年11月就制定了《农地制度改革纲要》，但未能获得内阁会议通过。后来，日本议会中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开始着手推出新的土地改革法案，但由于地主保有的土地面积仍然较多，改革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存在很多法律漏洞，地主容易钻空子。在盟国对日理事会（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的苏联代表和英国代表的敦促下，麦克阿瑟及其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幕僚便要求日本议会拟定一份更加彻底、更加缜密的农地改革法案，1946年10月，日本议会通过了经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的第二套《农地改革法案》^[2]虽然这套法案本身是日本议会

通过的，但很多技术细节却来自于拉德津斯基及其团队。³⁸因此，日本令人瞩目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就此开始了。

改革政策得到了落实

根据日本新的《农地改革法案》，几乎在全国所有地区，地主保有的土地面积不得超过3公顷。关键的落实机制是在各地建立相应级别的农地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当地佃农和自耕农的数量超过了地主的数量。农地委员会在土地事务中具有最终决定权，但这对地主来说是极端痛苦的事，因为地主丧失土地后所得到的回报就是30年期的债券，年利率只有3.6%，而且土地价值是按照严重低于市场价的标准进行评估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通胀率非常高，这些支付几乎没有多少价值。³⁹在这一轮改革中，将近200万户将会失去土地，而400万户将会得到土地。

在土地再分配开始之前的那几个月里，日本农业生产估计会出现25万户地主试图通过收回佃耕地而留住土地的情况。但在改革过程中，负责监督土地流转事宜的农地委员会成功地扭转了几乎所有这些情况。尽管如此，在1947~1948年之间，只有110起涉及地主与佃农的暴力事件被报告，没有一起导致人员死亡的事件。农业史专家罗纳德·道尔（Ronald Dore）对此评论说：“这场土地改革之所以能成为一场和平、有序的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次改革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的，佃农不需要通过革命就可以获得土地，而且还会对地主怀有一定的歉意，似乎他们认为地主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土地改革的原因不在于农民自身，而在于法律，所以无论从个人角度来讲，还是从集体角度来讲，农民都不负有责任。”⁴⁰

除了要求土地再分配之外，《农地改革法案》还对改革结束之后的土地销售做出了多重限制。这样一来，土地就不会像明治维新之后那样重新回到租佃状态。将近2/5的可耕地（略少于200万公顷）已经易主，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不到1/10的土地处在租佃状态。由于实物地租被取消，转而由货币支付，而当时通胀率又很高，所以这些支付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此外，这轮通胀也冲销了农村债务，导致地主的债券也几乎没有什么价值。通胀还推高了独立于政府收购范围之外的黑市农产品价格。所以，这个时候做一名农民还是很合适的。

20世纪50年代，当日本城市地区还在为了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水平而苦

苦挣扎之际，农村的产出和消费已经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⁴¹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非常大，不仅提供了数十种农业补贴和援助，还几乎为每一个村庄配备了一名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最后，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的农业产出量几乎每年增加3%。⁴²日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农村的就业形势也一片向好。

1955年，农业为日本提供了2/5的就业岗位和将近1/5的国民收入。较之于之前的改革，日本这次土地改革更加深刻，也更加持久，把农业经济的重点从提高租地利润变成了扩大产出规模，从而为日本实现战后奇迹奠定了基础。正是得益于这次土地改革，日本才有可能在维持收入均等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并促进了农村地区制造业的增长。然而，对于日本全面的土地改革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放到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去考虑，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经济的现代化水平就已经领先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了。后来，韩国、中国台湾也实行了同样的土地改革，改革的结果更加引人瞩目，因为韩国、中国台湾这两个经济体原本就处在发展阶梯的底端，在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的推动下迅速实现了崛起，这就为我们分析这种政策的潜力提供了良好的案例。

韩国的土地改革与其发展

在改革之前，韩国土地分配具有不公平性，其严重程度堪称东北亚各国之最。拉德津斯基在写到朝鲜半岛分裂（1945年）之前的农业状况时，引用了美国国务院在1928年发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朝鲜半岛上，不到4%的家庭拥有55%的农业用地，而25万无地农户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⁴³与同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相比，日本在韩国的殖民政权在农业方面的投入显然比较少，因为日本人在朝鲜半岛面临的政治反抗远远超过了在中国台湾面临的政治反抗，导致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政权在更大程度上是压迫性的政权，因此它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如何压制反抗上。到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日本利益集团控制了朝鲜半岛上大约1/5的土地，大多数农民都是纯粹的佃农。

从1945年9月开始，美国军队开始进驻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半岛，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盟国军政府（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负责管理南朝鲜。盟国军政府实施了限制地租的政策，并把原本由日本人控制的土地租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同时要求所有租佃合同必须是书面形式的。美国军事指挥官阿彻·勒奇将军

(Archer L. Lerch) 并不倾向于进行土地改革，认为这种改革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他重点关注的是不让苏联人跨越北纬38度线，同时压制南朝鲜的社会主义。此外，美国一些赞同土地改革的开明人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日本，而不是南朝鲜。

美国的态度和行动受到了外部势力的逼迫。从1946年3月开始，北朝鲜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而且非常慷慨地规定每个农户可以保留多达5公顷的土地，这就消除了土地所有上的不平等，而且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暴力事件，基层民众对兴起的社会主义政府的支持明显增加了许多。而在南朝鲜，民众对于美国军政府的严苛统治以及对李承晚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李承晚虽然是美国在当地极力扶持的政治代言人，但他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性，因为他是一个长期寓居海外的精英人士，只是在1945年10月才返回到南朝鲜。到了1946年秋，美国国务院终于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推进南朝鲜的土地改革，但阿彻·勒奇将军和李承晚继续反对土地改革。

1947年阿彻·勒奇将军去世之后，美国军政府就开始组织对“归属土地”的再分配，所谓归属土地，指的是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没收的土地。虽然这场改革涉及的土地在南朝鲜土地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略微超过了10%，但提高了南朝鲜人对土地改革的期待。1948年，南朝鲜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即韩国，次年，仍然与地主利益具有深刻关联的韩国新议会通过了实质性的《土地改革法案》，比李承晚总统想要的法案更加彻底，所以他持否决态度，但持赞成态度的议员数量过大，导致李承晚否决无效。

1949年6月，李承晚被迫签署《土地改革法案》。一个在土地方面有着重大既得利益的立法机构却在土地再分配问题上采取了坚决的原则性立场，这就提醒人们，民主并不总是妨碍发展的。⁴⁴在落实改革法案的问题上，李承晚一直踌躇不前，但到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周，韩国土地改革终于进入了实质阶段。战争初期，朝鲜军队进入韩国，之后在占领区建立了农民委员会，把超过50万公顷的土地免费分配给了100多万个家庭。1950年末，韩军与联合国军重新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部，并宣布朝鲜军队进行的土地改革是非法的，李承晚在美国的敦促下最终开始采取措施落实韩国自己的《土地改革法案》。这场改革到1952年底才完成。

韩国土地改革的正式条款非常类似于日本已经实施的改革条款以及中国台湾即将实行的改革条款。农户保留土地的上限是3公顷。地主获得的报酬都非常少，有些

地主直接丧失了90%的资产价值。然而，与日本、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相比，韩国的土地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下进行的，农民在改革进程中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解释韩国的改革效果为什么逊于日本、中国台湾的改革效果。第一，在正式的土地改革进程之外，地主把很多土地都卖给了佃农或亲戚。第二，虽然租佃制在《土地改革法案》下并不合法，但土地改革结束后逐渐抬头，并愈演愈烈，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大约1/4的农地都返回到了租佃的状态。然而，韩国的自耕农在农户总数中的比重，从1945年的不足1/10增加到了1964年的7/10。⁴⁵土地改革之后，几乎一半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都不到半公顷。人地矛盾十分突出。

土地改革后，韩国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日本那么快。20世纪50年代，李承晚政府强制收购水稻的价格甚至还不足以覆盖生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水稻产出虽然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他们宁愿把多余的水稻吃掉，也不愿意赔本卖掉。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韩国甚至不得不依靠美国的粮食援助才能避免发生饥荒。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之后，韩国政府提高了政府收购价格，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国内化肥厂的投资力度。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韩国政府效仿日本和中国台湾，开始为家庭农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扶持，农业产出实现了显著提升。每公顷稻田的平均产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3吨增加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5.3吨，虽然赶不上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水平，但仍然是同时期的东南亚国家或中国大陆（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的1.5~2倍。

无论是与明治时代的日本相比，还是与“二战”后的日本、中国台湾相比，韩国都不大可能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农业中汲取足够的财富去为工业化提供资助。在金融上，韩国政府严重依赖大借外债。然而，农业还是为韩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在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完善之前，农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通过补贴性的政府收购，农业为城市的工人提供了廉价粮食；农业的发展刺激了农村地区对工业品的消费，为早期的制造企业生产的产品创造了市场；农业还扭转了韩国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这种依赖必然会更加严重。总体来讲，韩国农业在土地改革之后的发展与在“二战”之前的发展呈现出了很大差异，而且韩国与东亚国家的土地改革效果也存在差异，后者即便在改革之后，仍然不得不忍受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事实。

台湾的土地改革

在东北亚地区，台湾的农业发展历程是最有趣的，原因有二。第一，台湾岛的土地改革催生了最引人瞩目的发展成果。第二，如果单纯从地理角度来讲，台湾属于亚热带气候，在地理位置上，更大程度上是属于东南亚，而不是东北亚，因此，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就充分地说明一个地方的发展状况不是由地理决定的。东南亚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经济之所以不太成功，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出现了失误，而不是气候条件不佳。事实上，东南亚的气候比东北亚的气候更加有利于农业发展，因为东南亚一年四季都是生长期，而且经常降雨，水量充沛，比较有利于植物生长。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和日本部分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恐怕是最不利于农业发展的。

1949年，在中国内战结束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因为吃了败仗而退守台湾。大约100万人从中国大陆移居台湾岛，导致该岛的人口数量在短短几个月内从原来的600万飙升到了700多万。在1945年之前，台湾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将台湾视为稻米和甘蔗的主要来源，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力度一直比较大，尤其是在灌溉设施和土壤改良方面。在被日本占领期间，化肥的推广以及新型种子的引进推动农业产出显著增加，农业部门的人均实际收入也翻了一番。⁴⁶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台湾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土地租佃现象也表现出了日益增加的趋势，而且佃农背负的地租压力比日本还沉重，高质量土地的地租高达总产出的70%。此外，地主经常要求佃农提前支付地租，而且地主经常在不考虑佃农收入总量的情况下设定很高的地租标准。

蒋介石的国民党当局在被正式打败之前就预见到了内战的结局，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推行了限制地租的政策，即所谓的“三七五减租”。根据这项政策的规定，地租最高不得超过租地全年主要作物收获总量的37.5%，原约地租不及此数者依原约。国民党在大陆时就已经同美国支持的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进行了合作，抑制地租被普遍视为国民党为了讨好台湾农民而采取的举措。毕竟对于国民党军事、政治机器要长期驻留台湾岛，并非所有台湾本地人都持欢迎态度。除了限制地租以外，国民党当局还要求地主和佃农双方订立书面租约，租期不得少于6年，根据这个租约，如果地主主要收回土地，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从1951年开始，国民党当局给台湾农民送去了第二个“福利”，即实施土地改革的第二步——“公地放领”。所谓“公地放领”，指的是国民党当局把从日本人手裡没收的公有耕地，按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耕地不足的雇农、佃农，地价分10年偿还，偿还完毕，耕地为耕者所有，当局发给土地权证书，转为私有土地。到20

世纪50年代末，14万农户在这轮改革中直接受益。截至1958年，共放领公地7万多公顷，承领农户14万户，平均每户购得土地0.5公顷。然而，国民党还没有真正实施全面彻底的土地改革，即“耕者有其田”的改革。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此时已迁到台湾）和美国政府都竭力推动台湾实施更加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一方面，他们希望国民党能够通过这一举措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建立牢固的民众基础，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受到了日本土地改革的鼓舞，因为日本土地改革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暴力事件。蒋介石政府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数十年里，曾经竭力避免进行这种彻底的土地改革，最后还是被美国方面说服了，决定改弦更张。因为蒋介石政府做出这一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赢得台湾农村人口的支持，而且绝大部分国民党精英人士都是刚从大陆迁徙而来的，在台湾土地上几乎没有什么既得利益，所以当局内部不会产生阻挠土地改革的力量。

1953年，台湾颁布了一个彻底的土地改革方案，即《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台湾省施行细则》，其中的条款与日本、韩国曾经使用的条款非常相似：当局对地主超过3公顷的多余土地进行征购，并转售给需要土地的农民；土地征购价格是按照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计算（公开市场上的地价是按照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3~8倍计算）；当局给地主的补偿主要用收益率较低的债券和股票支付；佃农购买土地的费用分10年偿还。在这次改革期间，50%的地主被迫出售了不到1公顷的土地，将近20%的地主被迫出售了超过3公顷的土地。⁴⁷如同日本的情况一样，台湾也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地主，但事实表明，土地改革的效应仍然是非常大的。

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中，沃尔夫·拉德津斯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是他建议国民党当局在设立各级负责裁定农村土地出售与土地征购事宜的租佃委员会。自耕农、地主和佃农的共同参与有利于防止出现大范围逃避法规、谎报瞒报的情况。日本也曾经设立过类似的委员会，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在台湾，自耕农、地主和佃农的广泛参与是成功实现改革的基础，这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5年，自耕农的土地在农业用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只是略高于30%，而到了1960年，这个比重提高到了64%。⁴⁸购买土地的农民虽然需要向当局交纳一定的购地费用，但不必向地主缴纳地租了，所以，农民实际上相当于无偿获得了新的土地，承受损失的是那些被迫卖掉土地的地主，这与日本的情况是一样的。有人估计，土地改革相当于把大量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给了另一个群体，这部分财富相当于

台湾生产总值的13%。⁴⁹

台湾土地改革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影响，其中包括构建了教科书里描述的那种理想的、完美的、公平的市场环境，每一个参与者，即农民，都拥有等量的土地，而且提升了台湾地区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在一个社会中，当“财产性收入”在收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时，那么“劳动收入”就会显得更加重要，而且总体性的收入差距就会缩小。^[3]台湾地区曾经进行过一次家庭收入调查，结果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4]是0.56，与巴西处于同一个水平，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则下降到了0.33，这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是前所未有的。⁵⁰

对于收入分配趋于平等，普通台湾人是持欢迎态度的，但对台湾地区而言，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土地改革以及一个更有利于刺激农业产出的市场结构。20世纪50年代，台湾农业需要提供大量额外的粮食和就业，因为当时台湾地区的人口增速比东亚地区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快，而且农业还肩负着创造外汇的重任，以弥补国际收支差额。所有这些都实现了。水稻、甘蔗等传统作物的产量增长了50%，而且很多水果、蔬菜的产量也翻了一番。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2/3的出口收入都是由初级农产品和农产品深加工创造出来的。⁵¹一开始，糖是台湾地区主导性的外汇来源。台湾当局把之前归日本人所有的制糖厂收了回来，交给台湾糖业公司管理，并从农户那里购买甘蔗。⁵²从20世纪60年代起，家庭农场逐步实现了多元化种植，开始种植一些新的、附加值高的、劳动密集型的作物，比如蘑菇、芦笋和香蕉（香蕉主要集中在台湾南部）。

如同每一个成功实行土地改革的经济体一样，台湾地区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同时，还在兴建农业基础设施、推广农业科技、提供营销支持等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曾经见证了美国对外政策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但在台湾这些改革举措的实行过程中，美国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扶持作用。据估计，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对台湾岛的援助中，有1/3都是经过这个机构落实的，涉及大约6000个项目，占台湾农业净投资额的50%以上。这个机构为台湾援助了大量的农业研究人员和农业科技推广人员，这些援助者的数量与台湾人口总数的比例之大，是其他经济体无法相比的。⁵³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帮助台湾改良现有作物，开发高产品种，同时推广替代性

的、附加值高的作物，而台湾当局为了限制农户承担的风险，也经常承诺对出口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以芦笋这个颇受欢迎的新型出口农产品为例，芦笋种植是一个高度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据估算，种植1公顷的芦笋所需劳动量是种植1公顷水稻所需劳动量的2 900倍，工业创造就业的速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才开始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在此之前，芦笋种植为台湾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台湾第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就是食品加工业，最初的加工对象是糖类，后来扩大到芦笋、蘑菇、热带水果和其他作物。纺织业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口创汇。

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台湾的出口行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农产品驱动和主导的，这一点与东北亚其他经济体比较起来非常突出。台湾这段发展经历恰恰印证了劳动密集型的个体农业对整个经济的推动力。事实上，农业部门对台湾经济的贡献非常大，当局能够在不损伤农民积极性的前提下从农业部门汲取大量财富去哺育工业。台湾当局还垄断了化肥产业，这些化肥厂的化肥价格比世界市场上的化肥价格高出了10%到30%，并且以严重低于市场价格水平的价格强制收购了农民将近1/4的产品。即便如此，农业依然能够高效运作。

从总体上看，农业究竟受到了多大程度的“压榨”呢？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因为当局在“压榨”农业、哺育工业的同时，还持续不断地加强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力度，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台湾农民为该地区早期的工业化提供了资助。当局不仅可以利用农民的储蓄兴建工厂，而且由于农业收入在20世纪50年代增长了1倍多，农民也为早期的制造商销售自己的产品提供了关键的市场。⁵⁴

农业对台湾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如同明治时代的日本、“二战”后的日本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一样，台湾地区早期的工业发展也是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换句话讲，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不仅具有经济层面上的密切联系，因为农业为工业积累了财富，开拓了市场，而且还具有地理层面上的密切联系，因为很多新的制造企业最初都是从农村地区兴起的，而且农村地区造就了很多企业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分析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农业及工业发展历程时，如果分开去考察，就是一种武断的做法了。然而，不能把它们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因为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更加常见的发展道路就是“城市偏向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城镇和农村、农业与制造业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东南亚地区。在那里，后殖民地时代的政府没有认真对待土地改革问题，虽然做了尝试，但没有坚持到底，没有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彻底变革。美国方面也没有从外部给东南亚地区的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就这样，由于本国与外国的政客们都不相信家庭农业对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就为东南亚地区在经济上的相对落后埋下了第一个伏笔。在东南亚各国中，菲律宾以最痛苦的代价印证了这个事实。

[2] 这套法案包括《创建自耕农特别措施法案》和《农地调整法修正法律案》，其中一项规定就是日本政府购买所有外在地主的土地和在乡地主的多余土地，再把土地转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没有钱买地的农民，政府给予抵押贷款。——译者注

[3] 劳动收入是指各类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的各种报酬。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庭利用自身拥有的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动产和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土地改革后，台湾社会的财产性收入之所以呈现了下降趋势，是因为依靠出租土地的人越来越少。——译者注

[4] 基尼系数是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译者注

案例二：西内格罗省

在马尼拉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的跑道上，一架大型的私人飞机映着午后的斜阳缓缓滑落，如果你是从东北亚地区过来的，那么飞机降落的那一刹那，就是在提醒你离开了基尼系数为0.3的世界，进入了基尼系数为0.5的世界，也就是说，进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乘坐的飞机要飞往巴科洛德市。这是西内格罗省的一个主要城市，位于内格罗斯岛的西部。这个省份素有“菲律宾的糖碗”之称，因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一直都占据着菲律宾制糖工业的核心地位。

从马尼拉到巴科洛德市，只有短短一个小时的航程。放眼望去，只见高低起伏的沿海平原上尽是淡绿色的甘蔗，这里原本是郁郁葱葱的林区，但现在只残存着少数几片黯淡的树林。这时正值11月，甘蔗的收获季已经过去了一半，田野里冉冉升腾着一缕缕甘蔗根茬儿燃烧时产生的烟雾。新建的机场周围尽是甘蔗园，甚至与机场停机坪连接到了一起。在从机场去市区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片片的甘蔗种植园，一辆辆满载甘蔗的卡车缓慢地驶向制糖厂。很多骨瘦如柴的当地人在种植园里拿着弯刀割甘蔗或者把收货的甘蔗装上卡车，在菲律宾，这些割甘蔗的人从事的劳动被认为是最低级的劳动。

巴科洛德市的鼎盛时期早已过去了。20世纪70年代是该市的鼎盛时期。当时，美国虽然宣扬自由市场，实际上却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市场处于严重的保护状态中，食糖的价格也位于世界最高之列。不过美国却给这个前殖民地的制糖厂提供了大量的进口配额，使它们能够进入美国市场。⁵⁵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里经常可以看到糖业大亨们驾驶着美国最新款的加长版敞篷轿车四处兜风。在那个时代的老照片中，巴科洛德市与其说是一个亚洲城市，倒不如说更像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今天，这里还保留着一些赌场，虽然有手持短管霰弹枪的保安，但没有了当年那种狂妄嚣张的气势。

但菲律宾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农业状况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地主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大多数劳动都是由无地农民承担的；⁵⁶虽然一些农民曾经

在之前那次考虑不周、仓促荒唐的土地改革中获得了小片土地，但到现在大多数农民都选择把土地转让给了地主，或者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而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产量仍然很低（很多农场的产量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的产量），农场劳动者每天的报酬只有120比索（约合2.6美元）。⁵⁷

情况本不应该演变到这个地步。菲律宾曾经制定了大量的土地改革方案，其数量之多，堪称亚洲各国之最。但菲律宾的统治精英为了自身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挠真正的土地改革，阻挠手段之多同样堪称亚洲各国之最。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之后，在菲律宾建立了新的殖民政府。1904年，这个新政府承诺针对天主教会控制的土地进行再分配改革，帮助佃农获得土地。但美国人坚持要求严格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把土地出售给农民，这样一来，虽然农民享有优先购买权，但这种优先购买权没有意义，因为地价太高，农民没有那么多资金。到最后，这16.5万公顷土地几乎全部落到了商人手里。⁵⁸

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菲律宾农村地区经常因为贫穷而动荡不安，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农民对土地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势力也因时而动，不断发展壮大，受其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吕宋岛（菲律宾最大的岛屿）。后来，吕宋岛爆发了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虎克军叛乱”，导致以前那种间歇性的、小规模在农村反叛终于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武装对抗。为了应对这种乱局，缓和农民情绪，菲律宾政府制定了一套新的租佃法案，但最后由于地主阻挠而没有得到落实，同时菲律宾政府还把数千名无地农民迁移到其他地区进行安置。（华盛顿方面在1916年给菲律宾政府下放了一些权力，所以它才有权采取这些措施。）虎克军叛乱愈演愈烈，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后来蔓延到了整个菲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收复菲律宾，很多地主通过纠集私人武装而收回了在虎克军叛乱中丧失的土地。这个国家到处都充斥着武装冲突留下的武器。1946年，菲律宾独立，之后，虎克军叛乱更加严重，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菲律宾独立之后，美国仍然通过其军事基地深度干预菲律宾事务，先后于1950年、1951年委托一些机构对菲律宾的情况进行了调研，拿到了两份报告，这两份报告均明确指出，要结束农村地区的动荡，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再分配改革。⁵⁹

然而，虽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支持彻底的土地改革，华盛顿方面却没

有像支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那样支持菲律宾。为了帮助菲律宾解决农村的难题，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多个美国机构联合建立了菲律宾农村复兴运动组织，并为该组织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但这个组织不主张进行强制性的土地再分配。从1954年到1955年，菲律宾政府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根据这些改革，种植水稻和玉米的农民有权要求同地主签订书面租约，地主用于出租的私有土地不得超过300公顷，政府将征用超过这个界限的土地，将无地农民和叛乱分子安置在公共土地上（但这样做会导致没有防御之力的部落族群丧失家园）。这些改革措施，加上有美国人帮菲律宾训练军队，而且菲律宾政府不遗余力地镇压叛乱，结果严重打压了虎克军叛乱的势头。1963年，菲律宾的改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征用土地的界限从300公顷降低到了75公顷。然而，菲律宾政府只是在个别被宣布进入“土地改革时代”的地方强制收购了地主的多余土地，土地改革并没有全面而彻底地展开。⁶⁰

菲律宾政府只是为了避免全面内战才被迫采取些许的改革措施，而且想方设法地把改革力度降到最低，因此并没有建立一个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经济。当年确立的农业模式得到了长期延续。1969年，虎克军叛乱的残余势力再度掀起波澜，与经过重组的菲律宾共产党实现了合并，形成了新的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20世纪70年代早期，新人民军开始和渴望和平改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进行合作，而且居然在中国革命者的启发下，在菲律宾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就像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做的那样，新人民军也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实行了地主减租减息的改革举措，有时候也会实行土地再分配改革。

1972年12月，正值新人民军刚刚勃兴之际，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签署“军事戒严令”，宣布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为了给军事管制的合理性寻找辩解理由，他反复强调只有专制政府才能实现土地改革。第二年，在实行军事管制一周年之际，马科斯在一次讲话中承诺要在菲律宾建立“新社会”，这与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也在中国承诺实现“新生活运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马科斯认为：“土地改革是判断新社会成败的唯一标准……如果土地改革失败了，就不会有新社会。”但到最后，和中国的蒋介石一样，马科斯也只是给国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几乎没有土地改革，也没有什么新社会，而且马科斯搞的小规模的土地改革仅仅局限于种植玉米和稻谷的地区，而且政府征用土地时主要是拿马科斯的政敌开

刀。⁶¹

到1986年马科斯倒台时，他原本就十分有限的目标还没有实现1/4。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估计新人民军的规模为25 000人，而且菲律宾每8个村庄中就有1个处于新人民军控制之下。1986年1月，也就是马科斯逃跑的前一个月，陷入绝望的菲律宾政府采取了一个铤而走险的举措：向那些还没有办理完土地改革申请程序的农民发放了“土地专有证”，即确认农民对某一块土地拥有所有权的地契，但事实上由于菲律宾政府在此之前并没有实施强制性的土地改革，所以，地主不会仅仅凭借一张地契就把土地分给农民，这种证书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了。如同美国为了支持中国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而于1948年到1949年设立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如同美国到了1969年才最终决定支持阮文绍在南越开展土地改革一样，菲律宾政府此时想实行土地改革也为时已晚。根据瑞丁格尔（Reidinger）在其专著《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中提到的统计数据，从1900年到1986年，菲律宾的土地改革总共重新分配了31.5万公顷土地，而这只相当于该国耕地总面积的4%。⁶²

名不副实的土地革命

如果说费迪南德·马科斯是一位失败的土地改革家，那么他的继任者科丽·阿基诺（Cory Aquino）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句公道话，作为一位被谋杀的政治领导人的妻子，科丽更加习惯于同其丈夫的客人在无关紧要的话题上进行闲聊，而对于菲律宾黑暗混乱的政治局面，她是无能为力的。她虽然是反马科斯力量的名义领袖，但没有自己的政党。她所属的许寰哥家族

（Cojuangcos）是菲律宾的地主家族，在吕宋岛的打拉省拥有6 400公顷土地。她的弟弟小何塞·许寰哥（Jose Cojuangco Jr.）是菲律宾议会中反对土地改革的地主势力的领导人。直到菲律宾发生了“曼迪欧拉桥大屠杀”事件（Mendiola Massacre）之后，科丽·阿基诺才开始正视土地改革问题。

（1987年1月，马尼拉爆发大规模农民示威，警察至少打死13人，打伤90人，因屠杀地点位于曼迪欧拉桥附近，所以被称作“曼迪欧拉桥大屠杀”。）她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让菲律宾议会制订出一个新的土地改革法的细节方案，而没有亲自承担起改革的领导权。

结果，1988年，菲律宾议会通过了《综合土地改革法》（Comprehensive Agrarian Reform Law），虽然该法案被称为菲律宾历史上最全面的土地改革法案，但该法案极其冗长，内容过于复杂，改革举措不够彻底，而且存在很多漏洞，落实的时间表也长得荒谬，以至于25年后的今天，经历过两次延长，这个法案仍然没有落实完毕。尽管如此，政府的更迭（马科斯倒台，科丽·阿基诺上台）仍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加上新政府“承诺”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请注意，只是“承诺”），再加上菲律宾政府对新人民军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严重削弱了新人民军的势头，最终导致新人民军失去各种支持并出现内部分裂。

在土地改革的立法阶段，科丽·阿基诺曾经发表过一些堪称菲律宾政治界最动听的言论，其中包括“我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而不要求任何人比我做出更多的牺牲”。⁶³然而，当她的家族寻求特权以避免自己的土地在改革过程中被分割时，她却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显然，她的政府尽管被称为“人民力量的政府”，肯定也无法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综合土地改革法》里的很多漏洞也为地主逃避土地改革创造了机遇，比如，隶属于阿基诺家族和许寰哥家族的路易西塔庄园（Hacienda Luisita）就利用这部法律中的“股权分配计划”条款来逃避土地改革。这一计划原本的意图是在把土地分配给佃农之前，允许庄园主通过股权分配让渡部分收益，即佃农可以获得庄园的股份，同时继续为庄园有偿耕作。[\[5\]](#)

除了存在“股权分配计划”这个漏洞之外，《综合土地改革法》还存在其他一些漏洞，比如规定佃农可以“主动转让土地”、“主动出售土地”等。然而，要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那样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必须遵循一条最根本的准则：不允许地主同农民直接谈判。换句话讲，所有涉及土地转让、出售的事宜，必须经过第三方组织进行处理，不允许地主同农民直接谈判交易。在菲律宾这种情况下，由于地主势力肯定大于佃农势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地主会在谈判中商定一些有利于自身的条款。以“股权转让计划”这个条款为例，地主可以高估一个庄园里的“非土地要素”和“管理要素”的价值，而低估土地要素的价值，然而由于庄园的股东，即佃农，是以土地要素入股的，所以股东的收益将会非常少。自从实行“股份制”改革以来，路易西塔庄园就一直被罢工和动荡问题困扰着，佃农说他们一年的“红利”只有2 000比索（约合43美元）。

对于了解路易西塔庄园历史的人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菲律宾的土地改革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寰哥家族通过放高利贷的方式在打拉省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后来，到1957年，这个家族先是从西班牙塔巴克莱拉烟草公司（Tabacalera）手中买下了现在的制糖厂，继而向菲律宾中央银行贷款，买下了一大片土地。⁶⁴但当时许寰哥家族无力偿还这笔庞大的债务，于是菲律宾中央银行便延长了还款期限，条件是10年后这个家族必须把这片土地以合理的价格和条款归还给佃农，但该家族从来没有履行过这个承诺，而且从没有被追究责任。这类人居然能成为总统（许寰哥家族的重要成员科丽·阿基诺担任过菲律宾总统，而她的儿子阿基诺三世为现任总统），着实为菲律宾的发展制造了障碍。

菲律宾官方口中的成功改革

菲律宾政府宣称已经实现了《综合土地改革法》的大部分目标。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末，共计680万公顷农业用地进行了改革（目标是820万公顷），惠及410万农户。⁶⁵这听起来很像东北亚地区的土地改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首先，菲律宾政府的统计数据囊括了所有类型的地契，而事实上佃农获得了地契，并不等于获得了土地，实际的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发生变更。1/3的新地契都是集体地契，因此，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地契，通常一张地契包括了数百个或者数千个假定的受益人。很多在理论上已经完成再分配改革的土地，实际上却被佃农回租给了原来的地主，或者非法出售给了原来的地主或其他人。此外，原定于进行土地改革的820万公顷土地中，只有1/3是地主的私有土地，其余的土地大多是公共土地，包括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公共林地。

（《综合土地改革法》原定目标是改革1 030万公顷土地，而且私有土地的比重比现在高很多，但后来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菲律宾政府就大幅减少了进行改革的私有土地面积，并将总体改革目标下调到了820万公顷。）⁶⁶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像路易西塔庄园这类的商业性农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在改革之前，菲律宾政府根本没有开展可靠的土地调查，没有摸清

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因此，对于改革的目标和结果，难免一直让人存在困惑。监督土地改革进程的委员会不是由佃农组成的，而是由政府官僚组成的，这些官僚不仅没能力、没资源行使监督权力，而且时常接受地主的贿赂。一些私有土地虽然进行了再分配，但都是通过地主与佃农进行直接谈判的方式进行的，因为《综合土地改革法》中有“主动转让土地”、“主动出售土地”的规定，有时候他们议定的条款对佃农十分不利，以至于土地转让、出售过程无异于抢劫了穷人的财富去送到富人的手中。⁶⁷

要确定菲律宾的土地改革是否具有实质意义，最有力的数据就是政府从地主手中强制征购了多少土地。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成功开展土地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先强制征购地主的土地，然后实行再分配。截至2006年，在《综合土地改革法》之下，菲律宾政府仅仅强制征购了30万公顷土地，在政府宣称已进行改革的土地中仅占据5%，在菲律宾可耕地总面积中仅占2.5%。

《综合土地改革法》还规定了较高的土地保有标准，地主每人可以保留5公顷土地，而且每名15岁以上的子女均可每人保留3公顷。因为一些地主有多名子女，所以原来的地主就可以继续保有大量的土地。时至今日，在菲律宾1 120万农业劳动者之间，估计有850万人仍然没有土地。⁶⁸农村地区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贫困状态中，土地的产量低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而且这种情况很多年以来都没有改善。所有这一切居然发生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简直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因为在很多方面上，菲律宾享有的优势远远超过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比如，在菲律宾，可耕地面积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高达1/3，而这个比重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要低得多，而且菲律宾的气候条件、土壤质量都更加有利于提高产量。菲律宾人在大好机遇面前把事情搞砸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地主的世界

从巴科洛德市一路向南，驱车进入内格罗斯岛的农村地区，你就会发现菲律宾农业的真实面貌。⁶⁹虽然官方数据赞扬菲律宾土地改革已经把大量土地再分配给了农户，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大片大片的商业性的种植园，这些种

植物园动辄连绵数千米，种植的作物包括芒果、霹雳果（果仁可用于制作巧克力和冰激凌等食品）、红毛丹（荔枝的亲缘植物）、香蕉、菠萝蜜和榴莲。我们时不时地能看到一群群农民在种植园中辛勤劳作的身影。虽然菲律宾曾经进行过土地改革，但一般的种植园主都没有受到冲击。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爱德华多·丹丁·许寰哥（Eduardo Danding Cojuangco）的世界。

爱德华多·丹丁·许寰哥是科丽·阿基诺的堂弟，也是菲律宾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的舅舅。他还是内格罗斯岛最大的地主、菲律宾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因此被佃农们称为“丹丁老板”（Boss Danding）。他代表着西内格罗省最强大的农业力量与政治力量。近年来，他把大量甘蔗种植园改种了其他作物。虽然理论上来讲菲律宾一直在进行土地改革，但他的庄园从来没有停止过扩张的步伐，以至于现在他拥有的庄园至少有6 000公顷，遍布内格罗斯岛6个城市。⁷⁰其中有一个城市是庞特维德拉。他居住在这个城市附近一栋颇有隐逸之风的豪宅中。当地人把这座豪宅称为“白宫”。他的娱乐爱好既包括亿万富翁、花花公子式的标准配置，比如豪车、昂贵的大型摩托车、赛马、私人飞机，还包括具有菲律宾特色的配置——猎枪和斗鸡。他拥有数百只斗鸡，很多都曾经参加比赛并得过奖。在斗鸡场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地上摆放着数百个巨大的笼子，斗鸡趾高气扬地在里面走来走去。每只斗鸡价值5 000比索（约合108美元），而这相当于贫困家庭一个月的收入。在附近的拉斐尔·萨拉斯自然公园，有一座小山，曾经是菲律宾新人民军的游击队基地，登到山顶，可以一览无余地鸟瞰爱德华多·丹丁·许寰哥庄园的全貌，包括深绿色的果园和浅绿色的甘蔗园。今天，由于武装冲突暂时平息了，新人民军的一些散兵游勇便被爱德华多·丹丁·许寰哥雇用过来守卫他的土地。用这种方式雇用保安，比豢养一支常备军廉价得多。厄尔·帕雷诺

（Earl Parreno）在《丹丁老板》（Boss Danding）一书中指出，菲律宾有传言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新人民军的武装叛乱达到巅峰的时候，爱德华多·丹丁·许寰哥豢养的私人武装包括1 600多名战士，部署在多个庄园，而且聘请以色列军官对其进行培训。⁷¹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菲律宾不仅逍遥法外，居然还能在西内格罗省和菲律宾其他地方获得越来越多的土地，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他是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头号亲信，1986年2月，美国军队护送马科斯及其夫人伊梅尔达离开菲律宾时，他也跟随马科斯开始了逃亡生涯。在马科斯的保护

下，他曾经担任菲律宾发展银行的行长，但利用职务便利把大量资金贷给了自己的公司。他还垄断了椰子营销，20世纪70年代，椰子是菲律宾主要的出口产业，他利用这个产业的税收资助自己的商业帝国，其中包括接管菲律宾一家大企业——生力啤酒厂。他还设立了联合椰农银行（United Coconut Planters Bank），结果使他得以变本加厉地利用别人的资金满足个人私利。⁷²

尽管劣迹斑斑，他却能在流亡几年之后于1991年11月返回菲律宾。马科斯的其他心腹要返回菲律宾，都必须同科丽·阿基诺政府达成协议，放弃部分资产才能回国。而丹丁却在没有放弃任何财产的前提下返回了菲律宾。他回国之后，就定居在了西内格罗省。他的妻子就来自这个地方，而且他在当地控制着自己的政党，也控制着当地大多数的市长和议员。⁷³

在土地改革进程中，丹丁为了让自己的庄园免于遭到瓜分的命运，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这些措施类似于科丽·阿基诺家族为了让路易西塔庄园免于被瓜分而采取的措施。丹丁提出了“合作性土地改革”，即把庄园变为地主与佃农共同持股的“合资企业”，佃农在名义上获得了庄园的土地所有权，但地主仍然保留着管理权和控制权。事实上，“转让”所有权的前提条件是接受他对庄园的继续控制。⁷⁴

合资企业是丹丁与佃农通过直接谈判建立起来的，而谈判过程没有得到政府的监督。根据最终商定的条款，丹丁按照市场价格支付佃农的劳动，而且丹丁还将拿出庄园净收益的35%作为红利分给佃农。自不必说，丹丁肯定不会邀请外人去查看他的账本。当他需要同其佃农“合作伙伴”进行谈话时，就会让他们到他在“白宫”附近建造的巨大的斗鸡场上集合，而不是到庄园里集合。菲律宾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对其提出的“合作性土地改革”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甚至菲律宾前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还在公开场合表彰其为“土地改革的教父”，显然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

佃农的世界

我们继续驱车前往另外一座庄园。这座庄园的主人是罗伯托·贝内迪克

托（Roberto Benedicto）。他现已去世。如同丹丁一样，他也曾是菲律宾前独裁者马科斯的一个重要追随者，同马科斯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而且如同丹丁垄断了菲律宾椰子交易一样，罗伯托·贝内迪克托垄断了菲律宾的蔗糖交易。他在内格罗斯岛所做的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就是豢养了一批恶棍，组成了所谓的“治安维持会”，专门谋杀那些反对马科斯政权的人。⁷⁵他拥有一座面积多达564公顷的庄园，被称作“埃斯佩兰萨庄园”（Hacienda Esperanza）。[\[6\]](#)

当初，丹丁结束流亡之后刚刚返回菲律宾时，曾经提出要收购罗伯托·贝内迪克托的埃斯佩兰萨庄园。然而，后来这个庄园的一些佃农向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根据《综合土地改革法》对该庄园进行土地改革，致使丹丁的收购计划不了了之。佃农提出土地改革申请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充分表明了菲律宾土地改革制度的失灵。

为了应对佃农的土地改革申请，贝内迪克托家族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收买一群较为温顺的佃农，同他们建立一个“联盟”，然后指使这个“联盟”公开声明反对土地改革。除此之外，贝内迪克托家族还派人游说菲律宾政府和议会，宣传土地改革的弊端，结果这件事情成了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经过长期角逐后，菲律宾中央政府做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决定：强制改革。政府为这个庄园的佃农发放了“土地专有证”，从理论上承认了佃农对土地的所有权。菲律宾土地改革部部长还亲自前往内格罗斯岛监督落实情况，帮助那些被解放的农民切实获得“土地专有证”上的土地，但武装保安和“联盟”的成员阻止他进入庄园。佃农试图通过武力方式强行占领政府分给他们的土地，结果保安枪杀了一人，另外打伤两人。⁷⁶

最终，菲律宾政府只有强制实行改革。其实，在佃农遭到枪杀之后，强制实行改革就成了菲律宾政府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最后，在政府强力干预下，埃斯佩兰萨庄园遭到了拆分，部分佃农获得了土地。但如同大多数菲律宾土地改革一样，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这次改革也没有实现圆满的结局，因为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但他们太穷了，根本没有独立耕作的能力，而国家几乎没有给他们提供过任何支持，结果导致大多数农民立即把土地回租给了贝内迪克托家族，自己坐收红利，而每年的红利只有12 000比索（约合240美元），这样一来，被解放的佃农再次沦为雇农。

一些比较坚韧刻苦的人努力独立耕作好自己的土地，他们通过非正式途径借来周转资金，年利率高达50%~120%。比如，贝内迪克托家族庄园的经理人就从事非法借贷行为，月利率是10%。由于贝内迪克托家族几乎控制了当地所有的制糖厂，因此成为了当地甘蔗的唯一收购者，他们把甘蔗的收购价压得非常低，导致蔗农几乎很少实现赢利。蔗农为了获得贷款，每年都必须在生长季早早地把甘蔗抵押出去，由于无法实现赢利，而且贷款利率过高，很多人在3年之内便经营不下去了。当债务形势失控时，放贷人就会收回借贷人抵押的土地，直到借贷人还本付息之后才能赎回土地。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走过同样的路子。

独立耕作的农民陷入了贫困的泥潭，只有放贷者是高兴的，因为他们能借机占有更多的土地。在贝内迪克托家族的土地上，甘蔗产量只有区区52吨/公顷，这与1978年后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土地改革后的土地产量相比低了50%多。与东北亚地区的农民相比，埃斯佩兰萨庄园土地改革的受益者以及菲律宾其他地方的农民都更加迫切地需要政府在信贷、农产品营销和农业科技推广方面提供支持，因为他们以前基本上都是在种植园里劳动，更加习惯于根据别人的指示去耕作，没有养成独立自主耕作的能力与习惯。与菲律宾的佃农相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那些能够以低价购买土地的佃农，以及中国那些无须出钱就能自动分得土地的农民更具有独立自主耕作的能力。此外，东北亚地区的政府几乎在每个农村都为农民提供了信贷和技术支持，但菲律宾农民什么也没有。西内格罗省曾经开展过一次调查，97%的受益者都表示从来没有得到菲律宾政府的任何支持。⁷⁷在内格罗斯岛，很多农民利用回租土地的收益购买“卡拉OK”等娱乐设施，农民在破旧的小房子里围着卡拉OK唱歌的情景成了菲律宾被解放农民的典型象征，这几乎没有任何令人惊讶的地方，因为独立耕作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很多农民不愿耕地。

为菲律宾的失败把脉

菲律宾改革过程中也曾经取得过阶段性的成功，但这些成功都是非政府组织介入的结果。它们为农民提供农业信贷、科技推广、农产品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填补了国家留下的空白，有利于家庭农业的繁荣发展。

如果非政府组织不这么做，像贝内迪克托家族这样一直控制着农业劳动者的地主家族也会这么做，这样一来，虽然他们理论上已经放弃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但农民仍然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在埃斯佩兰萨庄园里面，只有21个农户获得了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合作组。有一点是无须赘言的，即和那些没有获得非政府组织支持的250户农民相比，这个合作组农民肯定是政治觉悟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更加善于表达自我诉求的人。我们去拜访这些农民的时候，利托（Lito），也就是这个合作组的领导者，亲自来到庄园的外面迎接我们，引导我们绕开贝内迪克托家族那些随身带有武器的保安，来到他们分到的那20公顷土地上。他们的土地被贝内迪克托家族的庄园环绕着。在前往他们那片土地的路上，我看到了一个用木头做成的十字架竖在田地里，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因为试图夺回“土地专有证”上的土地而被保安枪杀的农民。在一个会客小屋前面的树下，利托坐了下来，向我解释说他们那21个人可以从一个轮转信贷协会[\[7\]](#)中借到120万比索（约合2.4万美元），而其他独立耕作的农民只能从非法途径去借高利贷，结果导致95%的人都陷入了无力偿付的高利贷债务中。

一个名为“互助贸易”（Alter Trade）的非政府组织还为农民提供科技推广方面的支持，帮助农民种植新型农作物并制作有机蔗糖。他们现在大部分食品都是自己制作的，再也不用担心甘蔗歉收会引发饥荒了。非政府组织还通过欧洲的“公平贸易运动”（Fair Trade Movement）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同类组织，帮助菲律宾农民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蔗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菲律宾农民销售的高级有机蔗糖的最大买家居然是日本、韩国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富裕起来的农民。

自从2004年同“互助贸易”组织议定了合作条款之后，利托那个合作组就还清了债务，而且实现了足够的赢利，他们购买了1辆二手拖拉机、1辆卡车和10辆牛车。这一组人耕种的土地的甘蔗产量非常高，与贝内迪克托家族的土地产量相比，甚至高出了25%。此外，他们还注重储蓄，准备购买灌溉设备，由于菲律宾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非常有利于农业发展，因此，如果有了灌溉设备之后，应该能进一步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甚至可能会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产出效率。

在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名叫伊萨贝尔的庄园，另外一个合作组的农民在“互助贸易”组织的支持下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在这个小组中，共有80个人持有“土地专有证”，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企业”，耕种了80公顷土地，种植的作物包括甘蔗和一些粮食作物，但他们养活着500个人。这个互助组的领导人自豪地向我炫耀着一辆大型的全新拖拉机。这是他们花了150万比索（约合3万美元）购买的。此外，他们还利用留存收益购买了1辆中型的拖拉机和1辆卡车。按照当地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显然已经达到了“富裕”的标准。这个小组达到青春期的子女中，有80%都在读中学，一些还要去读大学。

然而，如同利托的合作组一样，这个合作组也不具有菲律宾农民的典型特征，主要是因为他们政治觉悟较高，其组织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有些成员曾经在菲律宾新人民军中担任过军医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所以才能组织并维持这样一个“集体企业”。在菲律宾这样一个农业劳动者贫穷潦倒而且时常受到各种威胁的社会中，如果没有组织能力突出的人出面，就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这样的“集体企业”。他们为了获取政府的公共服务而努力奋斗。在他们的游说下，政府才最终做出了强制推行土地改革的决定。他们还把伊萨贝尔庄园的主人告上法庭，质疑他那个家族非法保留了一些土地，要求获得更多的土地，因为该家族原本有两个人，但他们登记的时候，却登记了7个孩子。除了从“互助贸易”组织获得周转资金之外，他们还从一个荷兰教会赞助的慈善机构获得了购买新拖拉机的贷款。他们还利用一个支持、同情他们的德国超市连锁企业提供的资金为成员购置了部分电器。而且在2009~2010年的冬季，他们建造了一个拥有20个房间的招待所，用来接待那些来到巴科洛德市考察有机甘蔗种植情况的日本、韩国的富裕消费者。总而言之，他们了解非政府组织的运作体系。

埃斯佩兰萨庄园和伊萨贝尔庄园这些农民的情况既让人乐观，因为一些人和一些组织能够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又让人悲观，因为这些合作社的资源和非政府组织投入的规模恰恰折射了菲律宾政府的无能。事实上，大多数农业劳动者自我组织能力薄弱，从来都不曾形成这样高效的合作社，内格罗斯岛的非政府组织虽然能为数百个农民提供支持，但根据菲律宾政府所说，土地改革受益者的数量多达12万。非政府组织无法照顾到所有农民，便非常明智地把援助目标锁定在那些他们认为最有能力实现成功的农民身上，而留下那些最弱勢的农民自谋出路。

菲律宾在农业领域的失败，根源在于政府制定了失败的政策。慈善机构的援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失败造成的后果，但无法完全弥补政策的失误，这就如同在菲律宾农业的开放伤口上贴了一些膏药一样，虽然暂时起到了缓解痛苦的作用，但无法彻底治愈伤痛。在东北亚各经济体中，农业之所以能实现引人瞩目的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自身能够实现有效动员，迅速而公平地进行了土地再分配改革，之后又为农户提供了必要的信贷、科技推广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提高了农户实现产出最大化的能力和动力。菲律宾政府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努力。相反，菲律宾虽然是东亚地区最薄弱的经济体，但菲律宾却涌现出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估计有6万到10万个，从非政府组织数量与本经济体人口总量之间的比率来看，菲律宾的比率在东亚各国中是最大的。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规模一般都很小，因为它们拼命地挣扎着，弥补菲律宾政府在农业发展方面的不足。

各种标准下都堪称低效的改革

从伊萨贝尔庄园出来，我们重新回到了公路上，继续驱车前往东南部的卡斯特兰镇，途中又经过了一些势力更加庞大的家族的庄园，其中包括阿罗约家族的庄园，强有力的灌溉水泵正在给庄园里的甘蔗浇水。最近刚刚被打败的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就属于这个家族。这个家族在内格罗斯岛拥有好几个庄园。阿罗约总统的丈夫迈克·阿罗约是大地主和大商人，迈克的弟弟伊格纳西奥·阿罗约（Ignacio Arroyo）是大地主、大商人和西内格罗省议员。早在2001年，阿罗约就曾经向菲律宾民众承诺说将对其家族的庄园进行土地改革，但实际上这种承诺从来没有兑现过。在西内格罗省农村地区转上一圈，仿佛来到了名人堂一般，到处都是大家族的庄园，而正是这些大家族才导致菲律宾在获得独立后一直处于举步维艰的发展状态。总体来看，西内格罗省的大家族主要包括许震哥家族、贝内迪克托家族、阿罗约家族、昆卡家族、洛佩兹家族等。马帕拉达工作组（Task Force Mapalad）是菲律宾旨在促进土地改革的最大团体，根据该团体估计，《综合土地改革法》实行了15年之后，17个家族仍然控制着西内格罗省78%的甘蔗田。⁷⁸

到目前为止，菲律宾的农业生产效率仍然低得出奇。虽然内格罗斯岛的

地主一再坚持说只有利用种植园去种植甘蔗，才能具有竞争力，但菲律宾种植园的甘蔗种植效率远远低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南部的效率，菲律宾的每公顷土地的甘蔗产量是56吨左右，而中国大陆和台湾南部的产量则是85~90吨左右。内格罗斯岛根据《综合土地改革法》而实行的土地再分配并没有带来产量的提高，因为国家没有为家庭农业提供它所宣称的那些支持，而且因为改革进程遭到了地主的破坏。

2007年，西内格罗省曾经进行过一次关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调查，结果表明农业土地改革的受益者收入状况非常惨淡，而且农业生产率只有非常微小的提升，70%的土地改革受益者都表示他们的状况比改革之前基本上好不到哪里去。⁷⁹前文提到的那两组曾经得到“互助贸易”组织支持的农户，也就是埃斯佩兰萨庄园和伊萨贝尔庄园的那两个合作组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他们每公顷土地的甘蔗产量大约是70吨，比该省普通农户的产量高出了25%，但远远低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甘蔗产量。在东北亚地区，灌溉设备一般被纳入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中，而得到“互助贸易”组织支持的那些农户却要用自己的资金去购买灌溉设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节约资金。在内格罗斯岛的农村地区，有不少河流，而那里的甘蔗田居然得不到良好的灌溉。我在旅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告诉我，东亚最贫穷的地方往往集中在那些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比如菲律宾这种条件十分优越的地区。

菲律宾虽然穷得令人惊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农产品的价格就是便宜的。内格罗斯岛每磅蔗糖的最终成本，包括精炼成本在内，是15美分，而近些年来，在世界市场上，每磅蔗糖的批发价格一直维持在10~12美分之间

（2009年夏季开始上涨了）。内格罗斯岛上的12个制糖厂被称为当地的“支柱”，但它们的设备在全球而言都是比较落后的，而且在菲律宾，出糖率还没有50年前高。由于菲律宾在2010年对蔗糖进口实行了免税政策，进口蔗糖对当地制糖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当地制糖工业的前景并不妙。地主的状况之所以比普通农民的状况好一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能接触到正规的银行体系，可以获得低息甚至无息的贷款，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美国的蔗糖进口配额，获得了这种配额，就保证了每磅蔗糖的出口价不低于18美分，所以他们能够实现赢利，正如对菲律宾制糖业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迈克尔·毕利希（Michael Billig）所说，一个拥有60公顷土地的种植园主能够承担得起在巴科洛德市的家里聘请12个用人以及在马尼拉买套公寓

的费用。⁸⁰

除了甘蔗种植的生产效率较低之外，其他作物也是一样。菲律宾最大的两种作物——水稻和玉米的产量分别是3.8吨/公顷和2.6吨/公顷，而在台湾，水稻和玉米的产量则分别是4.8吨/公顷和3.8吨/公顷。20世纪80年代，有机构在亚洲多个经济体开展了关于农业附加值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农作物和农业牲畜带来的价值，结果表明不同经济体的农业附加值总值表现出了巨大差异，菲律宾每公顷土地能带来的附加值为655美元，中国大陆是2 500美元，中国台湾是5 000美元，韩国是7 000美元，日本是10 000美元。这些数字包括了国家给农民的补贴。但即便与20世纪70年代晚期才重新回到家庭农业道路上的中国相比，菲律宾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这就清楚地说明菲律宾政府的政策存在问题。⁸¹

沃尔夫·拉德津斯基曾经好几次前往菲律宾，见证了菲律宾农村地区早期土地改革的真实情况，并且一如既往地得出了一些深刻独到的见解。1962年12月访问完菲律宾之后，拉德津斯基写道：“我在听佩雷兹先生（时任菲律宾财政部代理部长）讲话时，情不自禁地告诉他，从根本上来讲，菲律宾的自然条件是非常优越的，但依然贫穷，这让我想起了印度的贫困地区。”拉德津斯基还提到了他和马尼拉的一些富人在他们的豪华住宅中进行的对话，菲律宾富人们认为菲律宾的农民天性懒惰，谁也拯救不了他们。我们至今仍然能听到这种观点。拉德津斯基还拜访了国际水稻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享有“自然与科学之城”美誉的拉古纳省洛斯巴诺斯市，是亚洲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国际农业科研机构，曾经在亚洲发起了“绿色食品革命”。拉德津斯基认为，洛斯巴诺斯市的高产水稻品种改变了东北亚数百万人的生活，但对于菲律宾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灌溉、施肥、信贷和营销等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没有落实到位。关于菲律宾农民真实的本性，他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菲律宾当前的大环境下，如果一个佃农试图提高产量，就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劳动成本会被地主、放高利贷者或商人拿走。”即便到了50多年后的今天，拉德津斯基的话仍然是正确的。⁸²

苏加诺只开空头支票

菲律宾也许是东南亚土地政策失灵的最极端的例子。然而，如果你继续考察一下菲律宾周边地区，就会发现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农业发展模式，只不过情况没有菲律宾这么严重而已。

印度尼西亚在获得独立之后，也就是1945年之后，苏加诺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向国民承诺会采取越来越激进的农业发展政策。1957年，外商控制的种植园（主要是荷兰人控制的）被收归国有。然而，虽然苏加诺口头上说要开展土地改革，但他个人不了解农村问题，而且地主阶层的精英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而采取了一系列抵御改革的措施，导致苏加诺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效率。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改革立法和实施条例都遵循了菲律宾模式，结果肯定归于失败。

到1960年，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岛屿——爪哇岛，已经成为了亚洲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岛屿之一。在那里，足够幸运的人能够拥有一点土地，但总体来看，人均土地面积不到0.5公顷，而60%的农村人口是没有土地的。⁸³尽管如此，印度尼西亚在土地改革中规定，地主可以保留5公顷土地，而且由于法律存在漏洞，一些地主保留的土地面积甚至可能会高达20公顷。此外，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改革没有触动数量十分庞大的富农阶层的利益。大规模的“不在地主”（absentee landlord）可以选择在6个月的时间内回到所拥有的土地上，或者选择将所拥有的土地出售给正在耕种这些土地的佃农，以免土地被国家强行征购或尽量减少被征购的面积。⁸⁴在土地改革之前，很多地主提前与佃农直接协商，把土地转让给了佃农，以免被国家征购，以至于土地改革中在国家主导下真正实现再分配的土地非常少。虽然印度尼西亚也设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但被地主把持着，所以，他们阻挠土地再分配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沃尔夫·拉德津斯基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度访问印度尼西亚，其中有一次他还曾经到农村地区进行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他认为该国的土地价格计划过于复杂，效率低下，而且进度缓慢。他估计爪哇岛在土地改革中真正得到再分配的土地还不到土地总面积的2%，巴厘岛在土地改革中真正得到再分配的土地甚至可能只有土地总面积的4%。他给一位在美国政府工作的同事写信说：“印度尼西亚的土地改革法案数量太多，凌乱破碎，相互矛盾，过于保守，而且过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干

扰，只有出现奇迹，才能帮助他们看懂这些法案。”⁸⁵

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奇迹，土地的产量一直没有提升就是最好的证据。虽然爪哇岛的土壤是肥沃的火山土，即由火山喷出物所生成的土壤，但1963年拉德津斯基在爪哇岛进行了长期考察之后发现，这里的每公顷土地的水稻产量只有日本的1/3。印度尼西亚政府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确曾经组织过农业科技推广运动，为农民提供肥料，改良种子，出资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但由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这些措施对提高产量的作用微乎其微。背负着沉重债务的佃农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劳动者已经丧失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产量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即便产量提高了，大部分新增产量将会落入地主手中。此外，地主和当地的其他政治精英还侵吞国家为了支持农村发展而拨付的财政资金。

1967年，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他集中精力采取了一系列农业科技推广措施，力图提高农业产量，起初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苏哈托政府对稻米承诺了最低价格。然而，有大量证据表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用于推广农业科技的资金以及其他资金遭到了贪污挪用，导致稻米等农作物的产量开始出现下滑趋势，在贪污挪用这些发展基金的个人和机构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国政府在农村地区设立的农产品营销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并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价格收购农产品，而是把国家拨付的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⁸⁶

印度尼西亚虽然开展了土地改革，但并没有成功地改变土地分配格局，也没有摆脱东南亚地区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粮食政策，即“过于注重为消费者提供廉价的粮食，而不注重提高粮食价格以激发小农的积极性”。这种粮食政策曾经深受殖民政府的青睐，因为殖民政府的拥护者是种植园主和矿主，这些人希望压低劳动成本。⁸⁷但对于一个独立国家而言，这种政策不利于推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后，领导人一直把城市人口放在优先地位，把农村人口置于次要地位，既体现了殖民地时代殖民政府对农村的偏见，又体现了印度尼西亚新兴的精英阶层对农村的偏见。由于印度尼西亚人口不断增加，而农业产量长期得不到提高，这就意味着该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稻米和小麦，以满足本国对粮食的需求，结果消耗了本国大量的外汇储备，而该国原本可以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去应对更加迫切的发展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基本上实现了稻米的自给自足，但要全面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该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印度尼西亚那些国有化的种植园里，情况也不容乐观。大部分种植园之前是

由外国人控制的，国有化之后，被该国的国有企业管理，运行效率十分低下，一直遇到了20世纪60年代，甘蔗种植园，即该国面积最大的种植园，产量下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产量的50%，致使该国蒙受了惨重损失。⁸⁸印度尼西亚政府再次犯了“城市偏向”的政策失误，为了保障城市人口的需求而牺牲农村的利益，决心要把国内食糖的价格保持在低水平，同时对种植园征收重税。1975年，也就是在苏哈托担任总统的时期，印度尼西亚也曾经出现过一次根本性的政策转变，由大规模种植园经济转向小农经济，以期提高产量。⁸⁹然而，政府一味要求农民种植甘蔗，不允许他们种植其他作物，但农民与制糖厂之间的甘蔗贸易条款对农民非常不利，政府没有给蔗农提供充足的信贷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而且政府对蔗糖征的税一直高于对其他农产品征的税。结果可想而知，农民虽然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种植甘蔗，但肯定没有积极性，产量也长期处于低位。

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指出，一个国家在发展阶段中，为了应对国内人多地少的问题，可能会采取逃避性的土地政策，这类政策主要有两类⁹⁰，一类是徙民政策，即把土地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的农民迁徙到其他地区，以缓解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一味加大信贷、农业基础设施、农产品营销等方面的投资，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逃避土地再分配问题，结果注定收效甚微。印度尼西亚到最后就采取了第一类政策，即徙民政策。20世纪70年代，由于爪哇岛的人口总数已经高达8000万，苏哈托政府便开始把数以万计的农户迁徙到人口较少的岛上，尤其是苏门答腊岛，这些农户在新的岛屿上开垦土地。徙民政策的高峰期是1979年到1984年，在此期间，共有150万人在政府资助下迁徙到了其他地区。⁹¹但这个政策并没有解决该国农业面临的根本问题，包括土地改革问题和农业科技推广效率比较低的问题，而且迁徙农民的成本非常高，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但这个政策的确暂时缓解了该国贫困地区的人地矛盾。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仍然居住在爪哇岛的数以百万计的无地农民之所以能免受饥荒的折磨，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菜园为他们提供了大量食物，而且这种情况还存在于其他位于赤道周围的国家，比如拉美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赤道地区的气候意味着一些农作物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人们在爪哇岛进行的研究表明，就每平方米土地的产量而言，家庭菜园的产量远远超过稻田或由佃农或临时雇农耕作的土地的产量。事实证明，东北亚地区高产农业模式也存在于爪哇岛这类地方，但仅仅存在于农民为了个人消费而耕种的、面积狭小的土地上。⁹²

英国人对农业效率的观点：种植园模式高于小农模式

在殖民地时代，印度尼西亚是荷兰殖民者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而对于英国殖民者而言，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就要数马来西亚了，因为马来西亚的农业结构更加侧重于种植园农业。种植园农业模式下，投资者在每公顷土地上获取的经济利润是最主要的，因此更加注重种植经济作物，而至于每公顷土地产出了多少农作物、养活了多少人、整个国家的粮食能否实现自给自足，则成了次要的考虑。由于英国殖民者只在意从每公顷土地上获取多少经济利益，所以，种植园农业更加符合英国殖民者的利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来西亚大约40万公顷土地都被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就种植园面积与可耕地总面积的比率而言，马来西亚要高于印度尼西亚。⁹³

在殖民地时代，虽然马来西亚的土地在理论上属于马来西亚的苏丹，但实际上被“出租”给了英国殖民者或英国殖民者的顾问，具体的经营事宜也由英国人或其顾问决定。质量较高的土地，以及那些靠近公路、交通便利的土地都变成了种植园。英国人在马来西亚修建了很多公路，因为要如果要运输并销售种植园里的农产品，修路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也客观上有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除了修建道路之外，马来西亚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灌溉设施、农业电气化、农业科技推广等，都主要面向大规模的种植园，基本上没有惠及普通的小农。此外，殖民者控制的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也只考虑种植园。这些因素都相当于给种植园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补贴。正如马来西亚主流的农业经济史专家林德义（Lim Teck Ghee）所说的那样：“小农被视为低效、落后的象征，因此在马来西亚发展的过程中被摆到了次要地位。”⁹⁴但过于注重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种植园，而忽视以水稻为主的小农经济，可能会造成粮食减产，以至于不得不依赖进口粮食来保障本国的粮食供给。所以，政府只是为了削弱对进口粮食的需求，才愿意为小农提供一些支持，鼓励他们种植水稻。

虽然当时的人们一致认为种植园经济的效率高于小农经济的效率，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官员被迫进行农业产量调查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一点。当时，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橡胶生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橡胶需求量持续下滑，导致国际橡胶价格在1920年开始急剧下降。不久之后，种植园主（大部分都是欧洲人）便要求控制橡胶产出，以遏制价格下滑趋势。虽然马来西亚的殖民政府呼吁小农把种植水稻作为重点，但也有大批小农涉足橡胶种

植，而且其橡胶产出占据马来西亚橡胶总产出的1/3，他们并没有响应种植园主的呼吁而削减橡胶产出，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下令组建了一个由詹姆斯·史蒂文森（James Stevenson）主持的国际橡胶生产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最终认为必须抑制橡胶产出，并制订了《史蒂文森橡胶产出限制计划》（Stevenson Rubber Restriction Scheme, 1922~1928），该计划从1922年11月开始在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生效。斯里兰卡是英国另外一个种植橡胶的殖民地。该计划对种植园橡胶产出的限制是以前历史产出记录为基础的。但在限制小农橡胶产出的过程中，该计划的主观色彩过于浓厚。由于大多数小农都无法出示正式的橡胶产出记录，所以该计划在对小农的限制是以主观估算为基础的。由于种植园每公顷土地的年均橡胶产出是400磅，所以，他们评估，在小农经营模式下，每公顷土地的年均橡胶产出为320磅。⁹⁵

该计划一经宣布，几乎引发了农民叛乱，马来西亚多地爆发了暴力抗议，因为对小农橡胶产出的评估远远脱离了现实。很快，殖民政府宣布重新开展调查，而调查结果令殖民政府十分尴尬，因为结果表明，就橡胶生产而言，小农的效率一直都比种植园的效率要高得多，事实上也是如此，前者效率比后者高出了50%多，有些情况下甚至高出好几倍。史蒂文森的调查委员会拿到的证据表明，根据接受调查的小农的橡胶产量来看，在小农经济模式下，每公顷土地的年均产出应该位于600~1 200磅之间。⁹⁶

小农橡胶生产效率较高的原因与前文提到的“园艺式农业”效率较高的原因是一致的。在种植园里，每公顷土地上栽种100棵橡胶树，而小农的橡胶树栽种得更加密集，每公顷土地上通常可以栽种200棵，而且小农愿意付出额外的时间，每天去打理，努力实现产出最大化。在全球萧条中，小农比种植园更灵活，更有弹性，因为他们在橡胶树中间又种植了一些粮食作物，而且小农在从事农业耕作之外通常还会有第二职业。他们不必像种植园主那样支付经常性的管理费用，生产成本较低，因此，他们愿意而且有能力承受较低的价格，但殖民者却强迫他们接受为阻止种植园破产而采取的限制措施。

史蒂文森调查委员会建议把小农模式下每公顷土地的年均橡胶产出从320磅提高到533磅，虽然仍然太低，但至少不低于被普遍视为效率较高的橡胶园的效率。但无论是马来西亚的殖民政府，还是英国政府，都不支持这个建议，而是把小农每公顷土地的产出定在了426磅，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乘以一定的百分比，作为分配给小农的生产限额。《史蒂文森橡胶产出限制计划》一直实行到1928年。1934年，一份新

的、限制橡胶产出的国际协定也囊括了诸多不利于小农橡胶生产的条款，严重损害了小农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政府公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前文提及的两个限制橡胶产出的计划当时就导致马来西亚种植橡胶的小农损失了4亿英镑，按照今天的橡胶价格来计算，损失额则高达21亿英镑左右，相当于马来西亚全国两年的橡胶产出。这份报告的作者鲍尔（P. T. Bauer）严厉谴责这两个计划对小农的歧视，认为这种歧视“显然背离了某些明显的道德义务”。⁹⁷小农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马来西亚在殖民时代的橡胶市场只是一个市场受到操纵的简单的代表性案例，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橡胶市场遭到了严重的人为操纵，结果导致效率较高的小农经济去补贴效率较低的种植园。在史蒂文森的计划中，殖民政府甚至让经营种植园的人负责评估小农的橡胶生产情况，结果导致总产量和生产效率均被严重低估。然而针对某些小农的调查数据表明小农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种植园的生产效率，而且种植园当时有专业的经理人去打理，甚至有的大型种植园在伦敦股市上市，所以，马来西亚的殖民政府一直不相信调查结果也在情理之中。但实际情况和调查结果的确是相一致的，虽然殖民政府在橡胶产业进入萧条期前后为种植园提供了各种支持，但种植园的效率低于小农的效率却是不争的事实。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锡矿矿区也出现了一个能证明小农经济效率较高的例子。在经济萧条时期，数以千计的矿工遭到解雇，结果大批人为了生计而开始种植粮食和蔬菜等拿到市场上销售。当时马来西亚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度很高，国内粮食价格长期居高不下，殖民政府注意到城市居民所需的粮食中有很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小农供应的，所以暂时解除了禁止农民在锡矿矿区种植农作物的规定，鼓励农民种植水稻和蔬菜。⁹⁸但殖民政府没有重新思考基本的农业政策，仍然过于注重种植园产生的经济利润，而不太重视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和马来西亚的全面长远发展。

英国人的观念成了马来西亚的观念

“二战”的结束和马来西亚在1957年的独立并没有给马来西亚的土地政策带来重大变革。虽然当时的时代精神需要政府更多地照顾到农民的利益，但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不同的是，马来西亚根本没有尝试过土地改革。马来西亚在1955年和

1967年通过的法案本来是为了给佃农提供更多的保障，并禁止地主向佃农索要所谓的“喝茶钱”，但这些法律效力较弱，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体的执行权下放给了各州，而各州的政府主要是由一些“精英人士”控制的，这些所谓的“精英人士”，无一例外的都是大地主、大商人。政府为肥料等必要的农业资料提供了补贴，但主要受益者仍然是大规模的种植园，而不是小型的家庭农场。为了促进本国橡胶更新，马来西亚政府设立了一个专用基金，但它为受助者提供的援助还没有从受益人那里索要的“会费”多。⁹⁹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两国政府都采取了成本高昂的“徙民计划”，在马来西亚，这个计划的具体执行机构是联邦土地开发局（Federal Land Development Agency）。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利用“石油美元”购买了很多处于欧洲人控制下的种植园，交给本国的国有企业去经营，但经营效率并不比之前高多少，而且经常还没有之前高。

在实现独立之后，马来西亚的土地集中程度有所提高，长此以往，土地租佃现象和农民失地现象也会越来越多，而土地租佃和农民失地往往会导致农民贫困以及农村债务的加剧，通常也会导致农作物减产。¹⁰⁰这一点已经多次得到历史的验证。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人在目睹农村败象之后愤怒地指出：“政府制定的法律太少，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导致土地租佃和作物分成的制度大量存在，土地日益集中在投机者、投资者、放贷者的手中，农民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¹⁰¹

从1981年开始，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府向稻农承诺对水稻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农民。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农村地区大多数人的贫困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并不是因为小农因耕作土地而获得的收入提高了，而是因为农民在出口加工业的发展进程中找到了非农业工作。我应该强调指出一点，马来西亚并不是农业用地短缺的国家。大多数当地的农业专家都说马来西亚还可以再开垦几十万公顷土地，用来发展农业，而每当发生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那种经济衰退，现有的农业用地中就有数千公顷被农民抛弃，处于闲置状态。虽然土地资源过剩，但马来西亚却选择了一个充其量算得上“次优”的农业经济结构。这再次提醒我们，为了实现欣欣向荣的发展，不仅需要让小农获得土地，还要在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营销和农业信贷等方面为其提供支持，为小农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大环境。¹⁰²

如果还不理解我的意思，请看泰国的情况

农业经济学家罗纳德·赫林 (Ronald Herring) 指出，东南亚各国在实行土地再分配方面做的工作可谓少之又少，这些国家对此提出的常见辩解就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推进土地改革带来的困难。而赫林的观点与此相反，他指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似乎认为保持现状才算务实，但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论调。”¹⁰³

事实证明，东南亚地区维持所谓农业“现状”的代价非常高昂。在菲律宾，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组织和恐怖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镇压了一个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共产主义运动，结果造成数十万人失去生命。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马来西亚，英国殖民者曾经在马来西亚农村地区无情地镇压了一次共产党的运动。在泰国，整个国家几乎陷入了内战状态，就在我撰写本书之际，泰国仍然处于动乱状态，其中土地政策的失败可谓是“功不可没”。

2010年5月，泰国军方在曼谷的街头混战中杀死了数十名抗议示威的反政府者，即所谓的“红衫军”，红衫军的成员主要来自于贫穷的东北部。而就在几年前，泰国南部最贫穷的地区才刚刚爆发过一次农民暴乱，结果也遭到了残酷镇压。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泰国军方就曾经和泰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在北部和东北部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斗争，而在过去10年间，发端于农村的暴力活动达到了历史之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农民暴乱的根本原因一直都是农村贫困的周期性加剧，这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密切联系。

泰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的一点在于，它在殖民时代仍然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性。从地理角度来看，大致可以把泰国农业区划分为两个特征鲜明的地区，第一个就是以水稻经济为主导的沿海地区和中部平原地区，另一个就是偏远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如同马来西亚、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菲律宾以及19世纪的爪哇岛一样，近代泰国的土地资源一直都是非常丰富的。在19世纪，除了泰国之外，其他殖民地都曾经集中精力发展采矿业和橡胶、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因此，这些殖民地对粮食的需求就为泰国水稻的出口提供了动力。泰国政府在中部平原进行了排水处理，开辟出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水稻。中央政府修建了关键性的排水渠，但除此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曼谷周围的土地逐渐集中到了王室盟友的手中，最后形成了一片片的大型庄园，而位置较为偏远的土地则主要是由农民自己开垦、自己清理、自己耕种的。由于泰国土地资源较多，而人口总量较少，所以，虽然农业生产效率低，也产生不了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农民通过撒播的方法种植水稻，比用移栽的方法更加高效。截至20世纪30年代，虽然泰国每公顷土地的水稻产量只有1 200

千克，仅仅相当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的产量的20%，但泰国每年出口稻米150万吨。¹⁰⁴

在泰国王室（泰国在1932年之前一直是君主专制政体），曾经有人关注过农民在耕种土地过程中存在的困难。1906年到1907年之间，一位财政部长撰写了泰国有史以来第一篇正式的经济学论文，并且大胆地提出有必要为苦苦挣扎的小农提供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当时的泰国国王拉玛六世（King Vajiravudh）看到这篇论文后勃然大怒，并且宣称：“我能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穷人都不会比暹罗少。”结果，那位财政部长不仅丢掉了工作，而且被禁止从事经济学研究。¹⁰⁵

虽然泰国国王否认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是的确存在的。在“二战”之前，泰国的土地租佃、农民失地和农村债务问题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然而，因为在曼谷之外，虽然农民有地可种，但大多数农民对所耕种的土地没有正式的、经过官方认可的所有权，这就导致即使农民欠了债，放贷者也不能收回农民的土地，而且由于泰国地多人少，很多土地还没有得到开垦，所以农民欠了债之后可以一走了之，消失得无影无踪，另外找一个地方开垦新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泰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提高到了3%，土地租佃、农民失地和雇佣劳动的现象越来越多，结果导致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性大大加剧。泰国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但总体来讲，政府的政策仍然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农村地区的利益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证据就是泰国政府垄断了稻米市场，成为了唯一的买家，换言之，泰国的稻米市场上形成了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结构，这个买方就是政府。政府努力压低国内稻米的收购价，然后将收购过来的稻米用于出口或卖给城市居民。稻米交易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在有些年份甚至占据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1/3。在压低稻米收购价格的同时，政府还提高化肥等基本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当时泰国化肥主要依赖进口），严重抬高了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以至于和同时期的日本相比，泰国稻米生产成本是日本稻米生产成本的5倍。¹⁰⁶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泰国农村地区的叛乱活动愈演愈烈，政府对稻米经济的压榨逐渐减少。但在稻农群体中，佃农所占比重已经达到30%~50%。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逐渐加剧，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歧视，独立耕作的稻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以至于后来丧失了水稻经济的支柱地位。虽然泰国政府在20世纪

60年代开始为农民提供信贷，但主要面向那些拥有大中型农业综合企业（比如大中型种植园）的人，普通的小农是无法获得这些贷款的。¹⁰⁷泰国在1975年发布的《土地改革法案》基本上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土地再分配。泰国两位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巴素·蓬拜集（Pasuk Phongpaichit）和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认为：“除了基本的排水工程，政府就没有再为稻米经济提供过其他形式的支持。在新开垦的边远地区，由于农民只掌握一些非常基本的技术，而且几乎无法获得信贷，结果那里形成了亚洲地区技术含量最低、土地利用集约度最低、产量最低的水稻种植模式。”¹⁰⁸

泰国更加糟糕的情况

前面提到的是泰国农业的第一部分，即肥沃的沿海地区和中部平原。第二部分就是泰国北部尤其是东北部（即与老挝和柬埔寨接壤的地区）那些土地较为贫瘠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泰国开始推进这个地区的开垦。¹⁰⁹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银行的信贷主要提供给了那些大中型的农业综合企业（比如大中型种植园等），泰国东北部地区虽然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开发，但信贷歧视特别严重。

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独立之后的政府都从殖民者手中继承了种植园，也继承了规模农业模式，而泰国由于没有被正式地、完整地殖民化，也就没有形成这种农业模式，但后来泰国却逐渐形成了这种农业模式，主要手段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扶持本国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比如正大集团等，另一方面，热情地欢迎美国都乐公司（Dole）等外国企业在泰国直接投资。¹¹⁰

与单纯地继承外国人主导的种植园相比，泰国国内农业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或许能为泰国的大企业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启发。¹¹¹然而，与其他国家相似，泰国政府为了扶持这些农业企业的发展而严重牺牲了小农经济的利益。比如，伐木工把北部的森林砍掉之后，农民可能踏着伐木工的足迹前去清理、开垦土地，之后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但农民不得不严重依赖农业企业，以便获得农业生产资料并销售农产品，而且由于他们对所耕种的土地没有正式的所有权，因此也无法获得银行信贷。

不久之后，独立的小农就沦为了得到国有银行支持的农业企业的奴隶，因为这些企业建立了制糖厂、木薯加工厂、动物饲料厂和菠萝罐头加工厂等，并修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所需的其他基础设施，农民要想销售农产品，不得不依赖这些农业企业。正大集团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企业，将雏鸡提供给农民饲养，之后，农民再把成鸡卖给正大集团，而正大集团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买家，在成鸡收购方面几乎享有垄断地位。由于国家在灌溉设施以及其他设施上投资非常少，没有给小农提供任何援助，农村经济注定陷入萧条的深渊，很多农民用一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在农闲时节到处迁徙打零工。截至20世纪80年代，东北部地区囊括了泰国一半的穷人。¹¹²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泰国等国的农村地区虽然也贫穷，但总体上风平浪静，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的农民叛乱，出现这种稳定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出口加工业的发展，这种出口加工业是为外国跨国企业服务的，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非农业就业机遇。所以，虽然农业状况极度糟糕，但被出口加工业的繁荣暂时掩盖起来了。数十万泰国年轻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从东北部迁徙到曼谷，在出口加工业找到了工作。他们甚至还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流行音乐，用清冷孤寂的曲调唱出了在异乡漂泊打工的艰辛。¹¹³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政府部门组织的一次国民收入调查显示，在东北地区农民的家庭收入中，超过80%的收入都不是源自农业劳动，而是打工者的工资和外出打工的家人寄回来的钱。这一现象既能说明泰国土地政策的失败，也能说明当时出口加工业的确在泰国实现了大幅增长。

后来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大批工人遭到解雇，农村贫困程度急剧上升。就在这种形势下，一位出身豪族的大亨塔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即泰爱泰党（Thai Rak Thai），并积极动员泰国东北部的农村选民支持自己。他的竞选战略深切地回应了农民的不满与诉求，在农民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结果在2001年的大选中一举当选为泰国总理。但他的高升导致泰国军方和平民精英出现分裂，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政治崩溃。最终，塔信在2006年的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塔信曾经许诺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农民的利益，但他没有诚意，而且在位时间较短，导致这一承诺在政变之后变成了空头支票。泰爱泰党曾经给农村提供过一点开发资助，但从来没有实现土地政策的彻底变革。¹¹⁴

在泰国，曼谷与农村的差距如同鸿沟一般，政府决策过程总是存在极端的城市偏向，这些情况一直都没有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农业经济学家查希尔·艾哈迈德

(Zahir Ahmed) 曾经这样描述泰国首都的政治观点：

在这里，有现代文明的各种负面产物——夜总会、酒吧、围着迷你裙的女郎、披着一头长发的男子、吸毒、卖淫女和性变态……75%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但农村仍然贫困、拥挤和肮脏，那里的人们日复一日地从事辛勤劳作，却终生饱受无情的折磨……这个社会充斥着无视社会公益的人们，一心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农民的痛苦之上，并努力巩固自身的权力。¹¹⁵

即便到了今天，情况还是没有出现改观，泰国及整个东南亚地区仍然由“农民”耕作，仍然因为农村贫穷而处于政治动荡状态中。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真诚坦率地面对发展进程中的农业问题，结果导致本国大部分人过着贫穷的生活，并为工业化进程制造了重重障碍。如果政府为家庭农业提供了适当的支持，就会实现更大的农业产出，而实际上这种情景并没有实现。农村人口本来可以为制造企业的产品提供巨大的市场，本来可以催生出大量工业企业家，结果却拖累了国家的发展。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发展政策的失误。

没有任何好政策会永远有效

与东南亚不同的是，东北亚在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之后，雇农这个阶层就不复存在了。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1978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在制度支持下的土地改革都释放出了巨大能量，推动农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创造出了广阔的农村市场，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流动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农业发展的管理是尽善尽美的。即便最好的政策也只能解决某个特定时间点的问题。如果经济环境出现了变化，而原来的好政策却保持一成不变，那么好政策最终也会变成坏政策。

在农业发展方面，最初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利用一个经济体内部的一切劳动力实现效益和产出最大化。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模式就能应对好这个挑战。但随着工业开始快速发展，随着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收入较高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政府就需要对农业进行再调整，更加注重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利润。这就需要逐渐扩大农场规模，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让同样面积的土地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如果多余的农业劳动力都能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找到工作，如果为农户提供信贷与营销支持的机构仍然维持运作，就不会再次出现土地租佃的现象。在土地资源丰富的美

国，农场的平均面积从19世纪晚期的大概50公顷提高到了今天的将近200公顷，基本上与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同步增长。美国农民越来越多地采用大型农业机械，为了提高收入水平而更加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并愿意接受每公顷土地产出规模缩小的事实。¹¹⁶

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它的农业也要向工业那样，走上生产专业化的道路。在新西兰、荷兰等国家，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数量并不算高，因此不能把农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他们不得不努力在制造业或服务业领域占据竞争优势。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良好的政策，就能让农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在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之际让其他那些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获得越来越高的收入。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取消农业保护措施，取消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承诺。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发达国家减少对本国农业的保护之际，就为贫穷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因为这些穷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因此农产品生产成本也相应较低，可以把剩余农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这有助于破除阻碍穷国发展的因素，弥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不幸的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北亚经济体并没有在农业发展进程中做好过渡工作，没有在适当的时机扩大农场规模、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并削弱对本国农业的保护。虽然它们曾经在法律层面放松了对土地出租和销售的限制，但之后又为农民提供举世罕见的高额补助，提高了小农耕种的积极性，不利于土地流转和农场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东北亚地区的家庭农场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政府福利体系的职能，农民有了一小块儿土地，就可以减轻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政府之所以后来为农民提供补贴，是因为政府财力增强了，具备了补贴农业的能力，而且农业曾经哺育了工业发展，为工业起飞奠定了基础，政府希望通过在农业部门增加财政支出的方式表明政府对农民的重视。而中国是个例外。中国这个东亚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给农业和农民提供过补贴，并竭力让农场维持小规模运作，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却一度高达3倍。这种收入不平等性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那种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城乡收入平等而大力补贴农业的做法，无异于一种极端的社会福利政策。

日本的工业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进入了繁荣期，而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开始扩大。为了扭转这个趋势，日本政府立即重新采用了“二战”期间建立的农产品收购制度，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农民的部分农产

品。与东北亚其他经济体相似的是，日本价格补贴的核心也是水稻。政府为水稻支付的价格在20世纪60年代翻了一番，到20世纪70年代又翻了一番。由于日本政府给农民提供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有效地禁止了农产品进口，再加上农民享有大量的非农业就业机遇，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城市人均收入水平，这种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¹¹⁷结果，日本家庭农场的规模一直没有扩大，耕种农场的农民越来越少，而且通常是年龄比较大的农民利用小型农业机械从事农业活动。自1990年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农民的平均年龄通常都在50岁以上，一般的情况都是土地改革后分得土地的那一辈农民一直守着那块儿土地从事农业活动，而他们的子女则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去了。

我们可以从一本非常罕见的农民日记中感悟到农民从贫困到富足再到国家娇宠的过渡。写这本日记的农民名叫西山光一（Nishiyama Kōichi），来自日本的新潟县，居住地点接近于前文提到的伊藤家族的居住地。他于1902年出生在一个贫穷不堪、债台高筑的佃农家庭。在经济萧条期间，为了摆脱贫穷，他一次又一次地借钱从事副业，但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二战”结束以后，他成了当地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农民代表。根据他的日记所述，土地再分配之后，获得解放的农民相互合作，改良稻田与灌溉设施，在湿地修建了排水设施，并建立了一个水稻研究小组，最后效益和产出都迅速增加。他也成了因土地改革而成功的典型代表。后来，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支付给农民的补贴开始增加。后来，最初分得的农田需要重新规划，以便修建商业性的房产，村民们便把他们的公共土地卖给了当地的一位政客，结果发了一大笔意外之财。自此之后，西山光一的日记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关心耕种土地的问题了，而是开始关注商业规划的前景。由于拥有足够的资金，他购买了各种先进的农业机械。随着土地价值不断飙升，他便选择了退休，让大儿子去打理农田。但他的大儿子对种地根本不感兴趣，开始炒股了，到1987年，赔了3亿日元（按照今天的汇率换算，约合200万美元¹¹⁸），最后不得不把大幅升值的土地拿去做抵押，以借债度日。就这样，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这个家族从贫穷的雇农变成了节俭而富足的自耕农，最后又在股市上赔得一干二净。¹¹⁹

韩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并且开始对国内农业采取保护措施。政府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农产品，而且收购量越来越大，然后将其低价出售给城市地区的消费者，出售价只有收购价的50%。在农业的早期发展阶段，韩国政府利用对化肥的垄断地位收取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以此来盘剥农民，到后来，韩国政府改变了在农业问题上的态度，逐步降低了化肥价格，并利用在化

肥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进一步补贴农民。农民受到鼓励之后，就不遗余力地种植水稻，结果稻米产出规模远远超过了韩国人民的消费需求，导致政府收购的稻米堆积成山。韩国政府实行了农业保护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在受到进口限制的547种产品中，农产品就多达数十种，可以说，这一农业保护政策几乎惠及每一种农作物。¹²⁰

与东北亚其他经济体的农民相比，台湾地区的农民是最成功的，受到的保护也是最少的。在台湾农业的早期发展阶段，农产品出口总值在台湾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几乎达到了60%，而到1975年，这个比重则迅速降到了20%以下。这个时候，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工业化都开始起步，在工业化之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基本持平，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前者逐渐降低到了比后者低1/4的水平。¹²¹如同韩国政府一样，中国台湾当局从20世纪70年代也不再利用自己对化肥的垄断地位去压榨农民了，而是开始降低化肥价格，以这种形式来减轻农民负担，实质上相当于给农民提供了一种隐性补贴，同时还着手提高稻米收购价格。种植甘蔗的农民也得到了类似的补贴。不过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台湾对农业的补贴显得相对较少，导致台湾农民被迫采取多元化策略，更加注重生产一些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比如，台湾农民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肉类加工业，最终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猪肉类产品的出口者。

在每一个东北亚经济体，政府都在为农民提供补贴，而这种补贴主要是在牺牲普通消费者的前提下进行的，消费者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并交纳更多的税，从而为政府的补贴政策埋单。虽然近年来日本和韩国削减了农业补贴，但在这两个国家，政府发放的农业补贴在农户年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50%，相比之下，这个比重在台湾地区是25%，在欧洲地区是20%，而在美国则是10%。¹²²在日本与韩国，政府每年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1%，但这两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总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甚至还不到1%，换言之，农业补贴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如果在初级发展阶段之后继续保护小农经济，就会带来很多相关的成本。比如，在日本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比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高出60%，稻米价格甚至比世界市场上的稻米价格高出好几倍。对于日本畸高的农产品价格，从一件小事中就能体现出来。我从东京到新潟的途中，分别在东京和秩父的便利店买了苹果，在东京买一个苹果花了我4美元，在新潟买一个苹果花了我3美元。10个草莓居然需要10美元，我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价格而没有买。¹²³日本薪酬最低的临

时工现在一个小时挣的钱只能买几个草莓，从这一点上来看，你肯定能看出来哪里出问题了。

一些东北亚国家虽然最初成功地实现了土地再分配，但在之后的发展进程中，农业政策逐渐趋于僵化，为其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以至于逐渐被竞争对手甩在了后面。总体来讲，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政策陷入僵化状态，就会严重抑制政府应对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即便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并修建好一系列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这也并不意味着该国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能自然而然地领先于其他国家。“二战”之后，一度高速增长的欧洲新兴经济体就发现，知道何时应该加强管制与知道何时应该放松管制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必须不失时机地根据实际情况对政策做出调整。所以，东北亚那些最初成功实现土地改革的经济体如果想保持持续增长，必须及时地调整自身的政策，不能一味地保护农业，等待农业度过初级发展阶段之后，就必须适当地削减对农业的补贴，扩大农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然而，很多国家或地区根本没有成功地实行过土地改革，更不用提适时调整政策了。

客观的评论

虽然东北亚国家近年来的农业政策存在各种问题，但起初以个体农户为基础的土地改革的确对农业及工业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这些积极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家庭农业模式产生了两个其他政策无法产生的非常有利的影响。第一，能最充分地利用农业经济体内过剩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农业产出最大化。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所说的那样，“在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劳动力非常丰富，而储蓄能力非常弱，小规模的家庭农业模式具有特别好的前景，因为这样可以用尽可能多的人力资源优势去弥补可投资资源稀缺的劣势。”¹²⁴农业产出的增加又可以转化为农村购买力，为早期工业的发展开创农村市场。土地改革能提升农民对基本的、国内制造的消费品的需求，当这种需求在整个经济体内部扩展的时候，就形成了某种形式的“消费冲击”。增加的农业产出也有利于国家从国外引进工业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

土地改革产生的第二个积极影响与增加产出、刺激消费不同，但能与这两者结合起来，产生更多的经济成果。我所说的第二个积极影响就是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

这种最基本的非人力资源的公平分配，催生了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人们不仅可以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而且可以真正地相信他们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他们确实会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就是将会出现在下一章的两个关键性历史人物，一个是韩国总统朴正熙，另一个是韩国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第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就是金大中，他也是农民的儿子，他领导了韩国人民的民主斗争和体制变革。在中国台湾，最著名的企业家、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以及其他很多企业家也都是农民的儿子。曾经领导过台湾地区民主运动，并于2000年成为台湾地区首位非国民党籍领导人的陈水扁也是农民的儿子。在中国大陆，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领先时代潮流的企业家们，很多也是来自农民家庭。¹²⁵然而，在东南亚地区的商界和政界，几乎没有出现过像东北亚地区那种程度的社会流动性，甚至到今天仍然摆脱不了精英世袭的问题。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东南亚地区从来没有实行过公平的土地再分配，因此社会成员也就无法建立机遇均等的社会。从社会流动性而言，东南亚国家更加类似于拉美国家，因为拉美国家的土地改革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北亚地区进步的政治家以及像沃尔夫·拉德津斯基之类的区域外人士都认识到了土地改革对经济和政治领域产生的影响。土地改革催生了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然而，虽然土地改革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设，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政治精英却没有对土地改革表现出热情洋溢的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曾经推动台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之后，到了1969年，美国在南越地区宣布了一个全面土地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来得太晚了，美国当时已经做好了撤出南越的打算，最终这个改革方案不了了之。美国对南越地区土地改革的干预与1948年美国对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实行的土地改革的干预比较类似，都为时过晚。除了这两个案例之外，美国再也没有在亚洲地区推动过土地改革。在东南亚地区，美国倾向于维持现状，但维持现状意味着东南亚一些国家要继续面临恐怖活动与叛乱活动的冲击。时至今日，美国在实行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这些东南亚国家既是盟友，又是负担。这些国家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土地分配不公和农业效率低下，但这些国家仍然在推脱说土地改革难度太大而踌躇不前。在这方面，巴基斯坦也许是最好的例证。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国内政治中，沃尔夫·拉德津斯基等人倡导的土地改革被思想狭隘的右派政客们抨击为变相的社会主义。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2年11月当选为总统之后，华盛顿的政治气氛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那些支持强制推行土地

改革的人面临着更为不利的环境。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反对共产主义的阴谋在1950年之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当选也起到了助其一臂之力的作用。1954年11月，农业部以安全为由拒绝为拉德津斯基办理正常的工作调动。时任美国农业部长艾兹拉·塔夫特·本森（Ezra Taft Benson）给出的解释是拉德津斯基当时还有三个妹妹在苏联，拉德津斯基曾经在1939年访问过苏联（在本森的口中，这可能使拉德津斯基成为苏联的一个潜在胁迫对象），而且刚刚来到美国之际，拉德津斯基还曾经在短时期内为一家苏联贸易公司驻美国的办事处担任过翻译。本森虽然承认他对东北亚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细节了解得非常少，但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们说他不喜欢土地改革这个想法。¹²⁶在种种压力面前，拉德津斯基拒绝辞职，但最终他还是被解雇了。但当时的确有一些思想比较深刻的共和党人支持拉德津斯基的想法，并为他辩护，比如，共和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把拉德津斯基所做的工作描述成为“大概是我们在亚洲采取的唯一一个成功的对抗共产主义者的举措”。¹²⁷拉德津斯基后来到南越地区从事安置难民的工作，后来又先后供职于福特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他于1975年去世。

拙劣的借口

那些没有有效实行土地改革的东南亚国家或地区主要有两个借口，但都经不住仔细推敲。第一个是东南亚地区种植的经济作物不适合采用家庭农业模式。不假思索地提出这一借口的种植园管理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台湾在早期发展阶段的蔗农与蕉农都非常成功，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在当前的中国大陆蔗农也很成功。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很多确凿的证据都能表明家庭农业模式的优越性，可能提出这种借口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还忽略了马来西亚在殖民时代的橡胶种植园的生产状况。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目前东南亚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两国坚持声称只有在种植园里才适合种植棕榈树。但大规模种植园的管理人员却不停地抱怨说劳动力成本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且指出如果政府提供了棕榈加工、营销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那么棕榈树可能更加适合在家庭农场种植。棕榈油的产量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非常敏感，投入越多，产量越高。棕榈树上的棕果成熟时间分布不均匀，每10天就要采摘一次，以防止腐烂病和害虫侵袭。工程师们从来没有成功地用机械替代人力，采摘棕果这个工作只能由人力去做。所以，就产量而言，种植园不可能比家庭农场更具有天然优势。在过去20年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的种植园的产量几乎没有提高。马来西亚的种植园现在要想实现赢利，甚至不得不从

国外寻找廉价劳动力。这与印度那种合同制的橡胶园工人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殖民地时期，这类工人的报酬非常低，对确保印度橡胶园的营利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¹²⁸

只要多投入一些人力资源，几乎任何一种作物都能从中受益，也就是说产量与劳动投入成正比。很多国家的大量证据表明，农场的产量与农场规模成反比，原因就在于此。¹²⁹但长期以来，很多种植园经营者都声称他们种植的作物是例外情况，大多数人都不懂怎么种植，所以不适合采用家庭农业模式，而真实情况是家庭农场也适合种植经济作物。这种例外论虽然经常被人提起，但往往站不住脚。东南亚地区的规模经济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在农业加工和营销环节，因此，这就决定了小农经济模式不仅适用于东北亚地区，同样适用于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国家的第二个借口是政治借口，即东北亚成功的土地改革是特定历史环境以及美国干预造就的结果，具有不可复制性。从表面来看，这种观点似乎比较可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的确是在日本“二战”战败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而且地主阶层与日本这个战败国存在密切关系（在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主都曾经与日本人勾结过）。美国在不同程度上强迫东北亚国家开展土地改革，并且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金融和技术援助。但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它们内部的一些政治家对制定和落实土地改革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拉德津斯基曾经写道：“日本社会党籍的农业部长和田博雄（Hiroo Wada）是确保日本土地改革成功的最主要的人物。”¹³⁰在韩国，左倾的农业部长赵奉安（Cho Pong-am）在1948年11月组织草拟了韩国第一部土地改革法案，并与反对土地改革的李承晚总统发生了严重分歧，结果被指责为朝鲜的间谍，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¹³¹关于美国援助的问题，应该指出的一个事实是美国也给菲律宾、泰国以及苏加诺倒台后的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大量金融援助，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几乎没有把援助用于促进农业发展方面。

一些国家为无力推行土地改革而提出的政治借口是狡猾的、用心不良的，至少表明这些国家无法控制它们自己的发展命运。然而，虽然土地改革存在难度，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改革失败的案例多于成功的案例，但的确存在成功的可能性。比如，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没有任何外来政治指导与外来资助的情况下就成功实施了第一次土地改革。再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的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政府在其他邦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下却成功地推行了土地改革。所以，发展中国家并不

一定需要在富裕国家的指导下才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因为土地政策完全属于内部事务，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领域比在其他领域更有能力描绘自己的发展之路。对于贫穷国家的政府而言，土地政策是评价政府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土地政策可以衡量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与大多数人口，即农民，保持了密切联系，也可以衡量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打破原有的社会体制来实现积极的发展结果。简而言之，土地政策能告诉你领导人是否了解和关心本国人民。在这些方面，东北亚领导人的得分远远高于东南亚的领导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国家比较富裕。

对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而言，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真正辩解就是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影响太大，以至于东南亚的政治家们难以看清楚他们究竟需要哪种类型的政策。殖民主义的确对东南亚造成了很多伤害，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就不能做出良好的发展抉择。问题的核心在于，无论是独立前，还是独立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精英们都是由殖民统治者指派的，以至于他们没能力清楚地思考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经济体中，人们对日本殖民者产生了深刻的痛恨，再加上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了胜利，所以，这两个经济体的领导人更加清楚地思考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东南亚国家中，也有两位痛恨殖民者的领导人，一位是印度尼西亚放荡不羁的苏加诺总统，另一位是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马哈蒂尔对经济史了解甚少，无法为本国做出明智的政策选择。

在下一部分，我们将要展开对制造业的论述，但不能忘记农业对经济快速变革的深刻意义。在一个贫穷国家中，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不能低估了农业的重要意义。

[5] 该庄园原为许寰哥家族所有，后来该家族重要成员科丽·阿基诺嫁给阿基诺家族的成员贝尼格诺·阿基诺，遂为两个家族共有，如今，这一庄园如今的所有者包括菲律宾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及其舅舅、姨妈等亲戚，一直被视为阿基诺家族经济权力的象征。——译者注

[6] Esperanza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希望”，故此庄园名亦可译作“希望庄园”。——译者注

[7] 轮转信贷协会（rotating credit facility），是协会内部成员的一种共同储蓄活动，也是成员之间的一种轮番提供信贷的活动。这是一种成员之间的资金互助和民间借贷，同时涉及了储蓄服务和信贷服务。——译者注

第二部分

制造业：历史学家的胜利

如果一定要我概括经济史对经济学的贡献，我会说，它告诫我们根本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历史阶段的经济规律或规则。

——摘自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所著的

《经济史的神话与悖论》¹

在贫穷国家，农业政策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而小农经济模式可以大幅增加农业产出，促进农村消费，进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快速发展。然而，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农业是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的。土地改革与其他农业改良措施虽然能带来一定的红利，但经过10年左右，这些红利就会逐步弱化，因此处在崛起过程中的经济体必须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一般是围绕着制造业展开的。今天，虽然服务业在富裕国家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对于贫穷国家而言，要想迅速实现经济变革，却不得不依靠制造业，制造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制造业是以使用机械为基础的，因此可以缓解贫穷国家在发展初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即劳动者缺乏生产技能。在制造业中，少数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能够以机械为媒介（起初这些机械需要依赖进口），雇用大量不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机械化生产，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特别大的推动作用。经过最基本的培训之后，工人可以在完成制造任务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价值。之后，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也能学到更多技能。而服务业的很多活动则不是这样，因为在服务业，要想提高服务效率，必须在服务者提

供卓有成效的服务之前先对其进行长时间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技能，比如，一个人在具备软件编写能力之前，必须通过很长时间的才能学会如何编写软件代码。在制造业中，机械的使用会“放大”工人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而在服务业中，这种“放大”效应则不是那么显著。比如，在制造业中，一个人在一家工厂里负责管理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他只需付出很少的劳动，就能通过机械产生很大的价值。而在服务业中，往往会出现一位服务者只能为一位客户服务的情况，比如一位接线员每次只能接听一个客户的来电，不可能同时接听两位客户的来电，这就导致其服务产生的价值非常有限。简而言之，由于服务业更加依赖于劳动者，更加依赖于劳动者技能的提升，所以服务业效率的提升速度往往会滞后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速度。²

制造业之所以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和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在世界市场上，商品贸易的自由度高于服务贸易的自由度。大多数商品可以装进集装箱，运输到任何一个愿意付费购买的人手中。而服务贸易则面临着更多现实障碍和政治障碍。就现实障碍而言，除了少数服务（比如呼叫中心的服务或软件的服务）可以借助电话和网络实现远程销售之外，大多数服务的销售往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如果你的自行车坏了，你不可能把它送到印度去修理，再比如，如果一个人的心脏病复发了，你也不可能将其空运到其他国家去接受手术。就政治障碍而言，服务贸易面临着更大的限制因素。真正自由的服务贸易要求劳动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这样服务业从业者可以在存在需要的地方提供服务，但即便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也不愿意看到人员自由迁徙。在是否应该让人员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自由流动的问题上，鼓吹自由市场的人也持否定态度，他们并非真正完全地笃信自由贸易。不仅鼓吹自由市场的人持否定态度，富裕国家的政府也是如此。在国际贸易发展进程中，服务贸易的开放速度之所以远远滞后于商品贸易的开放速度，部分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对任何国家而言，如果把服务业作为发展政策的根基，就会面临更高的出口壁垒，而如果采取传统的、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发展政策，那么该国面临的出口壁垒就会低一些。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服务业的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0%左右，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³

制造业更适合进行贸易，而贸易对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贸易，贫穷国家可以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学习生产技能，获取新的技术。那些在国际贸易中参与度十分有限的、自给自足的国家，比如前苏联、1978年之前的中国以及1991年之前的印度，技术进步之路无一不是缓慢而痛苦的，实际上，这种情况甚至严重

到了让本国人民对经济进步的前景丧失信心的地步。对于想要进入发展“快车道”的国家而言，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就是发展制造业，开拓全球市场。当然，国内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本地的企业对本地的客户具有一种本能的了解。但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能够迫使企业对自己的产品不断做出调整来满足国际市场的不同需求，并极大地提高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此外，了解到外国客户喜欢的商品类型，也可以为日后发展服务贸易奠定基础。

富裕国家的人很难意识到制造业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因为在美国等国家中，服务业目前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制造业的从业人数则少得多。但从业人数少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重要，事实上，由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有了大幅提高，富裕国家可以在制造业规模相对缩小的情况下生产出比以往更多的商品。在制造业相对落后的国家，比如英国，目前制造业产出的实际价值是“二战”结束之际的2.5倍。而这种大大增加的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力在英国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却不到1/10，而就在1960年，英国制造业的从业人数在劳动力总量中的比重还高达1/3。所以，由于生产率的提高，现在使用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制造出较多的产品。⁴

然而，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进一步扩大其制造业规模。这是因为很多使用机器完成的任务只有使用熟练程度低的、廉价的劳动者才最有效率，因为这种任务是依赖机械完成的，不需要劳动者具有熟练的技能，雇用熟练程度低的劳动者可以降低经济成本，而富裕国家却缺少这种类型的劳动力，所以限制了其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张，但正在崛起的国家在廉价劳动力方面就占有更多优势，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遇。它们的制造业效率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但也不需要具有发达国家的那种高效率，因为贫穷国家的劳动力优势非常明显，有大量积极主动的、廉价的、刚刚脱离农业劳动的人可以用。

切记要实行出口纪律

在第二个发展阶段，制造业与贸易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决策者面临的挑战就是引导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进入制造业，而不是进入服务业，尤其是要引导他们创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制造企业。国家培育制造企业的方式有两种：通过保护和通过补贴。这些干预措施能够在企业家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过程中为其提供一定的喘息空间。

不幸的是，政府在提供保护和补贴的同时，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也会随之而来，经济学家们把这个风险称为“寻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谓寻租，指的是企业家不注重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改进技术和提高竞争力，而是一味地寻求国家的保护与补贴。这是一个切切实实存在的问题，而且已经削弱了很多贫穷国家为了促进工业发展而付出的努力。要解决寻租问题，一个方案就是找到某种有效的机制，在允许企业家为了自身谋求赢利的时候，也迫使他们变得具有全球竞争力。换句话说讲，必须强制性地统筹国家发展的利益与企业发展的利益。

东亚各大经济体的政府都曾经试图在某些发展阶段培育国内企业家。东北亚的政府成功了，而东南亚的政府却遭遇了惨败，其中凸显了一定的政策差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差异在于是否实施了我所说的“出口纪律”（export discipline）。所谓“出口纪律”，就是指政府连续性地评价、检验那些获得政府保护与补贴的国内制造企业，迫使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参与全球竞争，依据企业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支持谁或不支持谁。

国际贸易可以被视为一个反馈机制，成功的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机制了解它们扶持的制造企业是否接近于全球标准，了解制造企业是否已经投入了足够的资金来实现独立发展，比如钢铁厂或汽车制造厂是否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实现独立发展。在没有采取出口纪律的国家，发展政策催生出了造假的游戏，当地企业可以通过各种假象来迷惑政府，让政府相信它们已经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而不根据出口业绩去验证自己的说法。在东南亚，企业家的精力都用在了糊弄政客、骗取补贴上，而不是用到了促进出口上。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就像挖空了心思要把沙子卖给阿拉伯人或者把雪卖给因纽特人一样。他们消耗了国家的发展资本，把骗取的发展资本投入到了房地产业，结果导致巨大的泡沫，最终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而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的政治家们则根据一个企业出口能力的高低去判断什么政策可行以及什么政策不可行，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因为出口必须经过海关，所以核查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在日本，企业享受的减税力度是根据其出口业绩的高低来决定的。在韩国，企业必须按月向政府汇报出口业绩，企业能够获取的银行信贷额度取决于其出口业绩。在中国台湾，政府采取了现金补贴、优惠税率等多种措施来鼓励出口企业。

除了实行出口纪律以外，东北亚的政治家们之后又采取了第二个干预措施来增强其工业政策带来的红利，即淘汰达不到政府标准的企业。这可能意味着强迫这些

不达标企业与更加成功的企业合并起来，或者由国家掌控的金融体系取消对不达标企业的贷款，或者暂扣生产许可证（也可能只是威胁，而实际上并不会暂扣），甚至有可能采取终极的制裁措施，即强迫不达标企业破产倒闭。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业政策引发了大量讨论，人们认为西方国家的政策无异于从企业中间“挑选优胜者”⁵，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政策实行起来难度非常大。在东亚地区，一些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做得比较成功的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却采取了一套更加注重淘汰劣者的竞争机制。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不同生产部门的“合理化”布局与管理，在研究了德国的做法之后，于1927年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淘汰劣质企业的政府机构，即工商业委员会（Commerce and Industry Deliberation Council）。⁶ 韩国政府在惩处业绩不佳的企业时，采取的措施则更为直接。韩国政府强制业绩不佳的企业破产清算或者与业绩较好的企业合并，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中，有很多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不复存在了，而新涌现的十大企业中，有很多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不复存在了。⁷ 现在，别说外国人，就算韩国本国的人，也几乎没有听说过那些曾经在“二战”结束之后风光一时的企业，比如三湖海运公司（Samho）、加平集团（Gaepong）、东力集团（Donglip）、新进汽车集团（Shinjin）和东明集团（Dongmyung）等，这些企业早就已经倒闭了。还有一些大企业，比如大宇集团（Daewoo）、韩宝钢铁公司（Hanbo）、汉拿集团（Halla）和三美不锈钢公司（Sammi）等，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与政府谈判，并经政府批准之后宣告破产或被迫接受大规模重组，从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汽车行业，在国家的直接和间接补贴下，韩国先后设立了6个汽车制造企业，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被淘汰了。今天，只有一个纯粹属于韩国的汽车制造企业生存了下来，这个汽车制造企业就是现代汽车（起亚汽车是现代汽车的子公司）。然而，虽然只剩下现代汽车这一个幸存者，它的增长速度却堪称世界之最，因此也赢得了“全球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的美誉。

在东北亚经济体内，虽然有些企业必须依靠政府慷慨解囊才能不断发展，但也有一些大企业不依靠政府扶持计划就能独立地发展壮大，比如，日本的索尼、本田以及中国台湾的宏碁、HTC就属于这类企业。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实行的优胜劣汰机制，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往往是具备独立发展能力的企业。

东北亚经济体采取的第三个干预措施就是政府部门直接出面帮助出口业绩良好

的制造企业。除了保护国内市场和提供信贷之外，政府还为企业获取先进技术提供了重要帮助。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府多次组织本经济体的企业同外国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帮助它们购买外国的技术，政府通常会拿本国市场准入权做交换，促使外国企业免费或低价转移其先进技术。政府也会组织公共部门与企业一起开展企业无力独立开展的研发项目。20世纪50年代，日本通商产业省企业局局长佐桥滋（Sahashi Shigeru）⁸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干预行为：他告诉IBM公司说必须特许日本企业使用其技术，而且特许权使用费最高不能超过日本企业使用转让技术实现的净销售额的5%，不然就会阻挠“蓝色巨人”（IBM公司）在日本的业务。他还告诉IBM，每年在日本销售的计算机数量必须接受日本政府的行政指导，所谓行政指导，就是政府命令的委婉说法。由于IBM公司迫切希望进入日益崛起的日本市场，便答应了这些要求。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有关产业和外贸的关键决策权都集中在一个政府机构手中，这样有利于政府机构加强对国内制造企业的支持。比如，在日本，这种决策权集中于通商产业省，在韩国集中于韩国经济企划院，在中国台湾集中于工业开发委员会，而在中国大陆则集中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⁹过去这么多年里，人们对这些机构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查尔斯·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讲的全是政府机构在日本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而且这本书是在论述东北亚产业发展方面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然而，如果将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情况做一个对比，不难发现政府机构产生的作用最终取决于其是否引入了出口纪律和竞争机制这两个基本制度，也就是说，是否能强迫企业家为了增加出口而从事生产，然后淘汰业绩不够好的企业，并整合优势企业。只有实行了好的政策，政府机构才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各种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政府必须逼迫最有实力、最有才能的企业家去增加出口，而一般来讲这是违背企业家意愿的，因为如果企业能在受保护的 market 环境中挣到钱，它们往往不愿意参与全球竞争。其他政策往往是在这个大框架下展开的。这个大框架的合理性最先并非由东亚的决策者证明，而是日本人于19世纪在其他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复制过来的。

无言的事实

对于听惯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人而言，可能非常习惯自由市场的理念，认为市场就应该为所有参与者创造共赢的结果，而那种保护当地工业、强迫企业出口的政

策可能听起来更像是犯罪。在富裕国家，我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导就是要相信财富是竞争的结果。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每一个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成功的社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都实行过保护主义政策。除了中国香港、新加坡之类的离岸金融中心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完全依靠自由贸易政策跻身一流经济体之列的。¹⁰

早在16世纪的时候，英国的都铎王朝就率先通过保护政策与补贴政策促进工业化，从而开了世界先河。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毛纺织业，羊毛出口以及服装进口都要交税。¹¹法国在17世纪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美国独立后，南方种植园主倾向于出口经济作物，进口工业制成品，反对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联邦政府最终通过战争回击了种植园主的反对，于是从开国元勋及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产业保护政策与高关税政策才得以延续到20世纪初期。事实上，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把美国称为“现代保护主义的摇篮与堡垒”。¹²腓特烈大帝时期，也就是18世纪的普鲁士以及统一后的德国都完善并扩大了欧洲的产业保护政策。其中，德国的保护主义对明治时代的日本产生了深刻影响。

欧洲与北美国家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实行的保护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关税机制限制进口；控制贸易权（比如，英国议会于1651年通过的《英国航海法案》规定只有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才有权在英国和英国殖民地的港口开展贸易）；政府为工业制成品和深加工产品的出口提供特殊补贴或奖金；通过税收和配额来限制未经加工的原材料的出口；国家出资修建运河、铁路等基础设施，为企业增加出口提供支持；国家出面帮助企业获取外国技术（通常是帮助企业获取外国的先进机械，并物色外国技术人员，而这种做法往往有悖于他国的法律）；国家为企业购买原材料提供补贴；国家建立一套出口产品质量管控体系，确保产品的可靠性，打造本国的品牌与商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把大量援助集中在了少数大企业身上，也就是所谓的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这些企业拥有强大的实力，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并参与国际竞争。这些企业包括英国第一家获得垄断特许权的公司，即东印度公司，也包括德国在19世纪晚期涌现出的工业“卡特尔”。

总而言之，贸易保护政策往往是富裕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入场券”。历史学家们在这点上具有相当大的共识，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则不大可能承认保护主义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前提条件，原因在于保护主义会涉及一些临时性的利弊权衡，而经济学家们无法对此做出清楚的解释。在这种权衡中，一方面是经济学家的看法，即从短期来看，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会提高商品生产的成本，损害消费者利

益，并引发报复行为，最终会降低整个经济体的生产效率，使其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实行保护政策能为企业学习具有战略意义的知识、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虽然会给整个经济体带来一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是暂时的。在保护政策下，政府为企业提供的补贴有利于推动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结构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的转变。当高附加值的经济结构形成之后，经济学家们可能仍然会以保护政策带来了一定成本为由认为其效率是低下的，但他们似乎忘了正是贸易保护政策改变了经济结构。

国家工业政策与产业保护政策能够为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创造安全的环境。对于这个作用，很多保护政策的践行者都将其比喻成“培育孩子”。比如，美国独立后负责制定工业政策的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阐述自己赞成保护政策的理由时，就创造了“幼稚工业”（infant industry）一词，认为一个产业在处于发展初期时，实力和竞争力薄弱，需要给予适度保护，才能为其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前提，达到保护幼稚工业的目的。到了19世纪，这个术语在德国得到了广泛应用。明治时代的发展经济学家杉浩治（Sugi Kōji）也曾经指出：“在日本企业成熟之前，政府有必要像父母保护孩子、教师保护学生那样去保护企业。”¹³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Ha-Joon Chang）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企业的学习而付出代价，与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而进行投资在逻辑上是相似相通的。在19世纪的欧洲，父母们原本可以把10岁的孩子送到工厂里去做工，但如果他们在经济上能负担得起，就不会这么早将孩子送进工厂，而是让孩子在学校里继续读书，直到孩子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之后再让他们去工作。发展中国家那些成功的政府也是一样，它们先实行保护政策，宁愿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为企业更好地学习先进技术创造安全的环境，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未来收益。¹⁴在制造业领域，要想获得更高的收益，一条必由之路就是学习世界各地的发达国家已经消化掉的生产技术。当然，也有少数的例外情况，包括那些人口总量少、流动人口多的离岸金融中心，以及少数几个专业化程度特别高的农业经济体，因为这些经济体没有把发展重心放在制造业上，而是集中力量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差不多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制造业），这些经济体包括丹麦、新西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包括澳大利亚。

获取生产能力的途径与获得一切使用技能的方法是一样的，往往都是在实践中学习，也就是说，通过一遍又一遍地制造商品来提高生产能力。¹⁵无论任何类型的学习，失败总是难免的，所以，企业提高生产能力的过程肯定也充斥着很多失望。

企业学习的过程肯定有不完美之处，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孩子做错了作业就不让他上学一样，我们不能因为个别的不完美而放弃学习过程。而且要学习制造钢铁、石化产品、塑料、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就像在学校里学习一样，已经有人赶在你的前面掌握好了，并为你列出了课程表，你只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按照课程表的要求去学习，就能掌握好已有的技术，而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技术专家将这个过程称为“在技术前沿内的学习”。发展中国家至少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去学习、修正和借鉴其他国家已经掌握的技术，历史上不乏这种案例。政府和政策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帮助企业学习这些制造技术。政府之所以能够推动企业和经济体朝着预期的目标前进，一个重要前提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实现过这种目标了。在企业成熟之后，如果政府继续进行太多干预，或者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措施，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今天，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出现了低增长、技术进步停滞的问题，就是政府过度干预或政策失误导致的结果。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如果政府在本国迅速实现现代化之后仍然过度干预经济，肯定会带来负面效应。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如何才能首先变得富有，当你贫穷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比一切都重要。

历史经验与经济理论：发展思路的碰撞

有些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制定成功的工业政策，就是因为它们吸取了其他国家的教训。这些国家的工业政策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效仿了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例子。更加直接地讲，是效仿了德国的例子。德国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历程为明治时代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先例。

从日本开始，一些关于工业政策的思想逐渐传播给了韩国与中国台湾这两个日本的殖民地，并传播到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比日本晚了大约20年，¹⁶但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还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德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在制定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政策的过程中，经常参考德国的先例，直到1938年希特勒背信弃义地与日本结盟，德国对中国的影响才开始逐步弱化。由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孙中山对私营企业怀有深刻的偏见，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1949年之前，还是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与台湾都特别重视公有企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因为没有受到日本工业化的直接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或殖民时代结束之后才能学习到发展制造业的知识。当时，国际社会为了帮助新独立的国家而建立了一系列国际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对于如何实现发展，这些机构提出了一套新的、“经过验证”的思路。起初，这些思路都是根据已经实现富裕的国家的发展经历总结出来的，还算合理。然而，到后来这些国际机构提出的发展建议则大多是一些比较抽象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赖以建立的前提原本就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即所有经济体，无论其实际发展水平如何，都可以采用相似的发展规则。最后，很多新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忽视历史的教训，接受了这些国际机构提出的所谓经济科学的准则，以至于造成了一些不容乐观的发展结果。

日本借鉴了德国、美国与英国的经验

在19世纪的明治时代，日本领导人凭借直觉把德国作为自己的榜样。虽然当时日本的发展水平不如德国，但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1868年拉开帷幕的，3年之后，也就是在1871年，普鲁士才完成德国统一。明治时代统治日本的寡头与推动德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鲁士人虽然存在诸多差异性，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在政治上持有保守立场，致力于推动本国工业化，并且担心日本的领土安全。普鲁士人试图通过把其他说德语的人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来实现军事安全，梦想着洗刷过去的失败带来的耻辱，并试图夺回被拿破仑割走的领土。¹⁷相似的是，日本的武士阶层发动了军事兵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目标就是把各藩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能够抵御外来侵略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谋求军事安全的途径都是发展经济。

德国人在19世纪提出了一套发展理念，而这套理念类似于美国刚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之际提出的理念。继美国之后，德国是第二个明确提出这套发展理念的国家，提出者是历史学派。所谓历史学派，是一群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非正式学术派别，这支力量在19世纪中期的德国政治、经济领域以及德国各大学的法学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历史学派认为，英国历史表明，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培育企业家，必须采用保护主义的工业政策，而且该学派拒绝接受新兴的、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提出的自由市场理论，认为这种理论不适用于德国当时的发展阶段。德国历史学派最杰出的代表、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认为发端于英国的自由市场理论过于理想，是以机会主义为动力的，而机会主义则是由英国在全球的技术

领先地位催生的。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抨击了这一新兴的经济学派，他写道：

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¹⁸

李斯特的发展观念形成于1825~1832年之间，在这期间他生活在美国，研究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汉密尔顿在这篇报告中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即主张国家需要在产业的早期发展阶段制定一个保护性的政策，以培育幼稚工业。从19世纪初期以来，这个报告的很多建议，包括选择性的高关税，都在美国得到了实施。¹⁹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父亲是苏格兰人。他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英国在获得全球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英国政府阻止殖民地企业与本土企业进行竞争的政策引起了他的深入思考。²⁰

李斯特向来主张自由贸易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但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之前，必须先实行保护政策以培育本国的制造能力。他写道：“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明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指英国）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²¹这是李斯特全面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之后提出的具有历史智慧的观点，后来东亚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在从美国回到德国之际，李斯特已经成为了19世纪继马克思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提出了非共产主义式的发展路径。李斯特在旅美期间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日本人后来又从李斯特及其历史学派的同人那里学习发展经验。

日本人学习西方时特别认真，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高级领导人都曾经亲自前往欧洲和北美学习发展经验。1871年，日本第一个使团前往欧美考察，其中包括三位在职的部长，这个使团的考察目标是确定第一批试点产业项目。²²虽然这个使团在英国、法国与美国进行了很多考察，但最青睐的国家还是德国。1882年，伊藤博文在德国柏林进行了两个月的考察，并得到了德国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会见，后来，伊藤博文成为明治时代的第一个内阁首相。在明治时代，日本的第

二代领导人中间也有几位曾经在德国学习过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平田东助（Hirata Tosuke）也曾经在1871年跟随日本使团赴欧美考察，后来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担任日本的农商务大臣和内务大臣。平田东助1871年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师从格纳伊斯特学习政治学，后来于187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个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日本人。平田东助还是最早将李斯特的思想翻译成日文。²³金井延（Kanai Noboru）曾在19世纪80年代赴德国留学，其老师几乎囊括了历史学派所有的关键学者，包括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和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后来他返回日本，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培养了一代日本高官，该大学一时间成为日本的精英大学和政府官员的摇篮，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而且当时该大学还聘请了几位重要的德国学者担任教职，并为日本政府提供咨询。

日本一些主要的政治家在日记和其他文件中反复提到普鲁士的思想和制度适合他们的国家。历史学家肯尼思·派尔（Kenneth Pyle）把日本在明治时代复制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做法称作日本的“固定观念”。²⁴经济史学家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指出，“固定观念”在日语中暗含着所有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最终都会“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这明显体现了历史学派的主张。

日本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效仿或剽窃德、英等西方国家的技术

普鲁士在18世纪末期开始实行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日本则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实施这类政策。起初，作为试点，日本政府只是选择在基础产业建立了一些工厂。如同普鲁士的情况一样，日本这些试点工厂大多数都亏损，但政府愿意为企业的学习交学费，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环境下，私人投资者对工业还不太了解，不愿意冒着赔钱的风险去投资。普鲁士人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购买并仿造了英国的机械，还物色了一批英国工程师为普鲁士工作（当时英国的刑事法律是禁止这种做法的）。日本也如法炮制，进口了一批机械，然后进行改造，还聘请了一些掌握必要技术知识的外国人到日本工作。明治维新拉开帷幕之后的10年间，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多达400人，后来这个数字攀升到了数千人。

1843年，英国彻底废除了限制制造机械出口的法律条文，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与城市行会也开始取消类似的限制措施，因此促进了先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

通，日本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要远远低于之前欧洲大陆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难度。²⁵外国企业为了防止日本人仿造自己的机械，强迫日本人签订国际专利权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但日本人即便签了也会无视协议的内容。日本历史学家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Lockwood）指出，“外国制造企业经常抱怨说这些协议无法有效地阻止日本人仿造外国设计。”²⁶在明治时代，日本效仿外国技术的手段通常是对外国产品进行一定的改造，改造过程的成本和技术含量都很低，外国人讥讽说日本的仿造品是廉价而低劣的（“二战”结束以后，处于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也是一再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这些仿造品的主要消费者通常是手头拮据的农村人口，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日本的农村市场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有时日本人会对外国产品进行一些巧妙的改进，仿造品甚至比原来的产品还好用，比如，日本丰田自动织布机工厂在英国织布机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改进，仿造的丰田牌自动织布机甚至回销到了英国这个现代纺织业的发源地。²⁷如同德国一样，日本也阻止外国人在日本直接投资，以保护本国企业。

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把大多数试点工厂低价卖给了私营企业家，这些工厂所在的业务领域涉及采矿、棉纺织、羊毛线生产、缫丝、造船、平板玻璃与水泥。之后，很多工厂的赢利能力都大为提升。²⁸1889年，日本在《德意志联邦宪法》的基础上制定并实行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了“大政奉还”的政策，即把国家的实际管理权交还给职业性的政府机构。²⁹这些官僚后来扶持了一批企业家，其手段不仅仅包括将试点工厂卖给私营企业家，还允许企业家们垄断市场，并为从事采矿、造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提供最低利润保障。比如，日本向修建铁路的公司保证利润率不低于7%。1870年，岩崎弥太郎创立三菱集团时，日本免费为其提供了政府船只以及大量的补贴，直到其实力大到足以打破西方对日本航运业的压制为止。日本的出口商品起初只是生丝以及小企业生产的简单的工业品，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出口额迅速增加，在1880年到1913年之间，出口额增长了8倍。

日本的规模经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进入了现代化的最后阶段。在此之前，德国工业几乎没有产生真正的创新。这种情况在日本更加明显。普鲁士王国以及统一后的德意志进步的关键就是扩大投资规模，方式通常是合并企业，同时改进原有的技术。德

国在工业起步与发展阶段使用的工业技术主要是英国、法国开发出来的，这类技术包括用来生产无磷生铁的碱性转炉炼钢技术、实现苯胺染料商业化生产的技术以及发电和输电技术。随着德国日益重视发展规模经济，其工业产出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工业产出的单位成本远远低于英国这个老牌工业强国，因为英国在早期工业化阶段修建了大批小工厂，但不注重淘汰、改进这些老旧的工厂和技术，对其经济运行构成了负担。德国的规模经济非常成功，以至于钢铁厂不仅能够承担并消化进口一般铁矿石的运输成本（当时，铁矿石的单位运价比现在的运价还要高），而且其生产效率仍然位于欧洲之最。这是德国有针对性地发展工业的结果，德国当时每年拿出国民总收入的1/4用于投资，这么大的投资比例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³⁰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生丝一直都是日本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直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才愿意效仿德国建立大型工厂，发展规模经济。如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日本最初也是从发展纺织业开始着手的，因为纺织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对较低，而且市场空间广阔。1882年，明治时代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涩泽荣一（Shibusawa Eiichi）重用一位曾经被派往英国曼彻斯特学习棉纺织技术的技术人员，并说服多名投资人士共同出资，创办了大阪纺织会社，大量引进英国纺织机，成为日本第一家大规模棉纺织工厂，纱锭总数达到10 500枚，而之前最大的纺织厂也不过2 000枚而已。投资规模之大，堪称日本棉纺织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投产一年之后，这个工厂就给股东分发了18%的巨额红利。随着日本棉纺织业的规模经济日益壮大，该国便开始削减对进口棉线和棉布的依赖性，19世纪70年代晚期，进口棉线与棉布占据日本总进口额的1/3。³¹

涩泽荣一紧接着又说服政府取消对原棉的进口关税，推动日本采用德国的生产技术去加工进口的原材料。他发现，对于大规模棉纺织工厂而言，最理想的状况就是一方面享受着受保护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可以不用缴纳关税的情况下从世界市场上进口价格最低、质量最好的原材料。政府为了发展工业而取消了对多种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结果导致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冲击。到1914年，各类纺织品占据日本出口总额的60%，日本长期以来的贸易赤字也随之结束了。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扰乱了欧洲各国的工业生产，日本趁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之际抢占了东亚地区各殖民地的市场，大力销售各类基本商品，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罐装食品等。日本的出口贸易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日本仿照欧洲的方式，分别在1895年和1910年接管了中国台湾与朝鲜，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日本需要实施更多的出口纪律

虽然日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其发展模式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德国曾经遇到过的，即日本那些规模最大的企业总是想方设法地逃避出口，把出口留给较小的企业去做。所谓的财阀家族经营的企业集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渐主导了日本经济，但它们集中在采矿、船运、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以及面向国内市场上游制造业务，因为这些基础领域的企业可以控制产业链上游，向其他经济领域的企业索要高价，而不必劳心费力地到出口市场上参与竞争。财阀的势力越来越大，到1928年，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的实收资本^[8]总额占据日本全部企业实收资本总额的15%。³²然而，它们经常通过压榨下游的生产企业来获取利润。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状况良好时，这些下游企业可以依靠微薄的利润继续经营，但其现金流肯定不足以支撑其从事更复杂的商业行为，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这些下游企业就会破产。

1920年，日本陷入经济衰退，数以千计的企业开始破产。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政府在形势的逼迫下终于意识到有必要再次调整其工业化政策，即利用补贴制度，强迫大企业增加出口，将企业自身利益与国家发展利益结合起来。日本是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发现这一点的，这个发现过程跨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在19世纪晚期也曾经经历过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

当时，德国之所以发现有必要促使本国企业增加出口，也是因为受到了经济衰退的逼迫。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遭遇了长达20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如同日本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的衰退中遭遇了冲击一样，德国经济在当时那场衰退中也遭遇了严重冲击，处于产业链下游的数千个小企业破产倒闭。很多企业为了生存而纷纷联合起来组建卡特尔，实行生产配额制度，缩小企业的生产规模，防止出现肆意削价和恶性价格竞争现象，结果很多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幸存了下来。但很多大企业为了获得卡特尔董事会分配给小企业的生产配额而兼并了小企业。从长远来看，卡特尔的建立以及兼并浪潮只会更有利于那些最大的上游企业盘剥下游的小企业和消费者。

这种局面到1903年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了，严重阻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德国政府便开始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包括400个大集团和12 000个工厂。调查者严厉批评

原材料生产企业剥削国内企业。政府意识到需要把过剩的产出销售到海外市场，以充分利用本国产能，为德国人创造就业机会。卡特尔建议的解决方案是政府采取出口补贴机制，出口企业可以享受到价格较低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实际上，出口补贴在降低国外的销售价格的同时，也提高了国内商品的生产成本以及销售价格。按照经济史专家克莱夫·特里比尔科克（Clive Trebilcock）的说法，德国建立的由卡特尔管理的出口补贴机制催生了德国出口贸易的繁荣，进而催生了德国经济在20世纪前10年的繁荣。³³

1904年，德国钢铁厂联合会设立了第一个这种具有出口贸易管理职能的卡特尔。³⁴出口补贴主要提供给那些在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在出口卡特尔中，那些实力较弱的成员企业被迫淘汰落后技术，因为国际市场不像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那样能够容忍低质量的生产。这就体现了出口纪律的作用。德国出口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甚至能够独立出资资助完整的技术创新。这些出口企业热衷于进行大规模科技研发，不断开辟出全新产业，并在这些新产业中占据垄断地位，这类新产业包括电气工程产业、化学产业与石油化工产业等。³⁵

在1925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日本也对其原有的工业政策进行了调整，把实施出口纪律、促进大型制造企业发展出口贸易摆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³⁶这一调整过程始于1925年，跨越了4个时期，即大萧条时期、法西斯主义日渐兴起时期、“二战”时期以及战后初期，一开始，日本政府设立了工商省，赋予其监督重要出口商品的定价与质量的法定权力。³⁷在1927年那场具有毁灭性的银行业危机之后，日本又设立了工商业委员会，负责对面临破产的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产业合理化”运动，“产业合理化”这个术语本身就意味着国家有必要淘汰掉那些在政府保护下仍然无法发展壮大的弱势企业，因为淘汰这些企业是实现产业合理化的必由之路。³⁸1930年，日本工商省高级官员岸信介（Kishi Nobusuke）在德国花了7个月的时间去考察卡特尔的运作，并于1931年返回日本，发布了自己的考察报告。之后，日本通过了一部新法律，规定无论任何行业，只要该行业2/3的企业同意，就可以设立一个卡特尔，还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制定卡特尔协议。³⁹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钢铁业到丝织业，日本26个工业领域都建立了卡特尔，然而，如同德国在实行出口补贴之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卡特尔的设立往往加强了那些处在上游产业的大财阀的实力，而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则继续承受着这些财阀的压迫。20世纪30年代，国民经济军事化过程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增长，但即便如此，这

些下游企业遭受压迫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⁴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工商省的工作重心仍然是保护这些下游企业，使其免受财阀的剥削，而不是通过实施全面的出口纪律来调整产业结构。

日本工业政策的最后调整则是“二战”之后在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主导下完成的。由于之前日本财阀家族之前与日本军方关系过于密切，为军方发动战争提供了巨额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美国人占领日本后便对日本财阀家族实行了强制解散政策，剥夺了财阀家族的大部分企业产权，禁止他们拥有企业，并加强日本工商省的权力。1949年，日本在工商省的基础上设立通产省，对日本工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具有极为强大的控制权，这也使其能够以空前的力度去落实出口纪律并淘汰落后企业。⁴¹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最初的想法只是把通产省作为一个临时机构，但日本1952年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独立了出来之后，吉田茂（Yoshida Shigeru）组建的内阁过于软弱，在1954年解散之后，通产省开始了常态化运作。

通产省实行了以严格的出口纪律为核心的工业政策。“二战”后，日本的大企业不对财阀负责，而是对通产省的官员负责。通产省集中精力推动企业发展出口贸易，而且作为鼓励，把企业出口收益的80%纳入免税范围。1964年，《关贸总协定》迫使日本取消了“出口收益免税政策”，通产省继而采取了依据企业出口业绩决定折旧预备的制度，即日本企业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销售额作为预备金，以弥补固定设备的折旧，因为预备金享受免税，所以这种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为企业变相减税。20世纪50年代，通产省的官员对世界先进技术进行了系统性的调研，为日本打造世界一流的制造业奠定了基础。他们循序渐进地进行了多个产业的布局，包括钢铁业、船运业、化肥业、合成纤维纺织业、塑料业、石油化工业、汽车制造业以及电子工业。通产省企业局允许并鼓励企业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结果从1950年到1963年，日本与外国签订了2 487份技术引进合同。日本对1927年设立的工商业委员会进行改组升级，形成了日本工业结构委员会，下辖45个次级委员会，承担着各大行业的监管职责，并与各大企业签订出口协定，设定出口业绩标准、质量控制标准、生产效率标准、产能变动标准以及并购准则，强迫企业达到这些要求。⁴²拒绝与通产省合作的企业发现自己无法获得外汇，也就无法购买原材料和设备。而那些得到通产省青睐的企业不仅享有政府补贴政策 and 税收减免政策，还能获得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投资经费和免费土地。⁴³大多数企业的领导者都不喜欢被人指挥来指挥去，但他们除了合作之外别无选择。

日本对国内企业采取的这些保护措施表明日本也采取了幼稚工业保护政策，早在19世纪，英国、独立后的美国、德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也都曾经落实过这一经济理论。当然，“二战”以后，联邦德国、法国与意大利也曾经对国家工业政策进行过一些引人瞩目、行之有效的改进，但在这方面真正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的还要数日本，因为日本这样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能拿出前所未有的魄力践行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着实非常难得。从1952年开始，日本的制造业和采矿业的产出规模迅速提高，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分别提高了10多倍，促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经济增速长期接近两位数的国家。⁴⁴很多人认为这个国家发现了一种新的、无可匹敌的经济管理模式，1979年，《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在美、日两国迅速畅销了起来，足以表明日本的发展引起了多么大的关注。实际上，日本只是重新发掘了古老的思想，并继承了德国对这种思想做出的改进。此外，虽然日本也对这种发展思想做出了重大改进，但与韩国和中国台湾比较起来，日本又相形见绌了，因为日本在19世纪开始实行工业化政策时，它已经是一个较为强大的、稳定的国家，之后不久就成了一个殖民国家，而它的这两个殖民地则比较小，长期受到压制，尤其是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着手推进工业化进程时则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

朴正熙：历史学家与将军

韩国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工业政策，但其制定方式则较为简单。韩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在朴正熙将军的主导下启动的。朴正熙是在1961年5月16日的军事政变中掌权的。他曾在关东军中担任过中尉，关东军是日本驻扎在伪“满洲国”的一支精锐部队。正是在此期间，他目睹了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开展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日本与欧美殖民者之间的一个差异在于，欧美殖民者不会在殖民地兴建大中型工业企业，即便最基本的工业品也是由本国供给的，但日本却在殖民地大力发展制造业，兴建了大批工厂，结果为殖民地独立后开展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先例。⁴⁵

所以，朴正熙将军能够借鉴日本人的管理模式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不过，他还是一位业余的历史学家，读了很多关于前苏联发展历程的书籍，而且密切关注着德国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他还非常熟悉中国孙中山、土耳其凯末尔以及埃及纳赛尔的故事，也非常了解这些伟人为了培育大规模现代工业而付出

的努力。掌权9个月后，这位农民出身的朴将军就出版了他自己的第一本书——《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为韩国经济发展描绘了一幅路线图，他认为“国家要对强大的经济力量实行协调、监管和指导”。⁴⁶次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即他的自传《国家、革命与我》，在这本书中，有几章讲到了“莱茵河的奇迹”和“多种形式的革命”，他从经济与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不同的革命类型（他总是把自己发动的军事政变称为革命）。在这两本书中，在谈到流经首都首尔的汉江时，他向国民承诺要创造“汉江的奇迹”。

20世纪40年代，朴正熙曾经参加过韩国军队系统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所以他掌权后，美国人有点紧张，担心他仍然是一个潜藏着的共产主义分子。但他强调说，韩国将会像日本那样采取“国家负责制订经济发展规划、私营部门充当投资主体”的工业政策。他写道：“一定不能让经济规划或长远发展计划扼杀私营企业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他还写道：“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由竞争机制的优点，而避免垄断体系可能产生的危害。”他还回顾了日本的历史，指出日本在明治时代的政治寡头竭力拉拢私营企业家，并表示韩国也要采取类似的政策，他写道：“百万富翁被允许进入政治舞台和经济舞台的中央，以此鼓励国家资本主义。”“明治时代的案例将对于我们自己的革命产生很大的帮助。”⁴⁷

朴正熙了解历史，他的著作表明他还对韩国基本的经济状况和资源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他是一位见多识广的农民。但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政治寡头一样，朴正熙起初也没有领悟到出口补贴的作用。但他很快就发现了出口带来的力量，因为当他迫切需要外汇的时候，他的政权就参照日本模式在韩国纺织业建立了一个卡特尔，并为其提供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原材料进口关税减免等优惠措施，⁴⁸结果纺织业的出口额节节攀升，宝贵的外汇也源源不断地涌入韩国。1962年，韩国商品出口贸易额达到了5 600万美元，3年之后增加到了1.7亿美元。⁴⁹朴正熙非常兴奋，宣布从1964年开始，每年的11月30日为韩国的“国家出口日”。他需要用硬通货来进口大规模工业投资所需的设备。学者艾丽斯·阿姆斯登指出：“从那以后，朴正熙政权日益把出口作为对企业的强制要求，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⁵⁰实际上，韩国成了世界上对出口依赖度最高的国家，几乎任何一个发展出口贸易的企业都能从政府那里获得信贷补贴。在贷款利率上，出口企业是其他企业的1/4到1/2。在高通胀的20世纪70年代，出口企业每年支付的真实的、经通胀调整的贷款利率为-10%到-20%之间，只要这些企业根据通胀水平上调商品销售价格，则相当于它们非但不必支付贷款利息，反而会获得补贴。⁵¹

韩国商品出口额在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20倍左右，到1970年增加到了8.36亿美元，朴正熙给出口业绩出众的企业家颁发了大量的生产许可证，提供了非常高的信贷额度，为他们发展工业、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机会。现代、大宇、三星等韩国财阀的企业集团就是在这种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把这类最大的财阀比作日本在战前的财阀。但虽然原来的那些老财阀们处心积虑地逃避出口义务，朴正熙扶持的那些财阀却不得不在出口贸易中发挥表率作用。因此，韩国就避免了大企业不愿做出口贸易的问题（日本、德国曾经受到这个问题的长期困扰），这些都要归功于韩国在薄弱的工业基础上直接采取了一套更加有效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

当然，这不全是朴正熙一个人的功劳，他得到了很多韩国人的大力支持，这些人都对日本在“二战”之前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经济企划院前领导人张吉永（Chang Ki-yong）率领的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曾经供职于日本开设的殖民地银行——朝鲜银行。⁵²朴正熙给予经济企划院很大的权力，使其成为了像日本的通产省那样能够决定工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机构，而且经济企划院是由副总理直接负责领导的。20世纪70年代，经济企划院拟订了一份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计划，韩国政府为那些愿意建立工厂、发展出口贸易的企业家提供了低息贷款、廉价土地等丰厚的补贴，获得资金、土地等补贴的财团对重化工业各部门进行投资，借助规模经济实现了财团的发展，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韩国的产业结构也随之迅速升级。韩国重点投资的重化工部门包括石油化工业、机械制造业、钢铁业、造船业、电子产业和非铁金属制造业等。大多数职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韩国经济企划院这个投资计划太疯狂了。要知道，即便日本这个曾经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国家，也是在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工业积累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投资，而韩国在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着实是一个疯狂的举动。1974年，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韩国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对于韩国诸多既定的重工业发展目标是否能成为现实，世界银行保留意见，并建议韩国把纺织业这个资金壁垒、技术壁垒较低的产业作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突破口。⁵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警告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因为当时韩国产能过剩状况极为严重。但即便在经济形势最糟糕的时期，朴正熙扶持的那些企业仍然没有放弃开拓出口市场的努力，虽然进展缓慢，但一直在坚持。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欧美市场繁荣之际，韩国企业大举开拓欧美市场，先后在钢铁业、造船业、半导体业和汽车制造业崛起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全球性经济力量。到1987年，世界银行改变了之前的偏见，认为韩国大型联合钢铁企业浦项制铁（Pohang Iron and Steel）是“世界上最高效的钢铁厂”。⁵⁴之前，世界银行曾经拒绝为该厂提供

融资。从1984年开始，在朴正熙要求下建立的那些重化工企业的出口额在韩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高达60%，而在1973年时，这个比重还不到25%。

在发展历程中，韩国官员一直坚持阅读国际学者关于经济发展的著述，但他们读的不是美国那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著作，也不是亚当·斯密那些倡导建立自由市场的著作，而是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长期研究韩国、中国台湾事务的学者罗伯特·韦德曾经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韩国汉城从事教学工作，在此期间他发现当地大学书店的书架上总是摆满了李斯特的书籍。后来，当他搬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却发现图书馆里关于李斯特的书籍寥寥无几，而且李斯特的一本主要著作的最近借阅年份居然是1966年，此后再也无人问津。⁵⁵这就说明，不同的发展阶段适用不同的经济理论。韩国人在引用李斯特关于发展体系的思想时，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一些最基本的国情就是韩国的人口规模比德国、日本都要小，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危地马拉处于同一水平。⁵⁶后来，由于爆发了两场空前严重的能源危机，国际经济环境大为恶化，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韩国的发展步伐。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朴正熙都坚定不移地推动韩国经济的发展进程。每当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他取消国家领导下的工业政策时，他都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并不会照做，或者偶尔也会采取一些象征性的举措来兑现自己的承诺。⁵⁷朴正熙是一个拥有坚定信念的领导人，他的信念则是以历史为依据的。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公有制

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工业化之路不同于日、韩两国，原因在于公有制在这些经济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一切都被国有化了。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也非常重视公有制，公有制之所以能在两地同时发挥巨大作用，共同的原因在于从1911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给中国大陆与台湾留下了共同的遗产，孙中山对私有制怀有持久的反感，苏联在1927年之前一直对中华民国政府产生着重要影响（1927年，蒋介石与苏共及中共决裂），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又受到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一切都意味着在1949年之前中国肯定会把公有制奉为圭臬。⁵⁸

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政府主要通过一个负责产业规划的政府机构提高国有化

程度，这个机构的规模之大、运作之复杂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包括中国人也无法想象，但现在这个机构已经被人遗忘了。经过一些小规模的前期试验，从1935年开始，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开始指导国家工业政策。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资源委员会在20世纪30年代演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规划机构，负责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民用工业及国防工业的规划与发展。1936年，这个委员会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一份雄心勃勃的交易协定：用中国的矿产去换德国的工业技术。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希特勒选择站在日本那一边，该协议也就终止了。⁵⁹在抗日军事动员的大环境下，资源委员会对工业领域的控制权继续扩展和强化。到1944年，它的规模达到了1.2万人，下属企业拥有16万名员工，跨越矿厂、制造工厂和发电厂。一些企业起初就是作为国有企业而设立的，有的国企是通过对私营企业的国有化改造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归资源委员会管理，这些国企的实收股本在所有企业的实收资本中所占比重高达70%。⁶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源委员会曾经制订过一份非常详细的、多达20卷的工业发展规划，打算等战争结束就开始落实。但由于1946年中国再次燃起内战的烽火，而且美国对华援助规模远低于蒋介石的预期，导致这些雄心勃勃的规划就没有付诸实践。资源委员会的规模从来没有停止过扩张的步伐，最后到1947年年尾之际，该机构人员多达3.3万人，下属企业拥有25万名员工，但即便如此，它依然无法落实大部分发展规划。在中华民国时期，资源委员会的职员们以其较强的能力和专业水平享有一定的良好声誉。大多数人在1949年之后都留在了中国大陆工作，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了原有的国有企业，而且有很多人继续在毛泽东建立的国家规划机构工作。1953年，中国大陆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虽然很多曾经为国民党工作的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到了迫害，但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确实施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资源委员会曾经筹划过的建设项目。后来，国家计划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了今天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在资源委员会的职员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在1945年日本撤离台湾之际被派到了资源委员会驻台湾的办事机构，这部分人后来就一直在台湾工作。他们产生的影响比留在大陆的那些昔日同僚产生的影响大得多，这部分人中间有很多人都成为了台湾地区的经济事务领导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85年之前的14位台湾“经济部部长”中间，有8位都是从这批人中间走出来的。⁶¹这些“部长”管辖的“经济部工业局”在台湾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实施了一套严重依赖公有制企业的工业政策。他们创造出来的台湾公有经济主要

集中在资源委员会之前筹划的那些领域，包括石油化工业、钢铁业、造船业、重型机械制造业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业工程领域，后来他们又扩大了公有经济的覆盖范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当代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和缅甸这两个国家拥有相当规模的公有经济。⁶²

然而，由于台湾地区强调出口对发展的作用，导致公有制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升级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在这一点上，中国台湾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也不同于印度和缅甸这两个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台湾就开始指定某些部门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先是从食品加工业着手，之后是纺织业，当局允许出口商从他们挣得的外汇中保留一部分（其余部分交由“中央银行”保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出口商提供直接现金补贴，组织出口卡特尔以管理行业竞争，并提供一定数量的优惠出口信贷，从1957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口企业贷款利率只有非出口企业贷款利率的一半左右。⁶³20世纪70年代晚期，台湾开始大力发展重工业、合成纤维纺织业以及电子产业，这些产业也是今天的台湾最著名的产业。台湾当局于1973年设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并于1974年在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立了电子工业研究所，以便获取外国技术，承担当局资助的研发项目，并选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公司利用研究成果生产新产品。当韩国大规模生产存储芯片时，台湾则为特定的电子产品生产专用集成电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工业研究院以及电子工业研究所加起来拥有超过5 000名员工，而且管辖着众多当局控股的大型企业。⁶⁴

潜伏的问题

台湾地区的出口纪律显然是非常有效的。1952年，台湾的出口额只相当于生产总值的9%，到1979年，这一数字已经提高到了50%。一项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出口增长非常快，以至于制造业近70%的产品是用于出口的。⁶⁵然而，经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台湾地区的出口经济也存在一些结构性弱点，这一点与19世纪的德国和“二战”之前的日本相似。1985年，员工少于300人的中小型企业占出口总额的65%，这与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相同。德国和日本的失误在于它们没有迫使大型私营企业发展出口贸易，但台湾的失误则在于台湾当局没有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严格的出口纪律。虽然时代不同，问题的本质却是一样的。⁶⁶同时，台湾地区也没有像“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那样大力支持其发展出口贸易的私营企业家。

几十年来，没有人关注过台湾地区的出口结构。台湾岛一直引以为豪的是它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比韩国还高，1990年高达8 000美元，而韩国在同一时期只有6 300美元。出现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的发展速度比较快，而当时韩国正处于李承晚政权统治之下，受到内外因素的干扰，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台湾地区成功地开展了土地改革，其效率之高可谓是举世瞩目，因此为制造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撑。然而，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政策却不如韩国那么明智，因为台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迫使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开拓出口市场，这个政策失误最终制约了台湾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之前，韩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水平终于赶上了台湾地区。金融危机后，韩国又迅速恢复了元气，今天，韩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比台湾地区高出2 000美元。⁶⁷

虽然一提到公有制，西方经常会将其和业绩不佳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也并非总是如此。台湾地区大型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像韩国财阀企业那样形成全球竞争力，之所以业绩没有韩国的财阀企业那么好，公有制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没有像韩国企业那样面临严格的出口纪律和激烈的竞争。台湾当局允许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更加依赖合资企业来获取技术，长此以往就削弱了台湾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湾的电信行业。长期以来，台湾的电信企业在获取先进技术方面一直无法摆脱对美国合作伙伴的依赖，这类合作伙伴包括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rporation）和美国通用电话电子公司（General Telephone and Electronics Corporation）等跨国企业。⁶⁸在不逼迫大型国有企业开拓出口市场的同时，台湾当局也没有对私营企业给予充分的支持，众多占据主流地位的私有企业，比如计算机制造商宏碁集团就无法获得像韩国企业那种高水平的出口补贴、政府保护和金融扶持。这样一来，台湾的私有企业不得不依靠相对微薄的利润维持生存，技术竞争力的提升与经营规模的扩大也受到了很大限制。⁶⁹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有10家工业企业跻身《财富》500强企业名单，而台湾只有两家企业跻身其中。⁷⁰与韩国企业相比，台湾地区的制造企业更多地涉足一些利润较低的制造领域，或者生产一些自有品牌的低利润产品，或者为欧美跨国企业充当代工企业，比如，为美国苹果公司制造iPhone和iPad。而韩国的三星则销售自有品牌的智能手机，而且其销量领先全球，现代集团的汽车制造业务则位居全球前5名之内。⁷¹台湾地区之所以没有像那些最富裕国家一样从事利润率最高的自有品牌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其经济结构方面的缺陷。

历史学家的胜利

虽然台湾地区的工业政策存在一些相对不足之处，但无可置疑的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工业发展方面都是成功的案例。这几个经济体都先后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出口纪律，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出口市场。1965年，韩国、台湾地区的出口总额分别位居全球第33位和第28位，20年后，分别位居全球第13位和第10位，韩国与台湾地区的出口总额都超出了拉美国家的出口总和。⁷²由于韩国与台湾地区都比较重视发展重工业，只用了15年的时间，两个经济体的轻、重工业之比就从4：1变成了1：1。

当然，东北亚地区制造业政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农业生产效率高，而且农业产出规模不断扩大，为制造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比19世纪早期的普鲁士以及18世纪的英国发展速度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日本农业产出的增加速度也比较快，农村的富裕就为初级工业品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国内销售市场，很多出口商品在销往国际市场之前往往是先经过了国内市场的检验。20世纪50年代那10年间，日本农业产出就增加了50%，而农村市场的繁荣又提高了农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⁷³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估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出口商品中绝大多数都是先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只有晶体管收音机和照相机没有事先经过国内市场的检验。⁷⁴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制造业经济也都是在农业部门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每一个东北亚经济体都印证了日本问题专家大川一司（Kazushi Ohkawa）和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在分析日本明治时期的快速发展时指出的一个真理，即“如果传统经济（即农业经济）的产出没有大幅提升，那么现代工业的产品就几乎找不到任何国内市场。”⁷⁵

现在回首历史，不难发现，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在制定工业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可取之处，即决策者基本上都是通晓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人，职业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日本的发展之道效仿的是德国以及早期的美国，而它们都拒绝了始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明治维新的推动者之间，有很多人都曾经在德国，也有很多人在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接受过教育，这个法学院的教育重心不在法律，而在于欧洲式的公共管理。⁷⁶当时这些决策者普遍不那么重视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而是更加注重能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日本通产省次官的吉野信次（Yoshino

Shinji) 曾经表示,日本在制订经济规划的过程中采取了德国式的思维,他说:“关于‘控制’这个理念,从逻辑原理上来讲有很多复杂的解释,但要理解这个理念,人们只需要具有常识就足够了。”⁷⁷日本重用的人才大多数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通识型人才,其政府官员划分为管理型官员和技术型官员,而前者的地位往往高于后者。20世纪60年代,虽然日本通产省的权力达到了巅峰,但其高级成员中,只有两个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通识型人才占据绝大多数。⁷⁸

韩国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所有的高级领导人和官员,包括朴正熙本人和韩国经济企划院前领导人张吉永在内,都曾经接受过日本式的教育。但韩国与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差异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领导人大多来自于农民阶级,比如朴正熙本人就出身农民家庭。韩裔学者禹贞恩(Jung-en Woo)把这类人称为“生于田亩之人”,并且说:“当他们想到资本主义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富人的阴谋。”而台湾的情况则不一样,因为台湾工业政策的缔造者不是日本那种通识型的管理者,而是以工程师为主。台湾的历届“经济部长”中,大多数人在职业生涯早期都曾供职于资源委员会,而且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工学学位或理学学位。比如,尹仲容就是一个代表。他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供职于“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下属的工业委员会,对台湾工业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工业委员会直到1981年才开始雇用所谓的经济学家。⁷⁹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学家中,最有名的那一批是美国政府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新盟友的政策问题。在这一批经济学家中包括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⁸⁰,他于1949年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帮助日本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结果他的政策导致日本在1949年到1950年的冬季出现了一场深刻的紧缩型衰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6月。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催生了对战争物资的需求,日本抓住了这个机会恢复了元气。1952年,日本重新获得了主权,通产省之后继续遵循其以历史为导向的直觉。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早期,美国派往韩国的经济学家们要求对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提高利率,并实行进口自由化政策。结果韩国银行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私有化阶段,但朴正熙发动政变之后又恢复了银行国有的政策。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朴正熙在利率和进口管制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大部分让步都只是表面的,只是为了减轻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出口额开始逐步攀升,朴正熙政权以越来越自信的心态拒绝了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要求。⁸¹

然而，如果认为只有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出谋划策，那就错了。“二战”之后，在经济学领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观点越来越盛行的同时，还存在一种基于历史角度的发展思路。正如沃尔夫·拉德津斯基在“二战”后的几年里曾经对农业发展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一样，一些在工业发展政策方面具有历史眼光的顾问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沃尔特·罗斯托。他和拉德津斯基一样，也是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但他与拉德津斯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他反对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他肯定比拉德津斯基更受美国总统的欢迎，结果他先后担任过三届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高级顾问。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上给美国政府推荐的是李斯特式的经典良方，他的一本关键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讲的就是发展中国家是如何遵循同样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台湾顶级经济规划师尹仲容就是这本书的忠实信众之一。⁸²

20世纪50年代早期，随着拉德津斯基逐渐被边缘化，美国对东亚土地改革的热情也随之消减。但罗斯托与其支持者们继续推动美国政府支持韩国、中国台湾等盟友的工业化，并容忍这些盟友采取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实际上，美国也通常会用其庞大的军事及民事援助预算来为这类政策埋单。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政府削减了对外援助中无须偿付的拨款，但其他资金继续通过美国发展贷款基金提供给美国的盟友。该基金的明确目标就是支持冷战中的盟友的工业化。韩国政府和中国台湾当局不仅借助美国的援助制定了一套幼稚工业保护政策，还促使美国派来的顾问们适应并支持它们的目标。比如，台湾当局就曾经邀请美国纽约的怀特工程公司（J. G. WHITE）帮助其筛选数十个公有重工业项目，还曾经邀请美国理特管理咨询公司（Arthur D. Little）帮助其确定需要推进哪些新的制造业部门，同时让其提供关于出口补贴方面的建议（今天，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后面这种做法是非法的）。⁸³

与东南亚国家不同的是，东北亚国家能够有效地利用美国提供的援助资金改善本国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正如罗伯特·韦德所说的那样，东北亚经济体拒绝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没有让其努力提倡的效率准则颠覆本国探索通过何种产业与产品来加速经济增长的过程。⁸⁴20世纪80年代，当这类经济学家开始在韩国、中国台湾出任要职之际，效率问题的确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因为当时那些得到政府扶植的企业滥用寡头地位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且政府的出口补贴政策严重推高了经济体内部市场的价格水平，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消费者对于

自己在产业政策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日益不满。正如韩裔学者禹贞恩以轻蔑的口吻指出的那样，在韩国，一群到美国读个博士镀层金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给韩国的金融体系带来了严重危害，为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⁸⁵然而，在韩国多个工业部门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需要放松管制而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大环境下，这群经济学家登上决策舞台的确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相比之下，在东南亚，历史学家们对经济发展进程的理解则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南亚一些新独立的国家没有认真思考如何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后来却非常突然地接受了大力提倡效率准则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忽视了土地改革以及农业发展，为工业化进程制造了持久的障碍。为这些东南亚国家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接受过外国教育的当地人，比如所谓的“伯克利派”，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的五位主要经济顾问就属于这一类，他们都曾经在加州大学接受过教育。⁸⁶此外，更加常见的情况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提供经济发展建议。这些国际组织早已经为这些国家开出了市场自由化的发展处方，虽然这类处方从来没有催生过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建议的受欢迎程度。近些年来，一种非常流行的现象就是把发展中国家处于艰难处境的原因归咎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一味地追究历史责任不如总结一下日本在明治时代的经验更具有建设意义。日本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探索本国发展之路的过程虽然比较艰难，但没有必要非得依靠其他人的建议，它完全可以把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睁开眼睛观察外部世界，并探索出真正的发展良方。正如日本五条御誓文的第五条，也就是最后一条所说的那样，“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 [\[9\]](#)⁸⁷

韩国与马来西亚之对比

为了深入了解产业政策的作用，有必要对比一下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在管理某些工业部门时采取的不同政策。韩国与马来西亚的对比是最有趣的，因为在东南亚各国中，马来西亚是唯一一个曾经公开承诺要以东北亚经验为基础推进本国工业化的国家，当时马来西亚总理是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但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人们原先的希望。分析一下这种结局背后的原因可以为我们揭示出东南亚国家的产业政策给我们留下的教训。韩国与马来西亚在起步阶段的经济状况大同小异，但两国的发展结果却大相径庭。在韩国，有效的政策促使本国经济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而在马

来西亚，原有殖民地的关键经济特征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在东北亚经济体中，韩国的工业发展历程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因为与日本的政策相比，韩国政策更新，而且从迫使大企业发展出口贸易的角度来看，韩国政策比台湾地区的政策更彻底。“二战”以后，日本是以原有发展成果为基础的，而韩国的起点则要低很多，因为1945年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时，只有规模非常小的买办阶级才有一些企业家精神。20世纪50年代，这批人获准从李承晚政府手中购买廉价国有资产，并获得很多特许经营权。当时，韩国政府没有强迫企业发展出口贸易，仍然高度依赖美国的援助。但1961年朴正熙政变后，新政权开始大力实行出口纪律，淘汰业绩不佳的企业。韩国那些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朴正熙政府无情地淘汰了落后企业，鼓励大企业开拓出口市场，迅速扭转了这一局面，结果韩国出现了一批以现代集团、三星集团为代表的世界知名大型制造企业。无论是在朴正熙政府组建之前，还是在之后，韩国企业都是家族经营的，但国家产业政策却完全改变了这些企业的运作方式。

1957年，马来西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之际，其经济结构与韩国在李承晚时期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多相似之处。⁸⁸在殖民时代形成的买办阶级继续主导者马来西亚的私营企业，在投资食品加工业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优惠待遇，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必须发展制造业或必须增加出口之类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收购了英国公司控制的矿业企业和种植园的股权，但没有要求国内企业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相反，马来西亚政府还邀请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设厂，比如食品加工厂。1981年马哈蒂尔当总理之后，马来西亚突然认识到独立20年后甚至还没有开始建立名副其实的工业结构。

马哈蒂尔宣布了“向东看”（Look East）的政策，指出马来西亚将效仿东北亚的制造业发展方案。他在出任总理之前，也就是在担任马来西亚贸易与工业部部长时就对日本、韩国抱有浓厚的兴趣。曾几何时，似乎马来西亚要效仿韩国学习日本、日本学习德国的先例从历史中总结教训。然而，虽然马哈蒂尔政府派遣了数千名马来西亚人去日本接受培训，甚至让其内阁学习日本茶道，马哈蒂尔最终还是没有弄明白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最基本前提：实行出口纪律、惩罚失败企业。他竭力让国有企业做一些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事情，但根本没有惩罚那些耗费了数十亿美元而没有对经济发展做出任何重要贡献的主流企业家们。整个20世纪80年代，马哈蒂尔的做法就是一场悲喜剧，他吩咐内阁同僚去阅读一些完全不适用于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书，扭转了国内一度盛行的从文化理论角度剖析经济发展的潮流，但取而代

之的则是一种简单的、从结构角度去解释经济发展进程的分析方法。虽然马哈蒂尔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路上走了一半，但最终还是改善了马来西亚的处境，这比菲律宾等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政策来提高制造能力的国家好一些。马来西亚的制造业是个败笔，但它告诫我们失败的尝试比永不尝试好一些。

在发展中国家的各个工业领域中，最有比较价值的就是钢铁业，因为对于几乎所有富裕国家而言，在其工业化进程的早期，发展钢铁业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些立案金融中心和人口总量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高的国家是例外情况。）钢铁对于英国、美国、德国、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以及东北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所有工业部门中，钢铁都是一个必要的投入元素。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制造钢铁的效率很高，就意味着它制造其他产品的效率也会很高。朴正熙似乎深谙这一点，他为了勉励韩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厂——浦项制铁，为其亲笔题写了“钢铁国力”四个大字，意即“钢铁是国力”，这四个字挂在了浦项制铁总部的墙上。

钢铁业要想成功，必须依赖规模经济，必须充分利用好有限的投入，必须对长期沿袭下来的核心技术做出渐进式革新。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除了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要考虑需要制造什么产品、购买什么技术、投入多少资本之外，无一例外地都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厂。私营企业家的角色未必在每一个经济体内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经济体生产钢铁的效率都是极高的。韩国和日本最后对钢铁业进行了私有制改革，而中国台湾的钢铁业一直是当局经营的。马来西亚在发展钢铁业的过程中选择了中国台湾那种将当局主导与公有制相结合的模式，但马来西亚的努力似乎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没有培育出首屈一指的公有钢铁企业。

在大多数行业中，国家都不适合完全取代私营企业家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行业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供应链比较复杂，而且在产品营销过程中的挑战也比较大。汽车制造业就属于这类行业。在东亚地区，除了菲律宾之外，韩国、马来西亚等各大经济体都试图从这个市场中分一杯羹。正是由于汽车行业对营销环节有很高的要求，需要生产企业具有高度灵活性，能够迅速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所以特别适合私营企业家去做，对国家而言，最有效的角色不是在各个环节中完全取代私营企业家，而是根据既定的发展目标引导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汽车行业是竞争非常残酷的行业，也是具有高度周期性的行业，必须迫使企业家们拓展出口贸易，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在韩国，

政府先是利用补贴吸引一些亟须政府援助的商人，然后用了30年的时间淘汰落后企业，最后只留下来了像现代集团这种世界一流的大型企业集团。这个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混乱，但由于韩国政府在执行出口纪律的问题上毫不含糊，所以最后还是成功了。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努力则要逊色很多，在决定进军汽车产业之际，马来西亚只设立了一家国有汽车制造厂，不存在同业竞争，也没有实行出口纪律。后来，马来西亚又设立了一家公私合营的汽车企业，但其业务重点与前一家汽车厂不同，二者也不存在激烈竞争。马来西亚也有一些成功的私营企业家，但马来西亚政府没有逼迫他们发展出口贸易，而且允许他们继续在受到政府保护的非制造业务（比如移动通信服务业、电力行业）缔造自己的商业帝国。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即便到了今天，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等大规模制造业仍然是令马来西亚政府头疼不已的累赘，从事这些业务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私有企业则主要集中在非制造类业务。

纵观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政策存在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即在大多数大型企业中，对企业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是私营企业家与国家的关系。政府可以绕开私营部门，亲自经营各行各业。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方法是不值得推荐的。相反，政府必须运用自己的权力，尤其是控制国有资产、商业许可、银行信贷以及稀缺外汇的权力，引导企业做一些产业发展所需的事情。这样做的话，政府对企业家的看法必须现实一点，不能对其道德水准抱有幻想。不要指望他们会自愿地走向道德高地，而是要接受他们唯利是图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⁸⁹，利用他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愿望来引导和控制他们。所谓企业家，顾名思义就是一群追逐利润的人，他们不会自发地考虑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必须逼迫他们把本企业的逐利行为与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

因此，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是一项政治事业。如果政府允许企业使用政府控制的公共资源谋求私利，而这些企业却没有为落实国家的发展目标做出什么贡献，那么实际上这就相当于“政治渎职”。某些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之所以被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因为他们的商人既可以利用国家政策和公共资源谋求私利，又不必考虑为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因此，这种模式就是一个政治败笔，而不是一个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模式。“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起源于菲律宾。在东亚各国中，菲律宾的官僚可以说是最自私的、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新自由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竭力宣扬政府不应该扶持私营企业，避免让私营企业使用公共资源谋求私利。这种做法在一个已经富裕起来的国家还可能行得通，但对于一个经济

基础薄弱、发展欲望强烈的国家而言，这种做法是注定行不通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企业家没有实力，而政府又不加以扶持，你如何才能让企业家们做一些符合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事情呢？朴正熙扶持了一批世界一流的企业家，但从来不相信他们，如果朴正熙在世的话，对于前面这个问题，他肯定会这样回答：根本做不到。在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给企业家提供一些优惠待遇，以此为诱饵来引导并控制私营企业家。

[8] 实收资本是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它是企业注册登记的法定资本总额的来源，它表明所有者对企业的基本产权关系。实收资本是企业永久性的资金来源，它是保证企业持续经营和偿还债务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企业抵御各种风险的缓冲器。——译者注

[9] 五条御誓文是日本明治天皇于1868年4月6日发表的誓文，揭示治国方针，由此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序幕。——译者注

案例三：从首尔到浦项和蔚山

韩国的首都首尔，如同整个韩国一样，会给人一丝混乱的感觉。周围的山地丘陵地形赋予首尔一定的地形魅力。在首尔，经常有人把垃圾丢在街头，这一点与日本人不同。郊区地带矗立着一栋栋单调呆板的高层建筑，似乎在默默地告诉人们韩国是经合组织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但这里的食物非常好，出租车价格比中国台湾和日本低。韩国社会的公平性在东北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也是位居前列的。⁹⁰

首尔地处盆地，汉江曲曲折折地穿城而过。在首尔市中心矗立着一座环状的山，即南山。在市中心分布着首尔市政厅、大企业以及主要公共机构。在市中心周围，三个地方见证了朴正熙和商人之间形成的政商关系。第一个地方是总统府，距离市中心北部。青瓦台是韩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占地面积60公顷。1961年5月的那场政变后，朴正熙入主青瓦台，把这里作为指挥韩国发展的总部，朴正熙废弃了之前由日本人建造的国会大厦，只是将其用于礼节性场合（该大厦现在已经拆除），而将其政权内部各关键部门分布在青瓦台主楼周围的一些低层附属建筑里。其中有一栋建筑是令人胆怯的韩国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地点，1979年，正是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刺杀了朴正熙。权力巨大的总统经济秘书室（Economic Secretariat）也位于青瓦台。当年，朴正熙成立总统经济秘书室，就是为了亲自监督每天的经济事务，并在必要时掌控经济企划事务。

朴正熙会把关键的人员安排在自己周围。他每天到青瓦台之外的主要目的就是去市区的经济企划院，因为这个院的人数太多，青瓦台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不得不安排在市区。朴正熙在1963年写道：“我们需要默默地行动和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⁹¹这句话或许能解释他的做法。他的书就是对其行为的公开诠释。除了去市区之外的时间里，他都在竭力缔造一种有利于实现其产业目标的官商关系，比如，他会定期召见主流的企业家到青瓦台汇报他们的活动。一些最成功的企业家，比如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每周都会受到朴正熙的接见。郑周永（2001年已经去世）经常会在周四晚上与朴正熙共进晚餐。朴正熙时期青瓦台的改建工程中，有很多工程都是由郑周永旗下

的建筑物公司承担的。

郑周永居住在一座较为朴素的、拥有7个房间的风子里，这栋房子所处的小山距离景福宫不远。他说这栋房子是利用其建筑公司的剩余材料修建的，成本非常低，于1958年竣工，比朴正熙发动政变早了3年。郑周永成为亿万富豪之后，从不买价格昂贵的奢侈品。连续30年的时间里，他每天早上都是步行4 000米来到市中心的办公室，他的儿子们和保镖跟着他。他对奢侈物品的公开蔑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朴正熙提倡的节俭文化有关。他是典型的吝啬的企业家，他节约资本，也希望自己的下属效仿自己。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每天早上4点钟就起床锻炼、开会、给经理们打电话，然后在6点钟吃早饭，即便在饭桌上他还不忘教育全家老小勤俭创业。他还有专横独裁的一面，有时候会掌掴或拳打下属。他情妇众多：他公开承认的8个儿子中有一些并非是他妻子亲生的，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子女。⁹²

但郑周永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与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一样，无论政治风向如何改变，他都能发现可以赚钱的领域。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进军汽车维修行业。1945年，美国人来到南朝鲜之后，他承包美国军队的建筑工程，让他那位会讲英语的弟弟做劝说工作。⁹³在李承晚的腐败统治下，他成功地包揽多个民用建筑项目，1958年竣工的第一座横跨汉江的大桥就是由他承包修建的。

郑周永的家族企业结构、商业活动的性质以及他的个人癖好与主导东南亚经济体的寡头是一样的。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郑周永如同东南亚的企业家们一样，也是在一种裙带资本主义的环境下开展经营活动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打着所谓“喝茶费”的幌子吃回扣或操纵招标的行为非常普遍。到朴正熙发动政变之际，郑周永旗下的现代建设公司（Hyundai Construction）已经发展成为了韩国五大建筑公司之一。到此时，郑周永一直专注于建筑领域，还没有涉足过制造业，没有生产或出口过什么商品。他只是一个政治上非常精明的企业家，因为能做好建筑工程而赢得了好名声。如果他不是韩国人，而是生活在独立后的东南亚，那么他可能会在政府发放特许经营权时抓住机遇扩大原有的业务范围。但在韩国，在朴正熙的统治下，他原有的发展道路不得不发生转向，而这种转向注定了他将在建筑领域

和制造领域（包括汽车行业与半导体行业等）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全球性力量，成长为一个大出口商。

郑周永的企业发展之路之所以出现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朴正熙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选择。⁹⁴对于这一点，首尔的西大门刑务所（Seodaemun Prison）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西大门刑务所位于首尔市区，在青瓦台西南部，距离青瓦台有几公里远，夹在一个公园和一群新建的高层建筑之间，原本由日本人所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被用作监狱，今天被修葺之后成了一座博物馆，用来展示殖民者的残暴行为。但朴正熙却把西大门刑务所用作关押拒绝落实其国家发展规划的商人。

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独裁者都只是关押政治上的异见人士，但朴正熙连商人也不放过。他关押商人是为了给他们提个醒，引起他们的注意，促使他们听从自己的安排。根据西大门博物馆的英文介绍所说，今天在牢房和酷刑室中，有很多蜡像模型来展示日本殖民统治者施行酷刑的场景，包括拔指甲、电击等，而且为了让参观者更加真实地体验一下阴森恐怖的氛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特意录制了痛苦而凄惨的叫声循环播放。1945年日本殖民者离开之后，该处继续被韩国政府用作监狱。朴正熙通过关押、恫吓商人的残酷手段实现了韩国发展方向的调整。⁹⁵在恐吓那些争取制度改良的异见人士方面，朴正熙的做法比其他独裁者成功不到哪里去。但他却成功地恐吓了企业家，而且他发现只要让他们有钱赚，他们就很容易屈服于他的意志。

1961年那场政变的12天之后，也就是5月28日，朴正熙及其同僚开始以违反“控制投机倒把的特别措施”为由大肆逮捕并关押商人。⁹⁶至于关押人数、关押地点以及关押时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数十位韩国重要企业家遭到了关押。⁹⁷西大门刑务所只是其中一个关押点。当时，包括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在内的几位顶尖企业家运气比较好，碰巧在日本（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提前得到了风声）。但该国大部分企业家都被抓了。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里，朴正熙恐吓韩国商界的方式着实是前所未见的。他公开宣称说，“自由贵族”时期结束了，他所谓的“自由贵族”，就是指在裙带资本主义的环境下，依托李承晚政权的恩惠发展壮大却没有给国家发展做贡献的资本家。

朴正熙要求那些被关押的商人签署协议，这些协议载明：“当政府需要

我的财产开展国家建设时，我愿意全部捐献出去。”⁹⁸这样一来，无论朴正熙要求什么，企业家们就只能洗耳恭听。李秉喆等顶尖企业家从日本返回韩国后，大多数人也都很快速同意进行工业投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当时的韩国军方以及一批熟悉日本工业化的官僚希望开发的领域包括化肥业、合成纤维业、水泥业、钢铁业、发电业等。他们组建了经济复兴促进委员会，即后来的韩国商人联合会，既可以作为韩国商界与政界沟通的正式渠道，也可以借此推动商界实现国家目标。三星集团的李秉喆出任第一任会长。韩国的财阀家族还被迫认同朴正熙对银行业实行国有化政策（韩国政府曾经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而在1957年实行了银行业私有化改革）。在私有化阶段，韩国银行的领导人往往会把过多资金贷给自己的企业，而且容易导致银行成为一个非法借贷的来源。这个现象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从明治时期的日本到“二战”后的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

朴正熙建立基本的游戏规则后，又告诉韩国商人说只要他们坚守规则，就可以尽己所能地追求利润。大多数商人在1961年被释放了出来，但如果他们认为朴正熙政权把他们释放出来之后会放松警惕，那就错了。韩国乐金集团（Lucky Goldstar，即现在众所周知的韩国LG集团）创始人具仁会（Koo In Hwoi）被释放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就能证明朴正熙政权并没有放松对这些企业家的控制。朴正熙手下一位负责执行工业政策的上校曾经找到具仁会，希望他能在韩国政府担保下筹集外国贷款，引进外国转让的电缆技术，建立一家电缆厂。具仁会则不想涉足电缆行业，想办法推诿，说自己不熟悉电缆业务。但这位上校却以威胁的口吻和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原本打算让你一个星期之内办完，但现在作为特殊照顾，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结果10天之后，具仁会因办事不力而受到了严厉责罚，后来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那位上校吩咐的任务，筹措了足够的资金同一家联邦德国公司签署了技术引进合同。⁹⁹作为韩国最富有的商人，郑周永充分领会了这个事件传达出来的信息。

我们总是想要去制造……

郑周永在1961年5月逃过了牢狱之灾。然而，他和他的生意要接受新政府的审查。不用替他担心，因为郑周永在此之前就已经迅速转向了制造业务和

出口业务。1962年，经过一番游说，他获得了一个制造项目，当时，他的现代建设公司获准利用美国的优惠贷款建立一家水泥厂（美国共资助三家，郑周永的水泥厂是第三家），这是郑周永的第一家工厂。在此之前，韩国的大部分水泥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工厂投产一年之后，现代建设公司生产的水泥不仅足够韩国使用，还出口到了越南，而当时美国正在加大对越南的军事干预力度。在出资赞助现代集团建立第一个水泥厂时，美国方面提出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该厂的所有设备必须全部从美国供应商那里购入。但更能体现出韩国的变化的一个事实就是，郑周永掌握了制造水泥的技术之后，继而开始在国外大力包揽涉及水泥业务的工程项目，他以交钥匙工程^[10]的模式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建立了水泥厂。¹⁰⁰

对于韩国政府传达出来的有关出口纪律的信息，韩国商人不可能置之不理，因为韩国经济企划院要求企业每个月都必须汇报本企业的出口业绩。1964年，郑周永派出一位弟弟前往泰国寻找建筑项目，他打算在海外推销他非常熟悉的建筑服务。1965年，在韩国政府提供债务担保的前提下，郑周永家族以522万美元的低价击败了来自16个国家的29家竞争者，赢得了修建泰国北大年（Pattani）至那拉提瓦（Narathiwat）、长约58英里的高速公路的合同，成功跻身国际建筑企业的行列。但由于之前对所需设备、泰国气候模式以及穿越丛林的难度考虑得不够周全，导致郑周永赔了数百万美元。但通过承包这个项目，现代建设公司从错误中总结出了一些教训，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开始在越南、关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承包建筑工程。¹⁰¹

郑周永在出口业务上的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1967年，郑周永第一个受到了朴正熙的单独接见。¹⁰²他们二人讨论了修建一条长266英里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即京釜高速公路，把韩国的西北端与东南端联系起来，当时这个想法已经被谈论很多年了，但从没有付诸实施。由于在建筑行业具备了20多年的从业经验，而且修建的基础设施难度越来越大，所以郑周永就主动提出了一个成本低、坡度缓、隧道少的方案。这个方案被接受了，他赢得了半条公路的修筑权，1968年2月1日，以现代建设公司为主承建的京釜高速公路破土动工，1970年7月17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韩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项目，也是郑周永每周都会受邀同朴正熙共进晚餐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生意已经走上了正轨。

1968年，也就是郑周永开始修建京釜高速公路的那一年，郑周永旗下的现代汽车公司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订了《标准海外装配厂特许协议》，由福特汽车公司提供设备与技术，现代汽车公司则负责装配。郑周永在韩国东南部的蔚山购买了一块儿面积为82英亩的土地作为汽车装配厂的厂址。该厂正是朴正熙授意建立的蔚山工业园区的一部分。朴正熙认为蔚山适合发展新的工业项目，并把这个园区称为韩国的阿斯旺大坝。对于郑周永而言，创办合资企业无异于一次大胆的尝试，因为当时的韩国政府为了在零基础的前提下发展汽车工业，鼓励国内企业先进入汽车装配领域，前景如何尚不确定。1967年，朴正熙公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汽车工业作为优先发展对象。如同其他商人一样，郑周永也密切关注青瓦台和经济企划院发布的政策文件，因为它们决定着哪些企业能够享受到国内银行信贷、海外贷款担保、出口补贴、税收减免、公用事业费用减免、出口退税等优惠待遇。朴正熙政变发生之后的5年内，企业对政府的关注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1962年到1971年之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达到了10%左右，制造业出口额在韩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5%提高到了80%以上。¹⁰³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发展联盟关系，这就像是一桩在枪口逼迫下缔结的婚姻一样，而那个拿着枪的人正是朴正熙。

浦项制铁的光辉历程

现代建设公司参与修建的京釜高速公路被称为韩国的“一号高速公路”，见证并引领了韩国的工业腾飞。驾驶着一辆现代Avante轿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你会领略到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条道路是如何被强加给农村社会的。这条高速公路横亘在连绵不尽的农田之间。你可以看得出这些农田都得到了仔细的打理。在汉城的近郊，随处可见一片片的果林与烟草田，很显然是用于商业经营的，但继续朝着韩国腹地方向走，就能看到明显具有家庭农业特征的农田，而之前正是家庭农业模式支撑了韩国的工业发展。到处都可以见到小的塑料温室和整洁的木质架构，温室上面铺着一层黑色的遮阳篷，以加快作物生长的速度。稻田一直延伸到溪流之畔，经过充分的施肥，看上去一片碧绿。在稻田旁边，农户种上了家庭常用的蔬菜，比如玉米、西葫芦、马铃薯、生食叶菜类作物以及制作泡菜所需的萝卜、洋葱和卷心菜。在一段拱起的高速公路下面，一位农民正背着药筒给农作物喷洒化学药剂。

公路周围的山上遍布着茂密的树林，山间的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利用，即便高速公路岔道之间的小片田土地也有人耕种。

在城市的中心地区，都是大同小异的摩天大厦。这些地方很容易让人误解成斯大林式的厂区，只不过这里的市场很有活力，欣欣向荣，而且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些建造成本低廉的、用红色砖块修建的教堂（韩国有30%的人是基督教徒），这也提醒着你这并不是在苏联。如同建造青瓦台的日本人一样，韩国人也非常喜欢青色，在整个韩国，人们在修建住宅和低矮的厂房时，无论是采用普通的瓦片，还是采用波纹状的塑料板或钢板，顶部都是青色的。青色的顶部搭配上大量的混凝土，看上去并不是多么美观。韩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的确很可观，但也导致了环境的不美观，在从首尔到韩国东南部工业区这5个小时的旅程中，你是无法想象到这一点的。在一号公路的另一个尽头是韩国第二大都市和最大的港口——釜山，釜山往北一点是蔚山。现在，蔚山有时候被称作“现代城”（Hyundai City），由此可见现代集团在当地的影响是何其大。但我此行的第一站是还要再往北一点的浦项市。坐落在这里的浦项制铁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厂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浦项还只是一个有着6.7万名居民的农业城市。今天的浦项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浦项制铁是世界上第三大钢铁厂，也是最赢利的钢铁厂之一。浦项城区单调而破旧，与厂区之间隔着一条河。在浦项制铁大门外悬挂着一个巨大的蓝色标志，意思是说“清洁绿色的浦项制铁”。浦项制铁下属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及其两位同事已经等候在大门外了，他们将陪伴我参观浦项制铁。¹⁰⁴一进入厂区，我们就直接驱车前往接待楼，在一座大楼的墙上悬挂着朴正熙题写的“钢铁国力”四个大字。

在顶楼，我们观看了展示浦项制铁历史的官方影片，接着，一个按钮被按下之后，放映室四周的窗帘缓缓升起，放眼望去，可以俯瞰整个厂区，厂区内部的道路总长高达320公里。厂区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马蹄形，环绕在一个海湾周围。在厂区的一端，工人们正在从船上卸下原材料，据介绍这批原材料有200万吨，足够使用20天，在厂区的另一端，则是一堆已经制成的钢铁，等待着装船。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个地方是作为一个进出口贸易集散地而建立起来的。按照顺时针方向，从厂区的一端到另一端，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烧结厂（用于烧结铁矿石和花岗石）以及准备焦煤的工厂；多个高约百米的鼓风机；多辆鱼雷罐车，每辆车都载着300吨铁水送往精炼炉以便氧化

杂质，还能看到生产半成品的连铸厂以及生产制成品的轧钢厂。行驶在厂区里的汽车侧部靠下的地方都印着“8282”几个数字，在韩语中，这些数字的发音类似于“快点、快点”（quickly, quickly）的发音。铁矿石从厂区的一端进入加工流程，只要13个小时，就能到达另一端，成为制成品。浦项制铁每年生产的产品多达1 600万吨。浦项制铁后来在200公里之外的光阳市修建了一个新钢铁厂，每年可以生产1 900万吨钢，而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只需要7个小时。

浦项制铁的融资与建造过程非常不容易。韩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做出过三次尝试，试图推进建造浦项制铁厂的项目，但由于资金短缺，而且世界银行等国际投资主体却不愿意为韩国要求的这种钢铁一体化生产的大型项目提供贷款。世界银行在1968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援引了类似钢铁项目在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和委内瑞拉归于失败的先例，作为对韩国人的警告。¹⁰⁵最终，朴正熙不得不动用日本的战争赔款。他让自己在军校教学期间的得意门生、43岁的朴泰俊将军（Park Tae Joon）主持建造浦项制铁。朴泰俊在此之前曾经让一家国有矿业公司扭亏为盈。在建造浦项制铁的那段日子里，他每天都会让工人们在用波纹状铁皮建造的工地指挥部前面集合，告诉他们说这个项目使用的是日本战争赔款，宁死不能承受浪费资金的耻辱。

浦项制铁的成功不仅仅是流汗流泪以及化悲愤为力量的结果，还有其他因素。第一，将大规模与循序渐进的办法结合了起来。根据规划，浦项制铁是韩国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既定年产能是900万吨（日本技术顾问推荐将年产能设定在260万吨）。然而，第一阶段的产能为100万吨，之后分4个阶段逐步扩大产能。较为艰难的技术暂时搁置下来，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加以解决，比如，在第一阶段的建设中，韩国人没有采用连铸工艺，而是重点完成较为简单的上游任务。第一，他们建立了一个鼓风机。每一个建造阶段启动之后，韩国人就会争分夺秒地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以便尽早让前期投入的资本带来回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建造速度应该是其享有的一个相对优势，其中一个尤其重要的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健康标准和安全标准都比较低。在浦项，工人们采用轮班制，24小时工作，这样一来，韩国每吨钢铁产能的建造成本只有巴西的1/4。¹⁰⁶

第二，韩国坚持批判性地吸取外国顾问提供的技术建议。新日本制铁公司是技术建议的主要提供者。虽然日本战争赔款为浦项制铁提供了很大一部

分资助，但浦项制铁却并不信任日本人，而是让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公司（BHP）审议日本提交的工程建设报告，并让澳大利亚人在设备采购方面提供独立的建议。后来，浦项制铁又让一位旅居日本的韩裔钢铁专家审议日本顾问与必和必拓公司的报告。¹⁰⁷浦项制铁会听取每一个人的建议，但不会盲从任何一个人。

第三，浦项制铁坚持不懈地学习与钢铁厂有关的一切知识。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建造中，其管理层拒绝采用日本顾问推荐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以防自己无法完全弄明白设备的运作原理和钢铁生产流程。

在浦项制铁，1978年投入使用的一台热轧机今天仍然在使用中。当巨大的钢坯在1 200摄氏度的高温下被来回轧制时，释放出了巨大的热量，即使站在距离轧钢机20米远的空中走廊上，你也不禁会大汗淋漓。在轧钢机的一侧，你仍然可以看到手动的刻度盘，上面的刻度表示着上下两根轧辊之间的距离。今天这个操作已经计算机化了，但之前那么多年里工程师们一直都是亲自动手来获得生产线的各个参数的。到20世纪80年代浦项制铁打算在光阳市新建一个大型钢铁厂时，日本在很多方面的技术水平都输给了韩国人，所以日本企业没有参与光阳钢铁厂的修建。光阳钢铁厂的进口设备主要来自欧洲。到光阳钢铁厂将要建成的阶段，超过50%的生产线是韩国国内生产的，而在浦项制铁刚刚兴建之时，只有10%的生产线是韩国国内生产的。

浦项制铁的成功过程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出口纪律比前面提到的几条更重要。与其他那些已经倒闭的大型钢铁厂不同的是，浦项制铁一直面临着严格的出口纪律，韩国政府迫使其发展出口贸易。浦项制铁发展出口贸易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从外部来讲，韩国政府通过出口补贴来鼓励其增加出口，从内部来讲，浦项制铁也需要通过出口贸易获得外汇，它需要利用这些外汇来偿还在后期扩张阶段积累的国际债务。浦项制铁的产品中，30%~40%都是用来出口的。从理论上来讲，自从1973年投入生产以来，浦项制铁每年都是赢利的，但这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韩国政府为了维持该厂运营而投入了巨额补贴。1970年，韩国政府效仿日本出台了《钢铁产业促进法》，为浦项制铁享受廉价的电力、水、燃气以及政府补贴的港口和铁路服务奠定了基础。浦项制铁的很多配套基础设施也是由中央政府出资修建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海关对进口钢铁征收25%的关税（以再出口为目的的除外），这就保证了只要浦项制铁的生产效率达到了合

理水平，它就能利用过剩的国内市场需求实现巨额赢利。

浦项制铁生产1吨钢铁所需的雇员工时数从1975年的33个小时降低到了1984年的10个小时（1984年日本为6.5小时）。由于生产规模非常大，浦项制铁具备充足的资源去循序渐进地进行技术创新。1977年，浦项制铁设立了一个研发中心，1986年开始将其技术出口到美国，而且浦项制铁还在1986年与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在加利福尼亚州设立了一个生产冷轧薄钢板的合资企业，其中主要的技术投入都是由浦项制铁负责的。最近，浦项制铁发明的熔融还原炼铁工艺（Finex）又获得了专利保护，直接利用煤以及铁矿粉生产铁水，而不需要烧结铁矿或把煤转化为焦炭。该公司的生产规模不仅使其提高了产量，还为其进行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韩国政府逐步取消了对浦项制铁的补贴，现在该公司已经完全私营化了，而且再也不需要其他人施以援手了。近年来，它的净利润一直维持在销售额的1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比例。该公司制定的目标是将销售额从2009年的300亿美元提高到2018年的1 000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曾大规模购入该公司的股票，这一举动充分说明了浦项制铁的长期赢利能力。

2003年，该公司开设了自己的博物馆，讲述其发展历史。在一面墙上有一段话，是说世界银行对浦项制铁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原来那个用波纹状铁皮建造的工地指挥部也完整保留了下来，还增加了蜡像的数量。还有一组蜡像展示了浦项制铁创始人朴泰俊与朴正熙在准备场地时共同引爆炸药的情景。1973年6月9日，浦项制铁生产出第一批产品之后，朴正熙宣布将这一天定为韩国的国家钢铁日，与之前的国家出口日相匹配。今天，浦项制铁正与中国的宝钢争夺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的地位，而全球第一大钢铁企业则是安赛乐米塔尔集团。¹⁰⁸但浦项制铁的赢利能力以及市值却比其他厂家都要高，截至2011年12月，浦项制铁公司以299亿美元的市值位居世界钢铁企业的第一位。从技术角度来讲，浦项制铁追随的是日本最先进的钢铁企业。浦项的这个工厂现在只雇用了7 000人，比10年前产量较低时的雇员数量少了一半。据说，接下来要面临被解雇命运的是那些开着奇怪的大卡车运输成品钢的司机，估计他们会被机器人取代。

边实践边学习

技术学习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浦项制铁之类的工厂无异于很好的学校，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很多。浦项制铁是一所兼作职业学院的钢铁企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培养了一代钢铁专业人士，而且它在生产和出口业务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之后仍然在培养人才。基于工厂的学习与基于学校的学习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一点在现代集团位于蔚山的制造企业体现得尤为明显。蔚山在浦项南部，距离浦项只有70公里远。参观完浦项制铁的厂区之后，我回到了高速公路上，继续穿越一栋栋高低不同的建筑物和用红色、棕色的砖块修建的教堂，前往蔚山，而我们驾驶的这辆现代Avante轿车也算是返回它的出生地了，因为它就是在蔚山被制造出来的。在蔚山，大多数公寓楼上面都有现代集团的标志。如同在浦项一样，我也没有参观城区，而是直接去了码头。码头位于太和江（Taehwa River）的入海口，过去这条江被称作“死亡之江”，因为工业废水都注入了这条江里，但现在江水清洁了一点。如同浦项制铁的两个大型钢铁厂（即浦项制铁与光阳钢铁）一样，现代集团的所有主要工厂在建立之初都瞄准了国际市场，所以也都把厂址选在了江畔等水运便利的地方。沿着太和江朝着大海的方向走去，我知道我已经到达了现代汽车集团的生产基地，我并不是看到了一家汽车厂才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三艘巨型的运车船停泊在码头，紧挨着一个大型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大概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2009年，蔚山厂建造了150万辆汽车，其中85.2万辆都是通过这个停车场被装上运车船送到世界各地的。

我入住的是现代宾馆，旁边就是现代百货商店，对面是现代重工集团，即郑周永的船厂，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之最。从我的房间里，可以看到现代重工的很多巨型起重机。不远的地方就是现代汽车集团的厂区。现在的厂区远比1967年初建时的82英亩大得多。今天，现代汽车集团的厂区面积有1225英亩，包括5个独立的工厂，生产范围包括小型车、大型车、运动型多功能车、混合能源车以及轻型商务车。现代汽车集团的蔚山工厂每年除了生产160万辆轿车和卡车之外，还能生产200万台发动机和250万台变速器。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汽车制造企业。¹⁰⁹

我在一名经理的陪同下参观现代汽车集团的厂区时，很快就意识到仅仅通过参观生产线是无法重构该公司的发展历程的，¹¹⁰因为原先的工厂被拆除

了，而且与浦项制铁不同的是，在这里没有博物馆，原有的技术几乎都不再使用了，因此没有给人留下任何线索，使我无法了解该企业的技术学习过程。生产线上的工人偶尔会把一些存在质量缺陷的零部件扔进一个大木箱子里，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惯例。另外，工厂里使用的机器人越来越多。有两个机器人同时为一辆Avante轿车（在韩国以外的地区也被称为Elantra）安装前后两块挡风玻璃，而它们的工作只需35秒就能完成。之后，立即又有另外两个机器人从车辆上部的传送带上取下椅子放进轿车里。留给工人做的工作就非常单调了，所以，在韩国，装配线工人每隔两个小时十分钟就可以换个位置，做不同的事情。¹¹¹

如同浦项制铁一样，每当现代汽车集团学习了先进技术，生产流程的机械化水平就会出现相应的提高，需要的工人数量就会随之越少。现在，现代汽车集团的蔚山厂区有34 000名雇员，每年可以生产160万辆汽车。而在1994年，每年生产100万辆汽车就需要41 000人，1986年，每年仅仅生产40万辆汽车需要的人数甚至更多。现在的汽车比过去那种廉价的汽车复杂得多。我们坐在了一款雅科仕（Equus）轿车的后排，这款轿车是现代汽车集团推出的高端豪华轿车，发动机排量为5升，最大功率可达300马力，试图与雷克萨斯460轿车相媲美。那位经理为我展示了现代集团获得专利保护的几项新技术，包括声控车载收音机和改良版的卫星导航系统。他还向我介绍了现代汽车集团发明的新型油电混合动力汽车。这简直太现代化了，几乎无法让人将此与郑周永及其兄弟于20世纪60年代在零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公司联系在一起。

当年，郑周永只是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但正如他的传记作家唐纳德·科克所说，他从来没有生产过一个螺栓或者轴承。初创时期，他让他的弟弟郑世永（Chung Se Yung）负责管理汽车厂的日常事务，但他的弟弟经常说他对汽车没有一点激情。¹¹²然而，郑周永本人具有企业家才能，渴望进入汽车工业，而且国家为了发展汽车工业，为企业家们提供了各种鼓励措施，这就足以保障他的成功了。说到国家的支持，韩国政府打造本国汽车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在196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韩国政府就提出鼓励国内企业与外国合作伙伴发展汽车装配业务，在1967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又要求本国汽车制造企业将汽车的国产化率，也就是本土制造的零部件的价值在整车价值中所占的比重，由20%提高到60%。1973年，随着政府开

始进行大规模重化工业的投资，韩国政府又鼓励本国企业把汽车的国产化率提高到100%。最后，到1979年，韩国政府又出台了一个促进机械出口的国家政策，把汽车工业作为出口贸易的关键增长点。

为了引导国内企业，政府一如既往地采用了银行信贷、出口补贴、政策支持等手段。银行信贷日益向汽车工业倾斜，一个企业能否制造出真正属于韩国的汽车并发展出口贸易，决定着它是否能获得银行信贷。以现代汽车集团的情况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就意味着国家批准的信贷额度是其实收资本的20倍。¹¹³那些无法满足政府要求的企业在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时，会面临很高的关税壁垒，而那些配合政府的企业则能享受到保护政策，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中，政府会通过指令的方式提高国内汽车价格，这种价格高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因此汽车制造企业也能获取巨额利润。¹¹⁴但政府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实行出口纪律，为了让国内企业提高竞争能力以便参与国际竞争。以郑周永为例，他向朴正熙承诺如果能获得政府的资金扶持，他将在满负荷生产的第一年，即1976年，完成5 000辆汽车的出口。但在正式投产之前，他不敢向他聘请的那些外国技术顾问承认曾经做出过这样一个承诺，以防止这些外国人因担心现代汽车集团成为本国的竞争对手而终止对现代汽车集团的技术援助。郑周永的传记作家唐纳德·科克指出：“后来，出口压力迫使现代汽车集团进行技术升级，如果没有出口压力，只是面向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那么这种升级绝不会发生。”¹¹⁵

朴正熙于1979年遇刺身亡之后，韩国政府对本国汽车工业的态度出现了一次动摇（这是仅有的一次），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国际市场的行情不容乐观。起亚汽车这个由摩托车、卡车制造领域转向小轿车制造领域的企业，在政府的逼迫下，生产活动中断了好几年。而现代汽车集团为了筹措现金，则把一小部分股份出售给了它的主要技术供应商——日本三菱集团。¹¹⁶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朴正熙之前在钢铁、造船等重化工领域的投资开始带来效益，韩国政府开始再次加大对本国汽车工业的支持。这种支持的长期性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汽车集团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进入美国市场，起初销售的是一款经济型、紧凑型的“卓越”轿车（Excel）。对于这款轿车，现代汽车集团为了招徕美国顾客而不惜选择亏本出售。韩国汽车工业在其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很多挫折与艰辛，但韩国政府及其控制的银行体系一直支持者本国的汽车制造商。这是一

个十分漫长的艰苦奋斗的过程。现代汽车集团直到1991年，也就是建厂24年之后，才生产出了第一台真正由内部独立设计建造的发动机，即Alpha型发动机。韩国汽车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之前，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苦的奋斗，比如进入欧洲市场的过程就充满了曲折。为了进入法国市场，韩国政府就告诉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法国政府，如果法国政府购买韩国汽车，那么法国的火车制造商就更有机会成为京釜铁路的高速火车供应商，法国政府权衡了一下本国火车制造商与汽车制造商的利益得失之后，决定支持火车制造商的利益，最后，巴黎方面提出每年从韩国进口2万辆汽车。

对于韩国的工业政策，虽然时而有一些高级官员¹¹⁷会提出质疑，而且韩国的贸易伙伴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压力，没有改弦更张。韩国汽车工业之所以能形成全球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点。不仅汽车工业如此，韩国的造船业也是一样的情况。现代集团垄断了韩国的海上钢结构销售（offshore steel structure，包括石油天然气行业所需要的钢结构），韩国政府还发出指令，要求进口石油只能用现代集团的船来运输，而且国家担保贷款不仅直接提供给造船企业，还提供给现代集团下属的经营商船队的企业，这些商船队可以出资购买现代集团生产的船舶，以平衡市场需求的变动带来的冲击。¹¹⁸造船比造车简单一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集团的造船业务为其带来了大量现金流，现代集团就把造船业务创造的赢利挪给了造车业务。如果当时现代集团已经上市的话，股东肯定不会同意这种挪用资金的做法。但这一做法有利于现代集团学习国外先进的造车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举动是正确的。

现代汽车集团在汽车制造领域大获成功背后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在于，它在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之后，经过不断的学习掌握了自主研发能力，而没有形成对外国跨国企业的依赖。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工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国汽车制造企业难以实现技术独立，对外国企业的依赖性太大，因为合资企业很容易就能依靠外国合作伙伴获得技术，而无须投入巨额资金去做研发，这种日子的确很舒服，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厂商就形成了对外国企业的技术依赖，这种依赖是难以打破的。郑周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¹¹⁹在出口纪律的压力下，他认识到合资企业很可能会妨碍现代汽车集团获得技术独立，因此往往会绕过外国合作伙伴自己做技术研发。早在1968年和福特汽车公司进行汽车零部件组装合作时，美国人就提出说如现代

集团不出资建立合资企业，就不会转让给它先进技术。郑周永为了获得汽车制造技术，派出其家庭成员满世界地寻找更好的技术转让协议。¹²⁰

后来，现代汽车集团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即把技术问题分解成几个部分，分阶段去完成。第一阶段就是引进、借鉴外国技术。1973年，现代汽车集团同日本三菱集团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之所以选择三菱集团，是因为三菱集团在日本汽车制造企业中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企业，而那些较为强大的企业担心会培养出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所以不愿意同现代汽车集团签订技术转让协议，而三菱集团为了获得技术转让费，为了在汽车零部件销售中分一杯羹，就愿意把技术转让给现代汽车集团。三菱集团向现代汽车集团转让了与发动机、变速器和后桥有关的技术，现代汽车集团正是利用这些关键技术才制造出了第一款轿车，即小马轿车（Pony）。接下来，郑周永家族雇用了日益衰落的英国汽车厂商利兰汽车公司（Leyland）的前高管乔治·特恩布尔（Goerge Turnbull）来管理现代汽车集团的生产线，乔治·特恩布尔又从欧洲雇用了6名顶尖的工程师，让他们负责汽车设计、测试和生产等工作。如果三菱集团派到合资企业的经理们认为他们能控制住郑周永，那么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特恩布尔团队做的头几件事情中，就包括拒绝了三菱集团提出的关于选用发动机的建议，因为三菱建议的那款发动机无法为小马轿车提供足够的动力，郑周永坚持要求采用三菱在同款汽车采用的发动机。¹²¹后来，郑周永与其兄弟又到意大利考察，找到意大利著名的汽车设计公司“意大利设计”（Italdesign），让其为小马轿车车体的设计提出独立建议，最后他们还广泛征求了其他一些国际汽车厂商的建议，包括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意大利VM公司、意大利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公司（Alfa Romeo）等。

现代汽车集团用了不到两年的积累期就开始生产新的汽车。一开始，生产线每天开工时间只有5个小时左右，因为工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零部件供应商也存在问题，起初的产品可以说问题层出不穷，包括塑料零部件在夏季的高温中会突然断裂，车门把手会脱落，刹车偶尔会失灵，车身在几个星期内就会出现掉漆现象。郑周永为了完成向朴正熙承诺的汽车出口目标，不惜把出口汽车的价格定在成本以下，他把最初的出口目标锁定在了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秘鲁和厄瓜多尔这几个国家。¹²²即便投产10年以后，到了1978年，现代汽车集团的销售量还不到6万辆。但这个公司正在学习并

消化先进技术。1981年，现代汽车集团修建了一个更大的工厂，准备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就是在这个时候，它把一小部分股份转让给了三菱集团，但管理权没有转让，得到的回报就是三菱集团转让了一些新的设计技术和一份新的合作协议，这份协议规定，三菱集团每年回购3万辆带有Mitsubishi Precis标志的汽车。从这时起，韩国的汽车工业开始赢得了一点尊重。接下来，郑周永把目标定在了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为了打入美国市场，郑周永雇用了一个曾经供职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由美国人组成的营销团队。当时，美国政府刚刚开始强迫日本通过所谓的“自愿限制协定”，以此限制日本汽车出口量，结果导致美国市场上的日本车价格不断上升，现代汽车集团抓住这个机遇，利用“现代卓越”这款紧凑型轿车打入美国市场，其价格比其他竞争对手至少低20%。

由于现代汽车具有咄咄逼人的低价优势，又发动了强大的广告攻势，结果该公司雇用的那一帮美国经理人创造出了引人瞩目的良好业绩，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现代卓越”就一跃成为美国进口量最大的轿车。1987年和1988年在美国市场上的年销量均突破了26万辆。¹²³一夜之间，曾经无足轻重的现代汽车集团变成了一个重量级选手。但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贸易却给现代汽车集团带来了巨额损失，因为该公司为了打入美国市场采用了削价销售的策略。如果美国经理人认为他们的老板能够长期容忍这种亏损局面，那么他们就想错了。在抢占美国市场之后，现代汽车集团为了扭转亏损局面，做出了一些冷酷无情的举动：进一步大幅度削减蔚山工厂进口零部件的费用以及拨付给美国市场的销售经费。如同1977年解雇花费巨资聘请来的乔治·特恩布尔和欧洲工程师一样，1989年和1990年美国的营销经理们和分销商们获得的经费遭到了大幅削减，大批美国雇员被解雇，结果导致该公司在北美市场上的汽车销量下滑了50%。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公司的局面终于稳定下来，开始实现赢利。销售量再次开始攀升，现代汽车集团在美国这个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汽车市场上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该公司在北美市场上的成功预示着在竞争程度较低、利润幅度较高的欧洲市场也会更快地成功。¹²⁴

截至1991年，现代汽车集团生产出了第一辆真正属于韩国的发动机之际，根据该公司自己做的分析，它的生产效率仍然只有丰田、本田的一半。但它的技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现代汽车集团引进技术的标志性地点不是

合资企业，而是现代集团的别墅和宾馆，临时性的外国顾问就住在这里，现代集团吸收消化这些顾问给予的知识（我在访问现代集团的时候也住过那里，那里曾经被称作“钻石宾馆”。）宾馆的地下室仿佛是一个俱乐部，有菲律宾乐队来招待这些外宾。蔚山地区甚至还有一些比较低端的酒吧来迎合外国人的需求。一旦现代汽车集团和现代集团在蔚山的其他企业学习了它们需要的知识以后，这些顾问就会获得一笔费用，然后带着对蔚山生活的模糊记忆回国。从现代汽车集团的角度来讲，该公司是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最好是通过学习借鉴外国技术的方式来独立自主地研发新技术，而不能依靠合资企业来获取合作伙伴的先进技术。除此之外，一定要比竞争对手多支撑一些时间，等到竞争对手倒闭之后就吞并它们。

在1973年的韩国，国内汽车市场的年需求量只有3万辆，但政府却扶持了不止一家汽车制造企业，而是三家：现代汽车集团、新进汽车集团

（Shinjin）和起亚汽车集团。因为即便对于一家企业而言，国内市场也已经显得有点小了，所以，韩国政府同时批准成立三家制造企业的做法看起来的确有点荒唐。从1972年到1978年，虽然韩国国内汽车的价格定得非常高，现代汽车集团仍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不过，韩国政府同时批准成立多家汽车制造企业并不是为了获得短期赢利（如果只是为了获得短期赢利，只要批准一家企业，使其垄断国内市场就足够了），而是为了让各企业相互竞争，迫使他们加快技术学习的进度。由于国内汽车价格是由经济企划院制定的，所以各大汽车制造企业必须先在国内市场上展开质量方面的竞争，然后在出口业绩方面进行竞争。在韩国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阶段，市场上的领先者不是现代汽车集团，而是现在已经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新进汽车集团。当时新进汽车集团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了韩国通用汽车公司（GM Korea），生产世韩品牌（Saehan）的汽车。但韩国通用汽车公司积累了太多的债务，超出了其控制能力，最后韩国政府让它破产，让大宇集团接管它的汽车制造类资产，虽然大宇集团在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合资企业中只拥有50%的股份，但它仍然宣布将会想方设法生产出可以出口的韩国汽车。¹²⁵第三个汽车厂就是起亚汽车集团，该集团最早从事的是自行车和摩托车的生产业务，其技术来源是日本本田株式会社，但如同现代汽车集团一样，起亚汽车集团在引进外国技术的过程中也不会同外国企业分享企业的控制权。

20世纪80年代，随着韩国国内汽车市场每年的需求量增长到了几十万辆，其他财团纷纷要求获准进入汽车业。政府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但对于任

何一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企业，政府一如既往地采取冷漠无情的态度，根本不会出资救助，而是直接让其破产倒闭。20世纪80年代，亚洲汽车（Asia Motors）诞生，但最后又倒闭了，它的剩余资产被起亚收购。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只剩下4家汽车制造企业，即现代汽车、大宇汽车、起亚汽车和四驱车的制造专家——双龙汽车（SsangYong）。三星集团也要求进入汽车行业。新进汽车集团倒闭之后，现代汽车集团想方设法维持着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其汽车产量在20世纪80年代占韩国汽车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并于1994年首次达到年产100万量，从而获得了极大的相对优势。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郑周永获得的政治支持越来越少，大宇汽车集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¹²⁶

最后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开始于1997年，从现代汽车集团的角度来看，开始得正是时候。大宇集团虽然推出了大大改善的产品，如马蒂兹微型车，但终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走向了破产。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的干预，大宇集团的汽车资产出售给了它之前的合作伙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现代汽车集团在1998年接管了起亚汽车，从而在韩国国内市场上获得了3/4的份额，令其竞争对手难以望其项背（在金融危机期间，郑周永的政治困境忽然间又不那么重要了）。双龙汽车集团最初被改组，并入了大宇汽车集团，后来又被中国国有汽车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三星集团则集中发展电子产品业务。三星集团在与雷诺-日产联盟共同建立的合资企业中仅仅占有少量股份，而且该合资企业的技术完全依赖雷诺-日产联盟¹²⁷，但三星集团对此自满自足，完全接受。陪同我参观现代汽车集团的那位“导游”用戏谑而轻蔑的口吻说：“三星只是出租了自己的标志而已。”¹²⁸

到2000年，现代汽车集团显然成了韩国汽车行业的赢家。经历了激烈的国内竞争，它幸存下来了，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保持国内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并且完全达到了韩国政府设定的出口标准。现代汽车收购起亚汽车，标志着一个全球强势企业的出现。2000年之后，现代汽车集团不失时机地进入了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两大市场——中国和印度，这个决策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2010年，在世界市场上，现代-起亚汽车集团售出了570万辆汽车，这意味着它的全球销量超过了福特，从而跃居全球第四大汽车厂商。¹²⁹就这样，一个之前没有任何工业发展经验的家族企业成为了世界

上最成功的汽车公司之一，它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实行了正确的工业政策。

马来西亚的苍白模仿

丰田汽车公司用了36年的时间才使其汽车销量突破1 000万辆，而现代汽车集团只用了28年的时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而且现代汽车集团所在的韩国比日本穷得多，韩国人口只有日本人口的1/3。¹³⁰这不仅提醒我们韩国制造业发展政策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还提醒我们世界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如果一个国家出台了正确的政策，至少从理论上讲就会具有更多的机遇，经济发展速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然而，韩国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相对比较轻松，因为日本这个前殖民国家为韩国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朴正熙和其他领导人吸取了日本工业政策的精髓。但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则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复制，因此该地区需要有一个国家能像明治时代的日本那样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就像日本为东北亚树立榜样一样。在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中，马哈蒂尔治理下的马来西亚也许最值得称道，但做得还不够好。¹³¹

从政治角度来讲，要读懂马来西亚并不存在什么难度。马来西亚是由一群苏丹统治的小国家拼凑在一起而形成国家，这些苏丹国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殖民政权往往都是以小制大，实际统治马来西亚的英国人并不多，实际行使殖民管理权的地方管理都是由殖民者指派的。1957年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是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东古”在马来西亚当地的语言里是“王子”的意思。他非常富有，擅长交际，是一个英国化的上层人士。他花了特别长的时间才完成了在剑桥大学的本科学位课程。他没有改变本国经济的殖民化特征，继续让英国公司经营其矿业和种植园，而且不久就开始收受商界领袖输送的现金回扣。¹³²马来西亚独立后的第二位总理是阿卜杜勒·拉扎克（Abdul Razak），第三位是侯赛因·奥恩（Hussein bin Onn）。这两位都具有王室血统。其中，侯赛因·奥恩天生优柔寡断，或许是最不称职的总理了。他就任总理的时候，马来西亚已经爆发了针对经济状况较好的华人的严重种族冲突。在他的任期内，马来西亚政府开始使用其新获得的石油财富收购部分英国资产，收归国有，但没有实行认真或有效的产业政策，虽然实行过所谓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但到最后只是催生了一批躲在保护性关税背后的套件组装企业，根本没有促进本国工业实现

什么实质性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哈蒂尔走向了马来西亚的历史舞台。

马哈蒂尔于1925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吉打州。其父亲曾经担任过一所颇有名望的英文中学的校长，后来出任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的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年轻时曾经就读过这所中学，不过，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后来声称他在读书的时候从来不认识马哈蒂尔，因为马哈蒂尔当时还是一个无名小卒。¹³³马哈蒂尔的祖父是个从印度漂洋过海来的穆斯林，¹³⁴所以马哈蒂尔四分之一的血统是印度血统，这一点可以从马哈蒂尔非常印度化的容貌上清楚地反映出来。他在成长历程中似乎总是感到自己是社会的弃儿，对社会充满了愤恨情绪，而且他的思想越来越政治化，对政治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十分讨厌马来西亚贵族的势利（当选国会议员后，他曾经因为具有印度血统而被戏谑地称作“巴基斯坦人”）。他下定决心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于1946年加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英文缩写是UMNO）。^[11]后来，他于1948年顺利考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医学系。他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殖民地色彩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所以他只是把改善普通马来人的处境作为自己的事业。马哈蒂尔认为，马来人从基因方面来讲就受到了诸多限制，于是花了太多时间去思考自己的种族问题，而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了解技术学习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结构问题，因此，他对发展问题的判断将永远被蒙上一层种族主义的阴影。他最著名的书是《马来人的困境》。在这本书中，他以凌乱无序的方式分析了自己种族的苦难，与朴正熙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那两本书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朴正熙以更实际的方式分析了韩国为了学习工业技术而需要做的事情。¹³⁵

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了针对华人的骚乱，造成大约200人死亡，因为这件事，马哈蒂尔对当时的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产生了强烈的不满。¹³⁶同年，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这位总理在屠杀事件中扮演了愚蠢的领导角色，并且暗示屠杀行为正在进行之际，他可能正在打扑克。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与马来西亚上层阶级的许多成员一样，也喜欢赌博。结果是马哈蒂尔被逐出“巫统”。不过，因为这个事件，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已经成为“巫统”的一个政治累赘，最后被其他几位资深政客赶下台。1971年，马来西亚推出被称为“新经济政策”^[12]的机会均等行动计划，以缓和种族间的紧张关系。

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下台后，马哈蒂尔再次加入“巫统”，并重新当选为“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后来入阁出任教育部长。当第二任总理拉扎克和他的副手都

因病逝世之后，侯赛因·奥恩接任总理一职，并于1976年很意外地让马哈蒂尔担任他的副手，于是马哈蒂尔便出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从1978年1月到1981年7月，马哈蒂尔又辞去教育部长一职，以副总理的身份兼贸易和工业部长。

马哈蒂尔具有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一心想要推动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给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带来焕然一新的变革。贸易和工业部长这个职位也为他实施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机遇。为了探索适合马来西亚的工业发展政策，他花了3年时间访问东北亚地区。¹³⁷曾经陪马哈蒂尔访问韩国的阿斯马特·卡迈勒丁（Asmat Kamaludin）回忆说，马哈蒂尔在一天之内参观了“约15家”工厂，并且在一次演讲中情绪激昂地公开表示“希望马来西亚有朝一日也能像韩国一样”。¹³⁸虽然当时马来西亚和韩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略低于1600美元，但马哈蒂尔能看出来韩国的工业较为先进，这就为韩国未来占据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¹³⁹回到马来西亚之后，马哈蒂尔同那些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日本商人和韩国商人进行接触，并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在马来西亚的代表铃木一正（Kazumasa Suzuki）建立了终生的友谊。¹⁴⁰后来，马哈蒂尔宣布了“向东看”的政策，指出马来西亚将效仿东北亚国家发展制造业，尤其是效仿朴正熙启动的重化工投资运动（马哈蒂尔提出“向东看”政策之际，朴正熙的重化工投资运动正在趋于尾声）。¹⁴¹后来，到1981年夏季，总理侯赛因·奥恩因为心脏病动手术而无法履职，便决定让贤，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政变的情况下，马哈蒂尔突然当选为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平民总理，也是第一位具有连贯的发展战略的领导人。

马哈蒂尔担任总理期间，可以说是“马来西亚的朴正熙时代”。与之前那些名誉不佳、自私自利的执政精英不同的是，来自平民背景的马哈蒂尔具有务实干练的态度。¹⁴²早在1980年，也就是在担任贸易和工业部长之际，他就建立了马来西亚重工业公司（HICOM）这个国有控股公司，负责落实水泥、钢铁、汽车、摩托车、造船、化肥、石油化工、造纸等重化工项目，同时负责加强本地商业网络的联系，促进马来人创办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推动马来西亚的技术进步。¹⁴³马哈蒂尔还计划效仿韩国建设京釜公路、推动南部开放的做法，在马来西亚较为发达的西海岸地区建立一条高速公路。他认为，马来西亚应该有其自己的综合商社（Sogo Shosha），即日语中所说的“大型贸易产业集团”，让这些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为国内企业寻找市场和原材料，并由政府出面为其提供商业信用。如同韩国的情况一样，马哈蒂尔也愿意为资助本国现代化运动而大借外债。他深知马来西亚要想学习，必须先支付学费。

对马来西亚决策失误的详细分析

不幸的是，马来西亚的政策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政策相比，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再加上农业改革乏善可陈，¹⁴⁴农业状况不容乐观，这些就足以注定马哈蒂尔的工业野心必然会无果而终。其中最为发人深省的是，马哈蒂尔没有发现对本国企业实行出口纪律的必要性，他访问东北亚期间，接待他的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向他解释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即在早期工业化阶段，必须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为本国工业积蓄力量创造空间，相反，他们反复向马哈蒂尔阐述全球化时代下经济政策必须奉行开放原则。韩国人和日本人这么做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就当时而言，这些国家已经走过了积累阶段，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一大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工业企业，它们的自身利益是向马来西亚之类的国家销售工厂、建筑服务等交钥匙工程。然而，说句对马哈蒂尔公允的话，马来西亚东南亚的邻国在发展政策抉择方面无不是做得一塌糊涂，而且东南亚各国中没有一个实施过有效的工业政策，所以马哈蒂尔没有合适的先例可循。

马哈蒂尔是在1982年提出“向东看”政策的，就在同一年，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公开出版了有史以来第一本深入分析日本工业政策的学术专著——《通产省与日本奇迹》。马哈蒂尔本来是有机会读到这本书的，但不幸的是，他没有读到。马哈蒂尔也没有读到朴正熙论述韩国发展政策的书籍。¹⁴⁵恰恰相反，他后来竟然读了大前研一于1990年公开出版的《无国界的世界》。这本大部头的书为全球化摇旗呐喊，当时一度十分风靡，但这本书的观点根本不适用于当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马来西亚。马哈蒂尔不仅自己深入地读了，还吩咐他的下属去读。在制定和落实工业政策的过程中，马哈蒂尔表现出了善变的一面。他提出了马来西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项目，雄心勃勃地想要学习日本来振兴马来西亚经济，但马来西亚官方机构还没来得及制订详细的工业总体规划，马哈蒂尔就开始对日本的合作伙伴产生了厌倦情绪，甚至有时不愿意同日本人建立合资企业。¹⁴⁶

马哈蒂尔的第一个失误之处在于他忽视了出口纪律的作用，没有逼迫本国企业发展出口贸易，这一失误的负面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因为缺少出口创汇，马来西亚政府为了给国内投资项目融资，不得不一再增加外债，导致外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攀升，1980年为10%，到1986年达到了38%。¹⁴⁷但是，与韩国不同的是，马来西亚制造业创造的出口收益增速太慢。而出口收益增速太慢不仅产生了严

重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还导致马哈蒂尔无法真实地了解国内企业的出口业绩，无法据此做出重要的投资决定。而朴正熙之所以能成功，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透露出来的市场信息做出经济决策。马哈蒂尔在决策过程中非但没有考虑企业的出口业绩，反而一味地盲从于自己的主观判断，对于自己的亲信，他深信不疑。他似乎认为自己的主观判断比市场高明，试图比市场知道得还多，试图让自己的作用超越市场的作用。

马哈蒂尔第二个有悖于韩国经验的做法在于，他很少让私营经济去引领其工业投资，没有形成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他宁愿把国有企业作为自己的唯一投资对象，也不愿意把机会给私营企业。¹⁴⁸在汽车制造等领域，马哈蒂尔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这样就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来选择最有资质的企业。当国企经营不善时，他所能做的只是更换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而不能任由其破产倒闭，因为一旦这些国有企业破产倒闭，马哈蒂尔就没有其他企业可以依靠了。成功实现工业发展的国家都是通过竞争机制遴选强者的，马来西亚本来也应该在市场竞争中淘汰劣者，但马哈蒂尔却直接扶植国有企业，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马哈蒂尔又让本国所谓的强势企业同跨国公司建立了合资企业，这是一个失误的决策，进一步影响了本国企业的发展，因为这一系列安排导致马来西亚企业非常容易从其合作伙伴那里获取先进技术，容易形成长期的技术依赖。¹⁴⁹总之，马哈蒂尔在不知不觉中为他宠爱的企业走向失败埋下了伏笔。而当这些企业果真失败的时候，他却一味地指责企业的管理者。

第三个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失误之处在于，马哈蒂尔把工业政策与机会均等行动计划混为一谈了。他掌权之际就承诺要改善马来西亚土著¹⁵⁰的处境。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由种族主义划定的角落里，他不能使用经验丰富的华人和泰米尔人企业家来管理他的重工业投资，而马来西亚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是华人和泰米尔人经营的。相反，他不想利用那些经验丰富的华人和泰米尔人企业家，他既想实行有效的工业政策，又想创造出新一代的马来土著企业家，这往往会很困难。在没有出口纪律和私营部门竞争的前提下，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机会均等行动计划给马哈蒂尔的工业化计划带来了最残酷的讽刺。他让那些丝毫没有企业管理经验的马来土著（通常是公务员）去经营本该获得全球竞争力的工业企业，而一味排斥那些已经得到市场检验的、经验丰富的华人和泰米尔人私营企业家，没有迫使企业发展制造业和出口贸易，而是让他们利用在国内商品和服务市场上的寡头地位获取巨额利益。当然，这些企业家必须拿出成绩，给马哈蒂尔留下

深刻的印象。在不必要发展制造业，不必要发展出口贸易的情况下，寡头们要向总理展示自己的成绩，并不算什么难事。他们可以聘请西门子公司建一座效率很高的发电站，或者推出一项基于爱立信技术的移动电话服务，或利用东北亚国家生产的钢铁建造一座由美国建筑师设计的高楼，或者通过有效利用进口技术来获取源源不断的收入。为马哈蒂尔工作可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最终马来西亚的亿万富翁级别的精英们也不得不围着他转。他们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所谓“精英”无一不是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遭到朴正熙强烈谴责的那类“自由贵族”。

马哈蒂尔第四个偏离最佳实践的做法是削弱了马来西亚政府机构的作用。在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过程中，马哈蒂尔常常是上演着一个人的独角戏。如马来西亚官员阿斯马特·卡迈勒丁说：“你很难提出自己的观点。”¹⁵¹另一位曾经在马哈蒂尔身边工作多年，而且仍然对其相当尊重的人则更加直率地表示：“马哈蒂尔的自信达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¹⁵²在那些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经济体中，无论是日本与韩国，还是中国，其领导者都没有像马哈蒂尔那样回避国家政府机构的作用。发展战略是他一个人构想出来的，评估工作是他亲自做的，而且和外国企业的合作协议也是他自己签订的。

最后，当债务和国际收支问题越来越严重时，马哈蒂尔开始失去理智，经济政策开始摇摆不定。1985年和1986年，面临着财政紧缩和区域性的经济衰退，他实行了大幅减税、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变革。¹⁵³这些变革，再加上马来西亚货币的汇率下降，引发了一股外来投资浪潮，但投资大多集中在附加值较低的出口加工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外商竟然是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从1980年至1985年这5年间，马来西亚出口额只增加了70亿美元，但从1985年至1988年这3年间，出口额却增加了140亿美元。¹⁵⁴从1987年开始，马来西亚开始出现经常账户盈余。然而，马哈蒂尔推进工业化的决心后来发生了动摇。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韩国人坚持推动其工业化进程，但马哈蒂尔却在经济困境中削减了工业项目的数量，并竭力实现政府收支平衡。¹⁵⁵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大量的外来投资带动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繁荣，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开始迅速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很容易认为马来西亚在工业发展领域实现了切实的进步。实际上，马哈蒂尔似乎的确是这么想的。1991年，他宣布了他的“2020年远景规划”，指出马来西亚有能力而且肯定会在2020年之前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不幸的是，由于马哈蒂尔在保护幼稚工业方面的力度十分薄弱，在技术方面日益依赖外国合作伙伴，马来西亚在技术学习上几乎没取得什么切实的进步，其负面影响在亚

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尤为明显。

在发展工业期间，马哈蒂尔发现了一个新的、有影响力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大前研一。他是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的顾问，是《无国界的世界》一书的作者，喜欢预测未来。尽管大前研一是日本人，但他强烈抨击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做法。他期待着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国家认同感变得无关紧要，政府机构会变得无关紧要，开放的市场将会让所有的参与者实现双赢结果。这一乐观的前景与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如出一辙。虽然大前研一提出的观点与日本赖以致富的工业政策背道而驰，虽然马哈蒂尔本应该效仿日本的政策，但马哈蒂尔对大前研一的著作太痴迷了，甚至下令周围所有的人都去阅读。阿斯马特·卡迈勒丁这个时候是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的高级官员，他回忆说：“如果你走到哪儿都带着这本书，你就会感觉安全。”¹⁵⁶

然而，回过头去看，不难发现《无国界的世界》的基调没有以充分的研究为依据，相当草率，过于乐观，这些问题就决定了其预测的“世界将更有利于贫穷国家发展”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它无法替代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而言，要想在技术的阶梯上步步高升，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李斯特推荐的实施严格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恰恰相反，20世纪90年代，大前研一和马哈蒂尔在吉隆坡周围规划并启动了备受嘲讽的“多媒体超级走廊”和“赛博加亚电子信息城”（Cyberjaya）规划，他们本来期待着这两个项目能通过自由市场和跨国互利合作推动本国高科技的发展，但结果并非如他们所愿。¹⁵⁷虽然《无国界的世界》和《世界是平的》这些书提出我们正在迈向一种富国和穷国的利益趋于完全一致的新的发展范式，但马来西亚这些华而不实的项目恰恰印证了这种观点的天真（尽管是善意的天真）。

[10] 交钥匙工程指跨国公司为东道国建造工厂或其他工程项目，一旦设计与建造工程完成，包括设备安装、试车及初步操作顺利运转后，即将该工厂或项目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钥匙”依合同完整地“交”给对方，由对方开始经营。——译者注

[11] 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是一个完全由马来人组成的政党，英文缩写UMNO按照马来读法为“巫木诺”，于是华人就用“巫人”来替代“马来人”，将该组织简称为“巫统”。——译者注

[12] 阿卜杜勒·拉扎克在“5·13反华事件”后，接替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出任马来西亚总理之职，1971年提出了以马来人为优先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在经济、教育以及其他方面赋予当地的马来人更多的特权，并企图以此来缩小与当地较为富裕的华人之间的差距，在20年内建立起一个马来人占有经济优势的社会。——译者注

案例四：走遍马来西亚各地

我们要再次驱车出发了，探访马来西亚各地。在这个国家，基尼系数在0.5左右。出发前，我暂住在吉隆坡西边的一个地方，汽车租赁公司派了几个雇员把一辆汽车送到了我住的房子下面。那辆汽车的型号是宝腾华嘉（Proton Waja），这个名字在当地的语言中是“强壮”的意思。这款汽车是由马哈蒂尔心爱的国有汽车公司——宝腾汽车公司所造。在所有的工业项目中，他对宝腾投入的时间和金钱算是最多的。宝腾华嘉是马来西亚第一款真正属于本国的汽车，是由马来西亚人设计的，使用的是宝腾自主研发的发动机，于2001年开始投产。

我没有受过汽车专业的培训，但从我的眼光来看，宝腾华嘉的吸引力绝不低于第一代现代伊兰特，第一代伊兰特是韩国现代集团利用自主研发的发动机造出来的。¹⁵⁸在一周的旅行过程中，那辆宝腾华嘉只出现过一次机械故障，就是挡风玻璃雨刷速度的调节器失灵。除了这个小问题之外，再没出现过其他问题，而且这部车具有良好的加速性能，乘坐起来很舒适，行驶速度超过了道路标志推荐的速度。总之，这款车没什么令人惭愧的地方。宝腾汽车公司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所用的时间比现代汽车集团所用的时间还少。¹⁵⁹宝腾华嘉以及随后的几款汽车代表着马来西亚工业发展的巅峰，然而，马来西亚再也无法超越这个巅峰。

要理解其中的缘由，必须先明白一个事实，即马哈蒂尔没有逼迫马来西亚民营企业家为自己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东南亚常见的一个败笔。要理解这一点，你只要驾车沿着吉隆坡市区一条南北走向的主街道——苏丹依斯迈路（Jalan sultan Ismail）走上一遭，一切便不言自明了。在这里，你能看到很多亿万富翁的企业总部，他们在国内市场上占据着寡头地位，但马哈蒂尔没有把这些私营企业纳入自己的工业发展规划。分析一下这些企业家的财富来源，我们可以窥测到该国发展政策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先从这条街的最南端开始，也就是从升喜广场（Star Hill）的红绿灯路口开始，如果把这个十字路口称为“杨肃斌的十字路口”（Francis Yeoh Junction）也说得过去，因为这位华人亿万富翁拥有这个十字路口周围的所

有主要地产，包括购物中心、五星级酒店和写字楼。

在马来西亚当地，有两位华人企业家因为具有建筑行业的背景而被比作韩国的郑周永。其中一位就是杨肃斌。他的父亲当初就是依靠为政府修建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白手起家的，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赚了第一桶金。此后，杨肃斌和他的兄弟接过了父亲的生意。与郑周永家族不同的是，杨肃斌家族没有被政府政策逼着进入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马哈蒂尔在推出面向国有企业的工业项目时，对国内一些服务部门进行了私营化改革，而国有企业的兴趣集中在工业项目上，于是杨肃斌家族趁机收购了国内的服务行业，包括电力行业。之所以出现这些机遇，是因为马来西亚总理在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私有化政策以及放松管制政策等领域的观念是错误的。1992年，杨肃斌在没有公开投标的情况下获得了马来西亚第一个独立发电厂合同，建立了自己的发电厂。根据这份合同的条款，杨肃斌家族的发电厂在国内具有垄断地位，而且电力价格很高。除了投资发电厂以外，杨氏家族还投资了一些基础设施领域，但一直没有涉足制造业与出口业务。¹⁶⁰尽管如此，该家族最后仍然获得了滚滚财源。他们需要什么技术和设备，就向通用电气公司和西门子公司购买。政府的慷慨行为为该家族带来了巨额利润，而该家族为了获利选择将这些利润投资到房地产行业。当国内房地产投资无法充分满足他们的投资需求时，他们又把目光转移到了海外，并于2002年出资18亿美元收购了英国供水公司——韦塞克斯供水公司（Wessex Water），后来又先后收购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电力资产。在过去30年间，杨氏家族建立的杨忠礼集团（YTL）构建了规模庞大、利润丰厚的投资业务网络，但从促进马来西亚技术学习的角度来看，这些业务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¹⁶¹

从“杨肃斌的十字路口”再往北走一点，就来到了苏丹依斯迈路与拉惹朱兰路（Jalan Raja Chulan）交叉的路口，在这个路口的右侧矗立着云顶大厦（Wisma Genting），这座大厦就是林梧桐（Lim Goh Tong）的云顶集团的总部所在地。2007年去世的林梧桐是第二个被比作郑周永的人。事实上，与杨肃斌相比，林梧桐的经历更接近于郑周永。他的第一桶金不是来自建筑业务，而是来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日本人之间的贸易，后来他又开始买卖战后剩余的民用工程设备。“二战”结束后，英国人拍卖推土机和其他重型建筑时，林梧桐和他的合作伙伴想方设法进行操纵，¹⁶²以低价将其购买下来，然后进行翻新，把部分机器转卖出去，并使用剩余的机器从事采矿

活动，马来西亚独立后，他又利用这些机器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建水坝、桥梁、道路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如同郑周永一样，林梧桐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会亲自参加体力劳动，并与他的建筑队一起居住在施工现场。林梧桐和郑周永二人几乎没有接受过超出中学水平的教育，但计算能力都不错，而且二人都不大愿意征求下属的建议，但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讨好或行贿政客们。正如郑周永安然无恙地从李承晚时期过渡到了朴正熙时期和全斗焕时期一样，林梧桐与马来西亚独立后的每一个领导人，包括马哈蒂尔在内，也都相处得不错。

马哈蒂尔于1981年出任总理之际，林梧桐原本有可能承建从马来半岛到槟榔屿的大桥工程。在马哈蒂尔的工业项目清单中，这座大桥是一个重点项目。其实，早在1965年到1967年之间，林梧桐旗下的建筑公司已经在马来西亚——泰国边境重镇、马来西亚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巴鲁修建了一座横跨吉兰丹河的大桥，这座大桥长达850米，当时是马来西亚最长的桥梁。但到20世纪80年代，他早已不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活动了。这就是马来西亚，哪里赢利多，企业就可以根据自身赢利需要加以选择，而无须考虑国家长远发展需要，他从来没有被逼着出口建筑服务，也没有被逼着进入制造业。相反，当郑周永在朴正熙的授意下开始在汽车制造业、造船业、半导体产业等领域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之际，林梧桐却利用他的资源开设了大型赌场。1969年，林梧桐说服了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获得了开设赌场的经营许可证。他的赌场位于吉隆坡东北约50公里处的云顶高原（Genting Highlands），规模很大，号称“亚洲第二大赌场”。¹⁶³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禁止赌博的伊斯兰国家，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合法的赌场。这个赌场给林梧桐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然而，尽管他赚得盆满钵满，完全有能力建立大型的工业企业，但马来西亚政府却没有在这面对他提出要求，没有逼迫他发展制造业与出口贸易。在马哈蒂尔政权的治理下，林梧桐的企业集团继续在独立发电厂、石油和天然气等领域获得国家的特许经营权，但没有为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由于资金越来越多，而国内房地产投资和种植园投资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无法吸收这么多资金，林梧桐便开始在世界各地投资游艇产业和博彩业，开设了大量赌场，其中就包括在新加坡斥资34亿美元修建了一个具有赌场的度假村。¹⁶⁴

相当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马哈蒂尔治理下，连接马来半岛和槟榔屿的槟

威大桥的承建者不是林梧桐的建筑司，而是郑周永的现代工程建筑公司（Hyundai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工程建筑公司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出口压力，不得不想方设法将其建筑服务出口到其他国家。¹⁶⁵马哈蒂尔的战略不是在实践中学习技术，而是通过把建筑项目承包给日本、韩国企业来学习技术。1984年，他把马来西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建筑项目，即在吉隆坡修建大地宏图大厦（Dayabumi Complex）的项目，承包给了两家日本公司，虽然马来西亚本地的建筑公司在竞标过程中出价更低，但仍然改变不了马哈蒂尔的决定。马来西亚纳税人支付了这笔账单，但没有从中学到什么先进技术。¹⁶⁶在技术学习过程乏善可陈的同时，林梧桐和马来西亚其他企业家却继续利用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而攫取巨额财富。2003年，马哈蒂尔在林梧桐偶像化的传记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是一个模范的企业公民。他一直遵守马来西亚的几乎每一项规则、法规和政策。”¹⁶⁷马来西亚的悲剧在于，这句评价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与现代集团的郑氏家族和三星集团的李氏家族不同的是，马来西亚的商人从来没有被国家逼迫着为国家发展做出什么贡献。

危机过后，一切如旧

苏丹依斯迈路上，车流络绎不绝。我乘坐的那辆宝腾华嘉缓慢地行驶着，不一会儿，在我右侧就出现了一座地标性的建筑，这座建筑是皇冠假日酒店。它会告诉你，在1997年那场毁灭性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皇冠假日酒店（原来是希尔顿酒店所在地）的拥有者是马来西亚土著企业家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他的集团总部就位于酒店北侧的国际大厦（Complex Antarabangsar）。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赛莫达成了深受马哈蒂尔青睐的企业家。在2003年卸任总理之前的最后几年，马哈蒂尔向赛莫达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包括允许他建立发电厂，给他提供国家资助，并允许他在丹戎帕拉帕斯港建立一个新的集装箱港口。但是，这一次，马哈蒂尔也没有要求他发展制造业务或出口贸易。赛莫达对此充满感激之情，但这位亿万富翁仍然一如既往地把他现金流投向采矿、种植园、酒店和房地产等非制造业领域。现在我从车窗向外看到的这些大厦，就是他的一部分投资。¹⁶⁸

再往西北方向走，就到了苏丹依斯迈路与拉姆雷路（Jalan P. Ramlee）的交叉路口。在这个路口的西南侧，你可以看到合成集团大厦（Menara Hap Seng）。这座大厦之前是马来西亚亿万富豪邱继炳（Khoo Kay Peng）的总部所在地，但邱继炳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得罪了马哈蒂尔而无法享受国家的优惠待遇，最后垮掉了。他的垮掉告诉人们，马来西亚并非不存在国家纪律，只是国家纪律引导的方向不正确而已。¹⁶⁹从合成集团大厦出发，沿着拉姆雷路向东走，经过一片红灯区，就到了马来西亚土著大亨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修建的罗哈斯柏卡萨大厦（Rohas Perkasa），但旺阿兹米因过度注重房地产投资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破产倒闭了。¹⁷⁰像他这样因房地产而兴，同样因房地产而亡的人还有很多。距离罗哈斯柏卡萨大厦不远处就坐落着郭令灿（Quek Leng Chan）的丰隆大厦，这是他的丰隆公司总部所在地。郭令灿曾经在英国念法律，是英国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的大律师。他因投资银行和房地产行业而成为马来西亚的亿万富翁，但多年来他还从事了一些制造业活动，包括制造空调、轧钢以及半导体器件加工。从某种角度来看，郭令灿可能是马来西亚私营部门中最能算得上制造企业家的了，但按照韩国标准来看，他的这些制造业活动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

鸟瞰丰隆公司总部的是世界著名的双子塔。双子塔的建造者是阿南达·克里希南（Ananda Krishnan），但他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参与建造工作。¹⁷¹他是一位天才般的企业家，是马来西亚排名第一的富豪。在过去多年里，他未经公开投标就从政府手中获得了一大批特许经营权，业务范围涉及赌马业、石油天然气产业、发电厂、移动通信业务、私人电视业务等。此外，他还获得了吉隆坡市中心一个跑马场所在地的开发权，这块儿地就位于今天双子塔的位置。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虽然国家提供的这些特许经营权每年给克里希南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现金流，但仍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马哈蒂尔政府便介入了，让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出资购买了克里希南持有的双子塔的股份。克里希南的经历说明了马哈蒂尔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他的企业运营状况非常好，足以击败本国的竞争者；他几乎从来没有涉足过制造业或参与过国际竞争；在没有出口要求的前提下，他一直能够说服不同的政治领导人，让这些领导人相信自己值得他们的关注和青睐；¹⁷²克里希南在技术上需要什么，就从海外渠道购买，从双子塔的设计方案（美国人设计）到建造双子塔的钢铁，从修建双子塔的建筑技术到发展移动通信业务所需要的基站，

无不是从海外渠道购买的。截至2011年，他的财富估计达到了150亿美元，而他对马来西亚的工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却相形见绌。¹⁷³

继续往前开，到苏丹依斯迈路与拉姆雷路交叉路口，就能看到这个路口西侧的UBN大厦（在很多年里，这座大厦一直是吉隆坡租价最高的写字楼），在UBN大厦北侧是香格里拉酒店。UBN大厦以及香格里拉酒店都是郭鹤年（Robert Kuok）经营的物业。¹⁷⁴郭鹤年推动了马来西亚商业体系的现代化革新，他在创业初期就在贸易和食品加工业等方面获得了政府的一些优惠措施，拥有很多种植园，涉足数十种商品贸易业务。他的财富估计达到了160亿美元，是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商人之一。20世纪70年代，他在马来西亚之外大力拓展业务，他的财富遍布整个东南亚。事实上，在东南亚企业家中，他堪称一位非常典型的代表，因为他除了制造过面粉袋以外，基本上没有从事过什么制造业活动。

从UBN大厦和香格里拉酒店出发，沿着苏丹依斯迈路再往前走，就到了苏丹依斯迈路与安邦路（Jalan Ampang）的交叉路口。在这个路口的右侧是一大片别墅区，居住着吉隆坡的亿万富翁和王室成员，这片别墅区的前面就是吉隆坡的双子塔。¹⁷⁵沿着苏丹依斯迈路继续往北走，我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留下的尚未完工的建筑项目，这些项目原本是为了将苏丹依斯迈路向北拓展，但在危机期间停工了。与韩国不同的是，危机过后，东南亚没有痛定思痛地总结经验，没有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危机过去15年之后，这些烂尾工程仍然没有完工。在凯煌酒店（Concorde Hotel）之后，我又看到了尚未完工的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 Carlton Hotel），这是华人富豪陈志远（Vincent Tan）大力打造的豪华酒店。陈志远是马来西亚博彩业和房地产业的另一位寡头。¹⁷⁶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左侧坐落着尚未完工的吉隆坡君悦酒店（Grand Hyatt Hotel）。从苏丹依斯迈路与安邦路的交叉路口往前走，就到了“兴业宏愿城大厦”（RHB Vision City），但还有很多部分没有建好，工程被搁置了起来。“宏愿城”与马哈蒂尔提出的“宏愿2020计划”都是不幸的，因为它们最终都没有成为现实。“宏愿城”规模非常庞大，占地面积将近5公顷，是马来西亚金融大亨拉希德·侯赛因（Rashid Hussain）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韩国大宇集团共同启动的一个房地产项目，韩国方面负责提供全部建筑技术。¹⁷⁷拉希德·侯赛因是他那一代穆斯林企业家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但如同其他企业家一样，他也没有被政府逼着发展制造业。¹⁷⁸

苏丹依斯迈路拓展工程的尽头是苏丹依斯迈路与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被称作“前进路口”（Maju Junction）。这个路口的左侧是“前进大厦”（Maju Tower），这座大厦的拥有者是阿布·萨西德·穆罕默德（Abu Sahid Mohamed）。他因拥有一辆粉红色的加长款轿车而出名。在马哈蒂尔的工业政策几乎接近于失败之际，他出资收购了马哈蒂尔兴建的柏华惹钢铁厂（Perwaja Steel）。这个钢铁厂位于马来半岛的东部沿海地区，它就是我接下来要参观的地方。

丛林中建起的钢铁厂

我乘坐的那辆宝腾华嘉进入了吉隆坡北边的环城路，穿过吉隆坡东北部一片片美丽的热带雨林，就来到了卡拉克高速公路的起点。这条高速公路是一条连接马来半岛东部与西部的交通大动脉。在通向云顶赌场的岔路附近，有一座加油站。加油站里有一群顽皮的猴子，如果司机太粗心了，没有看好自己的东西，很有可能会被猴子偷走。过了加油站不久，便到了陈志远在武吉丁宜高原的柏嘉雅山度假区（因具有法国风情，也被称为“法国村”）。在刚刚实行“向东看”政策时，充满激情的马哈蒂尔曾经带领内阁成员花了一天的时间在此学习日本的社交礼仪和茶道。¹⁷⁹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一个名叫文东的小城，1951年10月，当时的马来亚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就是在这座小城外伏击并刺杀了英国高级专员亨利·葛尼爵士

（Sir Henry Gurney）。¹⁸⁰文冬南侧，是土地改革示范村——比鲁特村（Lurah Bilut），在20世纪50年代末，这个村子是为了600个马来土著、华裔和印度裔家庭建造的，现在，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在这里建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在博物馆的显要位置，展示着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的名言：“让最好的人获得最好的土地”。但在马来西亚，这显然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白日梦。博物馆附近有已经运作约半个世纪的南益橡胶厂（Lee Rubber factory）¹⁸¹，其刺鼻的气味和大批生橡胶提醒我们，政府对农户的支持都是虚假的，橡胶生产的大部分利益往往被私营部门的中间商抽走了。回到卡拉克高速公路，经过文东小镇之后，丛林就不见了踪影，你可以看到公路两旁遍布着大规模油棕种植园，每个种植园的长度动辄绵延数英里，一直延伸到东海岸，这似乎为我们揭示了马来西亚农业的真实状

况：该国没有成功地实施土地改革，没有像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那样建立起小农经济的农业模式。马哈蒂尔正是在这种薄弱的农业基础上开始实施他的工业政策的。

从吉隆坡到马来西亚东海岸，需要花三四个小时，沿途会穿越马来西亚中部地区。到东海岸下了高速之后，向北走，进入丁加奴州。寂静的白色沙滩上，遍布着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低层的酒店，内陆有更多的油棕种植园。距离沙滩最近的小镇是甘马挽。正是在这片海岸地带，马哈蒂尔决定打造马来西亚最大的钢铁厂——柏华惹钢铁厂。你看到这个工厂时，最先注意到的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与韩国浦项的钢铁厂有所不同，你无法一眼看出它选址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¹⁸²浦项制铁是沿着海湾进行布局的，运输条件十分便捷，厂区形成了一个马蹄形，原材料从马蹄的一端运抵厂区，经过一套完整的生产流程，到达另一端时就变成了成品钢，然后就可以装船运走。相比之下，柏华惹钢铁厂在甘马挽的厂区则像是被困在了田野里，四周被丛林和矮树包围着，而且与大海之间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从创建之初开始，它就没有把提高出口竞争力作为发展动力，而且从商业角度来讲，把厂址选在东海岸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钢铁需求最大的地区是在人口最密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马来西亚西海岸地区。从商业角度来考虑，如果用管道把东海岸的天然气输送到西海岸，在钢铁消耗量大的西海岸直接生产钢铁，则更加具有合理性。

但马哈蒂尔坚决把机会均等行动计划和工业政策捆绑在一起，想要通过工业建设提高马来西亚土著居民的经济地位，所以就把厂址选在了素来被称为“马来腹地”的地方。然而，仅仅是选址问题还不足以导致整个钢铁厂项目的失败。除了选址失策之外，他还出现了一系列导致问题越来越复杂的失误，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对企业提出出口要求，没有以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柏华惹钢铁厂的日本合作伙伴推荐的规划方案。这个合作伙伴是一个由新日本制铁公司领导的财团，韩国人在建立浦项制铁的早期也是与这个财团进行合作的。对于日本人提出的浦项制铁厂建设方案，浦项制铁厂和韩国政府雇用了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去加以审查，同时又雇用一位旅居日本的韩裔钢铁专家去审视澳大利亚人的建议，最终敲定了一个最佳方案。马哈蒂尔及其“执行与协调小组”都没有采取过这样的防范措施^[13]。他们全盘接受了日本人的建议，包括生产“直接还原铁”（DRI）的建议。所谓

生产直接还原铁，是指利用最新的气基竖炉技术，直接把铁矿石转化为可用来制钢的高品位海绵铁，而无须经过铁矿石烧结和鼓风炉熔炼这两个传统环节。

然而，对于自己推荐的这种气基直接还原炼铁技术，新日本制铁公司当时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当初韩国人之所以拒绝新日本制铁公司建议的计算机化生产系统，而选择采用手工操作的生产系统，就是为了掌握住钢铁生产流程中最基本的技术细节，但马哈蒂尔却不加批判地全盘采用了连日本人之前都从来没有用过的新技术，结果导致马来西亚成为了日本人的试验品。¹⁸³工业领域的很多专家得出结论，最后的结局就是马来西亚没有从日本那里学到任何新技术，反倒是马来西亚人自己出钱，为日本人学习新技术支付了学费。但马哈蒂尔的团队还不至于天真到忘记索赔条款的地步，这个技术失败后，日本财团在1987年向马来西亚方面赔付了1/3的项目初期运营成本。¹⁸⁴但即便这样，生产直接还原铁的失败还是给马来西亚浇了一盆冷水，减缓了其整体发展势头。结果，柏华惹钢铁厂连续好几年不得不用废金属炼钢，由于东海岸的废金属很少，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运来，结果又引发了大量不必要的运营成本。在钢铁厂出问题后，担任马来西亚政府应急小组成员的行业专家谭达文博士（Tan Tat Wai）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认为马哈蒂尔被日本人欺骗了。”¹⁸⁵

马哈蒂尔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但又不得不继续往前走。如同审视其他项目一样，他认为柏华惹钢铁厂的问题也出在管理失误上。马哈蒂尔后来评价这段历史时说：“不幸的是，第一任首席执行官没有管理好。”¹⁸⁶在更换管理人员时，他本来可以选择那些从事钢铁产业链下游业务，而且能力已经得到市场检验的马来西亚企业家，也可以选择钢铁业务以外的主流企业家，但他却选择了谢英福（Eric Chia）。他是一位信口开河的推销员，其父创建了一家汽车贸易公司销售宝腾汽车，谢英福后来也帮助父亲打理公司事务。如果说马哈蒂尔因新日本制铁公司而摔了一跤，那么选择了谢英福之后，他摔得更狠。

马哈蒂尔被谢英福的一番花言巧语骗得失去了理智，结果让他全权管理钢铁厂经营事宜。大权在握的谢英福下令不惜花费巨资，从墨西哥引进技术，修建了两个新的炼钢厂，替换掉了原来那个生产直接还原铁的工厂，同

时引进了新型电弧炉。他一直告诉马哈蒂尔柏华惹钢铁厂会产生出高合金的钢，包括制造汽车所用的钢板。实际上，这个承诺是无法兑现的，因为要制造这种钢板，必须利用纯度非常高的海绵铁。他不仅把那两个下游工厂建在了400公里外的马哈蒂尔家乡吉打州，而且这两个工厂只能生产国内建筑行业所用的那种工型钢和钢筋。¹⁸⁷柏华惹钢铁厂从来没有生产出来过足以让马来西亚跻身全球钢铁技术强国的工业用或汽车用钢材。相反，它在第二次尝试中生产出来的海绵铁的质量远远低于世界标准，这些海绵铁经过跨越半个马来西亚的长途运输之后，被切割成了低合金的建筑钢材，而且只能在受到政府保护的国内市场上销售。原来日本人建议的那个钢铁厂耗费了13亿林吉特，到谢英福时代，马来西亚已经为这个钢铁厂砸进去了100亿林吉特的公款（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约合40亿美元）。¹⁸⁸

柏华惹钢铁厂的乱象

谢英福曾经曾公开声称他接管柏华惹钢铁厂是“服务国家的行为”（马来西亚的亿万富翁经常用这一说法来标榜他们为国家发展做出的虚假贡献），而且他还表示将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并日夜奋战在甘马挽的建筑工地上，而且只拿1林吉特的名义薪水。这种花言巧语正中马哈蒂尔下怀。在没有利用出口业绩来衡量发展状况的情况下，这位超级自信的总理很容易相信自己的爱将正在力挽狂澜。而实际情况却是谢英福很少去工地，能不去就不去，经常待在他位于吉隆坡苏丹依斯迈路上的UBN大厦里属于他的豪华办公室里。此外，他不但没有推动柏华惹钢铁厂学习到任何真正的技术，还搞起了欺诈行为。1995年，有传言指出钢铁厂存在严重的隐性损失，谢英福被迫辞职，当时，马来西亚政府下令调查，后来的两个独立报告揭露了一些引起怀疑的合同，这些合同都是与那些同谢英福具有密切关系的企业签订的，而有些企业在合同规定的业务上根本没有任何经验，还有一些采购和销售合同明显不符合钢铁厂的商业利益——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些款项根本没有任何书面单据可查。连续7年的时间里，谢英福的欺诈手段不断翻新，而马哈蒂尔却浑然不觉，他不愿意让出口市场来评判企业业绩，而是过于相信自己那漏洞百出的识人察人能力。¹⁸⁹

1996年，马来西亚政府投入了99亿林吉特的巨资来偿还柏华惹钢铁厂的

大部分债务。之后却发生了离奇一幕：虽然有证据表明谢英福在过去多年间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大量可疑的交易，但后来在柏华惹钢铁厂私营化改革的过程中，马哈蒂尔却让一些同谢英福具有密切关系的人来接管。¹⁹⁰阿布·萨西德·穆罕默德是谢英福的一位老朋友，在谢英福大权在握时曾经承包了钢铁厂的全部运输业务。钢铁厂私有制改革之后，他从1996年开始就一直控制着钢铁厂的运营，其办公地点在苏丹依斯迈路尽头的“前进大厦”。阿布·萨西德·穆罕默德的老朋友和合作伙伴方天兴（Pheng Yin Huah），在谢英福时期曾经是柏华惹钢铁厂唯一的废金属供应商。阿布·萨西德·穆罕默德的哥哥阿布·塔利布（Abu Talib）是一名会计，曾经担任谢英福的首席运营官。但马哈蒂尔本人却一意孤行，在钢铁厂经营事务上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采取过适当的补救举措。整个事件给人们的教训就是，由于没有国际市场反馈回来的商业信息，即便是马来西亚最有远见的领导人也会做出一连串灾难性的决策。

阿布·萨西德获得的原始资产几乎完全是由国家支付的，因为当谢英福离开钢铁厂的时候，二期投资已经完成，新购的设备也已经投入运营。阿布·萨西德同意支付13亿林吉特的现金，并承担钢铁厂的债务，结果他只支付了5 000万林吉特，其余的分10年交清，每个月支付400万林吉特，且不产生利息负担。¹⁹¹根据他自己的工作人员以及政府消息人士透漏，拿到柏华惹钢铁厂的股份之后，他成功地迫使他的债权人（这些主要是国有信贷机构）削减他的债务，而且没有按时向政府支付其余应付的资金。¹⁹²他还拒不支付柏华惹的电费，因为他料定国有的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公司（Tenaga）不会切断这个国家级钢铁厂的电力供应，实际上，他这个算盘打得相当准。在那段市场前景未卜的时期内，他大力削减柏华惹钢铁厂的经营成本，后来，在21世纪头10年，钢铁市场的新一轮上升周期导致钢价不断提高。他把钢铁厂的一些股份卖给了熟人，并在2008年8月，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把更多的股权拿到了吉隆坡股票交易市场出售。¹⁹³虽然他接手钢铁厂已经十余年，而且最后还上市了，但他和其他那些参与收购钢铁厂的人仍然还欠着政府的钱没有还。

在操纵马来西亚政府的过程中，阿布·萨西德作为一个商人表现出的精明绝不亚于新日本制铁公司和谢英福。他以无可争议的事实表明，马来西亚土著居民的企业家才能绝不逊于其他种族的企业家。问题是政府的政策存在

失误，无法正确地引导企业家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阿布·萨西德如同该国其他大企业家一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倒卖资产的人，而不是开发技术的人。¹⁹⁴从一开始，他就把柏华惹钢铁厂的实际经营权控制倒卖给了自己在钢铁贸易方面的合作伙伴方天兴家族，而因为他们只是为了倒卖国有资产，而不是为了发展钢铁生产，结果让原来的那班人马原封不动地继续管理着企业。甘马挽厂区的那个负责工厂运营的总经理自从1984年该厂初创时就一直待在那里，而后来新建的那个替代工厂的总经理自从1991年建厂时也一直待在那里。¹⁹⁵就在整个企业被悄无声息地转卖之际，运营人员和技术学习流程却几十年一成不变。

1973年，韩国浦项制铁的年钢产量达到100万吨，之后，由于需求的增长而不断扩大投资，并于1983年年产900万吨，具备了世界级的钢铁制造水平，长期引领了世界钢铁产业的发展潮流，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韩国投资总额只有200亿美元。而马来西亚柏华惹钢铁厂投产时年产量为150万吨，但投产不久，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很快便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由于没有出口纪律，钢铁厂的资产被外部唯利是图的政客与商人反复倒卖，他们赚得盆满钵满，马来西亚的纳税人为此支付了60亿到80亿美元的账单，而这个国家到头来却什么技术都没学到。¹⁹⁶

马来西亚汽车工业的败笔

柏华惹钢铁厂的失败导致马哈蒂尔生产高级钢材的愿望落空，进而挫败了他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的雄心壮志。在这些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汽车制造业，由于本国生产的钢板达不到制造汽车的标准，马来西亚不得不继续进口钢板。从1986年第一批宝腾汽车上市到2010年，马来西亚公司总共销售汽车500多万辆，而因为无法生产出合格的钢铁，很多潜在的业务因此丧失。此外，考虑到外国汽车组装厂、外资主导的大型消费类电子产品厂等用户对高级钢材的需求，马来西亚蒙受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参观完柏华惹钢铁厂之后，我便乘坐那辆宝腾华嘉再次回到了那条高速公路，穿越连绵不断的种植园，返回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海岸地区。在这里，有三个地方诉说着国内汽车行业的故事。第一个是宝腾汽车公司的新厂

区。该厂区坐落在吉隆坡以北70公里远的霹雳州丹絨马林市，毗邻马哈蒂尔时期修建的南北高速公路。这个厂区是在2004年投产的，不久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对发展汽车工业的热情大大降低，导致这一现象的政治诱因是马哈蒂尔在2003年辞去了总理一职。第二个地方是派洛多汽车公司（Perodua）的厂区。这个厂区距离吉隆坡较近，但仍然在其北侧，坐落在万绕城区以外的农村地带，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马来西亚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只制造微型车，以作为对宝腾汽车公司较大型客运车辆的补充。最后一个地方是宝腾汽车公司的总部。该厂区在吉隆坡西南侧，坐落在吉隆坡的主要商业区——沙阿兰区，这个厂区是该公司的老厂区，而且至今仍然是该公司总部所在地。

这三个地点传达出了相同的信息，即这些汽车厂不是以出口为目标的。现代汽车集团的蔚山厂区外的码头上，庞大的运车船等着把汽车运往世界各地，而马来西亚的这些汽车厂则不以出口为动力，这一点从两家汽车公司总部展出的汽车模型上也能看出来：宝腾汽车公司着重生产较大的汽车，而派洛多汽车公司则专注于较小的汽车，显然二者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韩国于1973年开始大力发展汽车产业，虽然每年国内汽车市场的需求量只有3万辆，但韩国政府却设立了3家直接竞争的汽车制造企业。马来西亚则于1983年开始大力发展汽车工业，每年国内汽车市场的需求量多达9万辆，但政府只批准设立了1家汽车制造商，而且是国有的，¹⁹⁷直到10年后才设立第二个汽车制造商，但它的产品显然不是为了同第一个制造商进行竞争。¹⁹⁸在两家公司的运营问题上，马哈蒂尔总是亲自负责与外国合作伙伴进行谈判，¹⁹⁹坚持设立合资企业，宝腾汽车公司与日本三菱集团建立合资企业（韩国现代集团为了获得先进的技术，也是与三菱合作的，但没有设立合资企业）²⁰⁰，派洛多与日本小型车制造商大发汽车公司（Daihatsu）建立合资企业。马哈蒂尔宣称“我决定采用日本和韩国的战略与方法来发展马来西亚”，²⁰¹但他所做的事情则完全不同。

在现代集团，郑周永对日本三菱集团的目标总是持怀疑态度。他聘请欧洲工程师作为自己的技术顾问，当三菱集团打算给现代提供一个二流发动机时，欧洲工程师就给郑周永提了个醒。马哈蒂尔的警惕性则没这么高。二人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郑周永是一位久经考验的企业家，而马哈蒂尔虽然在年轻时涉足过一些商业领域，但终归是一位政客。²⁰²三菱集团与马来西亚政府

签订的合作协议中规定，三菱集团将其生产的三菱蓝瑟汽车（Mitsubishi Lancer）换成宝腾赛佳（Proton Saga）的标志，三菱集团可以享受以下回报：把自己过时的生产设备卖给与马来西亚的合资企业；放慢马来西亚提高汽车本土化的速度；让自己的零部件价格远远高于世界的价格；生产一些达不到发达国家安全标准的汽车投放到马来西亚市场。当三菱集团被迫根据马来西亚的市场要求生产本土化零部件时，它经常会通过日本的合资企业去生产，这样一来马来西亚人就无法学到本土化生产的技术。²⁰³似乎马哈蒂尔在原来的合作协议中也没有加入具体的出口要求，当他要求合资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时，日本合作伙伴仍然百般推诿，说要进入美国市场，必须拿出两年的时间来提高安全标准。²⁰⁴

宝腾 - 三菱合资企业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为我们揭示了为什么世界各地雄心勃勃的汽车厂商无法通过同跨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的办法来学习先进技术。双方的利益必然存在冲突。当合资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马哈蒂尔仍然像处理柏华惹钢铁厂的问题一样，将罪责归因于管理层。宝腾 - 三菱合资企业投产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988年，马哈蒂尔撤掉了担任高级经理人的马来土著人，让日本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三菱方面的高管随后搁置了向美国出口汽车的计划，而是集中精力拓展政府保护下的马来西亚市场。²⁰⁵他们对赔本开拓美国市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宁愿停留在马来西亚国内市场上，因为在这个市场上，汽车价格被人为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收益足以支付成本。

超越柏华惹钢铁厂

马哈蒂尔声称他的工业政策效仿了日本和韩国的工业政策，但实际上它的所作所为更加类似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这种政策并没有帮助东南亚国家学习到什么先进技术。由于国内市场没有竞争，企业也不专注于发展出口贸易，所以马哈蒂尔只能一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东北亚国家早就已经想通了，所以对企业实行了严格的出口纪律，逼迫它们相互竞争，发展出口贸易，因此避免了马哈蒂尔面临的困境。然而，马哈蒂尔对现代集团的苍白模仿的确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成果，这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他一直要求合资企业实行本土化生产，所以在马来西亚本土组装的

宝腾等品牌的汽车本土化程度越来越高，本国生产的零部件在整车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1980年前只有10%，到1990年提高到了60%多。之前有很多从事汽车套件组装的公司开始转而生产并出口汽车零部件。三菱集团断送了马哈蒂尔向美国市场出口宝腾汽车的计划，而且告诉马来西亚人说要盯住牙买加、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之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然而，马哈蒂尔政府帮助马来西亚汽车获得了免关税进入英国市场的机遇，每年可以向英国市场出口1.4万辆汽车。马哈蒂尔缺少指挥能力，但不缺精力。宝腾汽车在进入英国市场的第一年就销售了1万多辆，并且宝腾赛佳被英国一家全国性的报纸评为“最佳经济型轿车”，这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了当年现代汽车刚刚进入美国市场之际的辉煌成就。²⁰⁶

因为与三菱公司的合作让马来西亚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而且三菱技术相对比较落后，马来西亚也学不到什么先进技术，马哈蒂尔到1993年已经开始不耐烦了，决定让宝腾汽车公司重新回到马来西亚人的管理之下。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私营部门的马来土著企业家——雅哈亚·艾哈迈德（Yahaya Ahmad）。马哈蒂尔后来把政府持有的宝腾汽车股份转让给了雅哈亚。事实证明，他比阿布·萨西德和谢英福认真得多。和郑周永一样，他也在接手宝腾汽车公司之后开始从国外聘请顾问和第三方的技术合作伙伴，以减少对三菱公司的依赖性。他收购了英国莲花汽车公司，不是因为他想制造跑车，而是为了学习该公司下属的莲花工程（Lotus Engineering）的先进技术，莲花工程是世界顶级的、专业的汽车设计和工程顾问咨询公司。²⁰⁷1997年，他在一起直升机事故中去世，他的副手马哈里·宾·东古·阿里夫（Mahaleel Bin Tengku Ariff）接过了宝腾汽车公司的管理权，但继续沿用之前的发展套路。莲花工程重新设计了宝腾赛佳，让其外观呈现出了更加鲜明的宝腾特色。宝腾汽车公司设计的第一款汽车——宝腾华嘉于2001年推向市场，之后不久，这款车就开始搭载了宝腾与莲花共同开发的宝腾CamPro系列发动机。2004年，马来西亚国内汽车市场年销量超过了40万辆，宝腾汽车就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同年，宝腾汽车城第一期建设项目启动，管理层设想建立一个拥有25万居民的综合汽车城，方便整合与供应商之间的业务。在2000~2005年之间，宝腾支付给三菱的零部件成本从10亿林吉特下降到了6亿林吉特。2004年，因为在制造微型车过程中涉及一些与制造摩托车有关的技术，宝腾汽车公司便收购了意大利摩托车制造商MV奥古斯塔公司（MV Agusta），收购之后，MV奥古斯塔公司向宝腾汽车公司提供技术咨询。²⁰⁸

然而，这代表着宝腾汽车公司的发展到了一个巅峰水平，该公司一直无法超越这个水平实现更大的发展。虽然宝腾公司的国内业务每年带来的收益超过数十亿美元，而且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技术能力大大提高了，但它没有认真考虑开拓国际市场，仍然缺乏全球竞争力。例如，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销售的汽车中，它可以偷工减料，不安装安全气囊，不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ABS），但这种汽车显然无法出口到很多国家的市场。相比之下，现代汽车则要好得多，因为它为了出口而生产的汽车数量比较多，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现代汽车集团生产的伊兰特轿车，无论出口到哪个市场，无论哪个型号，不仅能够配置前排安全气囊，还会配置侧面安全气囊。马哈里·宾·东古·阿里夫一直认为宝腾汽车根本不可能全面采用现代汽车的出口模式，因为马来西亚其他领域的工业政策，尤其是钢铁领域，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抬高了很多人原材料的供应成本，他说：“马来西亚汽车工业很难成功……柏华惹钢铁厂本应该生产出高级钢板，但从来没有生产出来过。”²⁰⁹而宝腾汽车公司的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赫德·纳兹米（Mohd Nadzmi Mohd Salleh）却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马哈里·宾·东古·阿里夫在执掌宝腾汽车的9年内从来没有在发展出口贸易放慢做出过努力，他说：“他的战略只追求在国内市场上有利可图，在我看来，这是最大的错误。”²¹⁰马哈里·宾·东古·阿里夫在任期间，宝腾汽车已经拥有6个汽车生产平台，他打算增加到20个，但一直没有认真考虑过把汽车卖到海外市场的问题。

政治贵族的回归

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马来西亚经济，马哈蒂尔不仅重新将宝腾汽车收归国有，还不得不拿出数十亿美元的公共资金去救助一连串生产效率低下的裙带企业（包括他自己家族的企业）²¹¹。最终，宝腾汽车源源不断的投资需求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削弱了马来西亚政府发展汽车工业的意志。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对马来西亚汽车工业构成的挑战也越来越迫近，因为自从2003年以来，只要一件商品的自制率达到了40%，就能享受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关税。^[14]虽然马来西亚的宝腾汽车和派洛多汽车一直受到政府保护，没有受到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但其仍然无法同日本在东

盟地区设立的汽车厂进行竞争（这种做法是不符合自由贸易区规定的）。因此，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关税规定可能会对马来西亚汽车工业造成毁灭性打击。²¹²不过对于宝腾汽车公司而言，最具有致命性的打击是马哈蒂尔2003年的辞职事件。马来西亚的工业化政策一直是他一个人在推动的，如果没有马哈蒂尔，就没有人会为宝腾汽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做辩护了。

马哈蒂尔辞职后，马来西亚重新回到了传统的贵族统治状态，这些贵族是一群具有贵族背景的精英人士，其代表就是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llah Badawi）。²¹³2005年，新政府决定不再续签马哈里·宾·东古·阿里夫时期的一些合同，强迫宝腾汽车公司放弃了最近收购的MV奥古斯塔公司，因此也放弃了制造微型车的计划。²¹⁴阿卜杜拉·巴达维告诉他的同僚：“我不喜欢大项目。”²¹⁵但他没有明确阐述自己对工业政策的想法，结果导致宝腾汽车公司的士气有所下降，但有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决定继续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下去。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零部件供应商不愿冒险进一步加大资本支出，这意味着技术升级的步伐停止了。宝腾汽车的自制率停留在了90%的水平，但其生产规模不够大，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结果提高了单位生产成本。巴达维政府也没有进一步为该公司提供投资和补贴，致使其不得不将汽车生产平台的数量从6个减少到3个，市场份额也从21世纪初的60%下降到了今天的30%，其中2006年下降幅度最大。²¹⁶

不幸的是，宝腾汽车公司虽然已经制造出了自己的汽车和发动机，但由于现金不足，无法研发新车型，最终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境地，不得不同三菱公司签订换牌协议，就是我们常说的贴牌生产。宝腾与三菱之间进行合作，三菱负责提供机械结构与基础的设计工作，而宝腾负责包装上市以及后期营销。宝腾借助自己旗下的莲花汽车的优势对格栅、底盘和操控等方面进行更改，使之具备一些宝腾特色。所以，后期生产的宝腾华嘉其实就是在三菱蓝瑟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后来，宝腾又在华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就变成了宝腾赛佳。²¹⁷我乘坐的那辆宝腾华嘉轿车是改装之前生产的，是真正的华嘉轿车，此刻正孤零零地停在宝腾汽车公司沙阿兰区总部的停车场上，可以说这是最后的华嘉、真正的华嘉。

在今天的马来西亚，人们批评宝腾公司时最常说的是，在马哈蒂尔下台之前，宝腾公司有20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但事实上它并没有证明自己。然

而，与韩国现代集团的经历相比，这个批评可能是不公平的。韩国于1973年宣布要大力发展汽车工业，20年后，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韩国汽车工业可能支撑不了10年。1992年，韩国国内车企生产了350万辆汽车，但只卖出了170万辆，而且当时韩国车企的生产率仍然只有日本车企的50%，而且当时韩国汽车在海外市场上被认为是质量低劣、信誉不佳的象征。²¹⁸然而，回头来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现代等车企的技术水平开始大幅提升，逐渐脱离困境，这一点在不久之后的销量上就得到了体现。如同任何形式的教育一样，学习技术也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学习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正如现代汽车集团一位质量控制经理所说的那样，技术进步的秘诀就在于“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复同样的错误”。²¹⁹

宝腾汽车公司获取技术的速度似乎不逊于现代汽车集团。²¹⁰然而，在1970~2000年这30年的时间里，韩国政府一直为本国汽车制造商提供了非同一般的保护，在2000年之后虽然保护力度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仍然存在其他很多形式的保护。²²¹20世纪90年代初，现代集团能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建立轻型卡车和汽车的成套散件组装厂。一个政府能为本国企业提供这么大的支持，着实令人难以想象。²²²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至少表明该国政府在其工业政策上缺乏耐心和执着，这不是马哈蒂尔一个人的错误。日本与韩国都设立了一个负责保护本国工业的专职机构，并给这个机构充分放权，使其成为落实本国工业政策的主要工具，日本设立的是通产省，韩国设立的是经济企划院。而反观马来西亚，却不存在这样一个机构，这是马哈蒂尔无可回避的一个失误之处。

但马哈蒂尔的主要责任是没有执行出口纪律，没有让私营部门充分参与市场竞争，这样一来，他就无法通过优胜劣汰的办法淘汰劣者，整合强者。对于钢铁制造业的失败，马哈蒂尔的个人做派难辞其咎。在汽车工业，马哈蒂尔和宝腾汽车公司本来已经离成功越来越近，但由于本国无法制造出高级钢板，为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增加了诸多困难。说句公允的话，在马哈蒂尔的工业化政策下，马来西亚的确学到了一些东西，但不够多。今天的马来西亚有点像一个学生，花了20年时间去上学，但由于不够认真，结果现在发觉无法实现他所期望的那种经济水平的生活。马哈蒂尔在1981年出任总理一职的时候，就看到了韩国实施的工业化政策，认为自己的国家也需要制定这样的

政策。他知道，要培养竞争力，马来西亚必须学习工业技术，但在组织学习过程时，他的效率没有朴正熙的效率。马哈蒂尔2003年卸任总理时，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再与韩国处于同一水平，马来西亚是人均4 160美元，韩国则是12 680美元。²²³之后一直维持着大约两倍的差距。在工业发展问题上，马哈蒂尔卸任之后的历届政府更是指导无方，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人意识到，虽然马哈蒂尔这位前总理存在一些令人失望的缺点，但至少他本能地意识到了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重要性，这一本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政策对经济发展必不可少。

东亚的两种发展结局

韩国实行了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以及出口纪律，并鼓励多个企业进行竞争，所以其制造业政策非常有效地推动了该国的技术升级。马来西亚则没有实行出口纪律，也没有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致使其工业政策走入了死胡同。除了这两个对比十分鲜明的国家之外，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两个地区在制造业发展方面的成功与失败。

在东北亚，日本在保护、促进幼稚工业发展方面堪称该地区的模范国家，因此基本上不需要做进一步评论。然而，从明治时代到“二战”后的工业化历程中，日本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了更大程度的共识性与民主性，劳资关系的对抗性趋于弱化，劳资双方开始合作，社会关系趋于成熟稳定。²²⁴这与联邦德国在“二战”后发生的情况别无二致。“二战”以后，在这两个国家中，虽然家族企业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企业领导层的职业性得到强化，家族主导性弱化。

和战后的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台湾这个经济体的主要特点在于公有制经济发挥的作用比较大，没有对大企业实行出口纪律，而且没有为私营部门那些规模较小的出口企业提供充分的支持。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早期的日本也遭遇过类似情形，因为当时这两个国家的主导性企业也都不愿意发展出口贸易。中国在未来可能也会面临同样问题。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毕竟在获取制造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东南亚国家。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其领导人苏哈托在20世纪80年代深受马哈蒂尔“向东看”工业化政策的影响。不幸的是，他采取的工业化政策与马哈蒂尔的政

策存在同样的缺陷，²²⁵既没有实行出口纪律，也几乎没有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因此，就像马来西亚的情况那样，印度尼西亚的企业面临的压力很小，攀登技术阶梯的动力不足。谢重生（Edwin Soeryadjaya）家族的历程就为此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诠释。这个家族最先获准与丰田建立合资车企——埃斯特拉国际公司（Astra International），在该国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也是该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他回忆说，在理想主义弥漫的年轻时代，他曾经规劝他的父亲和其他股东效仿现代汽车集团通过请求、借鉴、剽窃等手段从三菱等公司获取先进技术的先例，开发出一款真正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汽车，这也正好符合政府政策对其家族企业的要求。²²⁶当时印度尼西亚拥有2.2亿人口，因此其市场容量是韩国的5倍，然而，由于国家没有逼迫车企竞争和出口，该公司的董事们最后还是“非常明智地”拒绝了年轻的谢重生，告诉他不要再提这件事，在没有竞争而且受到关税壁垒保护的国内市场上享受丰厚利润。因此，该公司向来都是财源滚滚，但在技术方面一直以来都是完全依赖丰田公司。²²⁷

印度尼西亚工业化运动的主要设计师和推动者是一位曾经接受过德国教育的航空工程师——优素福·哈比比（Baharuddin Jusuf Habibie）。他曾经担任该国研究与技术部部长，在苏哈托时代曾出任副总统，1998年5月21日苏哈托辞职，之后哈比比出任印度尼西亚第三任总统。他最热衷于做的事情就是发展印度尼西亚飞机制造业项目，并为此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国营飞机工业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语中，该公司的首字母缩略词是IPTN）。²²⁸该项目试图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制造出属于印度尼西亚自己的飞机。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项目。日本也尝试过培育出一个成功的飞机制造企业，虽然取得了一些技术进展，但最后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只能充当波音公司和空客公司的分包商。巴西也曾经制定过航空工业政策，试图培育出本国的飞机制造企业，最后建立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但技术水平长期停滞不前。²²⁹从1985年起，印度尼西亚国营飞机工业公司就建立起了一支规模接近1万人的研发队伍，遍及18个业务部门，大多数都集中于爪哇岛西部城市万隆。然而，如同马来西亚一样，印度尼西亚的上游工业项目也失败了，以至于制造业中某些基本的投入要素都无法实现本土化生产，比如高级钢材。因此，印度尼西亚的各个工业领域之间缺乏共同的基础产业做支撑，彼此的联系比较松散。相比之下，韩国各个工业领域，从钢铁制造业到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再到后来的电子产业和半导体产业，彼此之间的连贯性比较显著。除了基础产业薄弱之外，亚洲金融危机也制约了印度尼西亚工业的发展空间，因为这场危机重创了印度尼西亚经济，从而削弱了该国政府为实施工业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所以，自从1985年宣布了一批重大工

业项目之后，该国政府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魄力，而且危机之后该国的工业项目已经被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导致一大批关键的技术人员纷纷移民，通常是流向了发达国家。在过去15年里，印度尼西亚的技术能力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倒退。

在泰国，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此，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可能是在这个政策上坚持得最久的一个国家。此外，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泰国负责制定、落实工业政策的政府机构可能是能力最强、职业化程度最高的。但正如长期致力于发展问题研究的日本学者末广昭（Suehiro Akira）在《泰国资本的积累（1855~1985）》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泰国的制造企业基本上没有承受任何发展出口贸易的压力，而且泰国的工业无一例外地属于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型工业。与东北亚国家不同的是，泰国政府机构从来没有对本国企业实行出口纪律，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将军和政客没有把发展出口贸易摆到优先位置上。虽然泰国没有造就出一批优秀的出口企业，但培育出了一批优秀的合资组装企业（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与美国、日本企业合资），因为在其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下，零部件需交纳的进口关税比较低，而工业制成品需交纳的关税高，但在这种合资企业中，泰国人几乎学不到什么先进技术。但也有一些短暂的例外情况。比如，泰国丹宁电视机厂（Tanin）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向欧洲出口电视机，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泰国再次向外来投资敞开大门，随后降低了对国内企业的支持力度。末广昭在《泰国资本的积累（1855~1985）》一书中指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跨国企业的存在已经严重到了能够全面地或充分地控制泰国经济的地步。”²³⁰只有一个工业领域的出口额出现过大幅增长，这即是农产品加工业，但这也是在长期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泰国采取了马哈蒂尔式的做法，也开始吸引外国投资者，以期增加出口额，但这些外国投资者主要集中于那些附加值较低的组装业务，这就影响了出口贸易的增速。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的干预，泰国工业政策和预算遭到了进一步挤压。

菲律宾也曾经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但滋生了很多腐败现象，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该国最后在1962年放弃了这一政策，此后几乎没有做出过保护、促进幼稚工业的努力。菲律宾有一个问题比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都严重，即那些拥有土地的大家族主导了该国在独立后实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项目，并挫伤了国家为了学习先进技术而做出的每一次尝试。它们从跨国企业那里购买产品，然后进行组装，卖给高关税保护下的国内市场。他们唯一的出口商品就是农产品。后来费迪南德·马科斯也像韩国那样积累起了巨额外债，但不同的是，马科斯大借外债不是为了发展出

口导向型工业，而是把借来的大部分钱都投到了国内房地产建设领域，或用来拉选票，或进口一些非生产用途的商品。当东南亚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遭遇整体性衰退之际，菲律宾经济因外债规模超出偿付能力而瞬间崩溃，经济规模令人震惊地缩小了20%，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真正稳定下来，但即便稳定之后，往日的高增长时期也再没有出现过。菲律宾没有能力制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二战”结束之际，在亚洲地区只有日本和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水平算是比较高的。后来，菲律宾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韩国和中国台湾超越，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滑到了泰国后面，最近又被印度尼西亚甩在了后面。曾几何时，菲律宾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今天由于缺乏技术，贫困率居高不下，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三流国家。²³¹

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重要的因素

东北亚和东南亚在明确的主题上出现了小差异。日本佳能、韩国三星、中国台湾宏碁等品牌的诞生，正是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与市场力量相互结合催生出来的产物，这种结合既包括国家（在早期阶段）提供出口补贴，也包括制造商之间为了争取国家支持而展开竞争。20世纪50年代，东北亚国家想方设法地顶住各方压力拒绝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避免了这种政策造成的重重问题（当年，世界银行的左翼人士也曾鼓吹过这一政策）。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主张相反的是，只要在实行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同时实行出口纪律，寻租行为和权贵资本主义并不一定会妨碍工业政策的落实。计划和市场的结合使人们想起英国发展经济学家罗纳德·道尔的一个言论。当年日本工业建设达到高潮时，很多外国人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对日本工业化的看法，今天，回眸这些外国人的看法时，罗纳德·道尔写道：“左派观察人士从日本回来之后，相信他们看到的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一个光辉典范；右派人士访问完日本之后对日本实行的自由企业制度的优点大加赞赏。”²³²很多观察人士从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回来后，也得出了同样相互冲突的结论。

不同国家在发展制造业的具体政策上存在差异，这并不难理解，遗憾的是，这些政策被经济学家们搞得过于复杂了，令人眼花缭乱。他们坚持认为，在发达经济体中非常重要的效率因素也应该决定贫穷国家的发展政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无视历史的观点，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担忧效率问题之前，必须先经过一个技术学习阶段，让自己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先会走路，然后才能奔跑。因此，如果

我们从历史角度审视一下各国的实际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新古典派和新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很多重要因素其实并不重要。

“宏观经济稳定”理论就是这种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力宣扬该理论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其前提条件是低负债、低赤字和低通胀。这些因素的确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期待，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因素能决定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如果我们牢记工业化的目标是学习先进技术，形成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即便出现了负债、赤字和通胀，也是合理的。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借款或印钞票的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决定了这个途径是否合理。这就像贷款上大学，它取决于你是否能学到东西。在发展中国家，要评判债务、赤字和通胀是否合理，关键是看该国是否实现了技术进步。

韩国的中央银行直接听命于政府，无论国内外经济气候如何变化，总是坚持给受到政府青睐的项目提供贷款。虽然每年的通胀率都高达15%~20%左右，但韩国政府很少担忧。按照亚洲标准来看，韩国的储蓄率也很低，国外贷款中的大部分都被用来投资。韩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几乎没有任何谨慎性，甚至达到了不计后果的程度，这使其美国顾问和多边机构顾问十分恼火。然而，韩国工业化历程却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与韩国经济相比，中国台湾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党当局经历了一次超级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内战失利。后来，独立运作的台湾“中央银行”实行高利率、低通胀的政策，提高了储蓄率，所以台湾工业化过程中的国际借贷比韩国少，但台湾工业化成果却不如韩国。

无论是在东北亚的成功中，还是在东南亚的失败中，能否实现宏观经济稳定都不是决定因素。东南亚国家在对待宏观经济稳定的问题上存在些许差异，泰国最审慎，印度尼西亚则不那么审慎，但其工业化进程都以失败而告终。菲律宾的马科斯和韩国的朴正熙、童大焕一样借外债、印钞票，但不同的是，韩国人把资金用于提高本国技术水平，而马科斯则像赌场里的醉汉一样把大部分资金挥霍掉了。

除了宣扬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之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不断卖力地宣扬私营企业的优点和公有企业私营化的理念。在发达国家，有大量证据表明，私营企业的运营成本往往低于公有企业，²³³但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还处在技术学习阶段时，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优劣对比就不同了，因为公有企业比私营企业

更容易吸收先进技术并实现技术进步。当国家的监管能力薄弱时，有时候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实现工业化目标可能更为容易。日本、韩国、这几个经济体都曾经利用公有企业快速实现了技术升级，尤其是在早期发展阶段。当今中国对公有企业的依赖性远远超过了在其之前的任何发展中国家。这并不表明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这只能表明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究竟是采取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许并没有别人告诉他们的那么重要。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比如在前苏联，在改革之前的印度与中国，真正阻碍发展的因素在于国家没有实行出口纪律，没有实行有效的竞争机制，而不在于企业究竟属于谁。

与此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放松金融管制，实行开放政策，以便稳步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然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成功实现工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个国家或地区在关键的决策关头都加强了监管措施，并实行了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新兴的产业。在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日本为了保护通产省正在培育的新企业，大幅提高了关税，²³⁴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大力发展重工业时，也采取了提高进口关税、保护国内企业的做法。中国虽然早在2001年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目前似乎也走上了保护主义的道路，只不过不是通过关税壁垒。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一些具有历史眼光的经济学家最大的担心（但很少讲出来）就是，在过去只要一个国家的工业政策取得了成功，往往会出现长期性的贸易盈余，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损害全球的经济的发展。在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头70年的美国以及从20世纪晚期到今天的德国和日本，在成为工业强国后，都出现了长期性的巨额贸易盈余和经常账目盈余。很多人怀疑中国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然而，无论历史情形如何不容置疑，工业政策和贸易盈余之间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一个国家在处于发展阶段时，由于需要从外国引进尚未掌握好的技术，需要支付巨额的技术引进费用，更有可能出现贸易赤字，而不是贸易盈余。比如，韩国直到1977年才开始实现贸易盈余，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才出现连续性的贸易盈余。掠夺性的贸易盈余和经常账目盈余只是一些国家在制造业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做出的政治选择。维持贸易盈余的手段通常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过久地维持贸易管制政策或者严格压制国内消费，促使进口消费品的数量大幅减少。在历史上，一些实施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国家的确存在自私自利的现象。今天，很多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试图以史为鉴，想要剥夺发展中国家实施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权利，但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逻辑的。贫穷国家要想发展好自己，必须采用富裕国家曾经采用过的经济发展措施。

任何灵丹妙药都不会永久有效

如果说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政策、国内竞争和优胜劣汰是实现工业发展的灵丹妙药，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灵丹妙药的效力具有短暂性。暂且不提巨额贸易盈余容易引发世界经济失衡这个全球性的问题，一些贫穷国家利用幼稚工业保护政策跻身富裕国家行列之后，发现这一政策会催生出很多富裕国家特有的国内问题。比如，日本曾经实行过家庭农业战略，农业产出很高，但成为富裕国家之后，农业产出反而下降，农产品价格不断攀升，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每个苹果卖到5美元的现象。在工业领域也是一样，找到正确的药品来解决贫困问题是一回事，而贫困问题解决之后及时停药却是另外一回事。在一些东北亚国家，虽然其制造业迅速过渡到了发达阶段，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简要地反思一下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个问题是，虽然制造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它并不能代表发展的全部内涵。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生产大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部8家规模最大的钢铁厂全都在日本，世界上的工业机器人中有50%在日本，日本企业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比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²³⁵然而，今天的日本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富国，在过去20多年间，日本经济出现了多次衰退与停滞。2010年，我曾经开着车在日本四处转了转，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禁多次问自己，当年世界为什么会担心日本的经济霸权呢？为什么会揣测说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呢？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虽然日本的制造业政策非常有效，培育出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跨国企业，而且其中大多数企业现在仍然蓬勃发展，但日本广大的小型制造企业以及服务产业却比较落后。

日本大规模制造业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导致日本成为了世界上产业结构失衡情况最严重的富裕国家。日本的机械制造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超越了长期领先的美国，但到今天为止，日本的服务业和农业仍然与美国以及欧洲存在很大的差距。²³⁶关于日、美两国制造业之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可以从日产和福特这两家汽车制造企业的对比中体现出来，1990年东京股市崩盘的时候，日产的工人平均每人每年能造40辆汽车，而福特只能造17辆。²³⁷另一方面，关于日本落后的服务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的批发贸易规模是其零售贸易规模的4倍，而在美国则是1~2倍，由于日本的批发贸易效率极低，日本企业可以通过一次又一次地提高价格来压

榨消费者。从民航业到旅游业等服务业，效率同样很低。比尔·艾默特（Bill Emmott）在1989年出版的《太阳也西沉》（The Sun Also Sets）一书中准确地预测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楼市泡沫的破灭，而当时，美国的评论人士还在担心日本的国力不断增强。在这本书中，艾默特对日本传奇式的白领一族的低效率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如果这些白领们加班，往往都是因为他们渴望获得加班补贴，或者迫于来自同事的压力与自己的惯性而不得不加班。别人七八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他们要花上10个小时。很多办公室的架子上都会有开了封的三得利威士忌酒，遇上年度高校棒球锦标赛，办公室的电视也会播放。”²³⁸

工业政策的作用具有一定局限性，几十年来，日本通产省有效地推动了本国企业以竞争的、透明的方式获取经营许可证，合理有序地管理着市场准入，既对企业形成了保护，又不乏充分的竞争，迫使企业对自己的生产设备进行改进升级。但是，随着日本日益接近技术前沿，并停止追赶其他国家，企业实力越来越强，通产省对其约束力弱化，通产省的工作变得日益艰难。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通产省曾经试图组织本国企业进军生物技术前沿，²³⁹但结果并没有之前组织日本企业进军半导体技术前沿那么成功。在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通产省也无法通过自己的组织规划催生出微软那样的大公司，日本学界人士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经警告说日本可能在软件开发能力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同样，通产省从来没有对小型制造企业产生明显的、积极的影响。如同韩国的大企业一样，日本通产省培育起来的那些大企业也会利用自己规模较大的优势去挤压那些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供应商的利润空间，或者索性把它们兼并掉。大企业恃强凌弱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引发了一些没有根据的政治傲慢。在日本，当政府机构在实施工业政策时，该国不成熟的政客们则在不停地添乱，仿佛随时有可能给日本带来灾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资产泡沫逐渐破灭，之后，不习惯于做出艰难决策的日本政客们没有清理资不抵债的银行，以至于为1996年陷入第二轮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陷入第三轮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²⁴⁰当大城市以外的房价也开始暴跌时，日本社会的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状况达到了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严重程度，而且日本经济也停止了增长步伐。虽然当时日本大规模制造业仍然具有全球竞争力，但对于大多数日本家庭而言，这似乎无关紧要，因为日本6 000万劳动力中，大约有5 000万都没有从事制造业。事实证明，工业进步只是日本全面发展的一部分。此外，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傲慢思想逐渐消退时，日本人意识到了人口变化趋势带来的阴影。这种趋势会给每一个发展

中国家带来阴影，日本也不例外。那些曾经用辛勤的汗水推动日本工业进步的年轻人已经变老，而且他们那一代人的子女数量比上一代人的子女数量少得多，而且他们的寿命更长了，退休之后只消耗现有储蓄，而不再创造储蓄（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负储蓄”现象）。日本公民然后又意识到，经济低增长和国家人口的变化趋势意味着政治家曾经许诺给他们的养老金将成为日本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日本的经验给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应该在什么时间节点上放弃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呢？放弃之后应该过渡到哪种政策呢？显然，日本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推动本国农业从注重产量向注重利润过渡，而且几乎完全忽略了服务业。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政策吗？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在外界压力下进行的改革措施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借鉴。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韩国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包括解除对服务业的限制并开放外商对韩国服务业的投资，实行企业债务上限以防止财阀企业的贷款规模过大，取消财阀间以及财阀企业间的债务担保，解除对恶意收购的限制以及改变会计方法和公司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大多数股东的权益。这些政策调整的方向基本上都是朝着建立“盎格鲁—撒克逊”式经济结构的方向进行的，更加突出了对金融效率和短期利润的考量。²⁴¹这一系列改革导致大型企业削减了银行借贷在其融资组合中的比重，更加注重通过综合利用银行借贷、债券收益和股东权益这三种途径来融资，更加注重保护第三方的利益，尤其是小投资者的利益。

东北亚地区一些最受敬重的经济学家都预测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将削弱韩国继续提升技术水平和工业竞争力的能力，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旧只有1万美元。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夏准以及韩国财政经济部前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申璋燮（Jang-Sup Shin）曾经写道：“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尤其是禁止内部交易这一点，将导致财阀的企业集团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限制……再加上企业的负债权益比率遭到严格限制，大幅削减了企业融资渠道的数量……在我们看来，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需要做的不是努力过渡到理想化的、英美式的经济制度，而是制定继续追赶领先国家的制度，我们将其称之为‘第二阶段的追赶制度’。”²⁴²然而，危机消散10年之后，以三星、现代和LG为代表的韩国大企业似乎越来越繁荣了，在手机、汽车、电子和化工等行业的竞争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在危机之前，在1990年到1997年之间，韩国年平均投资额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37%，危机之后，这一比重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目前已经下降到25%左右。至于这一趋势是否妨碍了韩国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的技术进

步，目前还不明朗。与此同时，2010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高达20 600美元，是1997年的两倍。韩国股市也受益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管理体系，成为亚洲地区的佼佼者。韩国消费者终于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消费品价格较低，服务较好，而且有能力去国外度假了。²⁴³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韩国开展改革的时机是否恰当，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一方面，韩国经济在1997年之后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韩国政府继续沿用原先的工业政策，有效地利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来遏制外来竞争，并沿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劣势企业被迫出局，优势企业日益强大。²⁴⁴不过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韩国这次改革的时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肯定比菲律宾实行自由化与私有化改革的时机（20世纪80年代）好得多，比泰国和印尼改革的时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好得多，更比马来西亚改革的时机好得多。（马来西亚是在马哈蒂尔在2003年倒台后实行自由化与私有化改革的，虽然其改革方案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贯方案，但这是该国单方面启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韩国做的事可能是好事，但相比之下，在东南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改革导致各国政府在本国早期发展阶段就丧失了对工业政策的控制权，在世界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改革极有可能导致东南亚国家陷入落后的境地。

幼稚工业保护政策是无可替代的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家们经常说各国因为实行了错误的工业政策而丧失了重要历史发展机遇，而这些机遇再也找不回来了。他们认为这一地区的工业政策已经失败，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干预措施导致东南亚各国政府今后更加难以实行有效的工业政策，所以他们认为东南亚国家就不必再去努力实施幼稚工业保护政策，除了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之外，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有效政策，东南亚国家应该在其他方面进行探索。然而，正如有些人认为实行土地改革难度太大而采取替代措施一样，东南亚政客们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正如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其著作《多国经济表现之诠释》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²⁴⁵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如果要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增长过程中迅速提高技术水平，而不是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去实现技术进步，则工业政策的设计过程必须由国家来主导。

有些人认为，印度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或许可以替代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印度的确造就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大企业，比如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等，但自从印度在1991年启动改革日程的20年来，虽然人口总量达到了12亿，但只有300万人从事信息技术服务业，还不到劳动力总量的1%。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家、经理人和技术员虽然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之类的精英大学，并且管理着印孚瑟斯和塔塔之类的大企业，但他们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多。如果政府当初给这些人施加压力，逼迫他们去进军制造业，那么他们肯定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²⁴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忽略了工业政策，结果导致只有14%的劳动力受雇于制造业。而韩国以工业为基础的发展政策实施20年后，30%的劳动力受雇于工业。无论是班加罗尔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还是孟买的金融服务企业，都无法推动印度这个国家取得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那样的发展成就。在同样的时间内，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达到上述这些经济体的水平，有些专家把印度的经济发展比作上述经济体的发展，其实是很不明智的。²⁴⁷

如果政府真的想实现基础稳固的经济发展，就会继续吸引国内企业家进入制造业，并制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为此，政府必须对企业提供补贴和保护，但前提是必须一直实行竞争机制，而且要评判企业在竞争中的表现，最好的评价标准就是看企业的出口业绩如何，因为如同学校那种监考严格的评估与测试一样，企业不可能长期在出口业绩上造假。政府可以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来决定扶持哪些企业，或者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决定不扶持哪些企业。除了为政府决策提供关键信息以外，国际贸易还可以促使企业接触并利用新技术，教企业如何变得更具灵活性。

要扶持工业企业学习先进技术，需要政府进行长期性的、大规模的投资。这就意味着大企业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²⁴⁸事实上，我的观点是大公司比大国更重要，很多人口少的小国家，比如比利时和瑞典，都因为本国拥有一两个大企业而成为了富裕国家，但几乎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小企业成为富裕国家。反过来，国家产业政策中的国家资源承受的风险与被扶持企业的规模是相称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很多一流的企业家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而变成了垄断市场的寡头，东南亚、俄罗斯和拉丁美洲都出现了这类情况。即使是那些得到有效约束、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东北亚企业家，也在试图挣脱国家的约束。这些企业家拿到了政府的补贴来发展企业，一旦企业具备了全球竞争力，他们就会积极地为自由市场摇旗呐喊。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政府培育的大型企业都曾为积极游说政府放松

经济管制。借用李斯特的话说就是，他们很快就踢开了向上爬升的阶梯。

无论是在管制经济时代，还是在更自由市场的时代，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企业的约束，而是为企业运行设定了一个道德框架。事实上，随着政府的经济管制逐步放松，政府想要约束企业，将会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尤其是在金融部门。长期实行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之后，一个经济体面临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继续对企业实行约束，而在于选择在什么时机放弃原有的政策，过渡到那种注重小企业、消费者和被动投资者利益的政策。很显然，一些国家很可能会等待很久才逐步放弃原有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迈向较为开放的经济。亚洲的日本和欧洲的意大利就属于这类国家，他们就相当于宁愿待在自己卧室里也不愿意离开家乡、不愿意面对下一个人生阶段的成年人，对此，借用日本人常用的一个隐喻就是，不愿意跨越下一段河流。然而，如果把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比作新生的婴儿，那么这些长期实行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已经实现充分发展的国家就是“大婴儿”，他们不愿意离开原有环境并不算真正重要的问题。更加令人惊讶的一个问题是，世界上到处都是那些还处在发育期就被扔到大街上去找工作的孩子。这些国家没有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政府无法控制金融资源和国际资本流动，而人们却期待这些国家能实现工业化。结果，正是这些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了这类发展逻辑的错误性。

从发展阶段来看，只有少数一些国家可以算作“成人”，许多国家只能算是“儿童”。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美国算是年龄最大的“成人”了。它在东亚各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东北亚，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是一个理想化的负责任的成年人，不仅支持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还容忍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昔日的“儿童”已经长成“大人”了，美国就告诉它们不要继续过寄生虫般的生活了，提醒它们放弃原来的环境，过渡到新环境。而相比之下，美国在东南亚国家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推动土地改革，却在这些国家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数千美元的情况下敦促它们像富裕国家那样放松对工业与金融的管制，其实这种改革并不适用于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的东南亚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这些东南亚国家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迫使它们启动改革。这些东南亚国家在冷战期间都是美国的盟友，都曾经派遣本国士兵同美国士兵一道参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是，当这些国家遵循美国的建议启动改革之后，却面临着重重问题。而中国和越南这两个曾经和美国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并没有相信美国的发展建议，其经济情况反而要好得多。这就不禁引发了一个问题：做美国的朋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²⁴⁹

[13] 马哈蒂尔在总理府设立“执行与协调小组”，通过这个小组全面负责落实并监督本国工业政策。
——译者注

[14]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CEPT减税计划规定，凡是符合“东盟产品标准”的产品，均可适用CEPT优惠关税，所谓东盟产品标准，指该产品的自制率至少为40%，此40%的自制率可源自单一国或两个以上的东盟会员国并可累计。——译者注

第三部分

金融业：金融管制的意义

证明交换经济是连贯的和稳定的，并不能证明带有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经济也具有同样的性质……资本主义经济也许需要外部的控制和协调机制。事实上，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控制手段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市场中令人尴尬的不连贯性做出的反应。¹

——摘自海曼·明斯基所著《稳定不稳定的经济》

农业政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十分重要，是因为家庭农业模式可以迅速提高农业经济的产出。制造业政策也十分重要，因为幼稚工业保护政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向附加值更高的活动。除了这两类政策之外，金融政策也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引导一个国家有限的金融资源去扶持农业、制造业的发展。在20世纪之前，由于政府机构不具有完善的职能，而且也没有先进的信息科技做支撑，要把金融政策和农业、制造业政策统筹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实现空前快速的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它们把金融业的政策目标同农业、制造业的政策目标紧密协调了起来，以农业为基础，以制造业为支柱，同时动用金融资源扶持农业和制造业。但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重大风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无法对国内、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进行妥善监管。

在农业方面，东北亚地区的政府部门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实现农业总产出的最大化，而不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需要利用金融政策去扶持那些规模小、产出高的家庭农场，而不是扶持那些规模较大的资本主义农场。在工业方面，东北亚

地区的政府部门意识到必须先扶持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等充分学好技术之后再考虑赢利问题。换句话讲，东北亚的政府为了让企业带来较高的长远收益，通常会接受工业投资短期收益偏低的事实，愿意利用短期的经济损失去构建长远的发展图景。

除了上述这种旨在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的金融政策之外，另外一种金融政策则恰恰相反，即金融机构过于注重消费信贷。因为消费信贷往往会给金融机构带来较高的收益，所以这类信贷是富裕国家金融体系的重点。但如果一个新兴的国家采取了这种以消费信贷为重点的金融政策，就很容易催生出银行业赢利居高不下、工业技术仍旧落后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形。在东亚地区，银行利润最高的国家，比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无一不是十分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一个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并不适合推行自由主义改革，不适合放松金融监管，不能让银行自发地寻求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领域，最好还是对金融体系长期维持严格监管，使其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

“二战”结束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自然地遵循了这一逻辑，并根据这一逻辑采取了相应的政策。这些经济体都曾经失去过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权，引发了痛苦的结果。日本政府丧失金融体系控制权之后，本国的财阀开始通过设立或操纵银行来谋求私利，或通过收购供应原材料的上游企业和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的企业来压榨下游企业，从而阻碍了整个生产流程，影响了国家发展。韩国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对本国银行业实行了私营化改革，银行的控制权落到了财阀手中，结果是几乎各类制造业的发展都受到了阻碍。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内战失利，部分原因就在于金融体系的动荡和超级通胀给国家带来了重创。因此，后来上述这些东北亚经济体绝不再对金融体系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下定决心牢牢掌握住其控制权，使其服务于整体的发展政策。

相比之下，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则要求把资金投入具有长远发展潜力、能够推动国家经济腾飞的大型工业项目中。短期来看，这些项目的营利性可能比不上其他潜在的工业项目，也比不上消费信贷带来的赢利，所以要牢牢控制住银行，约束银行的贷款流向。政府还要对国际资本的流入与流出实行严格管制，以确保国内资本处于国家监管之下，而政府监管不到的外国资本的流入不会扰乱既定的发展规划。国民通过银行储蓄和投资获得的收益水平也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样银行体系才能支配更多的盈余资金，然后国家才有充裕的资金去落实发展政策，去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助。这就相当于对国民征收了一种隐性的税，而国民看到自己周围发生的经

济转变时，也会对此保持宽容态度。比如，韩国人对银行实际储蓄利率为负的情况一直保持着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看到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韩国的经济就超越了朝鲜经济，之后又超越了东南亚国家，最后甚至超越了中国台湾。

根据国家领导下的发展政策来塑造金融政策的理念与欧美国家在19世纪的发展历程也是一致的。19世纪70年代，德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设立了一批实力雄厚的投资银行，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葛先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描述这些投资银行时说道：“从经济影响角度而言，这些投资银行无异于经济发动机。”²然而，这些投资银行从事的业务受到了政府的严格限制，比如国家出台法律，要求这些投资银行把更多贷款向大型企业集团和出口企业倾斜。直到国家领导下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效之后，德国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银行。³与此相似的是，在美国，工业进步的前提是联邦政府实行的高关税政策、铁路补贴政策 and 鼓励大企业发展的政策。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int Morgan）等金融巨头在20世纪初开始参与了工业化进程，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创造了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显著的商业帝国。总而言之，必须把国家主导下的工业政策摆在第一位，把金融政策摆在第二位。

如果国家无法为金融业提供正确的引导，那么就会出现不同的发展结果。比如，19世纪的西班牙拥有大量投资银行，但这些投资银行没有为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采取任何措施。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西班牙的公司法倾向于支持铁路投资，而不是为制造企业提供融资。因此，西班牙银行为绵延数千公里的铁路线提供了融资，但铁路修成之后，西班牙却不得不从外国进口火车，而且由于制造业不发达，根本没有什么制成品可以拿来运输。19世纪70年代的那场银行业危机之后，西班牙的工业建设仍然丝毫没有起色。⁴19世纪的奥地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时，奥地利也拥有大量投资银行，但由于没有实行强有力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其银行在放贷时只考虑那些成熟的企业和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结果造成了制造业长期落后的局面。总之，纵观历史，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金融体系催生出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只有成功的新兴经济体的政府，才会引导金融体系为工业化进程提供有效的支持。

扩张性的金融政策

“二战”之后，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力量对发展政策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在所有国家，政府的规模与权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政府机构管辖的范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宽。从20世纪60年代，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管理系统成为现实，而这一系统又大大增强了金融部门的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固定汇率制度走向了崩溃（固定汇率制度取代了之前的金本位制度），催生了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而这一现象对贫穷国家而言可谓是有利也有弊。在19世纪后期，德国和美国最早意识到了节制消费、增加储蓄与投资的重要性，率先把储蓄与投资总额提高到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⁵1960年，美国政府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在其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预测道，很快就会有大批发展中经济体将其储蓄与投资总额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而且这类经济体的数量会空前的多。⁶最后，日本、泰国等东亚九大经济体果真在“二战”之后的储蓄与投资总额均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0%~50%之间。因此，单纯从金融实力来看，无论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还是东南亚国家，似乎都能以无可阻挡之势跻身全球富裕经济体之列，但一些经济体最后却被其他经济体远远地甩在了后面，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这些落后经济体的金融政策导向出现了问题。

在东南亚，大量资金遭到了浪费，根源主要有以下三个：土地改革低效、工业政策缺乏竞争机制和出口纪律以及消费支出与经济发展完全无关（比如奢华房产、进口消费品等）。更糟糕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那些力度不够、规划不善的农业政策与制造业政策的负面作用就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在这种状况下，各国政府受到了华盛顿共识的蛊惑，采取了错误的金融政策，因为当时这个刚刚出现的华盛顿共识呼吁各国实施利率市场化、市场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倡导各国政府放松对本国经济体系，尤其是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和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这种呼吁显然会让那些尚不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陷于不利地位。而且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政府都迫不及待地把华盛顿共识强加到发展中国家的头上。这些机构宣扬得最响亮、最理想化的一种观点是，解除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可以充分发挥资本流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落后国家谋求发展的努力步入正轨。这些机构鼓动发展中国家实行银行私有化改革，批准设立新银行，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并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依据是资本会自动寻找正确的投资领域，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但1997年却爆发了一场金融灾难，危害程度不亚于1982年重创拉美国家的那场金融危机。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并没有给东南亚国家带来更加合理的资本配置，却导

致一些大企业家逐渐控制了私营银行，让这些私营银行变成了自己企业的信贷来源。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没有对这些企业实行出口纪律，也没有逼迫它们去发展制造业，结果导致企业家们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愿将自身利益与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金融部门对农业、工业的扶持本来就薄弱，这样一来遭到了进一步削弱。最终，这些国家的投资越来越具有投机性和短期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房地产投资。东南亚国家鼠目寸光的银行体系只想着通过投机活动实现自身私利最大化，而不考虑国家的发展大计，这与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银行私有化改革之后出现的状况如出一辙。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几年前，韩裔金融学者禹贞恩就曾经援引拉美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引下实行的改革，给东南亚国家发出了警告，她写道：“拉丁美洲南锥体地区的私有化改革导致其企业集团陷入了肆行无忌的疯狂状态，它们收购银行，大搞企业并购，并且只给与自己有关系的企业提供贷款……这导致智利和阿根廷的大集团像土匪一样获得了赢利。”⁸虽然拉美国家的先例表明了提前解除金融管制的风险，而且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解除金融管制之后也出现了重重乱象，但东南亚国家仍然一意孤行，实施了非常相似的政策。这再一次印证了政治领导人由于对历史了解太少而太容易受到经济学家的蛊惑。

东南亚国家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解除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自从1959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秘书处一直向日本施压，迫使其实行货币自由兑换政策，但日本一直顶住压力，坚持实施严格限制资本流动的《外资法》（Foreign Capital Law），一直到1980年态度才开始松动。⁹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也拒绝了这些国际组织提出的解除资本流动管制的要求。而东南亚国家，则在发展进程中过早地实行了自由化改革。结果导致这些国家的短期外债迅速累积，以至于最后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围。而富裕国家的资本在利润机制的驱动下，为了谋求短期收益，也迅速地从利率低的地区流向了利率较高的东南亚地区。此外，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要么与美元挂钩，要么对美元升值，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短期投资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¹⁰在东北亚地区，韩国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于1994年解除了资本流动管制，随后，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韩国，但很多流向了工业领域，这一点比东南亚地区的情况好得多，因为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农业政策与制造业政策归于失败的问题，国际借款被用于房地产市场投机和股票市场投机等非生产性的活动，结果导致这些国家债台高筑。这与拉美国家在1982年那场危机爆发之前积累巨额债务的情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当时，拉美国家也是将国际借款投向了无法创造外汇的领域。

东南亚的灾难始于1997年7月。当时，泰铢遭到量子基金做空，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出现暴跌，迫使泰国放弃了长期以来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一时间，其他亚洲国家是否具备偿付国际债务的能力充满了变数，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恐慌。这场危机凸显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规则：一个国家在实现农业与工业的基本政策目标之前，必须使本国金融体系与发展战略保持高度一致。随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解除管制的必要性肯定也会不断增强，但如果过早解除管制，风险肯定会高于过迟解除管制，在当前这个金融流动具有高度全球化特征的世界里更是如此。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企业不可避免地想要挣脱国家的金融管制政策，这样一来，政府自然而然地就会面临解除管制的内部压力。解除管制要根据本国发展水平量力而为，操之过急绝非明智之举。不过，放松管制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很难恰到好处地确定改革时机。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实行自由化改革的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危机。但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功地顶住了来自“华盛顿共识”的压力，直到本经济体实现了重大发展成就才开始启动自由化进程。

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维持金融控制的关键手段往往都是实行资本管制政策，控制银行体系。之所以银行体系也包括在内，是因为各个银行必须对本国或本地区中央银行负责，接受中央银行的管理，政府控制起来比较容易，因此政府可以把银行体系作为提取应急基金和额外基金的来源，可以引导银行信贷更多地流向长期性的工业投资项目。而相比之下，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恐慌时期则很容易被做空，即便要实现一般程度上的良性运作，也需要建立更加复杂的监管机构和监管制度，需要具有高度的信息透明。

纵观东亚各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曾经试图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并试图通过私有制或公有制改革控制银行，这是一个共同点。但除此之外，再找不出其他的共同点。在东亚地区，有两个典型国家。一个是韩国，因为韩国曾经大借外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胀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频频发生，但这一切并没有损害韩国经济的发展。另一个是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没有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着本国外债，通胀率也比较低，结果也成了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因此，不同的政策也能带来相同的结果，这就说明，关键在于让金融扶持正确的目标。

日本在金融方面的摸索

19世纪，日本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探索导致政府丧失了对本国金融体系的控制权，财阀，即大型的企业集团，控制了银行体系。这种金融体系的“沦陷”，再加上19世纪70年代日本土地改革的很多成果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范围呈现出了空前的狭隘性，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大大弱化，进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激发了农民阶层和士族阶层的不满情绪，为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权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在明治时代，日本的农业改革和幼稚工业保护政策都是从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德国、美国）学习过来的。日本决策者面临的问题在于，当时那些发达国家在金融政策方面提供的经验可谓少之又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过金融政策促进大发展的情况（到20世纪这种案例就多了许多）。所以，日本在19世纪没有明确的先例可以效仿，必须自己去摸索。事实上，直到出现了大萧条和凯恩斯革命，经济学家们才开始认真探索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日本政府在探索金融政策的过程中充满了曲折，先后试验过好几种不同的政策路径。日本最早的银行业立法，也就是明治时期的银行业立法，是在效仿美国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这一时期银行业立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允许私营银行的设立，并且赋予私营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力，而且没有设立中央银行，这种政策引发的一个结果就是19世纪70年代通胀率居高不下，后来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又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通缩期。因此，日本设立了一个中央银行，让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日本很多早期的工业投资都是由政府利用政府储蓄和海外借款资助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私营银行不愿为工业领域提供贷款的问题。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日本政府先后设立了几个专门为工业领域提供贷款的银行，其中包括横滨正金银行（1870年设立）、日本劝业银行（1897年设立）和日本兴业银行（1902年设立）。

尽管如此，与同时代的美国一样，日本仍然有大量小型的私营银行处于营业状态，在20世纪伊始大约有2 000家。正因为如此，财阀有机可乘，这些财阀进军银行业，控制了大量私营银行，使其成为低息贷款的稳定来源，为自己的活动提供资助。被财阀控制的银行在贷款审批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比独立的银行少得多，而且当政府监管薄弱的时候，这些被财阀控制的银行会借给财阀一大笔贷款，这笔贷款的数额甚至比财阀新开或收购一家银行还多。在美国，小银行由于长期没有受到有效监管，终于在1907年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被称为“1907年大恐慌”。1927年，日本面临着一场更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和倒闭风潮。由于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小银行身上，日本政府就通过了一个新的《银行业法案》，逼迫银行之间进行合并。然而，

这同样无法阻止大财阀控制银行。到最后，日本最大的4个财阀逐渐控制了大多数信贷，在他们的控制下，银行信贷主要流向了财阀内部的企业，而非财阀所属的下游制造企业则很难获得贷款。20世纪30年代的军事独裁统治把财阀控制下的银行与一系列新的军事工业发展目标融合到了一起，让银行为军事工业服务，但在“二战”之前，银行从来都没有与制造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等到日本参加“二战”之时，在制造业技术上仍然与英美差一大截，明显处于弱势。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由于日本财阀曾经与日本军方进行过密切合作，为军方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多重支持，被视为“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全面整肃了财阀家族用来控制银行的控股公司，实施了财阀解体计划，从而终结了财阀对银行业的控制，国家掌握了对本国银行的绝对控制权，彻底改变了日本的金融结构。这一变革引发的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却是变革之后的日本金融体系反而更加适应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发展的需要。对于日本设立通产省并给予其很大权力的做法，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了默许的态度。通产省负责监管日本银行体系，同时在外汇配置上享有全面主导权。银行股权必须由多家不同的公司主体分散持有，而且一般的投资者或投资机构拥有的股权比重还不到1%。这样一来，通产省就独自垄断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权，没有任何个人或财阀会对通产省的这一控制权构成竞争。然而，政府允许银行最高持有企业10%的股权，¹¹这样银行就与自己持股的企业形成了密切的工作关系，银行因此可任命企业的管理人员，派遣辅助人员去董事会办公室承担临时性的工作，甚至当企业走向失败时，银行会直接接管企业的管理权。这就是“主银行制度”[\[15\]](#)，这一制度支撑了日本的工业化运动。

在改革后的银行体系中，国家对银行体系的管理是通过“再贴现机制”实现的。所谓再贴现机制，就是指商业银行将买入的未到期的贴现票据向中央银行办理的再次贴现。这种再贴现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但中央银行有权制定再贴现率，商业银行必须在接受再贴现率的前提下向央行办理再贴现业务。在“二战”之后的日本，商业银行是否能获得再贴现，取决于从这家商业银行获得融资的企业的出口业绩和所在经济部门。不过一开始日本再贴现的门槛比较低，商业银行一般都能在央行办理该项业务，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放贷的时候更加大胆，最后，这往往导致这些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超过了存款总额，出现了银行业用语中所说的“超额贷款”。因此，商业银行不得不继续依赖中央银行的融资支持，以维持自己的流动性。[\[16\]](#)

在这种再贴现机制下，日本银行（即日本的中央银行）的道义劝告（moral suasion）^[17]就会对商业银行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道义劝告，既包括对再贴现贷款用途的劝告，也有对商业银行优先贷款领域的劝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企业的总体融资需求中有40%~50%都是依靠银行体系解决的，而同一时期，这个比重在德国还不到30%，在英美两国还不到20%。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情况也恰恰折射了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日本处在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¹²银行变成了工业政策赖以落实的关键途径，由于国家还控制着外汇储备的使用权，而且行使这一权力的载体是银行，导致银行以及对银行行使管辖权的通产省具有了更大的权力。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金融机构一直处于国家严格管制之下。通产省的官员会制订各个经济部门的工业发展规划，依靠银行体系加以落实。随着日本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国际视野的形成，企业的管理者们肯定希望把企业的财务控制在自己手中，并且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寻求较为廉价的信贷，很少有企业喜欢处处接受政府机构和银行的指示。企业管理者们为了获得独立地位而进行了长期斗争。而由于幼稚工业保护政策是通过金融体系实施的，所以这个政策的落实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企业利用日本政府适度放松金融管制的机会，找到了其他融资渠道，其中包括在国内发行各种证券和在海外发行欧洲债券^[18]。¹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聪明灵活的上市公司的大部分或全部非内部资金都是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取的。随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复杂程度以及国际化层次逐渐提高，政府的金融管制政策必然要随着松懈。

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已经十分严重，其背后有很多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银行。由于商业银行无法像以前那样从企业客户身上获取巨额利润，而且日本禁止商业银行涉足私企债券与股票承购包销等投资银行类业务，结果很自然地就导致商业银行把大量贷款瞄准了房地产信贷和消费信贷领域。日本要合理优化投资与消费结构，需要对其经济模式进行重新调整。经济变革的进度原本在日本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日本启动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变革进度突然加快，以至于后来超出了日本政府的控制能力。“二战”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日本一直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直到1980年，日本才取消了资本控制。后来，到1985年，在美国施压下，日本终于屈服了，不得不推出一系列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最终导致日元进一步大幅升值，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不到3年就提高了1倍。金融管制的解除、外资大规模涌入以及迅速升高的汇率，必然会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导致这一转变过程更加糟糕的是，日本政府为了缓解日元升值对本国出口贸

易造成的负面影响，采取了一个非常宽松的、几乎可以说是鲁莽的低利率政策，结果引发了消费信贷的疯狂增长，这种情况在日本金融改革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5年时间里，日本城市地区的房价翻了两番，股价翻了一番。¹⁴一场全国性的投机盛宴吞噬了整个国家在过去30年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了新潟县一位写日记的农民——西山光一，他的大儿子就是在这个时期因为炒股而丧失了世代积累的家族财富。

在长达30年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时期内，日本的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采取了过多的干预措施，集中利用各种资源实现国家整体性的发展目标，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资产。然而，过多干预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了互相掣肘的恶性循环，这一时期的资产价格也长期遭到人为低估。因此，后来实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必然产生重大的财富放大效应，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资产价格注定会不断攀升。面对账面财富（paper wealth）如芝麻开花般地节节升高，日本人开始欣喜不已，开始飘飘然地认为本民族是与众不同的、高人一等的和更加优越的民族。为此，日本人甚至还用了“日本人论”（Nihonjinron）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优越感。日本人试图以此来解释日本资产价格一飞冲天的合理性。但实际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并没有像自己宣传的那样与众不同，而且日本人比较傲慢。这种狂妄自大、自视甚高的思想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敌，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日本也不例外。结果，从1989年冬季开始，日本的泡沫开始破灭，日本的股票指数，即日经指数暴跌3/4，房地产价格重挫，消费者购买力大打折扣，后来，商品和服务价格也持续下降，日本出现了典型的通货紧缩，从1989年以来，日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变化率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国内消费持续低迷。2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人回想起那场危机仍然心有余悸，他们终于意识到了“二战”后的发展成就实际上并不会因为自己民族所谓的特殊优势而一直延续下去。

朴正熙时期的金融政策

日本的黄金发展阶段大概从1950年持续到1980年。在此期间，日本实行的是严格管制金融机构的政策，但总体上来看，日本的金融管制仍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管制，没有采取极端管制措施。日本中央银行的再贴现政策维持了商业银行的流

动性，但仅凭这一点，是远远不足以引发高通胀的。此外，日本的海外借款一直维持在相对较小的规模，而且与其他工业国相比，日本虽然一直维持着低利率政策，但最起码是正利率。^[19]这与韩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朴正熙时期，金融管制政策极其严格，在当代很多人看来，甚至严格到了疯狂的地步。虽然很多人对韩国的金融政策提出了批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与东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相比，韩国的金融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都比较显著，韩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国家只要把资金用在了提高技术能力方面，再对本国企业实行出口纪律，逼迫它们发展出口贸易，把出口贸易额的高低作为评判企业业绩的标准，就能产生极大的经济回报。在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为了发展重化工业，几乎动用了举国的金融资源，投资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但最后这批投资也带来了不菲的回报。另一方面，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政府表明，在没有正确的农业、制造业政策的前提下，任何形式的金融松动都会给本国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韩国在快速发展阶段实行了以严格监管为基调的金融政策，这一基调是朴正熙定下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实行的银行国有化改革。早在1957年，美联储派往韩国的顾问要求韩国政府实行银行私有化改革。迫于美国压力，韩国的银行先后进行了改革，结果落入了一大批商人的控制范围，后来朴正熙为了再次实现银行的国有化，在1961年逮捕关押了大批商人，迫使他们接受银行国有化改革。¹⁵朴正熙认为，一个得到妥善管理的银行体系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个是必须接受政府的管制，另一个是必须满足发展重工业的融资需求。1962年5月，韩国政府对原有《韩国银行法》做了较大的修改，政府接管了中央银行的大部分权力，使政府直接干预和控制金融有了合法依据，这就为韩国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实际上，这一修订将韩国的中央银行变成了韩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从此之后，如同日本央行一样，韩国央行只能通过为其他银行办理再贴现贷款业务而行使日常的管理工作，而制定金融政策的大权基本上是由财政部掌握的。日、韩两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韩国政府为了引导金融机构将信贷投入到出口企业，金融政策更加激进、更加严格，韩国中央银行对于出口贷款的再贴现是没有限制的。换句话讲，如果一个银行的放贷对象是出口企业，则其从中央银行那里获得再贴现的额度是不受限制的（办理再贴现业务时，银行需出具出口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由外国客户开立的信用证）。除了鼓励出口企业之外，其他一些深受政府青睐的、经过政府批准的项目也能享受到无限的再贴现政策。

当然，通过增加银行的流动性，再贴现政策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通货膨

胀。但韩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日本在1949年之前的那种高通胀，也没有出现过中国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的那种超级通胀。所以，朴正熙政府倒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担心物价上涨，而是比较担心本国企业的发展水平。只要韩国企业遵守国家制订的发展方案，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卖到国外，朴正熙政府就要求银行为这些出口企业提供贷款。正是在这样宽松的融资环境下，韩国企业在20世纪60年代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40%，在20世纪70年代年均增长率超过了25%。在1960年，出口总额在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3.4%，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35%。在此期间，韩国每年的通胀率维持在15%到20%之间。¹⁶

那些深受朴正熙青睐的企业不仅能获得充裕的信贷，而且贷款利率非常低，实际上形同虚设。出口企业的贷款利率是最低的，一般是-10%到-20%，再加上出口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其产品价格来抵消国内通胀的影响，所以实际上他们非但没有支付任何利息，而且其借贷行为还得到了补贴。其他深受朴正熙政府青睐的非出口导向型的工业项目也能获得低息贷款。所有这些都必然意味着储户的储蓄利率是非常低或者几乎不存在的。然而，虽然储蓄利率极低，银行从来不会发愁资金不足的问题。极其节俭的朴正熙政府会把自己的资金存在银行里。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必须把自己的营运资金存在银行里，不然就无权获得低息贷款。一些家庭和小企业的存款也不得不放到银行体系，虽然储蓄条款对他们比较苛刻，但银行体系是唯一正式的储蓄类金融机构。还有一部分的私人储蓄进入了非法但得到政府容忍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以及自由贷款机构，即所谓的“场外交易市场”（kerb market）。

从1974年到1980年，当韩国发展重化工业的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银行体系平均的实际借贷利率为-6.7%，而在场外交易市场则平均为18.5%。银行体系的贷款主要是面向那些出口企业以及那些技术领先、规模较大的企业。到重化工业运动接近尾声之际，韩国银行体系共有221个不同类型的优惠贷款，这一点反映了政府机构的监管是卓有成效的。但韩国的借贷体系是一个双层体系，那些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可以选择到场外交易市场进行融资。¹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为韩国提供了大量援助的美国政府并不喜欢朴正熙的金融管制方式，它们的顾问竭力促使朴正熙采取较为正统的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段，他们取得了一些短暂的成功，因为韩国政府同意大幅提高实际利率。然而，正如韩国问题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艾丽斯·阿姆斯登所指出的那样：“总体来看，与韩国扩张主义这个基本文本相比，自由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注脚而已。”¹⁸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韩国工业化运动中最

重要的资金保障——韩国开发银行（KDB）大规模借入廉价的离岸资金，还增加了为财阀提供的担保，完全不考虑其行为对国际汇率带来的风险。¹⁹

到1969年，这种汇率风险终于爆发，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朴正熙将军忘记了他给美国顾问们的承诺（奖励储户和实行利率市场化政策），而是对场外交易市场实施了为期3年的利息延期偿付政策，实际上这就相当于牺牲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去救助工业。场外交易市场上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普通民众，财阀如果无法从银行获得借贷，则会求助于场外交易市场，朴正熙政府实行了利息延期偿付的政策之后，财阀就不必立即支付高额利息了，可以优先偿还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就防止了银行体系的崩溃，公众无法获得场外交易市场上的高额利息，而银行利率则再次下调。²⁰

这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韩国家庭储蓄率低于日本或中国台湾的现象。但韩国没有像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出现个人储蓄的崩溃。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家青睐的数学模型假定了储户对存款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实际上，当时韩国基本上没有为本国国民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所以储户需要把自己的钱存起来，防止未来出现不时之需，为了应对未来的潜在风险，他们只有无可奈何地选择储蓄。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可消费的领域不多，要把所有的积蓄用于消费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涉及使用外汇的情况。进口消费品要么遭到禁止，要么因高关税而变得极其昂贵，严格的资本管制又意味着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度假仍然是非法的。所有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消费领域。²¹

韩国政府、家庭和企业一直维持着一定数量的储蓄，并将这些储蓄转化为投资资本，如果出现短缺，则通过国际借贷来弥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国外贸出现持续性的顺差之前，投资资本不足的问题一直比较严重。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韩国的外债积累速度堪称世界最快，就连当时债台高筑的拉美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到1985年，韩国的国际债务负担仅次于巴西，发展中国家中位居第二，但韩国的人口却比巴西少得多。韩国的海外贷款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53%。²²不过，韩国非常注重发展出口贸易，虽然韩国的债务性支出（包含本金与利息）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但其外债性支出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重却从1970年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1970年，这一比重为28%，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则降低到了20%。而帮助韩国摆脱金融困局的正是出口纪律。

韩国全力发展工业的策略

大概从1965年到80年代初，是韩国工业投资最密集的时期，也是工业高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韩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业发展模式，即便韩国遭遇了外部经济危机或国内金融危机的冲击，韩国政府总是会不遗余力地采取一切必要的金融措施，保障经济发展势头。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除了对场外交易市场实行了为期3年的利息延期支付政策之外，朴正熙政府还强迫国有银行为财阀提供以股份换贷款的业务，并且放弃于1965年开始实施的高利率政策。每一次遭遇危机，韩国都是用廉价贷款加以应对。1973年末到1975年爆发了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了严重衰退。为了应对这一情况，韩国政府大量增加国内信贷的投放量，而且外国债务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31%上升到40%。1979年第二次国际石油危机爆发，再加上1980年美国的利率政策，催生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韩国政府再次大借外债，虽然外债在韩国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这场危机之前已经下降到了30%，但很快又飙升到了50%。²³

韩国增长过程中经历了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始于1982年，打垮了同样债台高筑的拉美国家与菲律宾。为了应对这场危机，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然大借外债。在这场经济衰退中，东南亚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之策，马哈蒂尔政府开始放弃了其原先实行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为了获取外汇并偿还外债，开始依赖外国人投资的出口加工业。而韩国却坚定不移地继续走原先的工业化道路，很明显，这种坚持在金融政策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韩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维持着原有的工业投资力度，不惜借助临时性的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²⁴在工业化过程中，那些表现不佳的财阀企业纷纷被淘汰出局或者被合并了。

只要国家把金融体系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韩国这种金融管制手段就是成功的。但随着韩国企业并购愈演愈烈，企业集中程度远远超过了日本和中国台湾，财阀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大型企业集团，这就意味着这些规模庞大的借贷者再也不会畏惧放贷者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韩国重化工业运动接近尾声之际，财阀的实力大为增长。1983年，三个最大的企业集团——现代集团、三星集团和大宇集团均占据了韩国10%的信贷。韩国财阀的两个典型特征就是规模十分庞大，杠杆率非常高。在韩国最大的50家企业中，平均来讲，负债是其股权的5倍。因此，这些企业一旦倒下，必将拖垮整个银行体系，并对整个

经济体产生重大冲击，由此一来，国家控制下的银行体系相当于遭到了这些财阀的绑架，再也无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它们，只能任由财阀摆布，财阀要什么，银行就不得不给什么。20世纪80年代，财阀不屑于同那些规模较小的对手展开竞争，而是直接将其收购。²⁵他们还逐渐开始利用低息银行贷款大肆从事房地产投机。有些财阀自己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之后以高息贷给场外交易市场。他们利用在国内市场上的寡头地位挤垮那些拒不接受收购的小竞争者，然后变本加厉地压榨消费者。财阀原本是一种引领技术进步的力量，却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肆意妄为的“经济恶霸”，它们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远不如以前那么显著。

就在这时，韩国出现了一种颇具诱惑力的新主张：解除国家对金融领域的管制，限制财阀势力。这种主张的倡导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以及一群曾经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韩国经济学家。在全斗焕总统主政的20世纪80年代，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由于在之前30年韩国的负利率政策牺牲了普通储户的利益，让这些储户为大企业提供补贴，所以，这种新理念一出现，便很快赢得了韩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将银行体系的实际储蓄利率和实际借贷利率都提高到了正利率的水平，并且对银行体系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规定每位银行股东最多只能持有8%的银行股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银行体系摆脱财阀的影响。然而，在私有化改革之后，韩国中央政府仍然设定银行的信贷限额和利率上限，而且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政府的安排。²⁶

除了银行私营化改革之外，经济学家们预测的其他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发生。韩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也没有对财阀形成什么真正有效的约束，因为当财阀的企业上市之后，董事会和高管层往往都被财阀家族控制着。20世纪80年代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非但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股东纪律，反而为财阀提供了一个额外的资金来源，因此进一步削弱了银行对大型企业的行为产生的影响力。韩国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也进行了大量自由化改革。所谓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一般指那些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牌照（full banking license）的小型储蓄机构。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为了限制场外交易市场，就批准了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设立。由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的储蓄利率高于银行的储蓄利率，所以其吸收的存款呈现出了不断增多的趋势，1976年，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吸收的储蓄额在韩国储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5%，但到了1989年，这一比重却增加到了63%，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财阀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关系与财阀和银行的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很多非银行类金融

机构直接被财阀控制着，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众多财阀的领导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早期都不遗余力地游说韩国政府解除金融管制。这不足为奇。²⁷

在1993年之前，韩国的金融形势一直处于政府控制之下。但到了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主张市场自由化改革的韩国经济学家终于说服了金泳三政府，促使其解除了对资本流动和短期海外借款的管制。因此，在1994年到1997年之间，韩国积累了大量的短期外债。但有一个事实恐怕与人们的普遍想法正好相反，即总体而言，韩国外债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最高时期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韩国的外债水平不是特别高，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最高时期的50%，²⁸但1997年恐慌情绪从东南亚蔓延到韩国时，背负着短期贷款的人必须立即偿付，而不能延期偿付，给韩国市场的资金流动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韩国陷入一场大危机。

虽然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但韩国用于房地产投机等非生产性活动的信贷在信贷总额中的比例相对较小，所以该国才能够在1999年开始强劲复苏。如同以往应对危机的方式一样，韩国政府在这场危机袭来时也策划、主导了企业的兼并，淘汰了那些业绩不佳的公司。正是在这次大洗牌中，郑周永的现代集团收购并控制了起亚汽车集团，此后在韩国汽车行业获得了无懈可击的主导地位。²⁹但这场危机与之前历次危机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在这场危机中，韩国政府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有关变革金融结构的建议。经过改革，韩国金融体系堪称是东北亚各国最“正统”的，包含独立的中央银行、完全独立的商业银行、外资控制的大型银行，而且独立投资者在股票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收益大大增加。韩国政府解除金融管制之后，除了在21世纪初消费者债务规模过大给韩国金融部门带来了短期性的危机之外，还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危机。因此，韩国向盎格鲁-撒克逊式金融体系过渡的时机是否正确，仍然有待观察。

台湾金融政策与日、韩金融政策的差异

数十年来，日本、韩国的金融政策呈现出了一些共同特征，比如政府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政策，银行体系要接受政府的管理，而且企业在获得信贷时，政府对其实行出口纪律，迫使借贷者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承担一定的信贷风险。但中国台湾却

采取了最保守的金融管理措施。与韩国相比，台湾地区的利率和储蓄率³⁰都比较高（因此台湾内部拥有更多的投资资本，需要的外国借款比较少），通胀率较低，不良贷款少得多，也没有反复出现过银行业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没有给台湾造成重创，但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人均生产总值方面的领先地位，2010年，台湾人均生产总值比韩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低出2 000美元。³¹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金融政策只是一个大框架，能否促进发展，关键要看金融扶持的对象是什么。台湾在农业方面做得不错，农户可以从农村贷款机构获得有力的信贷支持。但在制造业方面，台湾当局则比较失败，既没有逼迫大企业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也没有像战后的韩国和日本那样有效地扶持小企业发展壮大。相反，这个岛屿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主要依赖规模较小的公司，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回想起19世纪中期的德国或“二战”前的日本。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不注重发展出口贸易，而是过于注重台湾市场，为台湾企业提供原料和中间产品，这样一来它们就能够挤压下游企业，结果限制了下游企业的技术升级能力和资本积累能力。³²因此，一般来讲，台湾制造商仍然只能充当大型跨国公司的供应商。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党当局实行的经济政策决定的，国民党当局坚决要对最大规模的企业实行公有制。概括地说，台湾的问题在于它采用的金融政策催生了次优的制造业政策。

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前就对台湾地区的主要银行实行了公有制改革。在军事管制之下，国民党当局规定违反资本管制的行为就是扰乱资本市场罪，将会受到惩罚，严重的甚至会被判死刑，但它从来没有利用自己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权去实施一个以大企业为支柱的制造业政策，银行信贷范围十分狭窄，而且主要是短期信贷。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韩裔金融学者禹贞恩搜集的1983年的数据表明，在韩国，400家企业（来自137个财阀）占据了70%的银行信贷，而在台湾，333家企业只占据了30%的银行信贷。³³在台湾，即便具有战略意义的私营企业的项目也很难获得较长期的贷款。台湾当局没有像日本通产省和韩国经济企划院那样通过高度差异化的优惠信贷来实现某些特定的制造业发展目标。台湾地区也没有像“二战”后的日本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的韩国那样实行“主银行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主导性的金融机构密切监视并大力支持工业企业的发展。³⁴对于私营企业而言，银行最多能帮它们解决运营资本短缺的问题，因此这些企业如果想攀登技术的阶梯，不得不利用经常性账户盈余，或者到场外交易市场上以支付高利率为代价获得融资。（尽管台湾银行体系的实际利率比较高，但场外交易市场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³⁵对于

企业而言，这种金融形势是极其艰难的。

台湾当局之所以没有实行更加有效的工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它长期积极地人为压低台湾货币的汇率。新台币采取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台湾当局在1958年实行了汇率改革，之后，从1961年到1985年，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一直稳定在40：1左右。在此期间，虽然台湾的通胀率一直低位徘徊，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保持着外贸盈余（台湾实现外贸盈余的时间比韩国还早），生产力水平也提高了好多倍。一般情况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肯定会推动货币升值。但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台湾银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到1987年，台湾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6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6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而台湾经济体的规模却只有日本经济体规模的1/10。³⁶台湾当局人为压低新台币汇率的政策与中国大陆当前的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新台币汇率长期偏低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台湾这个经济体比日本、韩国更加依赖由跨国企业经营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加工业。20世纪80年代，出口加工业在台湾制造业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约为25%。此外，台湾经济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私营企业低附加值的出口贸易。新台币的汇率长期偏低可能是台湾当局没有纠正工业政策的体现。然而，虽然新台币汇率长期偏低，但它仍然无力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出口商品的质量与附加值超过了台湾。在接下来的10年间，韩国的国民总收入也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台湾。³⁷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台湾屈服于巨大的国际压力，放弃了操纵货币汇率的惯常做法，并开始放开其金融体系。结果，如同韩国的情况一样，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台湾当局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银行的控制权，因此，其通过银行实施产业政策的能力遭到了严重削弱。1991年，台湾原本有20家银行，但这一年之内台湾当局新批准了15家私营银行。私营银行的所有者不响应当局的信贷政策指导，台湾的“中央银行”也没有试图通过再贴现政策之类的手段去影响私营银行，而且与地区政府有关联的银行占据的市场份额自从1980年达到最高值（约95%）之后，呈现出了稳步下降的趋势。之前由于国民党当局严格控制着企业的上市流程，所以遏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但实行自由化改革之后，台湾当局放松了对企业上市流程的控制，台湾股票市场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这样一来就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企业可以在股市上融资，而不必承受地区政府的约束。这与地区政府放松对离岸借款的管制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在台湾企业总负债中，其银行信贷所占的比重呈现出了总体下降的趋势，这一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超过了

30%，而到了21世纪初，则下降到了20%以下。与此同时，新台币的汇率也逐渐攀升，消费信贷呈现出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态势。台湾的资产泡沫越来越严重，但在规模和危害上仍然赶不上日本的资产泡沫。³⁸台湾地区与日本、韩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台湾放松金融管制之际，其内部主要企业还没有实现较高水平的技术进步，也没有摆脱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

东南亚国家的失误

虽然台湾的金融政策表现不佳，没有为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台湾仍然没有偏离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主题，台湾经济仍然算得上成功的范例。从根本上说，台湾对银行体系和资本流动的管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截止到那个时候，台湾经济体的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台湾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过渡到一个更加开放的金融体系，这个时机算不上最佳选择，但也不算特别糟糕，不至于带来一场灾难。如果你想对金融灾难进行案例研究，那么台湾算不上这类案例，你需要去东南亚。

在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在金融体系管理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审慎原则，这一点与东北亚的情况是相似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金融政策是相对比较审慎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金融政策则是比较宽松的，这两个国家都像韩国那样实行了大借外债的金融政策，都积累了大规模外债。菲律宾效仿韩国制定了较低的储蓄利率，实际储蓄利率通常是负利率，以至于降低了菲律宾的储蓄率，储蓄规模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5%左右，这一点也类似于韩国。³⁹然而，总体来看，在东南亚国家中，其金融体系无论是审慎型的，还是宽松型的，都没有为本国工业化提供有效的支持。

一个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能否为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关键因素并不是谁控制着这个体系，也不是这个体系的具体运作方式是什么，而是它作用于哪一种企业环境，简单来讲，它所扶持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那些大企业虽然获得了银行体系的资助，但政府都没有对其实行出口纪律，没有逼迫它们发展制造业。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两种结局：第一，这些国家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几乎没有什么进步；第二，出口纪律的缺失意味着东南亚各国政府无法像东北亚各国和地区那样根据出口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去调整贷款流向，并提高贷款质量。虽然

有些国家的政府，比如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府，曾经满怀热情地启动了工业化运动，但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运动相比，东南亚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效率比较低，而银行体系的坏账却比较多。⁴⁰

有些东南亚国家虽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以至于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贷款，但由于其实行了比较审慎的金融政策，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那段时间内，它们原本是有可能挺过来的，就像一些东北亚经济体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最后还是挺了过来。不幸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都被国际组织说服，开始采取金融自由化改革，放松了政府对金融的控制。这种改革就意味着国家越来越多地把金融体系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私营企业家，而私营企业家的自身利益与国家发展的要求并不一致，因为它们没有受到出口纪律的压力，不愿意发展出口贸易，只愿意利用自身在国内市场上的寡头地位谋求暴利，这样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发展。这些私营企业家不仅控制了本国的银行体系，而且得益于金融自由化改革，他们还能越来越多地到海外去融资。这一系列变革就为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埋下了伏笔，这些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

在东南亚各国中，菲律宾的发展历程最极端，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就遭遇了一场金融灾难，可以说是东南亚的弃儿。当时，拉美国家也有着同样的遭遇。对于这两方面而言，一个共同的诱发因素就是美国的汇率政策。美国政府为了解决本国的高通胀问题，在1980年通过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

（Depository Institution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正式拉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贷款利率管制基本取消，存款利率管制也逐步取消，结果美国贷款利率当年一度飙升至15.27%，实际利率则为5.63%，达到了“二战”结束以后的最高水平。⁴¹由于菲律宾的国际债务都是以美元计算的，所以美元的大幅升值给菲律宾经济带来了不可承受之重。随着美元逐渐升值，菲律宾比索对美元的汇率逐渐下滑，菲律宾偿还债务的代价也随之攀升，而菲律宾虽然大借外债，但并没有好好利用，本国的技术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工业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出口创汇能力也没有实现大幅增长。从1965年到1986年，也就是在马科斯政府统治时期内，菲律宾出口总额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20%提高到了26%，也就是说，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只提高了6%，但其外债规模却增长了10倍。⁴²此外，由于该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本国银行体系实行了私营化改革，所以，本国

的寡头控制了银行，结果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及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菲律宾大批银行破产倒闭。菲律宾是东南亚金融政策的先行者，率先踏上了通向死胡同的道路。

韩国的别样风景

菲律宾的灾难之所以不可避免，根源并不在于其国际债务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遭遇金融危机之前，其外债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还没有韩国高。⁴³如果马科斯采取了朴正熙的做法，用出口纪律去约束本国企业，并指挥本国的银行体系来推动工业政策的落实，那么菲律宾就没有任何理由不会取得韩国那样的发展成就。相反，菲律宾的国内生产总值本来是韩国的2倍，结果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反而变成了菲律宾的11倍。⁴⁴菲律宾不仅没有集中力量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还轻率鲁莽地对待金融工具，世界上最糟糕的政策组合莫过于此。菲律宾的企业家们不必去满足任何形式的出口指标，而是肆无忌惮地操纵银行体系来谋求私利。在我们研究的这些案例中，菲律宾最类似于盗贼统治的国家。

早在1946年获得独立之前，菲律宾就形成了精英阶层掠夺金融体系的传统。1916年，菲律宾还是美国的一个殖民地时，华盛顿政府将金融权和大部分立法权下放给了菲律宾，并批准菲律宾设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国有投资银行，即菲律宾国家银行（Philippine National Bank）。该银行设立的初衷就是借鉴美国曾经实施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为菲律宾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美国派往菲律宾的总督弗朗西斯·伯顿·哈里森（Francis Burton Harrison）曾经承诺说这个银行将“有能力支持政府为发展做出的所有努力”。⁴⁵这家银行被指定为菲律宾政府所有资金的合法储蓄银行，结果在短短两年之内，这家银行的资产就占据了该国金融体系总资产的2/3。

但问题是，菲律宾国家银行会把贷款给哪些人或给哪些企业呢？当时，菲律宾虽然名义上同美国订立了自由贸易协定，但实际上这一协定的真实目的在于限制菲律宾的发展，让菲律宾集中精力发展农业。⁴⁶菲律宾的农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上无须缴纳关税，而非美国殖民地的竞争对手如果要向美国市场出口农产品，则要缴纳高额关税。菲律宾的食糖、椰子等农产品的出口额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早在

20世纪30年代就达到了80%，但菲律宾当时并没有实行出口纪律，因为美国没有对菲律宾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实行差别关税政策，而是零关税政策，因此农业生产领域就不存在竞争。（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削减零关税配额时，菲律宾农业部门的竞争力已经丧失殆尽了。）但企业家们并不在意，他们只是建立自己的庄园和种植园，集中精力从事农业发展活动，强烈反对政治家们为了发展出口贸易而采取的措施。在这些情况下，从菲律宾国家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几乎没有面临任何真正的出口纪律，因此，菲律宾政府就无法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去判断企业经营状况，无法根据出口业绩去调整信贷流向。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国家级的投资银行注定会招致灾难。金融权下放5年之后，也就是到了1921年，菲律宾国家银行由于把大量资金贷给了本国的寡头而这些寡头无力偿付，结果遭遇了第一次破产。

就这样，菲律宾开始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浪费银行信贷、掠夺银行体系的局面。自此之后，菲律宾再也没有摆脱这种局面。菲律宾独立3年之后，菲律宾政府把美国殖民政权离开时留下来的6.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挥霍一空，结果陷入了濒于破产的状态。⁴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菲律宾成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试验田，这两个机构把大量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和提高生产效率计划强加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付诸实践。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受这些机构的影响最大。这些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为菲律宾政府开出了对银行体系实行私有化改革的处方。（1957年，美国派往韩国的顾问也为李承晚政府开出了同样的处方。）但在缺乏出口纪律的情况下，银行变成了企业家们的个人提款机，任何意外事件带来的成本都由央行和国家去承担。马科斯在1965年当选为总统的时候，菲律宾有33家私营银行，而且几乎每一个主要的企业家族都控制着至少一个银行。1964年，由私营企业家控制的菲律宾共和银行（Republic Bank）破产，被菲律宾国家银行接管，拉开了银行倒闭的序幕。此后，菲律宾多家银行倒闭。⁴⁸

马科斯掌权之际就承诺开展彻底的变革。他是一位民选总统，但在1972年变成了一个独裁者，他做出的政治承诺与朴正熙做出的承诺一样。朴正熙在1963年也成为民选总统，后来也是在1972年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只不过比马科斯晚了几个星期而已。⁴⁹马科斯发誓要开展土地改革，推动工业发展，并压制所谓的“老寡头”。朴正熙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只不过他把“老寡头”称作“自由贵族”。两个人都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即那些为国家发展极少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们。不过与朴正熙不同的是，马科斯没有对本国企业施加出口要求，没有收回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权。在马科斯任期内，菲律宾金融部门的缺陷达到了历史之最，因为企业家们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通过自己的私营银行谋求私利。

这些企业家们的一个主要诡计就是滥用信贷优惠政策。如同在韩国一样，菲律宾央行也对本国商业银行提供了再贴现政策，但从来没有特别强调企业的出口业绩，也没有刻意强调商业银行要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战略提供融资。⁵⁰两位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过菲律宾中央银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有资格获得再贴现……央行成了‘第一大贷款人’”。⁵¹他们指出，烟草贸易、椰子加工和股票交易等活动的贷款都能获得菲律宾央行的再贴现。（菲律宾的股票市场是遵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建立起来的，这份报告呼吁菲律宾扩大资本市场。）⁵²

在马科斯最后几年的任期内，他主要亲信的资产中，有1/4到一半都是来自私营银行的贷款，而这些私营银行的资金则来自央行的再贴现。比如，从1979年到1984年，菲律宾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而罗伯托·贝内迪克托的一半财产都是他控制的一个银行利用央行的再贴现资金资助的（贝内迪克托就是我曾经拜访过的埃斯佩兰萨庄园的主人）。贝内迪克托几乎不从事任何制造业，只出口农业产品，除了食糖以外，他的主要业务在于媒体和电信。丹丁·许寰哥控制的菲律宾联合椰农银行（United Coconut Planters Bank）也有资格从央行获得再贴现，国家对椰子生产活动强制征收的税金也都存在这个银行，而且这个银行无须为此支付任何利息。（丹丁·许寰哥是一个斗鸡爱好者，是马科斯的超级心腹，至今在内格罗斯省的发展势头仍然十分强劲。）国家的税金存在了这个银行，无异于政府对该银行提供了巨额补贴，正是利用这部分资金，该银行在菲律宾银行体系中的排名从1976年的第19位跃升到了1983年的第4位。如果不考虑他生产了啤酒和朗姆酒，那么他对工业化运动几乎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马科斯本人则利用央行担保的外国贷款购置曼哈顿的房产。⁵³

对于菲律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金融崩溃的根源，菲律宾人将其归结为银行把太多资金贷给了银行所有者、官员、股东和其他利益攸关者。金融体系是被巨额的关联方借款拖垮的。然而，关联方借款只是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而不是最终原因。韩国的关联方借款也很多，银行业把大部分资金贷给了它们的所有者（即国家）以及深受政府青睐的盟友，比如郑周永之类的企业家，但这并没有导致金融崩溃。因此，菲律宾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最终原因不是关联方借款，而是没有对本国企业实行出口纪律，致使政府无法根据企业的出口信息来调整信贷流

向，无法通过信贷优惠措施去激励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并提高工业技术。由于菲律宾没有实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政策，本国企业就没有前进的动力，而是一味地利用银行贷款谋求自身利益，以至于最终堕落到掠夺金融体系的境地。正如一位曾经深入研究过菲律宾金融体系的人所说的那样：“与韩国、中国台湾的企业家不同的是，菲律宾企业家可以轻易地从银行获得贷款，而无须承担什么责任。”⁵⁴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之际，菲律宾央行仍然一如既往地为本国银行实施再贴现政策，因为这是防止本国金融体系崩溃的唯一途径，但这样一来就导致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越来越大。由于美国利率不断攀升，最终达到了19%的峰值，而且菲律宾的经济产出不断萎缩，菲律宾再也无法偿还外债利息了。1983年10月，马科斯政府采取了暂停偿还外债的措施。由于菲律宾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解除了大多数的资本管制措施，所以，马科斯政府暂停偿还外债之后，加剧了资本外逃速度。在这种形势下，开动印钞机印刷更多的美元成了唯一的选择。如同韩国一样，菲律宾由于长期实施再贴现政策，推高了本国的通胀率，菲律宾人也习惯了通胀率居高不下的状况，但菲律宾的物价上涨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突然大幅加快，1984年，菲律宾的通胀率攀升至50%的水平。菲律宾比索不断贬值，1980年，美元兑菲律宾比索的汇率为1:7.5，到1986年却变成了1:20。最后，就在1986年这一年的时间里，菲律宾就有4家银行因坏账过多而不得不开关。 (在此之前的1981年，菲律宾就曾经发生过银行挤兑风潮，当时菲律宾政府将部分银行收归国有，并关停了几家大型投资公司。) ⁵⁵1986年2月，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已经到了最糟糕的时候，国民经济规模收缩了约1/4，马科斯本人在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浪潮中，乘坐美国人的飞机逃离了菲律宾。⁵⁶

这场金融危机意味着菲律宾必须摆脱原先那种极端不正常的金融模式。1985年，菲律宾中央银行开始进行政策调整，取消了原先那种严重低于市场利率的再贴现利率，因为这种利率无异于为企业家掠夺银行体系、掠夺整个国家创造了便利条件。菲律宾国家银行和菲律宾开发银行这两个大型国有银行在之前很多年间为马科斯的心腹提供了大量贷款，而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无法收回，最后导致其资产规模分别缩水了67%和86%。1993年，菲律宾政府把中央银行120亿美元的债务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到了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上。最后这些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增发国债解决的。政府故意发行大面额债券，这样普通公民就无力购买，只有继续把自己的资金存在银行体系里，而实际储蓄利率往往是负利率，这样就相当于银行从

公众手里免费借到了一大笔资金，然后把这笔钱投资到高收益国债中，正是通过这种途径，银行才算逐渐恢复了元气。⁵⁷这与朴正熙在1972年实行的暂停支付利息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菲律宾的银行体系并没有为国家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今天，在菲律宾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私营银行和外资银行（这些银行基本上是后来设立的）。菲律宾政府对待这些银行的监管仍然十分松弛，菲律宾中央银行也不对这些银行提供再贴现服务，但这些银行的赢利却很可观。当然，这些银行仍然没有为国家的产业升级做出什么贡献。

如果菲律宾政府既不实行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也不对本国企业实行出口纪律，那就应该避免采取扩张性金融政策。实际上，菲律宾政府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扩张性金融政策，也没有将资金用于促进国家发展。菲律宾遭遇的一切后果都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警告过韩国的，因为当时朴正熙总统大肆实行扩张性金融政策。虽然菲律宾和韩国都曾经实行了扩张性金融政策，但到最后这些经济学家们预言的金融灾难没有在韩国发生，却在菲律宾成为了现实。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韩国政府利用银行信贷去确保本国技术的进步，而菲律宾疯狂的金融政策却没有支撑起推动本国制造技术进步的重担。1978年底，也就是马科斯政府开始走向灭亡之际，菲律宾报纸上刊登出来的一张照片似乎预示着未来。在这张照片上，马科斯、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时任菲律宾财政部长维拉塔（Virata）以及时任菲律宾央行行长利卡罗斯（Licaros）一起站在奎松市的国家铸币厂里，周围点着蜡烛，一位牧师正在做祷告，但在印钞机的上面有一句标语，意思是说“请拿开您的双手”，虽然这句标语处在显要位置，但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句标语。最终，马科斯政府还是走上了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资产的不归路。

那些虽然实行了审慎的金融政策仍然失败的国家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菲律宾得到的教训是要成功地实现发展，仅仅把钱花出去是不行的，中国台湾得到的教训是要促进经济发展，集中精力推动技术升级比采取审慎的金融政策更加重要。对于台湾的教训，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体会可能更加深刻。

在东南亚各国中，马来西亚的金融政策可以说是最审慎的，其部分原因是马来

西亚在历史上曾经同新加坡存在密切联系，而新加坡是一个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往往会采取保守的货币制度和银行体制，因为这些特征是它们吸引资金的必要条件。马来西亚一直有这种保守的传统，而且直到1967年才发行当前流通的货币。在1973年之前，马来西亚一直维持着与新加坡元挂钩的汇率政策，马来西亚的中央银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一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独立，其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控制，但央行实行的货币管理政策一直都是比较传统的、保守的，不像韩国、菲律宾那么具有激进性和扩张性，而且一直对本国银行体系保持着密切监管。从1962年到1980年，马来西亚的央行只有一位行长，即敦依斯迈·穆罕默德·阿里（Tun Ismail Mohamed Ali）。

如同中国台湾的情况一样，马来西亚政府一直把金融体系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对于有效落实发展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除了控制着两家国有银行之外，马来西亚政府还运作着一个强制性质的中央养老基金以及其他几个自愿性质的储蓄基金，政府可以动用这些基金去实现发展目标。有一项研究指出，在1980年，也就是马哈蒂尔上台的前一年，在马来西亚的金融体系的全部资产中（不仅仅包括银行的资产），政府控制的份额居然高达64%。⁵⁸然而，马哈蒂尔以及马来西亚其他领导人没有利用这些资金去扶持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运动。

马来西亚的央行原本非常有能力通过优惠信贷政策实行出口纪律，但由于马来西亚政府没有给央行提供充分的政治引导，导致央行只是为商业银行的出口类贷款提供了象征性的再贴现。根据历届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强迫它管辖的银行必须满足对马来西亚土著借款人的最低贷款标准，以推动机会均等行动计划的落实。⁵⁹在资助大型工业项目的问题上，马哈蒂尔总是绕开央行，不动用央行的资金，而是动用本国财政部出面担保的外国借款，或者利用两个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或者动用政府运作的储蓄基金，或者动用国有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资金。但所有这些机构都无权对企业提出出口业绩方面的要求，以至于多年之后这些机构不得不注销数十亿美元的坏账，20世纪60年代设立的国有投资银行——马来西亚土著商业银行（Bumiputera Commerce Bank）就曾经多次要求政府救助。

马哈蒂尔本人的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既包括东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体现出来的那种缜密规划、严格管制的思想，也包括东南亚国家体现出来的那种放松管制、私营化的思想。马哈蒂尔这种混合型的思想贯穿其金融政策和工业政策的始终。他一方面对一些较老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革，另一方面新启动一

些国家控制下的工业项目，一方面动用国家资金去资助新的工业项目，另一方面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尤其是放松对银行体系的管制以及扩大本国股市的改革，这样一来就削弱了政府在长期内影响国家发展的能力。

在早期统治阶段，马哈蒂尔政府一边支持柏华惹钢铁厂和宝腾汽车厂等工业项目，一边听从国际组织和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实行了利率自由化改革。反观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关键发展时期，一直对银行信贷利率设定上限，因为如果把利率控制权下放给银行，银行就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去实行利率政策，就会把更多信贷投放到消费信贷领域，而不是工业信贷领域。马哈蒂尔政府时期的马来西亚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政府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对银行而言，最简单、最有吸引力、贷款利率最高的领域就是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在马来西亚全国的信贷总额中，房地产部门的贷款所占比重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态势，该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刚超过1/5，到20世纪80年代则超过了1/3。⁶⁰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马来西亚本应该集中精力开展工业化运动，但事实上，它的房地产市场却繁荣了起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一栋栋奢华的高楼大厦被过早地建了起来，这与当时的台北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学者罗伯特·韦德所说，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台北就像是由棚户区 and 临时宿营地拼凑起来的混合体。⁶¹但在台湾，绝大部分金融资源都投入到了工业。

1989年，马哈蒂尔政府通过了《银行业和金融机构法》，放松了对股市的管制，这就为后来吉隆坡股票交易所出现癫狂的局面埋下了伏笔。用“癫狂”这个词来描述马来西亚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状况是最为恰当的。在1993年的那场牛市中，马来西亚股票市场上的总市值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4:1，这一比率之高，堪称世界之最。仅1993年一年的交易量就超过了前10年的交易量总和，而且某些日期的单日交易量甚至把纽约证券交易所比了下去。面对疯狂的股市，即便马哈蒂尔最亲近的政治盟友、知己心腹、财政部长达因·扎伊努丁 (Daim Zainuddin) 也不得不说：“似乎没有人在工作，每个人都在谈论股票。”⁶²

1994年，马来西亚股市开始丧失上涨的动力，到1997年崩盘。马来西亚的政府和人民终于认识到股市本身并不会预示现代社会的黎明即将来临。事实上，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大力赞扬股市的优点，并鼓励东亚国家发展股市，但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以及东亚其他国家的股市究竟对国家发展做出了多少贡献，的确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題。比如，股市对上市公司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明显有效的股东纪律，而这些上市公司也几乎注意不到小投资者的存在。实

际上，企业之所以热衷于上市，热衷于从股市上圈钱，一个原因在于从股民手中借钱，不像从银行家手里借钱那么烦琐。企业家们通常会采取“金字塔式股权结构”，即一种形状类似于金字塔的纵向多层次、多链条的所有权结构。终极控制人处于金字塔最上端，由它控制第一层级的公司，然后由第一层级的公司控制第二层级的公司、第二层级的公司控制第三层级的公司.....直到控制最底层的目标公司，这样一来，通过控股公司，终极控制人掌握少量股本就能控制许多公司，然后就可以从这些公司身上获取资金和其他资产，而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小投资者的利益。马来西亚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还催生出了大量利用内幕消息获利的情况。在私有化过程中，在没有经过任何招标投标程序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就被注入了私营企业，如果谁能事先获得内幕消息，知道这些财产被注入了哪些上市企业，那么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就能获利。如果有信息说某公司将获得国有资产的注入，而该消息并不属实，那么股市投资者若能事先识破这些消息，卖掉这些公司的股票，就能避免损失，甚至还能获利。总之，在马来西亚股市上，利用内幕消息获利的情况十分普遍。⁶³

这种情况对于能够获取内幕消息的人来说简直太有利了。如同俄罗斯的情况一样，马来西亚的股市也造就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从发展角度来讲，股市投机活动本身并无法促进国家发展。实际上，不仅无法促进国家发展，股市的泛滥还会造成其他更加严重的结果，因为如同房地产市场一样，股市的发展会导致大批银行信贷流向股市，从而挤占工业信贷。20世纪90年代，在马来西亚全国的商业信贷总量中，只有1/4进入了制造业、农业、矿业和其他生产性活动。马来西亚央行曾经对本国私营部门的制造企业进行过一次大范围调查，结果表明，在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只有10%到14%是由银行信贷满足的，而日本在工业化如火如荼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企业的融资需求中有40%到50%都是由银行信贷满足的，台湾企业的融资需求中有30%多是由银行信贷满足的。马来西亚企业被迫在更大程度上依赖自身的未分配赢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承担持续性的技术升级带来的成本，也无法发展成为真正大规模的企业。⁶⁴

马来西亚从来不缺乏可用来投资的资金。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马来西亚的总体储蓄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比韩国还高出几个百分点。⁶⁵但这些资金被投入到了错误的领域，而且由于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权逐渐减少，资金使用不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马哈蒂尔之所以对发展股市十分痴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情绪驱使的：他希望马来西亚的股市能把新加坡的股市比下去。在1990年之

前，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仍然具有密切的联系，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同一个交易场所。[\[20\]](#)如同仇日情绪给韩国人注入了强大动力一样，马来西亚对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出去的新加坡也是一样，也充满了敌对情绪。然而，不幸的是，在金融政策问题上，马来西亚最不应该效仿新加坡这个离岸金融中心，而是应该效仿那些成功实现工业发展的国家。

但由于马来西亚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政策仍然属于比较保守的，所以，虽然其工业项目存在考虑欠周的问题，而且政府放松了对股票市场和银行体系的控制，但马来西亚仍然幸存了下来，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央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1994年先后两次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同时不断推动小型银行机构之间的并购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放松管制产生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央行实行了一项长期性的规定，要求个人不得持有超过银行20%的股份，但实际上，经常有政客逾越这条规定。⁶⁶央行还对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维持着严格监管，并确保流入本国的外债都是长期债务，偿还期限比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债务长，因此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抵消货币贬值带来的影响。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马来西亚政府动用了国家石油公司、雇员公积金（Employees Provident Fund）等传统“资金池”对很多银行和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进行了大规模救助，但没有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情况严重到了不得不关门停业的地步。⁶⁷1997年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香港举办的一次会议上，马哈蒂尔抱怨说应该把货币交易定性为非法行为，这一言论使其获得了全球关注。他的这一立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都不明智。当时，虽然东南亚国家放松对货币交易的管制之后引发了一场区域性的经济衰退，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修订其章程，以便更加有力地推动有关国家放松对货币交易的管制。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马哈蒂尔本人在担任总理期间已经过早地放松了对货币交易、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他在香港发表那一番言论，就像是一个制造炸弹的人在抗议世界上存在冲突一样。

泰国：顺从的代价

由于马哈蒂尔对多边国际机构发起了攻击，而且在1998年临时性地重新采取了资本管制措施（遗憾的是，这一举动来得太迟了），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他就成了一个“坏孩子”，没有得到国际组织的大力援助。⁶⁸相比之下，泰国政府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得意门生”，泰国在金融危机期间蒙受的损失比其他国家都严重恰恰是对这点的最佳诠释。泰国还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

在东南亚国家中，只有泰国从来没有沦为殖民地，这一点是与众不同的。然而，该国接受糟糕建议的历史可谓非常悠久。从1855年与英国签署《鲍林条约》（Bowring Treaty）开始，一直到1926年，泰国在英国谈判者的劝说下一直维持着亚洲最低的进口关税，低到了只有3%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泰国政府不可能实施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也不可能造就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此外，泰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实力也比较薄弱，这就意味着资本密集型的经济部门肯定会遭到外国企业的主导，包括采矿业、木材加工业以及船运业，更不用提银行业本身了。在1932年君主专制政体结束之前，泰国国内的企业家从事的各类活动中，资本密集度最高的就要数碾米工业了，而实际上这个工业所需的设备相对便宜。

“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由于泰国不存在欧美经济势力，而且泰国政府经过重组之后，国家机构的职能更加完善，泰国当地的企业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准进入了银行业。在这个时期，泰国形成了4家重要的金融集团，⁶⁹其中规模最大的盘古银行（Bangkok Bank）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银行。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那样，泰国政府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而且该战略持续时间之久堪称东南亚各国之最。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泰国政府着力发展几个重点经济部门。在这些经济部门的发展进程中，资金来源就是私营银行，而且私营银行持有很多企业的少量股权。然而，在缺乏出口纪律的情况下，制造企业并没有制造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⁷⁰

在泰国，实力强大的银行集团虽然被私人控制着，但军队、王室和政府部门也持有股权。虽然泰国政府的金融政策存在缺陷，但泰国央行却是东南亚各国央行中独立性、传统性和专业性最强的。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泰国银行（即泰国央行，设立于1942年）就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形成了密切联系，而且这两个国际组织长期为泰国银行提供人员培训。⁷¹在泰国这样一个商业行为非常容易受到裙带之风影响的国家，泰国银行的官员对自己角色的定位不仅仅是发展事务的管理者，还是廉洁的警察。如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一样，泰国银行业只是为本国商业银行提供了适度的、不会引发通胀的再贴现贷款，其中大多数再贴现贷款并不是提

供给了制造业，而是提供给了关键的出口作物，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出口作物就是稻米。流入制造业领域的商业银行贷款在总体贷款中所占的比重增长得非常缓慢，1958年只有10%，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只增长到了25%左右。这大致上与马来西亚处于同一个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之前，泰国和马来西亚两国的贷款结构存在的一个差异在于泰国房地产业占款比例低得多。⁷²

然而，泰国政府金融政策的败笔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它批准设立了大量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泰国政府原本的意图是在正式的银行体系之外设立一些收益率较高的渠道以便吸收更多的存款，为政府应对石油危机引发的10年经济困局提供新的融资。同时，泰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设立这些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对正规的银行体系构成竞争。这与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取代场外交易市场而批准设立了一批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存在逻辑上的相似性，只不过在韩国这类机构的运作环境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环境。但无论在韩国，还是在泰国，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私营企业家们的操纵。但这种金融格局的负面效应在泰国很快就显现了出来，这不足为奇。泰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并关停了一批金融机构，影响到的金融机构持有全国金融体系1/4的资产，这就凸显了金融体系被私人控制所带来的风险。⁷³

尽管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然更加卖力地敦促泰国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监管，而且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危机并没有对泰国政府接受这两个机构的建议产生明显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泰国政府以及泰国央行招聘的经济学家中，几乎所有人都曾经接受过美国的教育，而且非常热衷于倡导那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以放松监管为核心的金融政策，这就进一步导致泰国政府在放松金融监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1989年到1991年，泰国利率几乎完全自由化了，政府事实上已经完全废除了对贷款利率和储蓄利率设定的上限。政府在放松利率监管的同时，还不断地批准设立更多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进一步放松了对股市的限制，进一步取消了剩余的资本流动管制措施。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导致泰国的消费信贷开始繁荣了起来。⁷⁴这与马来西亚的情况如出一辙，但与马来西亚相比，泰国的金融体系在更大程度上遭到了私营企业家的操纵，因为泰国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扩张速度太快，规模太大，而这类机构恰恰是更加容易受到私营企业家操纵的，这就削弱了泰国央行的监管能力。

泰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个相似之处在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加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快速的增长，面对这种增长态势，泰国政府

开始认为自己对经济发展的管理是卓有成效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在于，泰国也从来不缺乏可以用来投资的资金。从20世纪50年代往后，泰国的储蓄率增幅一直高于经济增速。在1997年那场危机爆发前夕，泰国的总体储蓄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35%，与韩国处于同一水平，略低于马来西亚。⁷⁵泰国的问题就出在既没有制定有效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又过早地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这两个缺陷就意味着泰国充裕的储蓄资金以及涌入泰国的大量外来投机资本必然无法得到正确的运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大部分资金被用到了房地产投机活动中。在1987年到1996年这10年间，泰国成了世界上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泰国经济能长久维持这种发展态势。⁷⁶

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迎来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官方的数字表明（这可能低估了现实），从1988年至1996年，房地产贷款在银行资产中所占比重从6%增长到了15%，在信贷公司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从9%增长到了24%。⁷⁷曼谷的股票市场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的态势，其指数从1990年的600点一直升高到了1996年的1400多点，为泰国提供了更多的投资资金，但这部分资金往往都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在危机之前，短期外国贷款不断增加，几乎占到了泰国投资总额的1/4，至于这部分外汇贷款中有多大比例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则不为人知。⁷⁸

由于泰国缺乏出口纪律，而且缺乏以资本管制为基础的风险防范机制，就意味着灾难已经不远了，就像一艘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油轮一样，很快就会到达眼前。随着资产泡沫不断膨胀，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年度经常账目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8%，仅此一个信号就足以让外汇交易员做空自由流通的泰铢，而当时泰国政府的政策是保持泰铢与美元汇率的稳定。泰国政府动用其外汇储备来抵御市场变动的影响，但最终无功而返，到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终于允许泰铢汇率自由浮动。这个日期标志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正式开始。

在东亚各国中，泰国遭受的经济收缩最严重。在泰国政府的邀请下，前来为泰国经济把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认为泰国政府需要紧缩开支，抵御通胀。早在20世纪80年代，该组织曾经为拉美国家开出过同样的处方。最后，泰国政府一方面将自身开支规模压缩了大约1/5，另一方面采取增税举措，但事实上泰国并不存在政府预算过于膨胀的问题，所以当上述两个措施出台之后，泰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从1996年到1998年，泰国经济规模收缩了14%（以泰铢计算）。⁷⁹当时，泰国共有

91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有56家破产倒闭，导致大批借款人，无论资信状况优劣，均无法获得营运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该机构的“得意门生”对这种乱七八糟的局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97年8月危机爆发之后，该组织对1998年泰国经济增速的预测是3.5%，一年之后，这个预测下降到了-7%，这反映了该机构对泰国的了解是多么匮乏。⁸⁰

1998年夏季，泰国政府的紧缩政策以及把泰国企业强行卖给外资的行为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抗议，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与此同时，很多现任的以及卸任的部长们开始在报刊上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月，该基金承认在判断泰国经济问题时存在一些误判，并同意泰国政府出现预算赤字，而泰国央行开始削减利率。1999年，泰国经济出现了一次温和的复苏，但直到2003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才恢复到了1996年的水平。在对共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革或这把本国企业卖给外国资本的问题上，泰国政府在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时打了一些折扣，没有完全按照其原先的要求进行。有两家银行被卖给了外国资本，有一些通过少量外资的注入充实了资本，还有一些仍然维持国有状态。⁸¹

总体而言，如果金融体系在1997年之前没有扶持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政策，那么之后就不太可能这样做了。过去的15年间，泰国在探索如何重新步入发展正轨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危机。因为该国在1997年之前的发展方向是完全错误的，要想重新步入发展正轨，绝不是容易的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泰国金融业没有催生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工业，其留下的最引人注目的遗产就是房地产业的滥觞。当游客驱车行驶在曼谷这个大都会中时，一栋栋土灰色的、单调的烂尾建筑映入眼帘。当赤道地区的降雨到来之后，这些建筑丑陋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似乎众神正在为人类的发展败笔而哭泣。

[15] 主银行制度是指公司以一家银行作为自己的主要贷款行并接受其金融信托及财务监控的一种银企结合制度。在主银行制度下，一家企业的全部或大多数金融服务固定地由一家银行提供。与此同时，主银行对企业拥有伺机介入治理的权利，甚至可以持有企业的股份，包括有投票权的股份。——译者注

[16] 商业银行流动性是指商业银行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支付到期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需求的能力。——译者注

[17] 所谓道义劝告，是中央银行实施调控的一种选择性工具，指中央银行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以书面通告、指示、口头通知、与负责人面谈等形式向商业银行通报经济形势，劝其遵守金融法规，自动采取自我约束措施，落实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译者注

[18] 欧洲债券，英文名称为Eurobond，指政府机构、大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等借款人在本国境外市场发行的、不以发行市场所在国货币为面值的国际债券，特点是它属于无国籍债券，债券发行者、债券发行地点和债

券面值所使用的货币可以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如德国公司在英国发行的美元债券就属于欧洲债券，因为这类债券最初在欧洲发行，故得此名。——译者注

[19] 如果存款利息能够抵消通货膨胀引发的损失，则说明为正利率，反之则为负利率。——译者注

[20] 1960年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成立。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仍在两个国家一如既往地运行，但被更名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证券交易所”。1973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货币互换协定》终止，联合交易所遂一分为二成为吉隆坡交易所有限公司和新加坡交易所，但之后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译者注

案例5：雅加达

现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旅程。这次我们去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印尼在独立后，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最近一场危机，也就是1997年那场金融危机，可以归结到苏哈托头上，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自由市场主义的金融改革。再早一些的那场危机，也就是1965年那场危机是在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苏加诺的治理下发生的，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嘲讽。1965年的混乱情形因电影《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而变得非常出名。根据官方的描述，这两次金融危机相隔30年，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引起的结果，一个是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引起的，一个是社会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引起的。如果从金融政策的角度来看，或者更加广泛地说，从本书提出的观点来看，你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两次金融危机其实得到了同一个因素的推动：国家没有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并且没有把精力放到发展制造业和出口经济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灾难和资本主义灾难其实只是同一个缺陷的不同表现形式。

在雅加达驱车由北向南走上一趟，就能明白我所说的意思。我们出发的地点距离雅加达湾的一个废弃港口不远。雅加达湾在这座城市北部，面朝爪哇海。北区是一座华人聚集的城市，有些混乱，但在雅加达这座城市的重心于20世纪80年代南移之前，这里曾是雅加达原来的商业心脏。我们的汽车开进了古南撒哈利路（Gunung Sahari），转进了一个居民巷，司机师傅问一位老人“林叔”的房子在哪里。林叔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最富有的大亨，被恭敬地称作“林叔”。那位老人缓缓地把手指向了那条路的尽头，于是我们驱车前往。

林绍良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位亿万富翁。据估计，早在20世纪90年代，其旗下企业的市值总额就占据了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5%。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暴徒洗劫了他的房子，并在他家的门上用漆喷上了“苏哈托的走狗”（Suharto's Dog），他被迫逃到了新加坡避难，此后再也没有返回过印度尼西亚。他的家族仍然保留那处房产的所有权，偶尔也会有人过去住。那栋房子已经修葺过了，换上了一扇新的、更高的金属大门。除此之外，那

个地方和别人向我描述的一模一样：一栋普通的、没有特色的白色平房。窗框是用廉价的铝制品制造的，人们一般很难将其与巨额财富联系起来。当林绍良还在这儿居住的时候，来访者进入房子之后往往会因为里面的陈设非常少而感到惊讶。如同韩国的郑周永一样，林绍良也是非常节俭，即使生意做大之后有没有改变住所，而且他仍然决定住在老城区，那个城区在今天的人看来显然不具备时尚气息。林绍良认为这栋房子能给他带来好运。如今，这栋房子在提醒我们，企业家的禀性是发展中的常量，在人和企业家身上，这个禀性都是不会变的，但他们生存的政策环境是发展的变量，会有所不同。⁸²

林绍良认为自己很幸运。他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半个世纪以来，在苏加诺和苏哈托的统治下，他都获得了大量的特许经营权不仅拥有自己的银行，而且在国内市场上确立了垄断和寡头地位，同时还不必利用自己卓越的企业家才能去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更加宽泛地说，政府没有强制要求他为国家的技术进步做什么贡献。林绍良的运气可以追溯到印度尼西亚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前期。从中国福建省移居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当时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商人。一天，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古突士镇的民族主义分子让他掩护一位名叫哈山·丁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领导人，哈山·丁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事后他才知道，哈山·丁正是苏加诺的岳父。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很多军队中的人，当然也包括印度尼西亚的首任总统苏加诺（当时苏加诺只是一个师的上校团长）。在独立战争期间，林绍良还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提供军用物资。⁸³1949年印度尼西亚获得独立之后，他因为关系灵通，尤其是因为与印度尼西亚军方的关系而大获成功。如同其他数十位企业家一样，他也从苏加诺政府获得了开设私人银行的许可。到1957年，印度尼西亚共有104家银行，他拥有其中两家。

1965年，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印度尼西亚开国总统苏加诺。1968年，他正式担任总统一职，此后，林绍良的事业也迎来了大的突破。林绍良早在中爪哇倒卖军用物资时就结识了苏哈托，而当时这位未来的总统还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军事指挥官。⁸⁴苏哈托就任总统以后，给林绍良提供了大量的特许经营权，确立了他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和寡头地位。林绍良的业务范围涵盖了丁香进口业务（丁香用来制造颇受印度尼西亚人欢迎的丁

香香烟）、面粉加工业、水泥产业、钢制品加工业等。这些交易大部分是与苏哈托家族成员合作进行的。如同苏加诺慷慨地给予他大量特许经营权一样，苏哈托在给林绍良提供特许经营权时也没有要求他必须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或必须发展出口贸易。林绍良只涉足了种植园农作物加工业和木材加工业。他的合作伙伴们，也就是苏哈托的孩子们，更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参与国际竞争。林绍良成了该国最重要的商人。他的很多利润都来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业务，比如香烟、面粉加工和建筑材料。他的经营活动对印度尼西亚的技术进步起不到任何推动作用，但正如当时很多印度尼西亚人体会到的那样，人们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他的企业。

在20世纪70年代，林绍良开始拓展银行业务。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银行。到70年代，他聘请了非常有经验的银行家李文正（Mochtar Riady）来拓展业务。他还让苏哈托家族入股了该银行，成为其合作伙伴。李文正也持有该银行股份，后来他很快把中央亚细亚银行（Bank Central Asia）打造成了该国最大的私营金融机构。该银行为国内最大的、不断扩张的垄断企业提供了巨额信贷，这些企业包括该国水泥制造企业的印度尼西亚水泥集团、面粉加工业的印度尼西亚Bogosari面粉公司、汽车组装业的印多汽车集团（Indomobil）以及苏哈托家族控制的收费公路公司。根据多名现任与前任银行董事所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央亚细亚银行将其贷款总额的60%都投给了林氏家族的企业，把30%投给了苏哈托家族的企业。⁸⁵

似乎林绍良的业务覆盖了各个领域。从法律角度来讲，任何银行提供给关联方的借款都不能超过贷款总额的20%，但实际上很多银行都违反了这条规定。中央亚细亚银行的贷款过程存在鲜明的裙带特征，但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资金贷给了面粉公司、水泥公司和收费公路公司等没有面临竞争的垄断企业，因此面临的金融风险就比较小。至于那些风险较大的贷款者，比如房地产项目和苏哈托子女从事的非垄断性商业投资，则遭到了礼貌的拒绝，这些风险较大的项目的融资主要依靠国有银行。1997年危机袭来之际，中央亚细亚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远远低于印度尼西亚其他银行。⁸⁶问题是包括中央亚细亚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把放贷对象瞄准了那些非生产性的、非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活动，而那些实力较弱的银行则抢不到这类客户。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放松对金融业控制之后，金融体系为投机活动提供的资助越来越

越多，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而银行的资金往往是在海外融资的基础上获得的。林绍良非常聪明，也非常保守，但面对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崩溃，他也无能为力。

当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蔓延到印度尼西亚时，印度尼西亚国内弥漫着严重的恐慌情绪，中央亚细亚银行、林绍良、苏哈托家族和各大垄断企业也都惶恐不安。印度尼西亚货币卢比在1997年末开始贬值，很快整个银行体系都无法偿还外债了。各大银行，无论偿付能力高低，均遭遇了挤兑，短短两周时间，储户就从中央亚细亚银行的各个分支提走了65万亿卢比（约合80亿美元）。⁸⁷后来，印度尼西亚央行提出林绍良必须拿出等额的资产做抵押，才能为其提供贷款偿付给客户。林绍良为了获得贷款而把一些企业和土地抵押给了央行，他向央行表示这些资产价值53万亿卢比，但最后当央行卖掉这些资产时，只筹措到了20万亿卢比。事实上，按照印度尼西亚的标准，能偿还给央行20万亿卢比，这种偿债率已经算是最高水平了。当很多大亨的银行破产倒闭时，他们无力偿还也不愿偿还银行贷款，结果全部由纳税人埋单了。林绍良丧失了对中央亚细亚银行和很大一部分企业的控制权，但他仍然保留着相当多的资产，后来他在新加坡安度晚年。⁸⁸事实证明，在一个失败的发展体系下，即便最聪明的大亨也不是很聪明。

苏加诺时期的政策

印度尼西亚的“危险年代”持续了两年，1965年是第一年。为了继续探索1997年那场金融危机在1965年的历史根源，我们驶出了林绍良那栋房子所在的小路，继续往南开。我们所走的那条路西边是两条并行的、南北流向的运河，是荷兰殖民者修建的，两条河中间夹着的地方是雅加达在殖民地时期和苏加诺时期的市中心。沿着老兵路（Jalan Veteran）进入这个地区，你的眼前会兀然出现一座庞大的清真寺，即伊斯蒂赫拉尔大清真寺

（Istiqlal）。这座大理石的庞然大物耗时10年才建成，能容纳12万人，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当它离你越来越近时，不由得让你心生敬畏。在清真寺的西南部，是雅加达的独立广场，广场的四周是宽阔的道路，分布着很多公共机构的大楼。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达130多米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苏加诺在1959年下令修建的，1968年竣工，是苏加诺

时期修建的最伟大的纪念碑之一。⁸⁹

苏加诺在1927年获得土木工程学位，是一位建筑师。他一方面对极简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很感兴趣，另一方面对格调奔放、色泽鲜明的巴洛克式的建筑也很感兴趣。毫不夸张地说，他原本打算建造一个全新的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广场南边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是他为了兴建雅加达新城区而修建的，相当于新城区道路网的“脊椎”。这条大路在命名时被划分为了几段，分别被称作谭林大道（Jalan Thamrin）、苏迪曼路（Jalan Sudirman）和西新雅芒加拉查路（Jalan Sisingamangaraja）。当我们沿着这条大路向南走时，经过了一个苏加诺时期建设的大百货公司，叫莎丽娜百货公司

（Sarinah）。再往南走，就到了曾经非常奢华的印度尼西亚酒店（Hotel Indonesia）的所在地，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凯宾斯基酒店，在电影《危险年代》中，记者们在“花香酒吧”喝酒的那个场景就是在这个酒店拍摄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立即感受到苏加诺时期的发展重点。在宾馆外面，是一个环状交叉路口，路口中间有一座雕塑，上面是两个兴高采烈的人，不禁让人想起了《音乐之声》开场时的那个雕塑。再往南走，就到了赛曼吉立交桥

（Semanggi Bridge），这座立交桥的辅路修建得非常巧妙，呈现出了四叶苜蓿的形状。四叶苜蓿也被称为幸运草，据说可为发现者带来幸运，故得此名。这座桥西边是“史纳延体育场”（Senayan Stadium），是苏加诺时期为了1962年亚洲运动会而修建的。再往南面走，就到了另外一个环状交叉路口，这个路口也有一个雕塑，雕塑的人物是一名男子，抬起头，他手中托着一个大的、扁平的物体，在当地这个雕塑被称为“送比萨的人”。⁹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加诺表现出了极大的建设热情，从民族独立纪念碑开始往南走，在5公里之内，随处可见那个时期修建的各种纪念碑和雕塑。

苏加诺很快花光了国库的积蓄，不仅仅是因为他大力兴建各种纪念碑和雕塑而浪费了大量金钱，更主要的原因是印度尼西亚没有在经济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在工业发展方面，苏加诺没有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而且他对发展出口贸易也不感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加诺政府设立了中央银行，并授权这个央行从事发放商业贷款的业务，同时设立了另外3家国有发展银行。印度尼西亚国内银行体系发放的信贷总额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国有银行发放的。这些金融机构本来可以成为国家实行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金融工具，但它们却积极主动地阻碍贸易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印度尼西

亚政府实施了机会均等的行动计划，大力鼓励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商人。这与马来西亚为了壮大土著居民的力量而实行的机会均等行动计划如出一辙。在印度尼西亚，信贷额度最高的企业是进口企业。在这一政策下，那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印度尼西亚土著居民通过进口奢侈品或者把进口许可证倒卖给华人企业或荷兰人的企业而大发了一笔横财，其中就包括林绍良的企业。⁹¹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政府毫无顾忌地批准私营银行的扩张，至于这些银行如何分配其贷款，印度尼西亚政府从不加以约束，而且这些银行还能从央行获得贷款。银行的所有者认为哪些领域符合自己的利益，就为那些领域提供资助，而通常情况下他们把大部分贷款都投给了自己的经济活动。

20世纪5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趋于恶化，苏加诺在1957年宣布实行军事管制，这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将会出现更加集中的、由国家领导的发展态势。他完全废除了保障央行独立性的法律条款（类似于朴正熙在1961年的做法），同时让国有银行几乎完全主导了整个国家的信贷分配格局，全力扶持那些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归国有的企业。他指示印度尼西亚央行直接向他青睐的项目提供贷款，并为商业银行提供大规模再贴现贷款。但信贷分配仍然不是为了落实工业政策，也不是为了刺激企业提高出口业绩。因此，一种几乎可以肯定的结果就是银行继续为那些完全非生产性活动提供资助，比如在通胀高企的过程中囤积主要商品，以便日后高价卖出。

20世纪60年代初期，印度尼西亚的金融环境中不存在任何金融纪律。央行不加质疑地满足商业银行的信贷要求，以至于大量增发货币，导致该国经济出现超级通胀。但苏加诺仍然不愿服输，仍然要继续摸索如何让金融服务于经济发展。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间，他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走得越来越近，制定的经济政策在很大体现出社会主义特征。比如，为了挽救印度尼西亚经济，他曾经和央行行长计划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大的“具有战斗力的银行”。这一点非常符合斯大林时期和毛泽东时期“大一统”的银行体制。苏加诺把他在1964年国庆节那一天发表的讲话命名为“危险之年”，并告诉印度尼西亚人民准备好为革命做出牺牲。但这个危险的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苏哈托就领导军队发动了军事政变，逐步剥夺苏加诺的权力，并宣称要推动印度尼西亚迈向一个彻底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苏哈托重用伯克利派经济学家

在苏迪曼路东侧，夹在《音乐之声》式雕塑与赛曼吉立交桥之间的那片区域逐渐与苏哈托的统治形成了密切联系。这片区域就是所谓的“黄金三角地带”，所谓三角地带，是指它夹在苏迪曼路、拉苏纳赛德路（Rasuna Said）和卡铎苏波罗托路（Gatot Subroto）这三条路之间。这个地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其高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高速发展似乎预示着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但实际上这是一道虚幻的曙光。今天，正如我们在吉隆坡苏丹依斯迈路北段所看到的情景一样，在黄金三角地带也有很多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搁置下来的大型建筑项目。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苏迪曼路西侧、濒临艾美酒店（Le Meridien）的两栋烂尾楼，这是当年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为林德祥（Sjamsul Nursalim）的印度尼西亚国民商业银行（BDNI）设计的办公大楼，如今已经停工15年了。⁹²

苏哈托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并恢复了宏观经济稳定。但他和苏加诺一样，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引导国内主流企业家发展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相反，苏哈托还提拔重用了一批伯克利派经济学家，这批人主张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增加出口。20世纪60年代，伯克利派开始从加州大学返回印度尼西亚执教，他们经常性地到印度尼西亚军方的神经中枢，位于万隆的陆军军官学校（SESKOAD）进行授课。正是通过这所学校，以尼蒂萨斯卓（Widjojo Nitisastro）为首的伯克利派经济学家逐渐与苏哈托建立了联系。在苏加诺统治时期，这批经济学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1968年苏哈托就任总统之后，他们逐渐开始为人所知。苏哈托第一次组建内阁时，伯克利派五位核心的经济学家都获得了部长级别的职位。⁹³在这些角色中，他们对央行施加了重重约束，对商业银行实施了信贷规模限制，建立严格的预算来约束各部，并监督制定了有利于跨国公司的新法律。

伯克利派经济学家及其传统的金融政策对苏哈托的影响力并不总是很大，在很多年里，随着政府预算的波动，他们的影响力也随之波动。对于这批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开出的处方是否能治好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弊病，苏哈托本人心里其实并没有底。但他的教育和生活阅历使他无法像朴正熙那类人一样形成明确的经济发展理念。20世纪60年代晚期，尼蒂萨斯卓及其同

僚们大权在握，如日中天。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繁荣时期，石油收入对印度尼西亚政府预算的贡献高达2/3，苏哈托便不再遵循他们的建议了，而是指示央行大幅增加优惠贷款额度，并开始了第一轮由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热潮，主要投资领域集中在钢铁、化学、化肥、铝制品和机床。但苏哈托没有认真地推动私营企业家发展制造业，也没有实行出口纪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石油价格迅速下跌，导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预算陷入赤字，该国也陷入了国际收支失衡的危机中。苏哈托开始重新依赖伯克利派经济学家，而这批人进一步放开了对外国投资的管制，削减了央行直接发放的贷款，缩小了再贴现贷款的规模，并实行了利率自由化改革。随着外国投资逐渐增加，印度尼西亚经济形势开始改善，苏哈托随后开始重用曾经接受过德国教育的航空工程师——优素福·哈比比，于1978年将其任命为印度尼西亚研究与技术部部长，同时扩大政府预算规模。但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尼西亚经济再次开始衰退，伯克利派经济学家获准对金融体系实行印度尼西亚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改革，在1997年危机爆发之前，印度尼西亚一直处于繁荣期，这段时期内，苏哈托再次重用哈比比。⁹⁴

伯克利派经济学家并非老练的理论家，但他们相信只有市场才能打破印度尼西亚裙带资本主义的风气。一位处于边缘地位的伯克利派经济学家举的一个例子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感到日益迫切地需要通过放松金融监管来寻求出路。在1993年到1998年期间担任印度尼西亚央行行长的苏特拉加（Sudrajat Djiwandono）回忆说他曾经在1996年末收到汤米·苏哈托（Tommy Suharto）的一封信。⁹⁵汤米·苏哈托是苏哈托总统最小的儿子。他在信中写到两家国有银行愿意贷给他10亿美元，供其创办一个汽车厂。但这么大规模的贷款不符合央行关于贷款额度的规定，而汤米·苏哈托却在信中问道：“你能为我做点什么呢？”（据说，当时，如果印度尼西亚官员试图对银行信贷做出指示，总是以威胁信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始于苏哈托。）

在雅加达，每个人都知道汤米搞的那个帝汶汽车项目（Timor car project）其实是一个骗局，滥用了仅有的一点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他获准进口45 000辆起亚轿车，先对其进行换牌，就变成了自己制造的汽车。⁹⁶苏特拉加也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于是索性把这封信放进了抽屉里，希望汤米自己知趣地走开。3个月后，他被召到了总统苏哈托位于雅加达铭登区山达纳路（Cendana）的家中，苏哈托把那封信的复印件放在了一张桌子上。苏特

拉加佯装不知情，然后若有所思地回忆这封信，并建议说如果汤米打破了央行的规定，那么对金融体系而言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然而，虽然汤米的汽车项目非常不符合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利益，但总统很显然想要央行为他最疼爱的儿子提供贷款。然后，苏特拉加提出是否可以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银行财团，这样为其儿子提供贷款就不会违反央行的规定。苏加诺告诉他：“就这么办”。根据苏特拉加所说，印度尼西亚央行后来虽然给汤米提供了贷款，但总是尽力降低贷款额度。他说汤米要求13亿美元，但最后只给了他3亿美元。所有这些贷款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注销了。

苏哈托连自己的家人都管不住，更不用提管那些私营企业家了。所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伯克利派经济学家们才一致得出结论，认定只有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才能破解金融困局。他们的逻辑是如果金融体系完全放开了，完全私营化了，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娇惯汤米之类的人。与他们密切合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也具有同样的逻辑。因此，从1988年晚期开始，这些当权的经济学家们开始为建立开放的金融市场做出最后一搏。其领军人物就是时任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的约翰尼斯·苏马尔林

（Johannes Sumarlin）。约翰尼斯·苏马尔林是最早一批的伯克利派经济学家，其事业直到晚年才开始兴旺起来。他沿袭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利率自由化的改革思路，把设立私营银行的实收资本标准降低到了1 600万美元，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5%降低到2%，放松了股市监管，而且他那些在印度尼西亚央行工作的盟友们进一步大幅压缩了中央银行给国有银行的再贴现贷款规模。

这样一番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直接作用就是导致了股市的繁荣，同时导致私营银行的数量大幅增加，1988年印度尼西亚共有66家私营银行，到1993年增加到了160家。1993年，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业务的本国和外国银行总共有234家。因为伯克利派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掌握经济大权时就放开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导致该国很容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变革浪潮中担任印度尼西亚经济协调部部长的拉迪乌斯·普拉维罗（Radius Prawiro）曾经公开宣称：“我们……放弃了我们自己在较早的时候设想的重商主义……，而是发现了市场经济的智慧。”⁹⁷

通往金融乱局的道路

中央亚细亚银行等印度尼西亚老牌银行的总部全分布在谭林大道北端，集中于印度尼西亚央行总部周围。要想追溯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金融乱局的根源，只要从苏迪曼路北端出发，经过黄金三角地带和赛曼吉立交桥，再到“送比萨的人”雕塑所在的环状交叉路口就能一探究竟了，这段路总长大约3公里多一点，正是在这里，曾经接受过美国教育的伯克利派经济学家和印度尼西亚本土的经济学家们共同主导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开辟了一条通往金融乱局的道路。

从1988年开始，黄金三角地带新出现了数十家银行总部，因此被称作雅加达的“银行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多银行破产倒闭了，而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仍然屹立在那儿。此外，这里还有一些未竣工的建设项目，比如印度尼西亚国民商业银行的双塔式办公大楼。从赛曼吉立交桥一直往南走，就到了苏迪曼路的最南端。当伯克利派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为了金融自由化做出最后一搏之际，这里还只是一片棚户区，后来成了金融区，被称为“苏迪曼中央商务区”。

苏迪曼中央商务区的历史可以从时任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约翰尼斯·苏马尔林对金融部门实行开放政策的那一个月讲起。当时，滚石乐队的主唱米克·贾格尔在苏迪曼路西北侧的史纳延体育场举办一场演唱会。那天是周日，数千名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从贫民区蜂拥而至。贾格尔准备的曲目清单中包括《难道你听不见我在敲门吗？》和《给我庇护》这两首歌，结果一些歌曲激起了来自贫民区年轻人的愤怒，他们打砸汽车，焚烧轮胎，同安保人员发生了长时间的激烈冲突。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这次暴力活动为当局迅速而无情地拆除多达40公顷的贫民区提供了最好的借口。由于当时印度尼西亚金融业蓬勃发展，金融区不断南移，所以，这片贫民区所在的地方可谓是一方宝地，后来发展为苏迪曼商业区之后，增加的价值不可估量。

贫民区的拆迁清理工程是由郭说锋（Tommy Winata）的公司承包实施的，郭说锋是一位与印度尼西亚军方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家，人们普遍认为他控制了雅加达的很多赌博场所、色情场所和收保护费的组织。郭说锋和印度尼西亚军队养老基金成为这一大片土地的所有者。在这里，郭说锋新建了一个庞大的证券交易所，修建了很多经纪行和银行办公大楼，同时也为自己的银行新建了一栋办公大楼，将银行总部搬迁到了这里。世界银行则不失时机

地将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到了郭说锋开发的这个苏迪曼中心商务区。郭说锋还在证券交易所附近兴建了一个据说是世界最大的夜总会，即Bengkel Nightpark娱乐城，其内设房间可同时容纳15 000人。⁹⁸贵宾室还提供全裸体表演的脱衣舞，在这里可以获取的毒品种类据说不亚于纽约或伦敦的夜总会。此时，雅加达已经为大力发展金融业做好了准备。

郭说锋的金融运作方式引领了印度尼西亚金融业的发展潮流。他先是收购了一家政府经营的上市公司，然后把他在这个商务区的股权注入这个上市公司，就是所谓的“借壳上市”。他通过发售新股来筹措资本，后来又剥离掉了他在苏迪曼中心商务区的股权，将其出售给了另一个上市子公司——雅加达国际酒店开发公司（Jakarta International Hotels & Development），从而实现了套利。⁹⁹1989年，雅加达证券交易所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证券交易所。其他企业家在资本运作方面的创新能力绝不亚于郭说锋。印度尼西亚国内排名第二的商业王朝——谢氏家族（Soeryadjayas）在1989年5月接管了一个很小的私营银行，为储户提供高利率，结果在两年之内就拥有了15万个账户，资产价值多达10亿美元。¹⁰⁰曾经被称作印度尼西亚第一石油大亨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首任总裁伊布努·苏托沃（Ibnu Sutowo）的家族，为了筹措资金，发行了10亿美元的离岸商业本票。¹⁰¹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一个大的企业集团都拥有一家或两家银行，私营银行首次占据了印度尼西亚银行体系的半壁江山。这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格局。¹⁰²印度尼西亚的银行业的确越来越繁荣了，郭说锋等大亨、伯克利派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兴奋不已。

给我庇护

虽然政府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但问题是它依然没有在其他政策方面做出任何改变，没有利用金融贷款去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技术进步。伯克利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观点是印度尼西亚的经常账目赤字还很少，1996年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3.5%，远远低于泰国的水平，因此断定印度尼西亚经济处于良好状态。然而，当时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出口收益都是由从事加工业务的跨国公司创造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

中期，由于中国沿海地区具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完善的供应链，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企业纷纷被吸引到了中国。后来，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确曾经告诉本国的企业集团更多地从事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务，但已经太晚了，收效甚微。排名第一的林氏家族从事的制造业只是造鞋子和玩具，排名第二的谢氏家族组建了一个船运公司，生产一些电池、火花塞，还为丰田汽车公司组装发动机。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制造业出口额首次占据了印度尼西亚出口的大部分，虽然宏观经济学家从自身立场出发，认为所有类别的出口业务都是平等的，但这样一来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是不合理的，由外资企业主导的、附加值较低的加工业务占据主导地位，¹⁰³这些出口业务的发展并不能给印度尼西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而且由于没有实行出口纪律，无法根据企业的出口业绩来调整信贷分配。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担任印度尼西亚央行行长的苏特拉加认为，给出口企业提供再贴现“并非真有必要”，因为大部分出口来自小企业，而这些小企业会为自己的活动融资。¹⁰⁴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忽视了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金融管理方面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大教训：政府必须利用自己掌握的金钱引诱和哄骗主流企业家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并开拓国际市场。对此，伯克利派的五大元老之一埃米尔·萨利姆（Emil Salim）往往会条件反射式地搬出老生常谈的论调进行反驳：如果采取出口补贴，会导致贸易伙伴采取反制措施加以报复。¹⁰⁵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情况证明，贸易关系不像这句话所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有规律性，一方采取出口补贴之后并不会立即招致对方的报复。前三个经济体实行出口补贴机制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导致其贸易伙伴的报复，而且目前中国大陆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李斯特曾经把幼稚工业保护政策比作发展的阶梯，日本、韩国等国家已经沿着这个阶梯成功地实现了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这些政策在其他国家行得通，在印度尼西亚肯定也行得通。但印度尼西亚在没有亲自实践的情况下就断定行不通，无异于自己踢开了已经准备好的进步阶梯。

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表明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早地放开金融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没有出口纪律的情况下，1988年10月，时任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约翰尼斯·苏马尔林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改革，为印度尼西亚铺就了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种种不祥的迹象接踵而至。1992年，谢

汉石创办的苏玛银行（Bank Summa）被将近8亿美元的债务拖垮了（谢汉石是谢氏家族的掌门人、印度尼西亚第二富豪谢建隆的长子）。在自由化改革之后的两年间，该银行的贷款组合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很多银行的情况。在一个日益兴旺的房地产市场上，谢汉石在雅加达、泗水和万隆购买了大片大片的地皮，同时拥有6家豪华酒店，而且在新加坡和越南还拥有大量物业。¹⁰⁶苏玛银行的大部分资产都是房地产。后来，利率上升，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市场扭曲的情形开始得到纠正，银行资产大幅缩水，最终资不抵债。谢氏家族不得不卖掉他们企业集团的主要资产来偿还客户（其企业集团在印度尼西亚排名第二）。1993年初，苏玛银行正式倒闭。

1994年，印度尼西亚建设银行倒闭了，这是一家国有银行，前不久刚把总部搬迁到郭说锋参与开发的苏迪曼中心商务区。这家银行的倒闭与陈子煌（Eddy Tansil）密不可分。从1989年到1992年，陈子煌利用苏哈托总统之子汤米·苏哈托、时任最高评议院主席苏多莫（Sudomo）以及时任国家财政部长约翰尼斯·苏马尔林等人支持自己贷款的信函，以需要在西瓜哇芝勒贡兴建石化企业为名，从印度尼西亚建设银行获得了5.2亿美元的贷款，但最后大部分贷款被挪作他用或者装入私囊。与东南亚地区形成惊人对比的是，在东北亚国家中，如果要获得银行贷款，必须先出示国外贸易伙伴开立的出口信用证，但在印度，仅凭某些官员的信函就能从银行获得贷款，作为所谓“进口货物”的预付款，而实际上借款人声称的订单可能子虚乌有，只是为了便于贷款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借口。¹⁰⁷陈子煌的妻子后来出庭受审时，穿着一件鲜红色的连衣裙，裙子前面印着一个大大的美元图案，这恰恰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潮流。陈子煌被监禁了不久之后就逃出了监狱，然后逃之夭夭，留下他的哥哥陈子兴（Hendra Rahardja）去经营两家私营银行。最后这两家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全都倒闭了。2002年，陈子兴因涉嫌诈骗银行2亿美元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但这是一桩缺席判决，陈子兴本人早已逃亡到澳大利亚，最后客死在那里。仅仅他们一个家族就掠夺、摧毁了多家银行，有国营的，也有私营的，这的确太令人震撼了。¹⁰⁸

后来，伊布努·苏托沃家族控制下的印度尼西亚太平洋银行（Bank Pacific）曾经发行了10亿美元的离岸商业本票来筹措资金，但后来甚至无力偿还这些债务的利息，这一不祥之兆预示着一场重大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印度尼西亚的银行可以发售到期日只有270天的

短期债券，而在美国只有那些蓝筹股公司才有权发售这类债券。在不成熟的东亚市场上，一个具有30年诈骗历史和管理不善历史的家族居然也能发售这类债券。那些轻信这类债券的买家大多数也是亚洲地区刚刚获得自由的银行。

到1996年，紧张不已的印度尼西亚央行不得不宣布已经有70家商业银行对关联方的贷款超过了国家的法定界限。¹⁰⁹但除此之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扭转乱局，一切都没有改变。银行家们心里早已认定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把法定界限放在眼里。在1997年下半年金融体系崩溃之前，商业银行为国内非生产性投资活动提供的贷款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贷款都流向了房地产市场。1997年7月，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出现了暴跌，迫使泰国放弃了长期以来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东南亚国家偿债能力的担忧，导致亚洲国家积累的巨额债务无法获得展期偿付。这一问题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

再度陷入金融困局

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印度尼西亚请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寄予厚望，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也没有良方妙计可施，因为正如弗兰肯斯坦^[21]一样，正是这帮经济学家大力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引发了目前的金融困局，他们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他们之前与拉丁美洲国家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政府打了很多交道，习惯性地认为印度尼西亚政府也是如此，于是给印度尼西亚开出了削减预算和提高利率的政策处方来破解金融困局（他们给泰国开的也是这一处方）。但东南亚地区的问题不是政府预算花钱太过，而是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私营部门的投机活动太猖獗，而且缺乏有效的发展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紧缩方案只会削弱市场的资金流动性，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以至于最后扼杀了实体经济。

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一股短期海外借款浪潮，借贷主体基本上都是银行和非出口型的大企业。在金融危机袭来之前的18个月里，印度尼西亚未偿贷款的规模翻了一番，债务方纷纷四处筹集美元来还债，结果导致汇率动荡，¹¹⁰1997年7月，1美元相当于2500印度尼西亚卢

比，而到1998年7月，1美元能兑换到14 000印度尼西亚卢比。印度尼西亚卢比的贬值极大地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严重打击了那些需要进口生产要素的小型制造企业（印度尼西亚制造企业绝大多数是小型企业。）在银行体系无序运作的状态下，很多制造企业便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此外，对于爪哇岛的出口企业而言，集装箱的缺乏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一方面因为进口贸易萎缩，从海外过来的集装箱数量锐减，另一方面是因为本地又不生产集装箱。印度尼西亚出口贸易总额在1997年7月达到了42亿美元，而到了1998年3月就骤降到了14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过早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场危机过后，很多制造企业后来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规模收缩了1/5，失业人数多达1 500万。过了一年多，印度尼西亚政府才开始像泰国政府那样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政策处方是否有效，并开始往实体经济中注入一些资金。即便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印度尼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低位徘徊，到了2005年才恢复到了1996年的水平。¹¹¹昔日的银行区已经繁华散尽，50家金融机构破产倒闭，26家金融机构被“印度尼西亚银行重组机构”（Indonesian Bank Restructuring Agency）接管，12家金融机构被国有化，4家国有银行被合并。¹¹²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印度尼西亚金融体系的重组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度尼西亚提供了23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必须重组金融体系。正是这笔贷款稳定住了局面，确保那些在这场危机中推波助澜的外国债权方得到了全额偿付。印度尼西亚政府保留了3家大型国有银行，但由于印度尼西亚仍然没有对其采取优惠信贷措施，而且放开了利率管制，这些银行的活动仍然备受限制。林绍良的中央亚细亚银行起初被美国的一个对冲基金收购了，后来被印度尼西亚烟草大亨黄惠忠（Budi Hartono）收购，但其一些高级管理人员仍然是外国人。¹¹³总体来讲，重组之后的印度尼西亚银行体系放贷的意愿大为降低（但比较青睐消费信贷），而且贷款利率大为提高。这种情况给中央亚细亚银行和外资银行带来了丰厚利润，不过这个时期的银行体系可以说是自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最不符合工业发展需求的银行体系。印度尼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的金融体系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平安无事，没有再出现过什

么危机，但远远不是印度尼西亚真正需要的那种银行体系。

金融的真相

东亚国家落实了各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管理政策，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结果，纵观东亚金融史，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真理，即金融制度的作用对象比金融制度本身重要得多。很多经济学家宣称，金融家对经济发展困局的出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¹¹⁴金融家本身也只不过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行为体，他们运作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他们也会采取一定的应对举措。这个环境是政府塑造的，金融政策要扶持哪些目标也是由政府最终拍板的。

政府要把金融领域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很关键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都利用金融政策来实现必要的农业目标，并促进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落实，在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中，出口业绩是衡量企业运营状况的基本标准。掌握金融控制权之后，政府可以对资本流动实施管制措施，本国资本就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政府就不必劳神费力地到海外市场寻求投资机遇，也不用担心外资的涌入会干扰其发展规划。“华盛顿共识”倡导的那一套金融自由政策无法取代金融管制政策。金融管制解除之后，金融部门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引导社会从贫困走向富裕，只会把短期赢利和消费信贷摆在主要地位，把促进国家技术学习和工农业升级置于次要地位。当一个国家还处于贫穷阶段时，没理由去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近几十年来一直把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作为己任。如果一个国家采纳了它们这一套政策建议，那么纯粹浪费时间已经算是最好的结局了，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这套政策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本国经济遭到了重创，以至于至今仍然无法恢复元气。一些东亚国家正是因为过早地放开金融管制，实行资本流通自由化改革，并推动股市的发展，才导致塑造本国发展进程的能力遭到严重削弱，而且遭受金融危机的风险大为加剧。菲律宾在20世纪80年代就体会到了这一风险的危害，东南亚其他国家则是到1997年才体会到。最近几十年来，对金融自由化的崇拜已经在全球深深地扎下了根，结果给富裕经济体带来了诸多问题，对发展中经济体产生的危害更大。

像银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之类的金融体系需要政府拿出很长的时间去扶持，需要政府职能和制度环境大大完善，之后才能走向成熟，成为有效促进市场经

济发展的元素。即便如此，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讲，金融监管仍然是最棘手的问题。但金融自由化之后出现的挑战不应该限制住穷国的发展，因为高效的金融体系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事实上，在描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成功实施的金融政策时，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政策极为有效，实际上，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这些政策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高效率，因为东北亚把很多金融资源投入到了华而不实的项目中，金融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很多浪费和腐败现象，比如韩国在这方面就尤其臭名昭著，因为韩国放贷决策过程中会牵涉到行贿受贿的现象。然而，由于东北亚普遍更加致力于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所以，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就是东北亚利用金融资助了很多有利于稳步提高技术水平和推动经济长远发展的投资项目，至于金融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则留待以后加以改进。

要想让金融在促进发展方面产生最大效应，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加强对银行体系的引导，因为政府引导银行去服务于工农业发展目标的难度是最低的。最明显的是，银行接受央行的指导，央行出台指导意见之后，银行体系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央行可以通过对出口业务和产业升级提供再贴现优惠政策，同时要求银行在办理再贴现业务时必须出示最终借款人提供的出口信用证，这一机制简单直接，十分有效。与银行相比，债券市场，尤其是股市，决策者想要加以控制，难度比较大，主要原因是政府很难监督债券发行方的资金利用方式。实际上，正是因为银行体系更容易成为政府落实发展政策的工具，才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们如此劳心费力地游说政府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因为在这类市场上，企业家更容易逃避政府监管。在实现基本的发展目标之前，政府的职责就是拒绝企业家们的游说。同样的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取得重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之前，也不适合让央行完全独立。

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金融管制为基础的金融管理政策带来的效益最终也会逐渐削弱，这一点与家庭农业模式和幼稚工业保护政策是一致的。然而，金融管制政策有利于让货币服务于农业与工业政策，因此，在早期发展阶段是有必要的。只要这种金融管制政策对促进基本的技术升级是有必要的，政府就不得不让零售储户和零售贷款者为此承担一定的代价。真正的问题是，究竟应该在哪个时间节点上转而采取更加开放的、解除管制的金融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之甚少。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之前的菲律宾都过早地实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而韩国则顶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政府等方面的游说和压力，在其工业化进程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之后才着手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韩国经济运行状况仍然良好，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获得

一些有益的借鉴。然而，对于任何反思历史的人而言，一个最大的感悟就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阶段性的过程，为了应对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需要不断地做出政策调整。没有任何良方妙策可以一劳永逸地推动经济发展。

[\[21\]](#) 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是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于1818年出版的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年轻的医学研究者，创造了一个毁灭了他自己的怪物。——译者注

第四部分

中国何去何从

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的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

——邓小平，1978年12月语¹

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东亚的发展史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吗？至少，有了亚洲这个大背景做参考，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做法是有益的，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尝试着预测中国的未来。在经济结构方面，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我们揭示出三个基本的观点：第一，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模式被大规模地转变成以农业推广服务为支撑的家庭农业模式，它就能够以最快速度开发出该国农业的潜力；第二，国家要引导企业家实现国家制定的工业化目标，推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升级，这是迅速实现经济质变的必由之路；第三，必须让金融服务于上述两个目标，为了在技术学习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有时候可以暂时不考虑短期效率问题。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对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热衷程度绝不亚于日本和韩国的政府。然而，两个不合理的发展思路长时期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思路也扰乱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计划。第一个思路是只有大规模农业才会有高效率。这一发展思路导致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启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但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看到的那样，农业与制造业不同，在制造业领域，规模经济在降低单位成本、提高技术水平、制造产品技术含量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农业领域，产品永远不会改变，无论农业生产规模如何扩大，水稻永远是水稻，玉米永远是玉米，要想

实现农业产出的最大化，就需要投入肥料，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这两类资源都是贫穷国家富有的。过早机械化实际上降低了产量，并且导致农村居民无所事事。朝鲜、中国、越南以及之前的苏联都曾经实行过机械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结果都导致了饥荒。

第二个错误思路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在没有商品流通的前提下发展制造业，即所谓的自给自足政策。一切技术问题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不借鉴外国经验。“二战”后，在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像这种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长期制约了技术进步，因为这种政策导致企业无法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每当企业需要新技术或新设备时，它们就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这样就做了大量没有必要的、重复性的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给中国带来的结果就是低效的工业生产技术，包括水泥制造、玻璃制造、石油钻探、隧道建设等方面的技术。²在这一政策的限制下，中国没有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品。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摒弃了上述两个错误的发展思路。第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家庭农业模式，以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业产出。1979年，邓小平开始访问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标志着中国试图再次与世界建立接触。之后，中国循序渐进地放开了对国际贸易和外来投资的管制措施，使其既能吸收国际技术，也能根据世界的标准来衡量其产品。

在此之后，中国排除了外界的杂音，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从发展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特质。关于如何才能发展好，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建议，而有很多建议其实算不上好建议。中国政府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唯命是从地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的建议，中国没有过早地解除对经济的管制。中国的确同世界银行进行了密切合作，世界银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曾为中国的很多建设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既定的发展思路，没有采纳世界银行新自由派经济学家们建议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方案。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宏观经济组织，它设立的初衷并非是给某些具体的项目提供建议。该组织提供的建议往往没有得到中国的采纳。中国政府不愿意让该组织为中央部委当助手。每当该组织试图打入中国的官方机构时，中国的标准回应就是：“给我们开个讲座吧。”近些年来，该组织因为与中国在资本管

制政策方面存在分歧，曾有两次无法发布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北京拒绝让其发布。⁴简而言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不同，勇于拒绝杂音，坚持己见，这一点帮助中国实现了蓬勃发展。

1978年之后，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而且在日本之后，成为了第二个让欧美国家刮目相看并惶恐不安的东亚国家。连续30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速维持在10%左右，这一速度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泰国经济增速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但持续时间更长。⁵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而言，中国大陆在农业经济领域赶不上台湾地区，中国在工业技术升级的速度和深度上逊于韩国，在工业技术创新方面逊于日本。但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多，而且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国家的盟友，所以，1978年以后它就震撼了整个世界。那么，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哪些潜在的制约因素呢？

一切发展路径都始于农村

20世纪70年代末，要破解中国的发展困局，农业问题是必须首先解决的。中国摒弃了近乎自杀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开始允许农户耕种小块儿土地。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影响下，中国曾经爆发了大饥荒，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想方设法提高农业产出，通过让农民耕种小块儿土地，农业产出的增幅超过了1/3。（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重演，一些学者认为，当时中国实行的家庭农业模式促进了产量的提高。）⁶1978年，在农业集体化制度下，粮食产量是3.05亿吨，到了1984年，几乎所有农业用地都分给了农民耕种，每户农田规模平均超过了1/3公顷，家庭农业模式得以确立，粮食产量增加到了4.07亿吨。⁷

恢复家庭农业模式并不是中国在1978年邓小平恢复权力之际制订的方案。相反，中国领导人最初认为那些由数百农户组成的大规模公社效率太低，而且不受欢迎，想要缩小公社的规模，并没有打算彻底结束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些农民自己探索出来的，他们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第二年大获丰收，使之变成了既成事实，之后得到了开明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在其自传中曾经说道：“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⁸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必须把一部分粮食以固定价格出售给国家，这样政府就可以以低廉的成本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剩下的粮食才能拿到公开市场上出售。

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很多原本用来种植粮食的农业用地被用来种植其他农作物了，而且大量农业用地被转变成了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土地被转化为了农业用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原有农业用地减少产生的影响。尽管如此，中国的粮食产量仍然增长到了5亿多吨。中国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像东北亚国家那样为农民提供耕作建议和培训指导，同时还在农产品储藏和营销方面给农民提供了一些服务。今天，中国的稻米产量与东北亚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小麦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甚至比美国在规模农业模式下的小麦产量还高出50%多。⁹

在家庭耕作模式下，中国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大幅提高，但很多人认为种植经济作物需要用到昂贵的机械，所以要追求规模经济效应，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中国用于生产蔗糖的甘蔗主要产自小农场。虽然中国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不如东南亚，但就甘蔗种植效率而言，中国的小农场远远超过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种植园。在中国，位于南方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是甘蔗主产区。1978年开始恢复家庭农业模式之后，中国甘蔗产量在1985年迅速增加了2.5倍。今天，每公顷土地的甘蔗产量大约是75吨，比菲律宾内格罗斯岛高出40%~50%。¹⁰中国蔗农合资购买或租赁土地深耕所需的大型拖拉机。政府负责确保垄断性的买家（即蔗糖加工厂）不会损害蔗农的生产积极性。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入世条款，中国大幅削减了农产品进口的关税及配额限制，此后的限制程度远远低于日本、韩国在类似发展阶段的限制程度。但有一种农产品的进口量大增。这种农产品就是大豆。2001年，中国累计进口大豆1 394万吨，进口金额约30亿美元，2010年则累计进口大豆5 480万吨，进口金额约25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大豆生产（主产区是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大型国营农场，而不是依赖家庭生产。中国决定在1978年之后在黑龙江省保留一些大规模的国营农场，与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大规模农场进行竞争，但最后没有成功。¹¹2010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占据粮食作物进口量的90%。而中国的稻米和小麦则主要采取家庭生产模式，在中国几乎随处可见由农户经营的稻田和麦田。2010年，两种作物的进口量分别是40万吨和120万吨，均不到中国年消费量的0.5%。按照中国当前的发展程度和国民收入水平，全球生产稻米和小麦的大规模农场无法与中国家庭农场进行竞争。

积弊难除

然而，如果认为中国农民因为农业产出高增而过上了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生活，那就错了。家庭农业模式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刺激了农村地区对工业和服务业的需求，促进了农村地区制造类和服务类企业的发展，但农民在发展进程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中共的党员构成中，农民比重越来越小。中国在促进城乡平等上的工作力度逊于“二战”后的日本和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头10年的中叶，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国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全国基尼系数从略高于0.3（与东北亚地区持平）提高到了0.45左右（与东南亚地区持平）。今天，中国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不及城市地区的1/3，而东北亚国家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城乡收入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¹²

这一巨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财政及税收政策取向。随着城市经济腾飞，中央政府在长时期内并没有像东北亚国家那样给农民提供补贴，而是任由地方政府对农民征收苛重的税费。农民需要自己承担就医费用和子女就学费用，还不得不从事强迫性的劳役等等。（在中国，大部分福利与服务都是由地方政府资助、管理的。）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经济加速增长，但国家财政政策也越来越偏向城市。从2001年开始，中国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而放弃了大部分农业保护措施。

到2003年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之际，农村地区的不稳定局面越来越严重。上任伊始，胡锦涛就呼吁建立和谐社会，这一呼吁的一个根本元素就是承诺弥合城乡差距。令人惊讶的是，在提出这个理念时，他使用的措辞和日本、韩国的决策者在为补贴农民辩护时使用的措辞是一样的。2005年，胡锦涛在一次主旨讲话中提出中国已经从“农业支持工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第二个发展阶段。¹³

从2006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禁止地方政府对农民征收苛重的税费，加大对农业投入要素的补贴，并实行农产品收购价格保护政策。2008年，中国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启动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农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修建了很多铁路、公路、学校和医院。中国还实行了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费的改革。正是得益于这些改变，2006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可能是中国农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佳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没有进一步扩大，但仍然维持在3倍差距的水平。中国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远远高出日本、韩国。更加具体地讲，中国农民

与东北亚国家农民的一个关键差别在于，中国农民不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出现这一局面的历史原因在于中国1978年重新实行家庭农业模式的过程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分给农户的土地原本属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设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为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恢复土地私有制，所以从来没有对农业用地的所有权归属进行重新设计，没有把分给农户的土地定性为私有财产，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是享有有限的使用权。1984年，中国政府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后来，到1998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2007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给予农民在土地承包期满之后可继续承包的法定权利，也明确指出农民耕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成员（不仅仅包括管理这类组织的共产党干部）。虽然中国法律明确规定涉及集体土地的决策必须征得每一个成员的同意，但在中国，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两码事，制定好的法律不一定能得到执行。

在中国农村，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土地属于集体，而不属于农民个人，这一事实引发了严重后果，最严重的一点是中国农民无法像日本、韩国的农民那样把土地出售给私人买家。从法律上来讲，农民不能买卖土地，但政府有权征收农民的土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一补偿标准听起来可能很多，但中国历史人均产量很低，意味着最终的补偿金额也很低。地方政府以很低的补偿费征得的土地往往被以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差价转手用于房地产开发或商业化农业。征地补偿费还经常被各级政府及集体经济组织截留，本来就不高的补偿费用不能全部到达被征地农民手中。

在日本和韩国，很多农民在“二战”后农业土地再规划、再开发的过程中变得非常富裕，比如，农民西山光一就是这种情况，他把自己的一些土地卖给开发商，从而变成了百万富翁。而在中国非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当农民失去土地的时候，他们获得的补偿费往往还不够维持生计，而土地再规划的利润有一部分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有一部分被官员贪污。最近10年来，农民失地现象愈演愈烈，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一方面肩负着提供福利与服务的职责，另一方面缺乏财政资金来源。近些年来，中央政府进行的税费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对农民征税的能力，但没有加大对地方政府的拨款来弥补这部分税费损失，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它们设立的下属企业来筹借资金。¹⁴当公有企业的利润不足以偿还债务利息时，它们无奈之下只有依靠卖地。媒体已经报道了很多关于政府征收土地之后用于开发房地产、建工厂的事件。除了政府征地现象越来越多之外，另一个越来越多的现象就是农业土地被出租给商业化的农业综合企业。农业企业可以

签订集体土地长期租赁合同，而土地所有权归属并没有改变，仍然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且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整个土地租赁过程很好操作。农业企业不仅需要给农民支付租金，还要给地方政府交税。

一份权威性的独立调查显示，在中国，将近2/5的农村在过去10年里都存在把农业用地用作非农建设的现象，将近1/4的农村都存在把家庭农场用于发展规模农业的现象。¹⁵21世纪初，中央政府削弱了地方政府通过直接对农民征税来筹集资金的能力，自此之后，地方政府征地的步伐日益加速。从2010年开始，1/10的中国农村每年都会失去一些土地，而这些征地常常是违背农民意愿的。平均来讲，政府每次征地的规模大约是35公顷（也就是说大概相当于100户农民的耕地总和）。很多商业用地协议动辄需要政府征地数千公顷，而且这类协议越来越多。¹⁶

农民的苦难

按照东北亚国家的征地补偿标准来衡量，中国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遭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考虑到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农民得到的些许补偿有什么意义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农民通常是在地方政府的逼迫下放弃土地的，但他们获得了一些补偿，2010年平均每个农户得到的补偿费用是人民币13 000元，约合1900美元。因为现在的农民一般都45岁左右，他们平均还有30年的寿命，所以这笔补偿就相当于每年给农民430元，也就是说，按照当前的大米价格，大概相当于每年补偿给农民140公斤大米。这笔补偿费用甚至不够两个人获取基本营养所需，但大部分农户都有子女在乡镇或城市里工作。¹⁷于是，子女们就不得不弥补征地补偿与父母生存成本之间的差额。虽然大部分失地农民现在年龄太大而无法获得全职工作，但有些人仍想方设法通过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中国的城乡差距不容乐观，有失公平，蚕食社会，但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最终的现象。农民奠定了经济腾飞的基础，而且继续支撑着中国的粮食需求。中央政府在今后数年的主要关切仍将是商业化种植导致主要粮食作物产量下降。规模农业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提高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商业化种植只注重附加值较高、利润空间较大、具有特殊用途的作物，比如蔬菜、草药和花卉，有时候也用来出口，但不种大米和小麦这类具有核心意义的主粮。随着家庭农场的消失，中国的主粮进口量虽然一开始比较少，但增长速度快。或许在将来某一时刻，

粮食安全问题会引起中央政府的忧虑。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对丧失粮食安全心存忧虑，存在这种忧虑是明智的。

中国可能会禁止把农业用地用于商业化农业，但除非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得以解决，不然地方政府肯定会继续通过财政政策去压榨农民，压榨给父母汇钱的农民子女。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承受了太多的苦难，遭到了太多的不公。近代以来，正是有了农民的支持，才有了建立新中国的胜利。“二战”结束后到1956年实行农业集体化之间的这个时期，农民自力更生，农业产出出现了短暂的增长，这个黄金时期至今仍然深深地铭刻在老一辈中国人的脑海中。在毛泽东时代，农民遭遇了多次灾难，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农民又大幅提高了农业产出，将这个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救了回来。同时，这个时代的农村地区还孕育了当代中国一些最具竞争力的大企业，包括中国越野车制造商、当代汽车出口大户——长城汽车、汽车零部件的主流制造商——万向集团、顶尖的饮料制造商——娃哈哈集团，以及因注重环保而著称的空调制造商——远大集团。这些大企业最初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地区蓬勃兴起的。¹⁸

说句公道的话，中国太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太多，中国政府不可能像中国台湾和韩国那样迅速地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来安置他们。今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步萎缩，因此农村劳动力会有更大的工资议价能力。但从1978年到现在，一个仍然存在的事实是，中国大陆仍然没有像台湾地区、日本、韩国那样优先考虑农村人口的福利。

后来，当农业欣欣向荣之际，中国农民本来也可以像拥有土地的韩国农民那样开上汽车去海滨度假，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却开始收走农民的耕地，通过卖地生意来填补财政赤字，来满足农村干部贪婪的欲望，而无法为地方政府提供充足拨款的中央政府一边袖手旁观，一边责骂说地方政府的做法太无耻。现在，中国农民再一次被迫履行传统的职责，按中国话说，就是农民要再次“吃苦”了。¹⁹

破解制造业难题

中国在1978年之后的工业政策比农业政策更复杂，因为它在改革时期经历了多次转变。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恢复了家庭农业模式，推动农村工业的发展。如同在东北亚一样，那一时期的很多企业家都来自农村和乡

镇。中国大城市的国有企业继续在原来的道路上接受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实行私有化这种休克疗法。这种疗法对俄罗斯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因为私营企业很容易被企业内部人士利用。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被巧妙地描述成了“没有输家的改革”。²⁰

但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国有企业成了发展的沉重包袱。问题最严重的是规模较小的或位于产业链下游的国有企业。小国企面临着来自日益崛起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残酷竞争。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难度远远低于进入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市场的难度。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盟友比起来，中国更加乐意拿本国市场准入权来换取进入富裕国家市场的权利。此外，与日本、韩国的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加乐意开放国内消费品制造业，因为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些行业不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中小型国企的亏损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1993年开始，在朱镕基这位较为强势的经济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开始整顿国有企业，试图实现合理化格局。主要方式是把国企经营权下放给地方政府，或者关闭一些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实行财税政策改革，限制地方政府的征税权限，减少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²¹结果迫使地方政府认真审视企业经营成本问题，一些赔钱的企业开始被甩掉。1997年，中国制定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因为大批国企倒闭，工人纷纷下岗，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据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下岗国企工人多达4 000万。²²

朱镕基对国有经济的改革范围广，而且取得了成功，让很多观察人士感到惊讶，包括我自己也很惊讶。²³此外，在甩掉亏损国企的同时，中国还鼓励大国企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中国石油企业等曾经占据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被迫开展相互竞争。在产业链上游以及在关键产业上，朱镕基的经济决策团队创造了两个、三个或四个寡头式的企业，彼此相互竞争以争夺市场主导地位。在石油、天然气、石化、电力、通信、保险业以及银行业，少数大国企之间的竞争大大加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水平。少数几个大型国企实现了收益最大化。如果让一个国企垄断整个市场，而没有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那么它就无法实现收益最大化。

在国企中，有196家规模最大的企业（准确地讲，应该是企业集团）被置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之下。这个机构设立于2003年，也就是朱镕基总理任期的最后一年。该机构的职责之一就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组建一批实力雄

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国企。该机构监管的央企数量一直下降，到2010年减少到了122个。虽然一些央企的子公司因为亏损而倒闭，但目前央企规模基本上都比之前扩大了很多。该机构每三年同央企签署一次合约，明确了利润目标，央企领导者必须接受考核，评分体系满分为100分，其中70分是根据不同的赢利指标来评定的。²⁴

总体来看，国企改革取得了积极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国企的总体赢利能力基本上不存在，但在21世纪头10年里，国资委控制的央企的年平均赢利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4%，2010年，央企赢利总计人民币1.35万亿元（约合2000亿美元）。²⁵大部分利润来自9家从事上游生产活动和服务的企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宝钢、中国铝业、神华能源以及国家电网。实际上，国资委监管的这些央企赢利的大约50%都是由三家油企和中国移动创造的。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完全控制着上游生产活动与服务的企业，而且这些企业的赢利能力很强。在那些改革不太成功的国家，这类企业往往落入私营大亨的手中，这种情况与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是不一致的。

朱镕基的改革结果

朱镕基的改革给中国的工业经济结构带来了三大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改革造就了一大批效率较高、赢利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集团，因为它们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是原材料的主要进口商和加工商，所以可以用来缓解国际市场价格震荡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些上游企业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上游企业想挣脱它，但迄今收效甚微，最终，这些企业的经理们会被一个事实限制住，这个事实就是：他们是公仆。

第二个特色是，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政策重点支持少数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主要产品是生产资料，也就是被下游企业用来从事生产活动的产品，金属、机床都属于这类产品。这一点与中国台湾工业政策严重偏袒国有企业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与台湾地区国有企业相比，大陆的国有企业总体上面临着更强烈的竞争和更严格的出口纪律。大陆的国有企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制造出了一大批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产品，比如水轮机和高速列车。中国大陆国有的制造企业虽然不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所向披靡，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可能算是最成功的。

第三个特色是，中国私营企业能获得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制造业，居于产业链下游，利润空间和现金流往往不足以支撑其集中精力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并成长为全球性的大企业。展望未来，私营企业的发展不足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中国实现整体经济抱负，是一个很重要，也很难回答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明确中国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规模对比及其真正含义。关于力量对比，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半对半”，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非常复杂，所以这种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国家经常给国有企业注入资金，这是它们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今天，虽然很多企业被称为国有企业，但其未来发展状况则取决于少数几个股东。另一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私营企业被国有企业吞并，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经常会做出这种预测。

怪兽式的国企

朱镕基改革之后，从事上游业务的企业为了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开展了激烈竞争。这些企业大多数都是国家控制的，依靠为中下游企业提供关键的原材料和服务来谋求巨额利润，这就导致这些企业变得很富有、很强大。然而，国家实行的价格管制政策一直制约着这些国企，使其无法像19世纪德国的卡特尔或“二战”后的日本财阀那样利用自身的寡头地位实现利润最大化，到目前为止，这种制约仍然存在，所有具有关键意义的上游产业投入要素，比如精炼石油产品和电力，在定价问题上都要受到政府的管制。政府允许这些国企长期获得丰厚的利润，但前提是这些企业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不能竭泽而渔式地谋求暴利。这些上游企业扮演着“减震器”²⁶的角色，有利于缓和国际市场价格震荡对中国下游企业的冲击，所有的下游企业，无论是公有制的、私有制的，还是混合所有制的，都会从中受益。

举个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到了140美元一桶，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制造企业而要求中国油企承担某些精炼业务的亏损。最近，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国际市场上煤炭价格却攀升至历史高位，增加了电力企业的投入成本，这些企业打算调高电价，但遭到政府的拒绝。无论全球经济环境如何变化，中国政府都坚定不移地推进本国工业技术升级。这一点与我们在东北亚国家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虽然不同国家采取的政策工

具不同，但其目标是一样的。

中国这些盘踞上游产业的国企的实力一直在稳步提高，所以政府是否能无限期地对这些企业维持密切监管，目前来看还不明确。韩国企业虽然从政府的慷慨帮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它们做大之后便同政府抗衡，希望摆脱政府的控制。目前，中国的上游企业虽然属于国有企业，但也开始挑战国家权力了。2005年到2006年，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上涨到了历史新高，中国油企竭力抗拒国家的石油价格管制，故意减少油品供应量，造成全国性的油荒，以此给政府施压。²⁷最近，中国的电企也故意减少发电量，制造全国性的电荒，以抗议国家对电价的管制。政府都压制了这些抵抗行为。为了确保这些企业听命于自己，政府对这些企业实行了高管轮换制度，即中国组织部门所说的“人事调整”。比如，2009年，中国三大油企的领导者就实现了轮换。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在军队中采取的军官轮换制度。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国企按照政府指令行事。除了人事调整之外，中央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干预大企业的运作。比如，同样在2009年，中国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被迫采用新一代通信技术标准，而把销售GSM手机的业务留给那些实力较弱的竞争对手。

中央政府仍然是国企的负责人和掌控者，但国企也在竭力提高自身实力。因为价格管制措施给它们带来了挫败，它们便越来越多地利用金钱和实力通过收购来获利，而不是通过竞争来获利。这一点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些大型国有钢企打着产业重组、结构调整的旗号，不仅收购了规模较小的钢企，还利用自己作为国企的社会关系去吞并并对其构成挑战的私营钢企。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便是2009年山东钢铁收购日照钢铁，作为一个私营企业，日照钢铁受到了政府部门的巨大压力，山东钢铁当时是亏损经营，而日照钢铁则能赢利，但最后亏损企业吞并了赢利企业。日照钢铁的所有者、曾是中国第二富豪的杜双华坦言说政府不支持他，他无法独立经营。

大型国有上游企业还利用雄厚的资金实力去收购中游企业。比如，中国三大油企以及电力巨头向涡轮公司、电池公司等新能源设备制造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没有制造经验的企业收购了有经验的企业，所以被收购企业未必能从这种收购中获益。而且这些上游企业竭力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商品贸易和配送等新领域。石油企业最近进军天然气配送业务，而之前这类业务被留给了私营企业去做。因为只有国有大型油企才能进口或开采天然气，所以与私营部门的油企相比，它们占据着很大优势，这对私企而言是不公平的。

所有这些都被中国公众和媒体所说的“国进民退”的一部分。对于这个词语反映出来的现象，几乎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但这一现象存在哪些局限性、会产生哪些意涵，目前还不明朗。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样，中国所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往往有些混乱，这些企业并不总是能够完全控制住它们收购过来的企业，所以上游国企的并购过程可能会造成资金的浪费。中国政府曾经公开表示要从国企利润中抽走更大的比例，以限制国企的野心。2007年，中国颁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央企须上交一定比例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从5%到10%不等，具体上缴比例视企业所在产业而定。2011年中央政府又对上缴比例做出了调整，最高上缴比例调到了15%。但这些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地逃避上缴更高的红利。²⁸国家虽然会为国有制造企业注入大量资本，但资源类和服务类的国企则通常享受不到这种待遇，所以它们会谨小慎微地维护自己的现金流，这是它们实力和影响力的来源，也是它们给自己发放福利的来源。中国工业政策面临的一个关键考验就是政府是否有能力从上游企业收取红利，然后用这些红利去资助制造企业。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政府扶持制造企业和多元经济的决心有多大。

制造业的冠军

中国当代工业经济结构的第二个特色是，制造业政策重点支持少数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主要产品是生产资料。东北亚国家或地区在指导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国有钢铁企业均取得了成功。在台湾，产业政策是由当局主导的，在这种政策下，台湾联华电子和台积电等公有制企业也取得了成功，在多种半导体的生产技术上达到了并维持着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台湾地区和东北亚经济体也出现了很多国有企业失败的案例，至少可以说，很多国有企业的业绩不如私营企业。比如，在台湾地区和韩国，国有造船厂的业绩就比不上私营造船厂，在地区竞争中，日本、韩国的私营化工厂就打败了台湾地区的国有化工厂。

总体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似乎做得比较好。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阶段以及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旨在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改革，一些居于产业链中游的大国企的全球竞争力越来越强。这些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因为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入壁垒较高，从而防止了过度竞争，市场因此免于陷入碎片化状态。同时，市场上又有足够多的竞争对手，能保证彼此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²⁹这些国有企业的发

展状况表明，在工业发展进程中，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在于政府是否能对这些企业实行出口纪律，是否能够通过激烈竞争促进优胜劣汰，而不在于这些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公有制和私有制企业都有成功的典范，混合所有制企业也有。有时候，在国有企业的子公司中，虽然管理人员和私人投资者持有很大一部分股份，也能实现良性运作，这种情况在现有国企设立新的子公司时特别明显。

中国企业在很多行业正在获得全球竞争力。这些企业所在行业主要包括采矿机械制造业、建筑机械制造业、机床制造业、航空航天业，造船业、火电业、水电业、风电业、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然而，截至目前，即便中船重工、中海油服、中集集团、华锐风电、中国南车等在国内算得上规模最大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还达不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但在2011年8月，仅中船重工一家的市值就接近200亿美元，而且中国24家规模最大的、能得到政策支持和银行信贷的、与国家有关联的中游制造企业平均市值是60亿美元，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市值的两倍。³⁰

中国一个关键的工业政策规划机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虽然我们对日本、韩国的类似规划机构了解很多，但我们对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内部运作情况了解很少，以至于在评估该机构的作用时有失偏颇。但回头来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该机构在培育国有制造企业方面的决策通常是审慎而明智的。除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之外，国家管理下的科研机构也促进了这些国企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发展绿色能源技术的政策时，就会建议政府把其大部分补贴用于支持最完善的低成本技术——风力涡轮机。虽然生产太阳能面板的企业也会努力争取政府的补贴，但太阳能发电技术成本较高，而且中国当前基于多晶硅的太阳能发电技术有可能会被美国当前正在研发的薄膜技术淘汰掉。蓄电池制造企业也想得到政府补贴来开发电动汽车，但这类汽车的制造技术还很成熟，市场也没有得到检验。经过广泛而审慎的分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继续推进风电行业，中国政府在该行业的大规模采购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市场。此外，在国企设立的风力涡轮机制造企业中，决策者允许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持有一定比例的股权。华锐风电和金风科技是目前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风电技术设备研发和制造企业，其很大一部分股权都掌握在私人手中。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很慎重，相应的政策风险也比较低，同时还通过市场机制采取了多重刺激措施，最后有效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发展。目前，中国的风力涡轮机制造企业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产品出口量越来越多。这一情景与马来西亚的做法形成了强

烈对比。马来西亚进军钢铁制造业的技术前沿时，只设立了一家国有独资技术，既没有明智的决策，有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政府实行的提高机械设备国产化率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国有制造企业的发展。比如，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下发了《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规定了风电工程项目采购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由于外国风电设备供应商抗议说这一规定违反了中国的入世协定，最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0年取消了该要求。但到2010年时，中国国内风电企业经过几年时间的培育，已经具备了技术、市场各方面的竞争能力，风电设备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70%。³¹200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政府要求各类装备制造业的国产化率均应提高到60%到70%。如果政府仅仅是发了一个通知，未必能成功地说服每一个下游企业去购买国产设备，但政府控制着本国的金融体系及其巨额采购预算，如果哪家企业不接受政府的约束，政府就不给这个企业贷款，或者不采购它的产品，³²所以企业不得不认真倾听政府传达的信息。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类似于日本、韩国的做法。

中国政府对制造企业实行出口纪律的最重要工具就是国家开发银行。该行是中国主要的政策性银行，也是该国效率最高的金融机构。该行设立于1994年，是朱镕基财税改革的一部分。之所以被称作“政策性银行”，是因为其主要使命是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落实国家制定的农业和工业政策，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在过去十余年间，该行一直是由陈元领导的。陈元是经济学家陈云之子。陈云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³³该行曾经资助过多个规模大、质量高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这些项目提供机械设备的中游制造企业实现了快速发展。³⁴

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在推动中国中游企业扩大出口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06年以来，该行累计贷出1 000多亿美元，资助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业务范围覆盖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等地。³⁵贷款最多的是从事上游产业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贷款主要用于原材料投资。但也有很多企业利用该行贷款去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国有建筑公司负责工程主体建设，而位于产业链中游的中国制造企业则负责硬件设施的供应与安装。³⁶在这方面，中国、日本与韩国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开拓国际市场的切入口，日本在20世纪伊始为了促进本国工业发展，也曾大力开拓工业

水平不如自己的亚洲国家的市场，韩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曾经竭力把本国的建筑服务出口到中东、东南亚市场。中国与日、韩的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开拓的不只是一两个地区的市场，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在过去5年里，在出口纪律的压力下，中国中游企业产品的总体质量与出口数量都迅速提高。

畅销国际市场的中国产品

在最早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中，就包括制造火力发电设备的企业。当初，中国政府为了降低技术获取成本，就参照日、韩等国的经验，与跨国企业谈判技术引进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出面同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商定了“市场换技术”的协议，将引进的涡轮机生产技术同时分给几个国有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企业逐渐开始利用引进技术生产中型涡轮机。此外，中国政府还帮助企业从西门子等跨国企业中获取水电涡轮机制造技术。因为电力装备制造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中国对发电厂的需求非常大，所以，在21世纪头10年，中国的发电设备制造能力就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而且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力装备制造企业的技术水平不仅极其接近于世界技术前沿，而且其产品的价格比那些竞争对手低30%（其竞争对手是跨国企业）。³⁷

在这些电力装备制造企业掌握先进技术之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另一家政策性银行）又通过优惠贷款措施鼓励这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初是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的，包括印度、巴基斯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到21世纪头10年结束之际，中国企业在快速增长的印度市场上占据了将近1/3的份额。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机械工业销售排名第一位的装备制造集团。2010年，印度信实电力公司（Reliance Power）与该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5年的电力装备供应协议，该公司将为信实电力公司旗下的36个发电站供应价值高达100亿美元的发电装备。同样是在2010年，中国同委内瑞拉签署了“石油换贷款”融资框架协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在10年内向委内瑞拉提供总额20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等项目，其中包括发电装备由中国供应的三家发电站，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签署石油购销合同，作为委内瑞拉还款保障。事实上，中国与委内瑞拉签订了多个类似融资协议。

2009年，中国出口了价值约90亿美元的电力装备，并开始在南亚、非洲和拉丁

美洲之后进军东欧市场。这些企业总产量的20%是用于出口的。现代集团等企业在技术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将总产量的20%用于出口。在出口纪律的压力下，掌握中型涡轮机制造技术的中国企业又开始制造1 000MW等级的超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以及700MW等级的水轮发电机组。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长江三峡水电站就使用了700MW水轮发电机组。中国最大的火力发电机制造企业同时也是世界上同类企业中规模最大的。

中国中游企业的常见发展模式是在初级发展阶段从国外引进核心技术，然后进行消化吸收，之后，在出口纪律的压力下，这些企业逐渐进军全球技术前沿。以造船业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中国造船厂主要是通过技术许可协议引进并消化基础技术，其接受的订单量在全球订单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到10%。在21世纪头10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内船舶市场的需求迅速增加，本国造船厂也开始竭力增加出口。在国际船舶市场上，韩国与日本的造船企业竞争力最强，而中国造船厂拿到的订单越来越多。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之际，世界船舶市场上新增吨位的40%是由中国造船厂提供的，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被国内船运公司买走了。虽然中国造船厂在设计方面仍然对外国企业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且外购零部件和发动机的价值在船舶总价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0%，但在出口压力下，中国造船厂的技术水平快速提高。中船重工现在正在出口苏伊士型油船，现在正在着手制造更大规模的船舶。

在过去5年里，中国建筑设备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实现了大幅增长，令人刮目相看。这些中国企业的卓越业绩与日本小松、住友、日立等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具有相似之处，当时，这些日本企业生产的建筑设备中，出口比例在短短几年内从10%提高到了30%，今天，出口比例提高到了70%。今天，徐工集团、中联重科等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中，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1/3左右，这一比例超过了中国的电力设备制造商。规模更大的三一重工也具有类似的出口比例。该公司是一家非国有的企业，也是机械制造企业的典范。所有这些中国的企业都是在巨大的、对价格高度敏感的国内市场中磨炼出来的，起初从轮式装载机等简单产品做起，进而制造挖掘机等较为复杂的机械，最后大举进军发展中国家市场，积极发展出口贸易。³⁸中国出口的建筑设备中，50%左右出口到了亚洲国家，20%左右出口到了非洲国家，还有20%左右出口到了欧美国家。中国建筑设备制造企业已经宣布到2015年其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将用于出口，这有点类似于日本企业在历史上的快速发展阶段。

在电信设备制造业，中国的领军企业——华为和中兴，就体现了中国的中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两家企业都是从小城市发展起来的，但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在中国国内通信基础设施市场上占据的份额逐渐增加，最终其国内市场份额达到了50%。从1997年开始，它们在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开始进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2004年，国家开发银行授予华为公司1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以支持华为在海外市场提供买方信贷，开拓国际市场。华为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的信贷支持比中国其他任何一家公司都多。最近几年，华为与中兴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又取得了新突破，同西班牙、挪威等发达国家签署了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服务合同。目前，两家企业都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唯一的技术挑战就是能否成为未来几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标准制定者，进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华为虽然没有上市，但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堪称中国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它是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仅次于瑞典的爱立信公司（其差距并不大）。华为在2010年的全年销售收入已达1 850亿人民币（约合280亿美元），其中65%都来自海外市场。与中国大部分中游制造企业相比，华为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华为对外宣称是全员持股的公司，而中兴公司的前身是中国航空航天部参与投资的一个企业。华为虽然说自己全员持股，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有很多的传言说国有企业持有华为股份。³⁹

中国模式的局限性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跻身全球市场前列的事实充分表明，中国那些位居中游产业、主营BtoB业务的公司，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与国家有联系的企业，都可以在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成为技术领先者。这些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的制造业政策将国内竞争与出口纪律结合在了一起，而且鼓励企业首先掌握现有技术，然后研发新技术。这一政策与日本、韩国曾经实行的政策是一致的。而且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政策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为中国大陆的政策让企业承受了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严格的出口纪律，而且大陆实行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也比台湾的做法更优越。

然而，在肯定中国国有部门制造业政策的同时，有三点应该谨记于心。第一点，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取得了成功，但其成功基本上局限于中游产业的BtoB业务。公有制企业最常见的缺陷就是它们缺乏在消费者市场上获

取成功所需的敏感性与灵活性，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那些居于中游产业的、与国家有联系的企业在学习先进技术方面做得很成功，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可以预测的过程，而且它们的企业业务做得也很成功，但当它们的活动要求它们了解个体消费者的时候，其表现则逊色不少。比如，在汽车行业，大型国企一直没能开发出深受消费者欢迎的自有品牌产品，它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失败。它们通过与外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而获取技术和设计，这与马来西亚宝腾汽车公司对外国企业的依赖性是一样的。中国的很多私营车企则比较了解消费者需求，本来更有可能研发出自有品牌产品，但它们受到了很大限制，因为销售外国品牌汽车的合资车企控制住了大部分市场份额。最有可能成功的私营车企则是四轮驱动技术专家——长城汽车，部分原因在于国企与外企建立的合资企业并没有推出能够与之相竞争的同类产品，因此无法将其排挤出局。其他私营车企，比如吉利和奇瑞，则只有十分微薄的利润。

在电信行业，即便华为也在竭力开拓个体消费者的市场。如同中兴一样，华为每年为沃达丰等跨国公司生产数千万部手机，但到目前为止华为自有品牌的手机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占据重要地位。这与韩国三星集团形成了鲜明对比。三星纯粹是个私营企业，它在从事企业业务的同时，也注重接近、了解个体消费者，开拓消费者市场。三星集团旗下的三星电子目前是全球两大智能手机生产商之一。而华为在成长过程中的很大一部分业务是向省市两级政府销售电信基础设施，⁴⁰后来才逐步扩大业务范围，开始外国政府和私营通信运营商合作。今天，华为的文化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企业对企业、企业对政府的文化，这一点对其打造顶尖手机厂商的努力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第二点就是，与消费者导向性的业务不同，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业务主要是获得政府采购订单或得到政府批准。中国企业很擅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做生意。中国政府对于本国企业会跟哪一个政权做生意几乎不做限制，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在提供贷款时也基本上不附加政治条件，所以，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缅甸、利比亚、刚果等国家包揽了很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然而，中国企业在和发达国家做生意时就不像在发展中国家那么顺利了。2010年，华为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移动通信设备合同，因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因受阻，失去了价值30亿美元的订单。此外，华为试图收购美国企业的努力因为被认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而以失败而告终。⁴¹这类障碍未来可能会影响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即便别国不援引“国家安全”问题，也可能会假借各类非关税壁垒来给中国企业的设备销售设置障碍。因为中国在国家采购过程中不会公开招标，而且没有签署《世界贸易组织

政府采购协定》，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讲，中国政府在这类事务中没有求偿权。日本和韩国的私营企业生产的很多产品，比如汽车、摄像机、智能手机等容易吸引富裕国家的消费者，所以它们能轻易进入富裕国家的市场。中国中游产业的设备制造商在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跨越政治门槛的时受到很多限制。

第三点是，虽然中国的中游企业似乎在技术进步之路上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在投资极为密集的时期，这种技术进步究竟会产生多少实际的成就，目前还无法准确得知。简单地说，当前中国为了获取先进技术而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以至于从表面来看肯定会产生引人瞩目的成就。在某些行业，中国的投资究竟能带来多大回报，目前还不明朗，恐怕再过几年才能看清楚。此外，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借鉴外国技术，又在多大程度上在搞自主创新，目前我们也不清楚。

铁路设备行业就是这一谜题的典型例子。200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投资金额高达3 95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网建设计划，计划到2020年，将中国高铁营运里程增加到16 000公里，其中一半以上的建筑工程在2010年底之前就已经建好。⁴²目前，中国高铁通车里程已经是日本新干线的3倍多，而且很快就会变成5倍。然而，为了修建高铁，到2010年底，中国铁道部的总负债已经达到了3 000亿美元，省级政府的负债规模更大。看到中国在高铁建设方面进行了规模如此之大的投资，美国政府也向国会申请530亿美元修建美国高速铁路网，但被国会拒绝了。

中国的高铁投资步伐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所以，铁道部技术获取战略的投入产出相对效率究竟有多高，目前还不明确。从某些层面来分析，这一战略的确不乏可取之处。铁道部在2004年正式签署重大技术引进协议之前，已经在这方面做了15年的研究。中国官员采取了一套经过事实检验非常有效的策略：先以市场巨大为诱饵吸引外国企业在中国开设办事处，然后花上数年的时间和他们谈判，最后再出钱引进技术。铁道部为了降低技术引进成本，把与技术供应商谈判的权力握自己手中。同时，为了便于中国的铁路研究机构研究现有的高铁技术，中国先后与4家世界领先的交通设备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签署技术转让协议，这4家公司分别是加拿大庞巴迪公司、日本川崎重工、德国西门子公司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⁴³

2010年，铁道部宣布中国两家国家控股的机车车辆制造企业不仅在5年内消化了高铁核心技术，还准备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制造速度更快的列车。铁道部高调宣传自主研发的CRH380和谐号列车，其最高时速380公里，堪称世界之最。刘志军因为承诺推动中国铁路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达到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被人戏称

为“刘跃进”。然而，到了2011年，似乎一切并不像表面看来的那么乐观。2011年2月，铁道部长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突然免职，并接受调查。所谓“严重违纪”，是 中国在描述腐败时采取的一种委婉表达方式。铁路机车领域行家、原铁道部高速办副主任周翊民发表了一番非同寻常的坦率评论，根据2011年6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周翊民指出，中国的高铁速度之所以比外国供应商的速度还快，是因为刘志军担任部长的铁道部降低了安全系数，对安全系数偏低的容忍度低于德国和日本的容忍度。周翊民还指出，中国的核心技术仍然是外国的，没有任何可以让列车提速的创新。⁴⁴他发表完这番谈话一个月之后，也就是到2011年7月23日，浙江省就发生了造成40人死亡的动车相撞事故。

中国铁路部门在学习技术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少进步，不可能得知准确的信息。中国也只是在近些年才开始实施由国有银行支持的出口纪律，所以，到目前为止，至于出口纪律的实施效果如何，来自国际市场的反馈还很少。在城市轻轨和传统机车车辆的出口上，中国曾经与马来西亚、加纳、突尼斯、委内瑞拉和土库曼斯坦签订过合同。在高铁设备（含列车与轨道）的出口上，中国已经和土耳其、委内瑞拉、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合同，但目前还没有完工交付。显然，中国能将其铁路设备销售给发展中国家，承担建筑工程的中国建筑公司在海外也能获得宝贵的经验。⁴⁵中国为学习高铁技术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因此，必须获得很大收益才能为这笔投资找到合理的理由。中国铁道部在2011年的收益估计会达到2 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10亿美元），而还本付息的压力则有2 500亿元人民币（约合390亿美元）。

被忽视的私营企业

朱镕基改革之后，中国工业经济结构的最后一个特色就是私营企业获得的政策支持要少得多。这一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重视公有企业、忽视私营企业的做法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总体来讲，由于中国大陆实施的支持政策较多，所以大陆的国有企业比台湾的公有企业做得好，而大陆的私营企业因为政策支持不足而遭遇了和台湾私营企业同样的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大陆这些与国家有关系的中游企业同消费者打交道时，自身局限性尤其明显。台湾没有企业能制造出三星集团那样的电子消费品，也无法制造出现代集团那样的汽车，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的私营企业是否能在消费产业变成全球知名的企业。中国企业具有在消费者市场上

竞争所需的敏感性、灵活性和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但它们往往缺乏挑战跨国企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和政府补贴。

这归根结底是政府政策问题。自朱镕基改革以来，中国大力扶持与国家有关联的企业，鼓励它们出口工业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备受约束，因为它们缺乏类似程度的政策支持。然而，民营企业的净出口额（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在2000年几乎为零，但2010年就达到了2 000亿美元，中国大部分净出口额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⁴⁶总体来看，中国国企净出口额在2000年到2010年为负增长，2000年，国企出口额勉强超过进口额，但到2010年，其进口额比出口额多出了1 530亿美元。这反映了上游企业所需的石油、铁矿石、煤炭等商品的进口量激增。中国的工业政策过度偏向国企，忽视民企，这些数据是否折射出了这一政策的根本缺陷，目前还没有定论。[\[22\]](#)民营企业虽然创造了如此优秀的出口业绩，但并没有得到国家的奖励。在大多数日用消费品业务中，就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与程度而言，中国民营企业超过了日本、韩国同类企业在类似发展阶段的表现。而且中国民营企业没有享受到非消费类业务带来的交叉补贴。比如，现代集团可以拿出造船业务创造的收益去补贴汽车业务。在中国，这样的非消费类业务基本上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在国家采购中，民营企业得到的订单远远少于国有企业得到的订单，在政府投资规模如此巨大的时代中，这对民营企业而言是一个严重不利的因素。而在某些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竞争对手是一些在市场上根深蒂固的国有企业，这些国企长期垄断市场，很难取代。汽车行业就是典型的例子。国有车企在提高本国汽车制造技术方面做得很少，因为它们依赖于合资企业中的外国技术合作伙伴，但它们占据了利率空间较大的市场区隔，民营企业只能依靠微薄的利润在夹缝中艰难度日。最后，民营企业获取贷款的能力远远比不上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限制。这个限制因素的影响可能被夸大的，实际上，对于有能力的出口企业，国家开发银行仍然会慷慨地给予巨额贷款。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限制因素在于，和过去相比，它们相对缺乏政府保护、政府采购订单和补贴。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对手往往是那些经验更加丰富、技术更加先进、资源更加充分的跨国公司，而且它们还不得不满足富裕国家提出的各种要求。

民营企业最常见的难处在于它们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它们的利润微薄，信贷额度有限，不足以支持自己长期开展产品研发工作。现金约束的一个表现就是民营企业无法完整地控制一个产品的价值链，因此无法确立自己的定

价权。这就意味着它们虽然能把一个产品组装起来，但无法控制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技术。这些关键零部件可能是一个产品中利润率最高的部分，比如一辆汽车的动力传动系统和发动机就属于这类零部件。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民营企业的财力不足以控制产品配送与销售渠道。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做的一些开创性工作表明，早在19世纪，美国一些跨国企业就成功地主导了产品的配送与销售渠道，因此也获得了定价权。⁴⁷当时美国企业也不像今天中国企业面临这么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中国市场上，跨国企业在资本、技术、经验等方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它们可以在产品价值链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环节谋求利润，也可以选择设置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来抑制竞争。

在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长期实施以公有企业为核心产业政策，很多民营企业无法获得政府的充分扶持，结果被限制在了价值链中利润率较低的环节。台湾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提出了“产业微笑曲线”理论来解释这种窘境。所谓产业微笑曲线，就是呈现出微笑嘴形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中间朝下，在一个产业的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设计和营销环节，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在很多台湾民营企业活跃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业务中，利润率最高的业务是曲线一端的品牌设计商、软件商和芯片制造商以及曲线另一端的大型零售商。宏碁集团由于资源有限，其业务范围也被局限在了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且其营运利润率遭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挤压。台湾企业虽然生产规模庞大，生产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较低的行列，但这些优势并没有给台湾企业带来较高的收益，因为上游企业通过加快创新速度来竞争，而下游企业又控制着大部分零售与配送业务，宏碁集团之类的台湾企业需要，而且也想要在全球市场上进一步扩大产业链，但台湾当局没有给它们提供足够的扶持。

产业微笑曲线在台湾的电子产业得到了体现，但在中国大陆的民营经济中，该曲线可能在更多产业中得到体现。家用消费品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在该产业中，大陆企业长期以来为知名跨国企业或沃尔玛之类的零售商制造产品，但畅销全球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不多见。除了家用消费品产业以外，中国大陆的摩托车产业、汽车产业和光伏产业等都越来越趋向于产业微笑曲线的中间阶段。⁴⁸跨国公司认为自己的创新步伐和营销实力可以让当前的产业微笑曲线形态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台湾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些跨国公司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政府不给予更多支持，大陆的民营企业恐怕难以发挥出自身潜力。

令人感伤的中国民营企业

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着重重难题，其中，比亚迪算是一个著名的案例。2008年9月，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通过旗下子公司——中美能源控股公司以2.31亿美元收购了比亚迪大约10%的股份。20世纪90年代，比亚迪依靠做电池业务起步，当时的技术支持主要来自欧美的手机公司，这些公司因为东北亚地区生产的电池价格较高，所以希望实现其电池供应渠道多元化。该公司的老板是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王传福。他利用低利润的电池业务带来的资本进军汽车制造业。在21世纪头10年里，该公司在借鉴日本汽车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利用中国汽车工业的繁荣期成为了全国增速最快、价格最低的汽车制造企业。王传福还宣布下一步打算把电池和汽车结合起来，成为电动汽车行业中的一支全球性力量。他承诺在2010年推出纯电动汽车，并从2011年开始出口到世界各地。他的崛起得到了很多全球性媒体的高调赞扬，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等。⁴⁹

然而，为了与那些资金雄厚的国有合资车企相竞争，比亚迪不得不大幅降低价格，以至于几乎不存在什么利润。比亚迪由于资源不足，无法掌握全套造车技术，所以，像汽车底盘、动力传动系统等附加值最高的一些零部件都是从国际供应商那里购买的。因为资源短缺，比亚迪甚至无法支持其连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务，对于研发电动汽车这种新业务更是力不从心，电动汽车复杂的软件和发动机管理系统会提出一些新的技术挑战。比亚迪唯一的补贴来源就是深圳当地的政府。它把政府补贴也算作企业的利润，以便让公司的财务报表看起来美观一些。⁵⁰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来源，而且从股市上获取的融资也耗费了很多，结果导致该公司在量产并出口电动汽车方面做出的承诺落空。比亚迪的市值在2008年12月，也就是巴菲特入股后不久，达到了250亿美元的峰值，但到2011年夏季，市值缩水到了不足峰值的1/10。

中国很多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民营企业曾经做出重大的承诺，但很快又落空。比亚迪只是一个最新的案例。在它之前，最受追捧的民营企业是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伏企业。该公司之所以走向破产，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投资资金不足，无力从光伏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过渡到高附加值环节，以至于最后资不抵债。如同比亚迪一样，尚德只能从所在省份得到为数不多的补贴，而且其业务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业务上。⁵¹中央政府的大部分绿色能源补贴都给了风电产业的国有企业，导致尚德几乎完全依赖出口实现增长。随着来自中国其他光

伏企业的竞争日益加剧，尚德发现其上游的多晶硅供应商以及下游的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企业拿走了光伏产业的大部分利润。2005年，尚德上市后，其股价一路飙升到了90美元。到2011年年中，虽然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光伏企业之一，但其股价暴跌至5美元以下。对于未来，该公司的一个美好期待是国家政策能够向私营企业倾斜一点。2011年，中国政府开始为国内太阳能行业的民营企业提供适度的补贴，或许这是一个好兆头。⁵²

中国民营企业在艰苦打拼的过程中虽然面临着诸多不平等，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际并购壁垒大为削减，它们可以更加容易地通过收购外国企业来获取先进技术并扩大价值链，但中国民营企业经常被资金紧张的问题束缚住手脚。收购企业固然需要资金，但收购完之后及时消化掉也需要资金。2010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另外一家民营企业——吉利汽车出资18亿美元从福特汽车手中收购了沃尔沃，以期消化吸收沃尔沃的技术和营销渠道。吉利汽车的利润率小，赢利十分有限，以至于到2011年夏季其市值才只有20亿美元。换言之，吉利的市值与它的收购对象相差无几。过些时日，雄心勃勃、意志坚定的吉利很可能会完全消化掉沃尔沃中一切有价值的元素，但到那个时候，吉利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技术前沿，但这个前沿已经进一步前移了。当中国企业接近技术前沿的时候，日韩企业就建议它们加速前进，超越前沿，但这需要巨大的财力，而中国民营企业往往缺乏这种财力。

民营企业固然可以通过上市来筹集投资资本，但按照中国的情况来看，股市根本无法取代政府的政策扶持，无法取代银行的长期贷款，无法扶持企业取得长足的技术进步。民营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获取的资金远远不足以支撑自己冲刺技术前沿，因为股市与企业之间存在“期待错配”的问题：企业的期待是获得长期资本来实现技术升级，而股市投资者的期待则是获得丰厚的短期收益。这种局面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者购入原始股的短期兴奋之后不久便认识到企业谋求技术领导地位的过程并不能快速地为自己带来利润，不可避免地会抛售股票，进而削弱了股市作为企业投资资本来源的地位，导致民营企业因资金短缺而不得不长期从事利润率偏低的活动。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样，2011年，中国24家规模最大、能得到政策支持和银行信贷、与国家有关联的中游制造企业平均市值是60亿美元，而中国12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市值只有20亿美元，这反映出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偏小、未来赢利预期偏低的事实。⁵³

情况可能更加不妙

总体来讲，中国制造业政策的基本点是很好的。中国政府不允许上游国有企业擅自提高矿产、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的价格，这样不至于妨碍中下游制造企业提高生产能力。很多和国家有关联的中游制造企业既能得到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扶持，又接受政府实施的出口纪律。中国官方的政策取向通常是非常审慎的，对于一个沿着由发达国家确定的技术路线图不断前进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弥足珍贵。

然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对民营经济存在偏见，在消费者导向型的产业中尤其如此，这种偏见肯定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的工业政策绝对算不上最优选择。然而，如果说中国政府刻意打压民营企业，则有失偏颇。在当代中国，民营企业遭受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一个正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以往政策路径的依赖性。虽然以前得到大量补贴的企业现在仍然能得到补贴，虽然现在国企仍然倾向于直接吞并与之竞争的民营企业，但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历史因素的影响，并不能说明当代中国官方在意识形态上敌视民营经济，恰恰相反，中国国企在设立新的子公司时，往往允许私人持股。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当民营企业在缺乏国家扶持的前提下取得成功之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政府不会刻意去打压它们，建筑设备制造产业的民营企业代表是三一集团，汽车制造产业的民营企业代表是吉利、奇瑞、比亚迪等，这些民营企业都可以和那些受到国家大力扶持的国企展开竞争。在太阳能产业中，很多企业家都是持有外国护照的海归人士，但当他们陷入经营困境时，政府同样会伸出援手。

中国政府对待民营企业的政策似乎缺乏连贯性，导致观察人士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每天都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不定。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之所以难以分析，就是因为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受到原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导致新旧政策交叉并存，从而导致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取向缺乏连贯性。⁵⁴中国当前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还不明朗，但这一政策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一个表现就是在这种政策下，中国那些与国家有关联的企业取得了卓越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树立了标杆，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重新定义了全球性的产业标准，目前中国在技术水平和创新成果方面还赶不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当然，中国的制造业政策可能会随着2012年的权力交接出现改变。如果中国国内出现金融危机，则其制造业政策可能会出现重大转向，很多新兴经济体都曾出现过这种情景。如果国家持股的公司（比如国企与外企建立的合资车企）没有度过危机而被卖给民营企业家，那么中国可能由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引人注目的经

济发展阶段。

投资资金从何而来

中国金融体系与日本、韩国的金融体系之间具有两个共同特征，正是这两个特征使得政府能够运用金融体系来有效地落实农业政策和制造业政策。第一个特征是，政府控制着银行，不至于使其遭到民营企业操控（民营企业谋求短期利益的目标与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存在一定的冲突）。第二个特征是，政府实行了资本流动管制措施，使得国家能够决定国内投资资金的用途，能够有效管理外资流动。

中国的银行都是国有化的，过去10年间，虽然银行上市了，但大部分股权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仍然是银行的实际控制者，级别最高的银行高管也是由政府任命的。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被称为“四大行”。这四家银行控制着全国银行资产将近50%的份额。在确定优先贷款领域时，这些银行接受国家的指导。中央政府还批准设立了一大批规模较小的全国性、地方性的银行，这些银行控制着全国银行资产将近30%的份额，它们给“四大行”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压力。但这些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也要接受政府的指导。

第三类金融机构是朱镕基在1994年设立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在过去10年间，从放贷规模的增速来看，这类银行是增长最快的一类金融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全国银行放贷总量中，政策性银行就占去了15%，这个比重是非常大的。⁵⁵在2011年末，仅国家开发银行这一家政策性银行的未偿还贷款就几乎达到了9 000亿美元，占据了全国未偿还贷款总量的10%，是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未偿还贷款的两倍多。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政策性银行对推动落实农业与制造业目标以及对实行出口纪律的扶持力度是最集中的、最大的。在东亚地区，与中国政策性银行最为相似的金融机构就是韩国开发银行（该机构为韩国国有银行）。然而，韩国开发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是在海外筹措的，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全都是通过发行国内债券筹措的。

国家开发银行的国内贷款结构中，很大一部分贷给了各级政府，这类贷款是以政府卖地收入作为担保的。（在城镇与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这种贷款进一步鼓励了地方政府的征地运动。）除了贷款给各级政府之外，还有一部分贷款流向了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往往需要由中国的制造企业和建筑公司负责提供地铁系统、火车、道路、电站等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土地价格呈现出了不断提高的态势。在给外国提供的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贷款国某些自然资源的开采权作为抵押的，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矿和铜矿的开采权，也有一部分贷款是基础设施项目与工业建设项目贷款，这些项目需要从中国企业采购建筑、运输、电信、能源等方面的设备与服务。政策性银行对外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直接流向了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企业。⁵⁶

为了回报金融体系为本国发展做出的贡献，中国政府采取了设定最低贷款利率和最高储蓄利率、扩大存贷款利差的做法，保证了那些储蓄类银行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商业银行通过购买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为其提供融资。这一管理方式与东北亚地区发展型国家的做法如出一辙。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了解决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问题，国家扩大了常规银行享有的存贷款利差。（之前，朱镕基在改革过程中关闭了一些亏损的银行，这些银行的债务就由政府制定的银行接管过来，20世纪90年代末的不良贷款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一部分坏账是通过国家注资的形式直接注销的，还有一部分是银行通过存贷款利差获得的巨额收益偿还的，这一利差每年能给银行体系带来数百亿美元的利润。⁵⁷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表明，控制存贷款利差等于政府给民众强行征收了一种隐性的个人所得税，不失为政府筹措资金的一个有效途径。存贷款利差给银行带来的巨额利润抵消了政府信贷管制措施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但政府实行信贷管制措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其工业政策目标必须具有现实可行性，不能造成信贷资金的过度浪费。20世纪90年代，中国关停了一大批扭亏无望、死气沉沉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信贷资金的浪费。

因为中国需要运用本国金融体系来实现发展目标，所以，资本管制是金融体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实行资本管制措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国内资本为了寻求更高收益而离开中国，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国际资本随意进出中国（如果不对国际资本流动加以管制，政府引导金融体系服务本国发展的能力就会遭到削弱）。中国的资本管制措施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这个庞大的机构负责落实的。该机构接受央行的管理。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资本管制措施很显然存在一些漏洞，根据粗略的估计，每年未经事先批准而进出中国的资金数量大约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⁵⁸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实行资本管制的逻辑依据并不是要筑起一道铜墙铁壁，完全阻隔资本跨国流动，而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效

的资本管制措施远比资本自由流动更加可取。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金融体系的管理方式总体来讲是有效的，政府控制住了本国金融体系，有效地利用本国金融体系去落实既定的发展政策。但东北亚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当一个政府为了促进发展而去操纵、压抑本国金融体系银行时，银行、企业和储户最终都会想办法挣脱国家的约束，因为银行希望挣脱国家的信贷管制以寻求利润空间更大的信贷领域，企业希望挣脱国家的投资政策指导，或者把低息贷款投资到房地产等利润较高的活动中，储户则不愿意继续忍受实际储蓄利率为负利率的状况，日益迫切地希望能在正规银行体系之外寻求收益状况更好的投资渠道，而且目前企业、金融机构和国际投机资本都在利用资本管制制度的漏洞来谋求暴利。所有这些趋势都反映出上述各方都希望能谋求短期赢利，而这种做法不利于国家推动本国制造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因而不利于长远的经济发展。很多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表明，在争夺金融体系控制权的斗争中，最终往往都是国家处于下风，中国可能也不例外。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能否在失去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权之前推动本国企业充分实现技术进步。

近些年来，中国金融领域内出现的一些迹象表明，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正在遭受着迅速的削弱，而且未偿还贷款的大幅增加凸显了国内金融危机引发的风险。首先，中国影子银行的数量越来越多，正规银行体系外的贷款规模也随之扩大。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富人阶层的崛起，由于正常情况下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给他们提供的投资收益率较低，所以他们希望寻求更高的收益，而银行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些客户，便帮助他们设立能够规避国家管制的财富管理基金，从而为其提供较高的收益。虽然这种情况会导致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士感到忧虑，但实际上中国影子银行的作用与日本、韩国的场外交易市场一样。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政府为了落实农业、制造业发展政策而压抑金融体系，注定会催生出替代性的、半合法性的储蓄与借贷模式。⁵⁹

虽然非银行类贷款的增加不断侵蚀着国家权力对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中国一直没有出现像东南亚国家那种私人控制银行的局面。如同东北亚地区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和场外交易市场一样，中国的财富管理基金和其他影子银行渠道从事的投资并不能算作正规金融体系的负债。中国的金融管理者一直以来也是这么提醒投资者的。如果这些投资渠道产生了损失，除非政府决定利用公款进行救助之外，都要由私营部门承担。从理论上讲，这就意味着通过非正规银行渠道投资的人可能会遭受损失，正如朴正熙政府在1972年实行了场外交易市场利息暂停支付的政策之后，

很多通过场外交易市场进行投资的人不得不自行承担损失。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影子银行体系比私人控制金融体系可取得多。正规银行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的并存，体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相互协调，这种协调有利于成功实施既定的发展政策。⁶⁰

除了影子银行引发了一定的担忧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忧虑的因素就是，近些年来，政府在利用信贷信贷促进增长的过程中，不像以前那么审慎了。但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即在当前发展阶段，中国仍然能够把大笔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仅会在现阶段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而且还将带来长远的积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效率。⁶¹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不同于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末那场泡沫破灭之后的基础设施投资方式，日本在本来只需要一座桥的地方修了两座桥，而中国则是把桥修在了原本需要桥却没有桥的地方。虽然中国近年来新建的供水系统和地铁系统带来的收益可能还无法覆盖运营成本，但提供这些设备的中国制造企业从中学到了知识和技术，而且这些基础设施也会在长远的未来源源不断地带来收益。

在今后几年中，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融资缺口难免会增加银行坏账，但如果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体现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在财政关系上的博弈。地方政府在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长期面临财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央政府倾向于通过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贷款，而不是通过预算转移给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拨款，但到最后如果地方政府无力偿还贷款，还得由中央政府出面处理。同样的道理，铁道部的巨额贷款（相当于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今后也得由国家出面进行救助。但如果中国铁路企业学到了足够多的知识与技术，能够把中国的高速列车和高铁技术销往世界各地，那么即便需要中央政府动用财政预算去收拾烂摊子也是值得的。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投机活动也愈演愈烈，不断扩大的影子银行业务对这一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中国政府有决心，也有能力抑制住房地产投机活动，这一点在2009年就得到了说明。当时，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出口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趋于弱化，中国经济日已呈现出复苏迹象。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立即采取房地产调控措施，取消了之前给房地产市场注入的刺激因素，规定住房抵押贷款的首付提高到房款的40%，同时房产证持有期满5年的房子在转售时方可享受免税待遇。这一调控过程再次凸显了中央政府对银行体系进行微调的能力是何其重要。在中国的家庭贷款结构中，住房抵押贷款所占比重最大，但

全国家庭贷款总量尚不及中国国民税后收入总量的40%。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家庭贷款总量是美国国民税后收入总量的130%。虽然中国近来出现了局部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现象，但这还不至于立即引发系统性风险，虽然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未来难免会有所弱化，但目前来讲，国家仍然牢牢控制着金融体系，这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前进之路

在分析中国政府近年来为了应对外部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时，最好不要认为这预示着金融纪律的突然丧失，最好将其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结合日本、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全球货币体系震荡与石油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去考察。中国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有利于继续让本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并没有因为外部经济震荡而暂时关闭本国企业学习技术的“学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债务问题。且不提养老金出现巨额缺口这种长期性债务，仅仅把中央政府债务、最终需要由中央政府处理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近期其他的“或有债务”^[23]加在一起，或许高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⁶²但其中一些债务可以通过出售一些容易变现的资产来偿付。此外，中国没有外债负担，且资本管制措施也意味着银行手中总会有大笔现金，银行不必担心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尽管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近年来缓慢加剧，导致实际储蓄利率为负，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储蓄资金大规模逃离金融体系的现象。⁶³

东北亚国家的金融史揭示出来的经验在中国也得到了验证。这些经验在韩国更是得到了极端的体现。第一个经验就是，政府完全可以在压抑金融体系，使其服务于国家发展政策，同时也不会引起国内恐慌或系统性的不稳定。第二，如果将金融压抑政策与资本管制措施结合在一起扶持经济发展，那么即便积累了高额债务，也不一定会引起国内动荡或遭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中国现阶段的债务风险还不及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债务风险，因为中国没有外债负担。）第三，要检验一个国家的金融压抑政策是否有效，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在金融压抑政策带来的机遇之窗关闭之前，该国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了多少。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有，随着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导致新生劳动力的缺乏，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出现结构性的放缓，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通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率来压缩债务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比率。此外，随着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在今后几年将从10%下降到7%，以及随着中国金融体系难免会更加开放，中国遭遇金融危机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大。有鉴于此，中国未来的投资拉动型的技术学习过程要减少对资金的浪费。如果未来的债务与产出之比继续维持在以前那种水平，将成为中国的不可承受之重，因为中国之前已经积累了巨额债务。因此，中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了。

过度的金融抑制政策

最后，人民币汇率长期遭到过度低估，影响了中国大陆的经济运行效率。这一点与台湾地区有点相似。到1987年，台湾迫于国际压力而提高新台币汇率，当时台湾已经积累了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规模仅次于日本，考虑到台湾地区的经济规模，其外汇储备的规模显得更大。大多数外汇储备都是台湾“中央银行”为了压低新台币汇率而大肆购入外汇。当时，经济学家们估计新台币汇率被低估了25%。⁶⁴中国大陆也采取了类似举措。在考虑到物价变化和中国经济规模之后，粗略的换算表明，台湾在1987年的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今天大陆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在2012年中期，大陆的外汇储备实际达到了3.3万亿美元。⁶⁵

汇率的低估相当于为本国企业提供了一种补贴。补贴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培育世界级企业是必不可少的，但通过压低汇率提供补贴则过于直接，它有助于推动所有企业发展出口贸易。如果通过银行体系和其他有目标的资助体系去提供补贴，则只有那些优先享受国家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企业才能获得补贴。压低的汇率也会补贴附加值较低的国内制造企业，这些企业对提升国家技术水平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而且更加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压低汇率甚至会为跨国企业的加工业务提供补贴。

压低汇率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一个压低汇率的国家而言，其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的价值终将会大幅下降，因为贸易伙伴会迫使其提高汇率。此外，压低汇率还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一些持续性的成本。中国央行为了减轻外汇储备盈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必须冲销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除了削减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之外，央行开始自己创造负债，发行人民币票据，央行为此所支付的利

息，便以供给更多基础货币的形式予以抵消。⁶⁶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说台湾地区异常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其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经济成功的象征，今天，更多的人认为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也是经济成功的象征。但如果说台湾的发展历程可以作为借鉴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未来将会再一次印证长期而严重地压低汇率并不能长期促进工业政策的落实。⁶⁷但说句公允的话，中国大陆对货币汇率的管制没有台湾当年那么僵化，人民币在2007年之后被允许适度升值。

中国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总体来讲，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切必要举措。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中国对于他国之前采用的政策做出了质量上的改进。中国的国有经济表明，如果把出口纪律和竞争机制结合起来，那么经济所有制并非落实工业政策的关键因素，但谁都不会认为中国对私营经济的偏见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当前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一致肯定，但在亚洲发展的问题上，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谓是最先探索成功的先行者，中国则是后来者。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其土地改革、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和金融压抑政策，而是在于其经济规模。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十多倍，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只有5 000美元，而中国已经成为了从矿产到电话再到汽车等几乎每一种商品的最大市场。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消费的产品的平均价格和尖端水平都赶不上富裕国家。令世界赶到震撼的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而不是创新能力。

中国的持续崛起是必然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吗？当然不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及其国内市场的规模会自然而然地为中国的成功提供保障，但中国的规模也使得中央政府难以落实有效的工业政策和减少浪费。中国还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世界一流的企业，历史也表明，就培育世界级企业而言，一个国家的规模大并不会带来什么优势。世界上很多最成功的企业都是在欧洲的小城市成长起来的，而那些规模较大的国家，比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在经济上都比较失败（美国除外），这是因为政府决策的质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景。中国也不例外。

在这方面，最近中国政治的一些动向并不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中国的人才选拔过程对家庭背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品德与才能则相对受到了轻视，长此以往容

易弱化社会流动性，中国的政治精英们也日益注重自身利益，而不愿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朱镕基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策变革，但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会再次出现这类人物。不幸的是，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的时候，领导者同样需要做出艰难的经济决策。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就说明，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发现了创造财富的秘诀而无须继续做出政策调整时，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弱。

即便中国在今后10年间避免了金融危机，人口变化趋势也会制约该国经济发展潜力。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削弱，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时期的人口结构，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退休人员非常少。目前，中国的这个时期已经过去。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正在变老，而且今后几年内新生劳动力数量会缓慢减少，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中国工人的议价能力正在提升。这种情况是合理的，而且来得太迟了。企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与工人工资水平低位徘徊这两种现象之间的差距也会随之缩小。（这种差距正是之前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再也不能通过逐年增加劳动力数量和投资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了，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口形势调整经济政策。对比一下中国与日本、韩国的情况，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时，中国出现人口增长停滞和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还比较低，低于另外两个经济体，这就意味着它的长期经济前景将会更具挑战性。到2030年，将会有3亿退休者依靠养老金生活，这些人只会消耗储蓄，不会创造储蓄，而人口数量也将在15亿人的峰值不断下降。

除了人口变化趋势很好预测之外，还有一点也很好预测，即中国的体制改革进度非常缓慢，将创造更多的社会摩擦，并最终导致中国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3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宣称自己致力于逐步打造民主的未来，而农村民主选举就是在这方面的初步探索，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做的工作非常少，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做得越来越少。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在完善法律制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近年来在这方面的进展有所放缓。一些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声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认识到了竞争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然而，尽管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更加完善的体制架构提出了要求，但中国不了解或不愿意考虑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竞争。

中国不仅要提高技术能力，还需要完善体制架构。只有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并真正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到目前为止，体制的低效还没有严重地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它最终会的。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国

内安全机构对民众的生活进行盯梢式管理（micro-manage），而且在这方面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国防经费。⁶⁸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中国将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体制也将严重滞后。如果继续沿着目前的发展轨道往前走，中国将成为一个体制滞后的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层面上，世界上的主流国家不应该担心中国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但在政治层面上，前景或许有些值得忧虑的地方。我们希望与19世纪的德国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相比，中国更加具有超越民族与地域的国际情怀，中国军队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公民的控制，这样中国这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才能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在未来的几年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仍然需要继续同一个更加强势的中国保持接触，用他们的政治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去影响中国。当然，如果我们能更加诚实地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和驱动因素，这个过程就会容易得多。

[22] 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4（2006~2007）》指出，2006年，全球市场继续保持较好的态势，国内政策环境持续改善，民营企业抓住良好的内外部机遇，充分挖掘开拓国际市场的潜力，进出口持续保持高增长势头，其中出口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我国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主体。——译者注

[23] 或有债务指由过去事项或既存事实引起的各类潜在义务，履行这些义务可能会导致政府支出压力加大。——译者注

后记

学会说谎

东亚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成功的秘诀并不简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元素：实行精耕细作的家庭农业模式，制定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政策，同时还要对金融业实行密切监管，使其服务于上述两个领域的发展目标。这一秘诀之所以能奏效，是因为在一个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人口的生产技能低，通过这一秘诀，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现有生产要素的效用。因为劳动力的素质不会因为政府政策而立即出现转变，所以政府要操纵经济，推动经济不断前进并创造财富，利用这些财富去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其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喜欢对市场经济进行政治干预。他们声称，市场本质上是有效的，但历史表明，市场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所说的那种原始社会中人们在森林旁边用浆果交换坚果，这中以物易物的行为不算市场行为。）¹人为创造市场就意味着，在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中，市场都是在政治权力反复塑造下形成的。如果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没有剥夺地主的土地然后进行再分配，就不会有农业产出盈余，工业发展也就丧失了农业基础。如果不集中精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那么现代经济体中的数千万离开土地的农民就找不到用武之地。如果不采取金融压抑政策，就不可能为经济学习的过程提供资助。在上述所有情况中，要有所发展，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

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给经济学家传达出的一个信息就是，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经济学，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类似于教育过程的发展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经济体的组成人员（最好是所有人员）需要获得必要的技术来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手进行竞争。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需要政府的培育和保护，也需要竞争。第二种是适用于更高发展阶段的效率经济学。这个阶段需要国家减少干预，更多地放松管制，建立更加自由的市场，并更加密切地关注短期利润。这两类经济学适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准确地界定这两个阶段之间的临界点。这是一个很困难，也很有趣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可以在这方面

多做些有效的研究。

不幸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效率论在全球经济理论争鸣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对经济发展进行诚实的讨论。虽然富裕国家需要考虑经济效率的问题，但不适用于贫穷国家。贫穷国家必须学会撒谎，一方面公开赞成富裕国家大肆赞扬的自由市场理论，另一方面则继续采取干预政策，先让自己变得富裕，然后再考虑效率问题。建议别人去撒谎往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这种情况下，这种建议是有必要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像苏加诺、马哈蒂尔等人那样明确拒绝认可西方经济理论的主导权，并言辞激烈地抨击最主要的倡导者——美国，这不是明智之举，远不如效仿当年的朴正熙或当代的中国，发表公开声明，认可自由市场的重要性，然后悄悄地实行干预经济的举措。

然而，关于哪种经济发展政策最合适的问题，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二战”以来，一些国家把家庭农业模式、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政策和金融压抑政策结合在了一起，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富裕，这些国家肯定不愿意或无法认识到其发展模式的局限性。这些国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东亚的日本与韩国以及欧洲的意大利，²它们一直顶着外界的阻力，不愿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即便经济已经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并需要放松管制的时候，它们也没有放松。韩国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失时机的干预下才放松了管制，如果没有危机，没有适时的外界干预，韩国也不会推行这类改革。如果当时政策不改变，当代日本或意大利的经济肯定会陷入僵化状态。

其次，某些东亚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经常违心地说经济发展是定义社会进步的唯一元素。这一立场与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具有密切关系，这种价值观认为，亚洲人民（具体指的是谁？）不希望和富裕国家的人们得到同样的东西。这种言论是不正确的。经济发展只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部分，除了经济发展之外，社会进步还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元素，比如自由和人权，这些元素与经济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某些国家故意无视体制改革，不愿意创建独立的司法体系，不愿意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代表性的政府，为了给落后的体制寻找合理性的根源，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惜抛出“种族特殊论”的托辞，说自己的民族具有特殊的历史与文化，不需要借鉴其他所谓先进的体制。其实，这种状况并不符合人民的期望。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之外存在大量的“黑监狱”³，如果你的朋友或亲戚一不小心就消失在这个国家的黑监狱里，那么这个时候，你能买得起小轿车还是买得起摩托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你吃的食品因为厨房缺乏环境控制或者因为厨师采用了有毒原料而

遭到了污染，而且官方却为虎作伥，蓄意掩盖事实，那么即便是新厨房也没有什么意义。正在崛起的国家除了要追求经济发展之外，还要追求其他一些方面的进步，努力实现全面发展。以中国为例，其政府不愿积极地讨论政治和社会进步，让富裕的、自由的国家感到惶恐，以至于要坦诚地讨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变得不可能了。

我们还有可能再次经历像日本、韩国、中国大陆或台湾那样的经济变革吗？很可能不会，原因很简单。如果贫穷国家没有开展有效的土地改革，很难在不引发致命债务危机的前提下保持7%到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反观当今各国的政治议程，都不包括彻底的土地改革，也不包括政府为农民提供农艺和营销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反而促进了小额贷款，鼓励农村贫困人口设立街边小摊销售商品，而由于农民都比较贫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摆摊销售商品并行不通。世界银行的这个建议属于拙劣的发展建议。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曾经是倡导土地改革的主力军，但现在它对贫穷国家彻底开展土地改革的前景感到非常悲观，所以把游说工作的重点从土地改革转移到了微型农田上，它试图说服贫穷国家的农民设立面积只有数平方米的微型农田，希望通过这种变革措施为农村居民提供粮食和收入。但由于这些改革措施对农业发展的干预力度十分有限，肯定不会创造什么经济奇迹。

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议程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认真地开展土地改革。菲律宾土地改革就是一场闹剧，而且这场闹剧仍然在延续着。既然如此，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是否能够通过一些别的途径来改善其经济表现呢？最明显的一个措施是，它们可以让东盟充当有效落实产业政策工具。在东盟这样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市场上，东盟的4个核心经济体没有理由不实行有效的幼稚工业保护政策（其实越南也可以算作东盟的重要经济体，但本书略去不谈），⁴但目前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会成为现实。东盟非但没有提高进口壁垒，扩大出口贸易，并培育本地区制造企业，反而同那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包括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之间的政治领袖们基本上没有凝聚力，也没有进行过具有实质内容的对话。新加坡这个离岸金融中心虽然对东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非常不利于推动东盟的经济发展。如果瑞士或摩纳哥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欧洲工业政策的影响而改变了原来的发展道路，同样无助于自身发展。东南亚的发展经历就是一个警钟，告诫人们哪些事情不利于经济变革。东南亚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主要败笔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虽然这些国家拥有大量农民，而且这些农民的潜力一旦得到发挥，就能迅速提高农业产出规模，但依旧允许地主制度和规模农业的存在；没有对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给予充分的重视；没有给企

业家提供充分的扶持与保护；后来又过早地放松了对银行、股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将这些元素视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真正象征。这就是东南亚地区相对失败的原因。

不能指望富裕国家把贫穷国家从拙劣政治家的手中拯救出来。不过，马哈蒂尔和苏哈托之类的政治家还不算太糟糕。富裕国家及其创建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组织却出现了重大失误，它们没有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向贫穷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拙劣的发展建议。我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一个成功实现发展的重要经济体从一开始就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和放松管制政策，一直以来所需要的往往是积极的干预措施，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唯有如此，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初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学习。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直面这一历史事实，才导致几十个国家陷入尴尬的发展状态，才导致贫困的农村成为恐怖组织滋生的温床，这些恐怖组织起初只是为了反映东南亚国家受到压迫的农民的诉求，但现在直接威胁到了富裕国家的民众。要落实本书讨论的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政策，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如果不实行这样的政策，就表明我们可以接受当前的世界。看一看南亚、中东和非洲，然后问问自己这种情况是否可以接受。

致谢

本书是受伦敦Profile出版社社长安德鲁·富兰克林和纽约大西洋格鲁夫出版社（Grove Atlantic）社长摩根·恩特里恩的委托下撰写的。我感谢他们持之以恒的支持。莎莉·霍洛韦是一位非常高效的编辑，这是我第三次与其搭档。在编辑过程中，安德鲁·富兰克林和佩妮·丹尼尔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并进行了持续的指导。纽约的贾米森·斯托尔兹是北美版本的负责人。本书为精心打磨之作，非常感谢每个人，包括我的经纪人克莱尔·亚历山大，谢谢你的幽默。

如果没有各位朋友为我提供免费住宿，本书是无法完成的。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包括东京的马库斯·孔索利尼，北京的葛艺豪、沈岱波、马特·福尼、鲍拉·祖尼、甘达维和符佳。香港的西蒙和米霍·卡特利奇，吉隆坡的乔什·格林与罗何莲，新加坡的伊沃·菲利普斯和特雷西·福斯特。菲律宾互助贸易基金会的泰德·洛佩兹为了帮我在菲律宾做研究不厌其烦地做了很多事情。此外，大和日英基金会（The Daiwa Foundation）为我在日本的实地访谈提供了一笔资助。

剑桥大学贾吉商学院和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都善意地允许我暂停博士论文来完成本书的写作。感谢彼得·诺兰鼓励我进行学术研究，感谢简·戴维斯和彼得·威廉姆森为我研究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指导。本书的一些观点是我在剑桥大学读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时候提出来的。彼得·诺兰、张夏准、加布里埃尔·帕尔马、迈克尔·库津斯基、阿吉特以及杰夫·哈考特等给了我很多启发，谨表感谢。

在写书稿的过程中，葛艺豪、乔纳森·安德森以及我的妻子蒂芙尼·鲍恩提供了很多令我受益匪浅的评论和支持。在研究阶段，很多人为我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两个人不希望我道出名字，但大部分是可以道出的，其中包括：安·瓦斯沃、西田义章、罗纳德·道尔、玛丽·孔特-赫尔姆、唐纳德·科克、哈里·巴帝斯亚、约翰·斯温森-赖特、张永俊和阿拉尼斯·秦、珍妮特·张以及龙洲经讯的其他人。此外，还有卡尔·里斯金、威廉·科比、乔莫、哥梅兹、亨利·巴洛、巴里·韦恩、阿斯加里·史蒂芬斯、史蒂夫·海格尔、陈达怀、查美·麦基尔、科文·欧诺克、亚当·施瓦茨、恩迪·巴云尼、约翰·麦克贝思、谢重生、吉恩·加尔布雷克斯、保罗·哈奇克罗弗特、罗赞·吕滕、菲利普·鲍林、罗伊·普罗斯特曼和李平。露西·麦克马洪、威尔·罗兰兹把我收集的大量学术资料

进行加工，整理成了可以出版的附录，关于本书的一些更新信息将发布在下面这个网站上，www.howasiaworks.com。

注释

前言

1. 引自198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华盛顿：世界银行，1987年）。该报告采用的经济模型效力较弱，因为它把离岸金融中心也囊括了进去，而且在分析产业政策时，仅仅着眼于国家层面，而没有深入到产业部门层面。从部门层面来分析，大多数经济体的制造业政策都存在重大差异，尤其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制造业政策。除了经济模型值得商榷之外，该报告对经济史的评述也存在高度争议，因为它着重突出英国在19世纪中期放松经济管制的政策，当时英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技术领导者的地位，而对于英国在坐到这个位置之前实行的保护主义政策却绝口不提。对于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逐渐崛起时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该报告也只是轻描淡写，仅仅提到了美国关税税率在1857年左右达到了历史性的低点，即24%，而事实上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高达40%。关于欧洲的部分，很少讨论到德国的工业政策以及工业卡特尔，却大谈特谈法国在19世纪采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导致法国的经济状况远远不及德国）。详见该报告第38页和第77页。就某些方面而言，198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是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先驱”，因为1983年那一版最早导致人们认为韩国的发展是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但这种认识是高度存疑的。

2. 引自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世界银行专题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该报告存在很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时任世界银行行长刘易斯·普雷斯顿（Lewis Preston）在前言部分发表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言论就恰恰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他承认：“本报告研究的这八个经济体所采用的政策差异性非常大，既有放任自由的政策，也有强烈干预的政策。因此，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东亚发展模式”。但接着往下读几行就会发现，他开始阐述世界银行那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核心信息，他指出：“本报告的作者得出的结论认为，各个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一套共同的、市场友好型的经济政策，这套政策带来了资源的积累，优化了资源的分配。”整个报告里面，这种前后不一致的现象随处可见。

3.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 是“华盛顿共识”这个术语的创造者。这三个机构的总部均位于华盛顿。威廉姆森列出了构成华盛顿共识的十大政策。其中，与本书关联性特别大的几个是利率市场化政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意指放松对外资的限制）、贸易自由化政策、开放市场、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以及放松政府管制的政策。

4. 查默斯·约翰逊 (Chalmers Johnson) 的观点引自斯坦福大学于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 (1925~1975)》(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1925~1975) 一书第viii页。艾丽斯·阿姆斯登 (Alice Amsden) 的观点引自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的《逃离帝国：发展中世界的天堂地狱之旅》(Escape from Empire: The Developing World's Journey through Heaven and Hell) 一书第9页。不知道为什么，她在这本书中只提到了泰国这一个东南亚国家。沃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 的观点引自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的第三版《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第xvii页。

5. 参考迈克尔·斯彭斯 (Michael Spence) 编纂的、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于2008年出版的《增长报告》(The Growth Report)。该报告列举了13个在“二战”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连续25年不低于7%的经济体。我略去了3个离岸金融中心（中国香港、马耳他及新加坡）、1个袖珍的石油国（阿曼）以及1个过度依赖钻石矿的小国（博茨瓦纳）。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选取了东亚地区7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

6. 2010年，韩国、中国台湾发布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21 000美元和19 000美元。马来西亚的人均生产总值是8 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库，在1962年（即最早发布此类数据的年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每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均在100美元左右。世界银行当时没有发布中国台湾的数据。从1962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来看，日本的繁荣程度最高（610美元），其次是马来西亚（300美元）和菲律宾（210美元）。

7. 引自义原国雄 (Yoshihara Kunio) 所著的、牛津大学于1988年出版的《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崛起》(The Rise of Ersatz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一书。同一时期，日本学者末广昭 (Suehiro Akira) 著有《泰国资本的积累 (1855~1895)》(Capital Accumulation in Thailand,

1855~1895) 一书，由东京的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于1989年出版，该书结合泰国这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拓展了义原国雄在观察东亚地区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观点。

8. 人类发展指数是在人均国民总收入（即经济收入状况）、寿命预期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即成人识字率）这三个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得出的。

9. 虽然很多经济体的整体生产率都受到了农业的拖累，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比如丹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人口基数小，耕地面积大，农业技术超级发达。但即便这些国家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例外情况，因为其农业领域成功的主要秘诀在于运用工业技术去加工农产品。

10. 早在殖民时代，大英帝国的财政部就对发展离岸贸易中心具有了深刻认识，经常力主发展离岸贸易中心以减少财政投资，但很多夸夸其谈的政客与企业家则鼓吹把面积较大的殖民地作为发展重点，以便自己在这些殖民地从事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进而获得大英帝国政府的资助。今天的离岸金融行业都在一些小岛上。那些在经济上具有掠夺性的帝国的会计人员比较喜欢这类金融中心。（今天，大英帝国的一些小岛已经失去了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南亚的孟买岛和非洲的拉各斯岛最初之所以吸引英国人定居拓殖，就是因为它们是岛屿，但今天已经算不上离岸金融中心了。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的槟城岛曾经是离岸金融中心，但今天已经让位于新加坡了。在讨论东亚发展政策时，很多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著作都明确拒绝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纳入讨论范围，比如英国剑桥大学的韩裔经济学教授张夏准（Ha-Joon Chang）编写的《东南亚的发展经验：奇迹、危机与未来》（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e Miracle, the Crisis and the Future，由英国Zed Books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第18页、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工业化》（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s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第4页以及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所著的《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角色》（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第xv页。韦德甚至这样写道：“它们是城邦，不应被视为具有典型经济结构的国家。”

11. 比如，可参考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著、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各国经济表现之诠释》（Explaining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Nations) 一书第117页。

12. 涉及古巴的一切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2009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古巴的毛入学率高达100.8% (毛入学率有可能超过100%, 因为一些曾经辍学的儿童可能会再次入学)。古巴2009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是6 876美元。由于毕业生多, 工作机会少, 导致很多古巴医生都去委内瑞拉开展业务, 而且委内瑞拉也可以利用其石油收入给这些古巴人支付更高的薪酬。

13. 关于中国台湾的教育体系, 请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64页和第190页。1983年, 一个名为“台湾‘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的机构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自从1960年之后, 台湾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中间, 工程类占据1/4。平均来讲, 工程类毕业生的收入比法律类毕业生的收入高出11%。

14. 参考戴维·兰德斯 (David Landes) 所写论文《日本与欧洲工业化之对比》 (Japan and Europe: Contrasts in Industrialization), 该文收录于威廉·洛克伍德 (William Lockwood) 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的《国家与日本的经济企业: 政治经济增长论文集》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in Japan: Essay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一书。1900年, 日本达到小学学龄要求的男童中, 仅有7%选择职业学校和学徒学校。1930年, 大学毕业生中仅有9%是工程类毕业生, 而到20世纪30年代末, 这个比例攀升到了16%。到“二战”爆发前, 日本大学仍然偏重人文学科。

15. 参考近藤雅之 (Masayuki Kondo) 所写的《改进马来西亚产业技术政策与体制》 (Improving Malaysian Industrial Technology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一文, 该文收录于乔莫·夸梅·孔达拉姆 (Jomo Kwame Sundaram) 及格雷格·费尔克 (Greg Felker) 编纂的《技术、竞争力与国家》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State) 一书。该书由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Routledge) 于1999年出版。

16. 日本的委员会通常是经由选举产生的。中国台湾的委员会则是经由任命产生的, 但委员会的章程、准则要求他们代表普通农民的利益。

第一部分

农业：土地政策到底有多重要？

1. 参考W·A·多尔夫·奥因思 (W. A. Dolph Owings) 等人编纂的《萨拉热窝的审判》(The Sarajevo Trial) 一书第54页。该书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的文献出版公司 (Documentary Publications) 于1984年出版。

2. 关于亚洲农户的除草方式，罗纳德·道尔 (Ronald Dore) 在其所著的《日本的土地改革》(Land Reform in Japan) 一书第5页指出，在日本，传统上，水稻一季只需除三次草。该书由伦敦的阿斯隆出版社 (Athlone) 于1984年出版。

3. 此处计算的依据是美国的平均水平，即每公顷产出8.5吨，每吨价格为300美元。

4. 参考郭婉容 (Shirley Kuo)、古斯塔夫·拉尼斯 (Gustav Ranis) 与费景汉 (John Fei) 合著的《台湾成功的故事》(The Taiwan Success Story) 一书。该书由美国西景出版社 (Westview Press) 于1981年出版。

5. 此处数据是1953年到2007年的平均水平。数据来源是台湾农业委员会和菲律宾糖业研究学会基金会 (Philippines Sugar Research Institute Foundation)。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一直是蔗糖的一个重要产区，但现在甘蔗已经不再是台湾的重要作物了。

6. 关于马来西亚的情况，参考林德义 (Lim Teck Ghee) 所著的《马来亚殖民地的农民及其农业经济，1874~1941》(Peasants and Their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olonial Malaya, 1874~1941) 第90~95页，该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东亚历史专著系列丛书”的一部分。殖民地时代，英国殖民者为了防止马来亚的小农同橡胶种植园主进行竞争，采取了很多措施，林德义也对此进行了探讨。关于肯尼亚与津巴布韦的情况，参考比尔·弗罗因德 (Bill Freund) 所著的《当代非洲的形成》(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frica) 一书第111页，该书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在该书中，作者提到，在南罗德西亚 (津巴布韦的旧称)，白人殖民者大力发展大规模的种植园农业 (包括茶园)，并为种植园提供补贴，以维持其赢利，并希望其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但实际上为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却是小农生产者。虽然白人殖民者征走了黑人农民将近一半的可耕地，但黑人农民通过耕种自己的小型农田，城市所需的农产品中，仍然有大部分都

是小农供给的。因此，弗罗因德认为，“农民在每英亩土地上的生产效率其实更高。”克劳斯·丹宁格（Klaus Deininger）在其所著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改革》（Land Policies and Land Reform）一书第16页也指出，在殖民地时代，津巴布韦的殖民者为了发展种植园农业，颁布了禁止将大片土地拆分的法律，并阻止黑人农民发展小农经济，该书由世界银行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7.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根据这一论点，农业在第一个经济增长阶段扮演着促进原始资本积累的角色。参考罗斯托所著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

8. 丰田和日产为了适应农村地区的载重需求，对承载车身的底盘做了相应的调整。中国最成功的国际性企业——华为，最初也是通过为农村提供电信设备而实现突破性发展的。

9. 参考迈克尔·利普顿（Michael Lipton）所著的《为什么穷人依然贫穷》（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

10. 最近，迈克尔·利普顿在《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L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第275页指出，拉丁美洲的农村地区依然处于极度贫穷的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土地分配极度不均，土地利用效率极低。

11. 关于台湾的评估来自于李国鼎（K. T. Li）所著的《台湾的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一书第21章，该书由Shepherd-Walwyn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12. 或者如克劳斯·丹宁格所说的那样：“资产（指土地）初始分配的不平等与长期的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会降低穷人，而非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在丹宁格的数据组中，长期增长指的是从1960~1992年这段时间。他发现，在土地分配非常不平等的情况下，即土地分配基尼系数超过0.7的情况下，波多黎各和以色列这两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仍然能够维持超过2.5%的年平均增长率。其中，波多黎各是一个小型经济体，是美国的一个自治邦。参考丹宁格与林恩·斯夸尔（Lyn Squire）合著的《看待旧问题的新方式：不平等与增长》（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 Inequality and Growth），该文刊登于《发展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第57卷（1998年第2期）第259~287页。

13. 中国在唐朝时期的土地管理制度其实比此处所叙述的复杂得多，因为小块儿土地也是永久性地分配给了农民。对于一个古代国家而言，唐朝官方的要求是非同一般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历史学教授艾兹赫德（S. A. M. Adshead）所著的《唐代的中国》（T' ang China）一书第90~91页，该书由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如同唐朝的其他制度一样，土地制度也在公元750年左右陷入瓦解。但艾兹赫德评论说：“到那时，已经出现了一个由管理者、男性及女性小农组成的新阶层，这可能是当时中国农民做出的最佳选择。”

14. 日本明治时期的土地税改革开始于1873年7月，结束于1876年。参考山村耕造（Kozo Yamamura）所写的《明治时期的土地税改革及其影响》（The Meiji Land Tax Reform and Its Effects）一文，该文收录于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 Jansen）和饶济凡（Gilbert Rozman）编纂的《过渡中的日本》（Japan in Transition）一书，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15. 1868年，日本的人口大约为3 500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上升到7 000万。关于日本在1900年之前没有进口过粮食的情况，参考佩内洛普·弗兰克斯（Penelope Francks）、约翰娜·博斯特尔（Johanna Boestel）等合著的《东亚的农业与经济发展》（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一书第52页，该书由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16. 参考利普顿所著的《为什么穷人依然贫穷》一书第35页，在该书中，利普顿提到了15个在明治维新时期已经实现富裕的国家。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工业开始腾飞时，其人口的城市化率达到了35%到70%。C·M·劳（C. M. Law）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城市人口增长（1801~1911）》（The 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1801~1911）一文中提到，英国人口在1811年的城市化率是36%，该文收录于《英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第41期（1967年6月那一期）第128页。

17. 参考利普顿《为什么穷人依然贫穷》一书第24页。

18. 参考佩内洛普·弗兰克斯、约翰娜·博斯特尔等合著的《东亚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第63页。

19. 此处数据系基于拉德津斯基（Wolf Ladejinsky）在《艾奇逊—久费瑞备

忘录》(Atcheson-Fearey Memorandum)中所做的评估。该备忘录是推动日本在“二战”之后开展土地改革的一份关键文件。据估计,在“一战”之前,日本农户的负债水平为每户135日元,到1937年则达到了1 000日元,在利息最高时,农户每年支付的债务利息会消耗掉1/3的净收入。

20. 参考罗纳德·道尔所著的《日本的土地改革》一书第49页。

21. 参考佩内洛普·弗兰克斯、约翰娜·博斯特尔等合著的《东亚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第20页。

22.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此次起义的信息,请参考罗纳德·道尔所著的《日本的土地改革》一书第3章。

23. 现在被称为新潟市北方文化博物馆。

24. 关于寿命预期的数据引自路易斯·普特曼(Louis Putterman)所著的《中国农村发展的连续和变化》(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 s Rural Development)一书第9页,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数据引自卡尔·里斯金(Carl Riskin)所著的《中国的政治经济》(China' s Political Economy)一书和韩丁(William Hinton)所著的《翻身》(Fanshen)一书第2章。关于邓家的信息,是我在1994年8月份去实地考察获得的。

25. 此处引自R·H·托尼(R. H. Tawney)所著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一书第66页,该书由伦敦的乔治·爱伦和昂温出版社(George Allen & Unwin)于1932年初版,由波士顿的灯塔出版社(Beacon)于1966年再版。

26. 参考韩丁所著《翻身》第1章。

27. 这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的情景,当时距离中国共产党全面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还有好几年的时间,但中国一些农民已经开始重新采取家庭耕作模式了。

28. 参考再版的《翻身》第615页的“附录A”。

29. 大部分人估计的人数都是在100万到500万之间。之所以出现差异，部分原因在于在计算过程中仅仅统计了那些因土地改革而死的人，还是一并统计了“解放”前后因其他政治斗争而死的人，比如国民党反革命分子。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崔瑞德和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合作完成的《剑桥中国史》的表述，中国很多地方都有一个政策，要求每个村庄至少处死一名地主。

30. 参考韩丁所著的《翻身》第200页。

31.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没有全国性的农业产出数据。一种可能性非常大的情况是，在20世纪40年代，在那些土地改革没有遭到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严重破坏的地区，农业产出有了明显增加。从1949年到1952年，农业产出大幅增加，早期的中国官方数据称这一阶段内粮食产出的增长率超过40%，但根据托马斯·威恩斯（Thomas Wiens）的估计，这一增长率更有可能在25%左右，其依据就是官方数据严重低估了1949年这个基准年度的农业产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52年到1957年之间，粮食产出进一步增加了20%，这一数据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从绝对数据来看，根据历史记录，在1949年之前，粮食产出最高的年份是1936年，当时为1.39亿吨，1952年是1.55亿吨，1957年是1.95亿吨。卡尔·里斯金与托马斯·威恩斯合作完成的《中国农业政策与农业技术能力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Policies and Capabiliti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一文，收录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于1978年编纂的论文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Chinese Economy Post-Mao）。曾经担任中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张根生著有《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一书（Rural Reform in China），由深圳海天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张根生在其著作中引用了中国官方在20世纪80年代发布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1949年的粮食产量。他在没有指明数据出处的情况下提到，1949年的粮食产量是1.132亿吨，1953年是1.668亿吨，1956年，即实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前夕，是1.927亿吨。根据他的数据来推断，中国粮食产量在7年内增加了70%。

32. 参考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所著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该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参考克里斯托弗·布拉莫尔（Christopher Bramall）所著的《四川的生活标准（1931~1978）》（Living Standards in Sichuan, 1931~1978）一书，该书由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

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于1989年出版。

33.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是根据1948年《援华法案》设立的。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48年10月在南京举行，当时，毛泽东的共产党即将最终击败国民党的军队。

34. 参考拉德津斯基 (Ladejinsky) 与瓦林斯基 (Walinski) 合著的《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Agrarian Reform as Unfinished Business) 一书第289页，此处引用的话出自致福特基金会的乔治·甘特 (George Gant) 的一封信。

35. 参考拉德津斯基所写的《拯救亚洲为时太晚？》(Too Late to Save Asia?) 一文，该文发表于1950年7月22日的《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后又收录于拉德津斯基与瓦林斯基合著的《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一书。拉德津斯基在中国大陆仅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当时共产党即将在1949年10月取得最终的胜利。

36. 引自《艾奇逊-弗尔里备忘录》(Atcheson-Feary Memorandum)，1945年10月26日，载于拉德津斯基与瓦林斯基合著的《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一书第575页。当时，罗伯特·费尔里 (Robert Feary) 供职于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办公室，是一位支持东亚土地改革的官员。小乔治·艾奇逊 (George Atcheson Jr.) 当时是美国国务院派往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

37. 参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关于农地改革的411号指令》，载于拉德津斯基与瓦林斯基合著的《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一书第579页。

38. 参考罗纳德·道尔所著的《日本的土地改革》第6章，第129页。日本土地改革过程中各事件的顺序如下所示：日本国会起草自己的法案；麦克阿瑟下令开展土地改革；法案被通过；占领军拒绝了第一个法案；日本国会于1946年10月起草第二套法案。第一套法案规定了较高的土地保有标准，地主每人可以保留5公顷土地，而第二套则降低到了3公顷。这两公顷的变化直接涉及被征收土地的地主是10万户还是100万户。麦克阿瑟在推动日本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时扮演的角色不应该被高估。英国和苏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拉德津斯基提出了3公顷的土地保有标准之后，英国表示支持。苏联通过盟国对日理事会 (Allied Council for Japan) 要求日本降低土地保有标准。盟国对日理事会设于东京，由中国、英国、美国及苏联四国代表组成，委任美国代表为主席，是盟国在日本问题上的咨询机构。参考普策尔 (Putzel) 所著《一片被征服的土地》(A Captive Land) 第3章。

39. 地主也会收到少量的现金。

40. 参考罗纳德·道尔所著的《日本的土地改革》第172~173页。关于地主试图避免土地被征的案例的数量，引自该书第151~152页。

41. 日本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估计，如果把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消费指数设为基点，即100，那么，到1954年，日本农村的消费指数达到了136，而城市的消费指数只有94。引自罗纳德·道尔所著的《日本的土地改革》一书第202页。

42. 引自佩内洛普·弗兰克斯、约翰娜·博斯特尔等合著的《东亚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第4章。

43. 引自拉德津斯基所著的《朝鲜的农业及其问题》(Chosen's Agriculture and Its Problems)一文。该文于1940年首次刊登于《外国农业》期刊，后又收录于拉德津斯基与瓦林斯基合著的《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一书第49页。(此处的朝鲜指整个朝鲜半岛。)

44. 参考普策尔所著的《一片被征服的土地》一书第80页。

45. 引自约翰·鲍威尔森(John P. Powelson)与理查德·斯托克(Richard Stock)所著的《被背叛的农民：第三世界的农业与土地改革》(The Peasant Betrayed: Agriculture and Land Reform in the Third World)一书第179页。该书由华盛顿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于1990年出版。

46. 参考顾应昌(Anthony Y. C. Koo)所著的《土地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The Role of Land Reform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第8页。该书由美国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于1968年出版。

47. 参考顾应昌所著的《土地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一书第44页。

48. 参考顾应昌所著的《土地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一书第38页。根据台湾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共发生了19.5万笔独立的土地所有权变更交易。参考“表12：所有权的增加——土地改革前后的台湾”。

49. 参考郭婉容、古斯塔夫·拉尼斯与费景汉合著的《台湾成功的故事》一书第53页。

50. 参考《台湾成功的故事》一书第5章。该书第45页的表格整合了多个关于台湾收入状况的调查数据。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 (Hollis Chenery) 于1964年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了60个经济体进行收入状况调查, 结果显示, 底层人口 (在台湾人口总量中占比40%) 的社会财富在社会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51. 比如, 在1953年, 初级农产品占据台湾出口商品的14%, 深加工农产品占据78%, 而工业品仅占据8%。

52. 台湾糖业公司还继承了日本殖民者留下来的甘蔗田, 后来, 这些甘蔗田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划分为小片, 租给农户继续种植甘蔗, 但与日本殖民时期相比, 此时的地租条款对农户更加有利, 而且国营企业承担了大量的农业推广工作。

53. 关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活动的的数据引自托尔贝克 (E. Thorbecke) 所写的《农业发展》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一文, 该文收录于格兰森 (W. Galenson) 主编的《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一书第182~183页。该书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关于农业推广的数据引自郭婉容、古斯塔夫·拉尼斯与费景汉合著的《台湾成功的故事》一书第54页。1960年, 从每10万人拥有的农业研究和科技推广人员数量来看, 台湾是79个, 日本是60个, 泰国是4.7个, 菲律宾是1.6个, 印度是1.2个。

54. 参考顾应昌所著的《土地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一书第8章。根据顾应昌的计算, 按照1935~1937年之间台币的价值计算, 1950年的农业收入是2.76亿台币, 到1960年上升到5.77亿台币。

55. 美国利用对进口糖征收高关税来保护国内糖企, 包括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外国人在美国境内开办的糖企。近年来, 美国已经逐步削减了给予菲律宾的糖类进口配额, 现在每年只有5万吨。参考苏雷什·高沃利 (Suresh Gawali) 所写的《世界糖类贸易的扭曲》 (Distortions in World Sugar Trade) 一文。该文发表于《经济与政治周刊》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第38卷第43期 (即2003年10月25日那一期) 第4 513~4 515页。

56. 参考马克·克利里 (Mark Cleary) 与彼得·伊顿 (Peter Eaton) 合著的《传统与改革》 (Tradition and Reform) 一书, 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分社于1996年出版。他们估计, 在20世纪90年代初, 55%的菲律宾农民没有土地。除

了无地农民之外，他们还进一步划分出了“几乎没有土地的农民”（这部分农民占总菲律宾农民总数的26%），这意味着他们控制的土地勉强可以让他们在贫困线上挣扎度日。这个估计与菲律宾发展研究所的估计大体上是一致的。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在《2008年全面土地改革计划之后：关键改革的拓展》（Post 2008 CARP: Extension with Critical Reforms）一文中指出，在1 120万菲律宾农民中，估计有850万人没有土地。此文发表于该研究所主办的双月刊《发展研究新闻》（Development Research News）第26卷第3期（2008年）。

57. 本处采用的是2009年末的汇率，当时1美元兑换46.15菲律宾比索。

58. 参考瑞丁格尔（Reidinger）所著的《菲律宾的土地改革》（Agrarian Reform in the Philippines）第3章和普策尔所著《一片被征服的土地》第3章。

59. 第一份报告是丹尼尔·贝尔代表团完成的，丹尼尔·贝尔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其代表团启动调查的时间是1950年。第二份报告是罗伯特·哈迪的代表团完成的，其代表团启动调查的时间是1951年。当时，哈迪供职于美国共同安全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该机构在冷战之前是经济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曾经主导了马歇尔计划的制订过程。哈迪本人也曾经参与过推动日本土地改革的工作。

60. 如要查看菲律宾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制定的涉及土地的所有法律法规，请参考菲律宾土地改革部于2006年3月3日发表的报告《菲律宾土地改革》（Philippine Agrarian Reform）。

61. 参考瑞丁格尔的专著《菲律宾的土地改革》第8页。在马科斯本人主持开展的小规模土地改革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其政治上的关键对手——阿基诺家族的土地。时至今日，吕宋岛的一些农户仍然对马科斯充满万分感激，因为他们不仅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获得了土地，而且马科斯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在吕宋岛开展的农业推广工作通常是非常高效的。

62. 瑞丁格尔在《菲律宾的土地改革》第55页指出，菲律宾新人民军的成员既包括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也包括游击队员。1963年11月，时任南越总统吴庭艳（Ngo Dinh Diem，另译“吴廷琰”）遇刺身亡。1965年6月，阮文绍出任南越总统。在吴庭艳主政期间，美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支持南越开展土地改革的措施。关

于菲律宾在1980~1986年累计开展土地改革的评估，引自《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一书第97页。

63. 引自瑞丁格尔所著的《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一书第139页。

64. 引自厄尔·帕雷诺 (Earl G. Parreno) 所著的《丹丁老板》 (Boss Danding) 一书第72页。这本书的作者是菲律宾的一名新闻工作者，或许是迫于许寰哥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只通过少数几个书店分销，所以现在很难买到。许寰哥家族购买路易西塔庄园的700万美元贷款来自于“政府服务保险系统”，但前提是将路易西塔庄园的土地分割为小块儿分给农民。

65. 参考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发表的《2008年全面土地改革计划之后：关键改革的拓展》一文。

66. 参考小萨图尼诺·博拉斯 (Saturnino Borrás Jr) 所写的《对比视角下的菲律宾土地改革》 (The Philippine Land Refor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一文。该文发表于《土地所有制变化杂志》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第6卷第1期 (即2006年1月那一期) 的第80页。

67. 博拉斯在《对比视角下的菲律宾土地改革》一文中指出，拉丁美洲的土地改革中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博拉斯和珍妮弗·佛朗哥 (Jennifer Franco) 在《争取土地和生计：菲律宾农业种植园的再分配改革》 (Struggles for Land and Livelihood: Redistributive Reform in Agribusiness Plant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一文中提供了几个案例，表明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直接谈判只会导致佃农的境遇更加恶劣，其中一个案例就是美国跨国公司都乐 (Dole) 给菲律宾棉兰老岛的蕉农提出的交易方案。

68. 关于菲律宾可耕地总面积的估算数据引自联合国粮农组织。除了大型商业农场没有遭到土地改革的冲击之外，瑞丁格尔在《菲律宾的土地改革》第160页给出了这样的计算：5公顷的土地保有标准导致75%的小农场免遭冲击。该书第165页指出，世界银行在1987年的一份报告中就菲律宾的《全面土地改革计划》评论说，该计划将会鼓励地主逃脱被征地的命运，导致佃农和无地农民的比重升高，增加行政负担。无地农民的数据来自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发表的《2008年全面土地改革计划之后：关键改革的拓展》一文。

69. 接下来这一节依据的是以作者本人在2009年11月11~12日的访问。非常感谢互助贸易基金会 (Alter Trade Foundation) 的执行理事特德·洛佩兹 (Ted Lopez) , 他帮我安排采访事宜, 并放弃了自己的时间去陪我。

70. 6 000公顷是保守估计, 接近于丹丁向菲律宾土地改革部汇报的面积。一些新闻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估计他占有的土地面积高达2万公顷。

71. 参考瑞丁格尔所著的《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一书第134页。帕雷诺所著的《丹丁老板》一书第183页引用了一些传言, 说丹丁的私人武装分布在多个庄园内, 由3 000人组成, 并接受以色列军官的训练。

72. 参考帕雷诺所著的《丹丁老板》一书第98页和第125页。

73. 丹丁返回菲律宾之后, 甚至重新控制了生力啤酒厂。详情请参考帕雷诺所著的《丹丁老板》一书。丹丁的政党是民族主义人民联盟。该党曾经短暂地支持过科丽·阿基诺的继任者——菲德尔·拉莫斯, 后来又支持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 (这是在埃斯特拉达遭到弹劾之前的事)。《丹丁老板》一书第208页曾经指出, 在西内格罗省, 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 丹丁的游说者占据了7个国会议员中的6个, 占据32个市长中的28个。丹丁之子查理曾经连续担任三届内格罗斯岛第四国会选区的长官。

74. 引自菲律宾经济学家沃尔登·贝洛 (Walden Bello) 等人合著的《反发展的国家》 (The Anti-development State) 一书第54页。丹丁的“土地改革”方案所得到的政治掩护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埃斯特拉达是丹丁亲密的政治盟友, 从1998年起开始担任菲律宾总统, 到2001年遭到弹劾。有很多佃农举报说丹丁后来曾经给他们提供小额资金, 希望购回他们的土地所有权, 丹丁这种做法在当时《全面土地改革计划》条款下是不合法的。还有很多报告说农民被要求签署空白的法律文件。根据《丹丁老板》一书第200页所述, 1998年9月27日, 丹丁在一次有1 700名农民能加的集会上, 宣布自己已经回购了自己的土地, 而且还对这次集会进行了录音。

75. 参考《地区动态: 菲律宾共产党与新人民军在西内格罗省的兴衰》 (Regional Dynamics: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PP-NPA in Negros Occidental) 一文, 该文收录于《革命的掮客》 (Brokering a Revolution) , 该书由马尼拉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76. 被杀害的那个人名叫迪奥尼·盖兰 (Diony Gaylan)。他的死亡日期是2004年3月6日。

77. 引自西内格罗省政府于2007年12月发布的《西内格罗省落实综合土地改革计划的评估》。

78. 引自《来自人民的压力》(Pressure from the People)，2005年5月26日，宿雾市第一届维萨亚斯发展规划研讨会论文。

79. 引自西内格罗省政府于2007年12月发布的《西内格罗省落实综合土地改革计划的评估》。

80.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2000~2007年，至少有45%的菲律宾人日均收入不到两美元。原糖价格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上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在线回顾。本段其余内容引自迈克尔·毕利希 (Michael S. Billig) 所著的《大亨、经纪人与买家》(Barons, Brokers and Buyers) 一书第61和75页，该书由火奴鲁鲁的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81. 关于每公顷产量的数据引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2009年的数据。调查数据引自普策尔所著的《一片被征服的土地》第33页。1985年，中国每公顷土地的产出带来的附加值，按照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之后，相当于2009年的5000美元，在本章开始讨论时所提到的那些富裕国家中，一些最好的家庭农场也差不多能够达到这个附加值水平。罗杰·多隆 (Roger Doiron) 的家庭农场的产出如果在商店里出售的话，相当于每公顷13 500多美元。

82. 参考拉德津斯基与瓦林斯基合著的《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一书第325页。

83. 参考加里·汉森 (Gary E. Hansen) 主编的《印度尼西亚农业和农村的发展》(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一书第5页。该书由美国西景出版社 (Westview Press) 于1981年出版。1973的印尼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爪哇岛，农民持有的土地面积平均是0.64公顷，大部分农民持有的土地还不到半公顷。农村无地农民的数量后来又增加了 (此处的“无地农民”不包括持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今天，估计至少70%的农业人口没有土地。爪哇岛的可耕地总面积为900万公顷。

84. 参考罗伊·普罗斯特曼 (Roy Prosterman)、罗伯特·米切尔 (Robert Mitchell) 和蒂莫西·汉斯塔德 (Timothy Hanstad) 主编的《新增的十亿人：法律、土地和全球扶贫》 (One Billion Rising: Law, Land and the Alleviation of Global Poverty) 第135页。该书由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85. 关于拉德津斯基对印尼土地再分配的估算，参考拉德津斯基与瓦林斯基合著的《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一书第341~342页。另参考该书第297页拉德津斯基致美国经济和文化事务委员会执行理事亚瑟·西奥多·莫舍 (Arthur Theodore Mosher) 的一封信。

86. 关于苏加诺与苏哈托为了提高农业产量而采取的措施，参考汉森主编的《印度尼西亚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一书第7~43页。

87. 种植园主的利益与工厂或矿井经营者的利益具有更加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比人们认为的要密切得多。种植园是一种低效率的农业工厂。

88. 参考约翰·鲍威尔森与理查德·斯托克所著的《被背叛的农民：第三世界的农业与土地改革》一书第219页。在国有化之际，印尼甘蔗种植园占地75 000公顷。

89. 即所谓的Tebu Rakyat Intensifikasi (TRI) 计划。参考鲍威尔森与理查德·斯托克所著的《被背叛的农民：第三世界的农业与土地改革》一书第221页。

90. 参考迈克尔·利普顿所写的《土地改革理论探索》 (Towards a Theory of Land Reform) 一文。该文收录于戴维·莱曼 (David Lehmann) 主编的《农民、地主与政府》 (Peasants, Landlords and Governments) 一书第272页。该书由纽约Holmes & Meier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

91. 参考马克·克利里与彼得·伊顿合著的《传统与改革》一书第95页。1979~1984是印尼在苏哈托领导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时期内，只有不到50万的迁徙者获得了政府资助。印尼最早在政府资助下的迁徙发生在20世纪头20年，当时印尼还处于荷兰殖民时代。

92. 任何去过爪哇岛农村地区的人都会看到，小规模家庭菜园子里种植作物的效率非常高，而且家庭饲养鸡或其他家禽的效率也高。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大多数国家能开展有效的土地改革，但看到家庭菜园的高效率之后，便积极呼吁将花园式

的微型农场作为一个替代政策，希望以此提高农业效率。但这种微型农场不会创造出东北亚那种程度的农产品盈余。

93. 参考拉德津斯基与瓦林斯基合著的《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一书第59页。1933年，范登博世（A. Vandenbosch）估计，荷兰殖民者在20世纪初每年可以从印尼获取约1.6亿美元的经济利益。经由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相当于2010年的20亿美元。关于马来西亚种植园面积的数据，引自林德义所著的《马来亚殖民地的农民及其农业经济，1874~1941》第128页。

94. 参考林德义所著的《马来亚殖民地的农民及其农业经济，1874~1941》第90和127页。另参考乔莫·夸梅·孔达拉姆所著的《一个关于阶级的问题》（A Question of Class）一书第55页。在殖民地时代，马来西亚的道路在促进该国开放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道路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参考林德义所著的《马来亚殖民地的农民及其农业经济，1874~1941》第94页。

95. 参考林德义所著的《马来亚殖民地的农民及其农业经济，1874~1941》第149~151页。主张限制橡胶种植规模的那个组织是“橡胶种植者协会”。该组织主要代表种植园主的利益，在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这两个殖民地均有成员，这两个殖民地是英联邦中关键的橡胶种植区。1923年，该组织在马来联邦调查了426个橡胶种植园，结果表明，平均来讲，每英亩橡胶种植园的年产量为375磅。

96. 林德义所著的《马来亚殖民地的农民及其农业经济，1874~1941》第143页对这一节描述的情况有详细叙述。

97. 这份报告的委托方是英国藩政院（British Colonial Office），发布于1948年，起草者是彼得·托马斯·鲍尔（Peter Thomas Bauer）。鲍尔估计，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者因1922年的《史蒂文森橡胶产出限制计划》而损失了3 000万英镑，因20世纪30年代限制橡胶种植的国际协定而损失了1 000万英镑，总计4 000万英镑，相当于1940年马来西亚橡胶总产值的两倍。如果根据英国1930年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进行调整，则相当于21亿英镑。当时，马来亚联邦的殖民政府拒绝接受鲍尔对蕉农损失数额的评估，但鲍尔坚持己见。他在该报告第37页中指出：“橡胶是一种非常适合亚洲小农种植的作物。”但当时的马来亚橡胶研究所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种植园农业，因为种植园农业更加有利于增加出口额，而该研究所的经费就来自于出口税。结果，在第88页，鲍尔指出：“种植橡胶的小农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受到马来亚政府的冷落；其效率和重要性遭到了普遍忽略……小农的遭

遇以及限制橡胶种植的规定显然背离了某些明显的道德义务。”引自彼得·托马斯·鲍尔所写的《关于考察马来亚小型橡胶种植园的报告（1946年7~9月）》（Report on a Visit to the Rubber Growing Smallholdings of Malaya, July-September 1946，由英国皇家出版局于1948年出版）。

98. 参考林德义所著的《马来亚殖民地的农民及其农业经济，1874~1941》第125页。罗德西亚等非洲殖民地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殖民者的农业政策倾向于发展大规模农业，而实际上却是小规模农业为城市人口和矿业人口提供粮食来源。

99. 参考乔莫·夸梅·孔达拉姆所著的《一个关于阶级的问题》一书第77页和第123~124页。此外，希琳·玛兹·哈西姆（Shireen Madziah Hashim）所著的《马来西亚的收入不平等与贫穷》（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Malaysia）一书第202页指出，橡胶种植者在20世纪80年代承受的出口税等税负相当于作物价值的13%。

100. 关于土地集中程度，参考乔莫·夸梅·孔达拉姆所著的《一个关于阶级的问题》一书第113页。根据乔莫所说，水稻种植领域的土地租佃情况比橡胶种植领域更加普遍，全国无地农民所占比例高达40%。关于产量不断下降的情况，参考马克·克利里与彼得·伊顿合著的《传统与改革》一书第75页。水稻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

101. 参考查希尔·艾哈迈德（Zahir Ahmed）所著的《东南亚的土地改革》（Land Reforms in Southeast Asia）一书第188页。该书由印度新德里东方朗文（Orient Longman）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

102. 马来西亚那些几乎没有多少出口加工活动的地方，比如沙巴州，贫困率仍然是最高的。稻农的贫困率是80%。参考希琳·玛兹·哈西姆所著的《马来西亚的收入不平等与贫穷》一书第219页。如想进一步获得关于未用农业土地的信息，参考马克·克利里与彼得·伊顿合著的《传统与改革》一书第75页。

103. 罗纳德·赫林（Ronald J. Herring）所著的《耕者有其田》（Land to the Tiller）一书第284页。该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104. 参考巴素·蓬拜集（Pasuk Phongpaichit）和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所著的《泰国：经济与政治》（Thailand: Economy and Politics）一

书第16页和第41页。关于产量的数据是以1950年的数据为基础的，但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与东北亚地区在土地改革后的对比，指的是“二战”后的土地改革，而不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土地改革。

105. 参考巴素·蓬拜集和克里斯·贝克所著的《泰国：经济与政治》一书第31~32页。

106. 参考巴素·蓬拜集和克里斯·贝克所著的《泰国：经济与政治》一书第36页。

107. 参考彼得·范德吉斯特 (Peter Vandergeest) 所写的《新自由主义土地改革导致的分离：老挝与泰国土地租期的不稳定性》 (Displacements in Neoliberal Land Reform: Producing Tenure In-securities in Laos and Thailand) 一文。1975年，泰国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案设立了一个农业土地改革办公室，该办公室成立之后一直从事公有土地的分配，这些土地中的大部分之前都被非法占据。这与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在土地改革中集中力量分配公共土地，而不是对现有的私人农业用地进行再分配的做法是一致的。相似的是，1974年，泰国颁布的《地租控制法案》 (Land Rent Control Act) 因为遭到了地主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反对而没有得到普遍实施。

108. 参考巴素·蓬拜集和克里斯·贝克所著的《泰国：经济与政治》一书第45页。

109. 请注意，按照东南亚标准来看，三角洲和中部平原地区本身并不是特别肥沃，因为那里的土壤为重黏土，远远不如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土壤那样适合开展农业生产活动。

110. 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银行 (BAAC) 成立于1966年。从1975年开始，泰国政府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其贷款结构中拿出一定份额投向农业领域，不过这些银行更加乐意同那些大型农业企业或种植大户打交道。

111. 作为本书作者，我对此存在一些疑惑。正大集团是泰国主要的农业综合企业，曾经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大量关注，但一直没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正大集团曾经采取业务多元化策略，进入了电信业 (得到了政府的保护) 和零售业，但始终没有变成一个具有核心业务的工业企业。没有一个东南

亚国家能够培育出真正从事高附加值业务的明星企业，都无法同都乐食品公司（Dole）那样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在全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

112. 参考巴素·蓬拜集和克里斯·贝克所著的《泰国：经济与政治》一书第64~65页。

113. 这种流行音乐被称为Phleng luk thung，请参考巴素·蓬拜集和克里斯·贝克所著的《泰国：经济与政治》一书第79页。关于泰国农村收入的数据，引用自该书第89页。

114. 值得注意的是，塔信的妹妹英拉在2011年赢得选举，成为泰国总理。英拉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上一届由军方支持的政府所实施的物业税和土地增值税，减轻了富裕群体的税负压力，而不是去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举动。塔信家族与贫穷农民的联盟现在已经被置于次要地位了。塔信当年就意识到泰国东北部农民的选票肯定没问题，所以就把农民利益置于次要地位，根本就没打算重塑泰国的政治经济。

115. 参考查希尔·艾哈迈德所著的《东南亚的土地改革》一书第170页。

116. 关于美国农业史和农场整合的情况，参考布鲁斯·L·加德纳（Bruce L. Gardner）与戈登·劳瑟尔（Gordon C. Rausser）主编的《农业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第1A卷。该书由阿姆斯特丹的爱思唯尔出版社（Elsevier）于2007年出版。

117. 参考佩内洛普·弗兰克斯、约翰娜·博斯特尔等合著的《东亚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第79与87页。政府为60千克的稻米支付的价格，在1960年是4 162日元，1970年是8 272日元，1980年是17 674日元。

118. 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进行调整后，1987年的3亿日元相当于今天的2.92亿日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在泡沫时代结束之后实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之后，再根据1987年的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1:144）将这个�数字转换成美元。

119. 西山光一的日记还没有被完整地翻译成英文。上面的内容是基于西田义明（Nishida Yoshiaki）在其所写的《20世纪日本农村的变化程度》（Dimensions of Change in Twentieth-century Rural Japan）一文中对该日记的讨论，该文收录于安·瓦斯沃（Ann Waswo）和西田美昭（Yoshiaki Nishida）编著的《日

本20世纪的农民与农村生活》(Farmers and Village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Japan)一书。该书由伦敦劳特利奇-柯曾出版社(Routledge-Curzon)于2003年出版。此外,我于2009年11月亲自采访了西田义明教授。

120. 关于农产品进口限制,请参考佩内洛普·弗兰克斯、约翰娜·博斯特尔等合著的《东亚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第146页。

121. 出口农产品所占的确切比例1965年为58%,1975年为17%。参考佩内洛普·弗兰克斯、约翰娜·博斯特尔等合著的《东亚的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第192页。

122. 在提供农业补贴方面,欧洲有三个人口较少的国家可以和日本、韩国相比,这三个国家是挪威、冰岛和瑞士。

123. 2009年11月我去了日本,当时,在东京吃两个苹果要花400日元,在秩父要花300日元(当然这是大一点的苹果)。在东京期间,有人向我推荐用发泡胶包装起来的草莓,10个草莓居然需要1 000日元,令我望而却步。一个非常小的白兰瓜需要花费1 000日元,很小的西瓜需要3 000日元。

124. 参考迈克尔·利普顿所著的《为什么穷人依然贫穷》第23页。

125. 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及中国东北有一个不同之处,因为日本经济最初开始腾飞时,本国土地改革力度较弱。在明治时代,武士阶层承担了企业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才更加深入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而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出现了一批立足城市的企业家。然而,一些重要的商人,像本田宗一郎,都是来自农村家庭,而且丰田之类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农村业务为基础的。

126. 参考詹姆斯·罗蒂(James Rorty)所写的《拉德津斯基专论》(The Dossier of Wolf Ladejinsky)。该文发表于1955年4月的《评论》(Commentary)杂志。

127. 参考1954年12月23日的《纽约时报》

128. 合同制的工人一般都会与雇主签订长期合,他们是英帝国奴隶制的替代品。

129. 迈克尔·利普顿在《土地改革理论探索》(Towards a Theory of Land

Reform) 一文中指出：“现在有丰富的证据表明土地产出效率与农场规模呈现出负相关的联系。”他提供了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来佐证这一说法，涉及亚非两洲的南部与东部。有趣的是，即便世界银行对南非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没有任何案例表明因农场规模大而形成的规模经济的效率超出一个具有中型拖拉机的家庭的效率。”

130. 参考拉德津斯基与瓦林斯基合著的《未竟的农业改革事业》一书第286~287页，

131. 参考普策尔所著《一片被征服的土地》第81页。赵奉安拟定的土地改革法案草案被李承晚内阁删改之后，赵奉安便离开了政府，努力组建一个政党来反对李承晚，结果导致自己遇害。

第二部分

制造业：历史学家的胜利

1. 参考保罗·贝洛赫 (Paul Bairoch) 所著的《经济史的神话与悖论》(Mythes et paradoxes de l'histoire économiqu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巴黎Editions La Découverte出版社于2005年再版。

2. 关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对生产率的学术争论涉及富裕国家是否需要采取“去工业化”措施。然而，从理论上讲，富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相同的。

3. 一个经济体的服务贸易额在其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是以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为依据的。如果逐一分析，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东亚地区，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离岸港金融中心在其经济腾飞初期也具有大量的制造业，今天的新加坡仍然如此。除了文莱这个袖珍的石油国之外，东亚唯一一个通过服务业成功实现发展的地方就是中国澳门，澳门的发展并不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而是集中于黄金走私和博彩，而澳门在“二战”结束之际的人口还不到20万人。印度有时候会被视为通过服务业成功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因为印度的信息技术服务业非常有名。但实际上，印度目前只有大约300万人从事信息技术服务（印度总人口为12亿人）。本章结尾处将再次探讨印度的情况。

4. 英国制造业产出是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通胀调整后的一系列生产指数进行测算的。这些指数最早于1948年开始发布。今天，英国制造业从业人数略多于250万，占劳动力总量的8%，而1960年为900万，占劳动力总量的35%。

5. “挑选优胜者” (pick winners) 这个词语最早起源于早期的新自由派思想家，他们在写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大陆经济体时发明了这个词语，但后来逐渐出现了滥用的趋势，一些学者和媒体开始用这个词语来描述东亚地区的经济政策。

6. 原来的机构是设立于1927年的工商业委员会 (Commerce and Industry Deliberation Council)。“二战”后的机构是工业合理化委员会 (Industrial Rationalisation Council)，该机构后来演变成了工业结构委员会。稍后会对这些机构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参考查默斯·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第94页。该书由斯坦福大学于1982年出版。

7. 张夏准所著的《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一书第123页。该书由纽约圣马丁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1966年，韩国前十大财团中，只有3个到1974年仍然位居前10。1974年的前十大财团中，只有5个到1980年仍然位居前10。1980年的前十大财团中，只有6个到1985年仍然位居前10。在中国台湾，政府对私营经济干预力度较小，主流私营企业的变动情况比较稳定。1971年的前十五大企业中，有12个到1980年仍然位居前15。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69页。

8. 佐桥滋 (Sahashi Shigeru) 曾担任日本通商产业省企业局局长，后被擢升为通产省次长。

9. 这些官僚机构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日本的“通产省”和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台湾地区的“工业开发委员会”和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则面临着来自其他部委的权力制约，其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力从来没有像前两个机构那样显著。然而，台湾地区和中国均有一个由政治领导人组成的精英团体来监督各方面的经济问题与发展问题，比如台湾地区有“经济与金融特别小组”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pecial Group)，中国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10. 荷兰有时被认为是一个没有采取过贸易保护政策就成功实现发展的国家，但荷兰赖以发展的主要产业是服务业，它是一个面向欧洲大陆的贸易与金融中心，

德国是其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因为德国最重要的河流——莱茵河流经荷兰之后入海。其他一些人口较少的欧洲国家，比如丹麦、瑞典、瑞士，工业化模式中都具有保护主义的色彩。

11. 在某些时期，英国不仅对原毛出口征收重税，甚至完全禁止。在16世纪，英国至少实行过16个议会法案来禁止或限制服装进口。所谓的“限奢令”主要是禁止奢侈品的进口，而先后颁布的9个服饰法案则具有更加普遍的适用性。

12. 参考保罗·贝洛赫所著的《经济史与世界史》（Economic and World History）第23页。该书由英国Wheatsheaf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13. 引自泰莎·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 Suzuki）所著的《日本经济思想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一书第60页。该书由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14. 张夏准所著的《富国的伪善》（Bad Samaritans）一书第3章，该章题为《我三岁的儿子应该得到一份工作》。该书由伦敦的兰登书屋于2007年出版。

15. 在现代经济学中，“在实践中学习”这个说法的流行起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在实践中学习对经济的影响》的论文。然而，在我看来，阿罗缩小了这个概念的意义。阿罗在该文中声称，每个人都是在实践中学习的，这一事实说明新技术的学习是一个自动发生的经济过程。这样一来，这个理念就佐证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中那种市场掌管一切的观点。而历史上，要想在实践中有效地学习技术，往往需要政府的干预。

16. 1911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之前的将近10年时间里，孙中山曾经寓居日本，当时正值日本的工业化成果开始大量涌现的时候。

17. 明治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主要来自农村地区的萨摩与长州这两个藩，而不是来自开放程度较高、国际思维较为显著的沿海地区的东京等城市。他们的农村背景与普鲁士容克地主非常相似。1815年，拿破仑被英国打败。之后，德意志收复了曾经被迫割让给法国的领土，但德意志人从来没有忘记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遭受的屈辱，最终在1870年与法国的战争中一雪前耻。

18. 参考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第368~369页。

李斯特声称，英国首相威廉·皮特随身带着一本《国富论》，并利用该书的论点同那些“缺乏经验和政治眼光”的法国人进行谈判，试图使法国人相信法国只能发展农业和造酒。

19. 美国的关税保护有利于北部的制造业，而不利南部和西部农业原材料出口者。在关税问题上的大部分争论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阵营都占据了上风，虽然起初汉密尔顿在争论中输给了托马斯·杰斐逊，但杰斐逊的观点中，部分是自由贸易，部分是反对优先发展工业。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提高关税的实质性法案，将关税平均提到了约25%的水平，这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从1833年到1842年，美国关税税率有所下调，后来再次上调。如果同东北亚一样，对个别领域征收的关税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对钢铁工业征收的高关税就促进了美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防止了来自英国的竞争。

20. 比如，英国在1699年禁止其殖民地出口呢绒，1700年禁止从印度进口棉布。在18世纪初期，英国的罗伯特·沃波尔政府禁止美洲殖民地建造钢铁厂，以防对英国的钢铁制造业形成竞争。

21. 参考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著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第127页。

22. 所谓的“日本岩仓使团”先后拜访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历时1年零10个月。时任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负责根据欧美之行的发现确定了一批试点产业项目。

23. 平田东助 (Hirata Tosuke) 的译文发表于1897年。参考涩泽敬三 (Shibusawa Keizō) 所著的《明治时代的日本社会》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Meiji Era) 一书第73页。该书由旺文社于1958年出版。日本关于李斯特思想的译文，最初并非从德语翻译的，而是在英语版本的基础上翻译的。最早翻译的人是大岛贞倍 (ōshima Sadamasu)。

24. 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与日本首任驻美大使岩仓具视的论文中也包含了很多赞美俄国的言辞。参考乔治·贝克曼 (George. M. Beckman) 所著的《明治宪法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Meiji Constitution) 一书第1章。该书由堪萨斯大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在肯尼斯·B·派尔 (Kenneth B. Pyle) 的诸多著作中，请参考《追随者的优势：德国经济学与日本官僚 (1890~1925)》 (Advantages of Followership: German Economics and Japanese Bureaucrats, 1890~1925) 一文，该文收录于《日本研究期刊》1974年秋第1卷第1期，第143

页。

25. 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一直禁止生产机器的出口，并禁止熟练工匠移居他国。尽管如此，英国议会在1825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估计，2 000名技术人员非法“协助”欧洲其他国家开展工业项目。在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早期众多工业项目的负责人、号称普鲁士工业沙皇的格拉夫·冯·雷登（Graf von Reden）亲自前往英国寻找技术和人才。他获得了锻铁技术和焦炭炉的操作技术，带走了英国铁匠大师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的兄弟，让他管理西里西亚的国家炼铁厂，同时也带回了苏格兰人约翰·贝尔顿（John Baildon），让他操作焦炭炉。在19世纪初，约翰·科克里尔（John Cockerill）和一群英国技术人员在普鲁士人的引诱下，在亚琛创建了当时堪称欧洲最先进的机械制造厂。明治维新开始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已经延揽了数百个外国技术人员，并向他们发工资。但外国人没有无限期地停留下去。举一个例子，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是一个具有关键地位的航运公司，1884年成立时有174个外国人，包括水手。到1895年，共有224个外国人，但到1920年，则一个外国人都没有了。参见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Lockwood）所著的《日本的经济发展：增长和结构变化（1868~1938）》（*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1868~1938*）一书第329页。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版。以及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所写论文《日本与欧洲工业化之对比》（*Japan and Europe: Contrasts in Industrialization*），该文收录于威廉·洛克伍德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的《国家与日本的经济企业：政治经济增长论文集》（*The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in Japan: Essay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一书第93页。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

26. 参考威廉·洛克伍德所著的《日本的经济发展：增长和结构变化（1868~1938）》一书第330页。

27. 丰田汽车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Sakichi Toyoda）在1891年为其发明的织布机申请了专利，之后不断创新。1924年，他生产了G型汽车，之后也不断做出改进。后来，他把这项技术卖给英国人，获得了一笔资金，他利用这笔资金建立了丰田汽车公司的雏形。

28. 这再次体现了欧洲的发展经历。当时，德意志境内的普鲁士等邦国以及法

国、奥地利都曾经在18、19世纪实施过试点工程项目。有很多逸事证据 (anecdotal evidence) 表明，大部分工厂都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实现赢利，因为学习工业技术的过程会耗费很长一段时间。欧洲工厂经常被国家卖给私营部门的企业家。

29. 日本从普鲁士那里仿照过来的两个关键的宪法规则就是：第一，如果议会无法就新预算达成共识，则自动采用原有的预算。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官僚机构遭到的政治操控；第二，天皇可以在不咨询议会的情况下选择首相。

30. 在“一战”爆发之前，德国进口的铁矿石在其庞大的钢铁部门所需铁矿石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50%，主要进口来源是法国洛林和瑞典。德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在其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851~1870年的14%增加到了1891~1893年的24%，其中大约2/3的投资集中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参考克莱夫·特里比尔科克 (Clive Trebilcock) 所著的《大陆强国的工业化 (1780~1914) 》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780~1914) 一书第62页。该书由伦敦朗文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

31. 参考约翰尼斯·希尔施朱勒 (Johannes Hirschmeier) 所著的《涩泽荣一：工业先驱》 (Shibusawa Eiichi: Industrial Pioneer) ，该文收录于威廉·洛克伍德主编的《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企业》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in Japan) 一书第209页。

32. 根据日本经济史学家高桥龟吉 (Kamekichi Takahashi) 的估算，在1928年，在日本企业实收资本总额中，三井占6.5%，三菱占4.5%，住友占1.4%，安田占2.8%，总计15.2%。参考威廉·洛克伍德在其所写的《日本的新资本主义》 (Japan' s New Capitalism) 一文中指出的，到“二战”前夕，日本四大财阀占据着日本企业实收资本总额的25%。该文收录于其主编的《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企业》一书第494页。

33. 参考克莱夫·特里比尔科克所著的《大陆强国的工业化 (1780~1914) 》一书第72页。

34. 该集团不仅处理自身成员之间的出口补贴支付，还与煤矿企业等原材料供应商谈判供应价格。参考克莱夫·特里比尔科克所著的《大陆强国的工业化 (1780~1914) 》一书第72页。

35. 比如，到1910年，电气工程行业形成了西门子-舒科特工程有限公司和通用电力公司双寡头垄断的局面，这两个大企业都是由20多个大型企业在20多年里通过合并形成的。化学行业也形成了双寡头垄断的局面，一方是霍斯特-卡塞拉公司，另一方是巴斯夫-拜耳-苯胺染料制造有限公司结成的企业同盟。

36. 查默斯·约翰逊分析了日本形成法西斯主义时期、“二战”时期以及战后的历史道路，指出“从产业政策历史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连续性的时期。实际上，不仅这个时期的产业政策具有连续性，日本在更加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如此。参考查默斯·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第195页。

37. 这里所指的有关法律是1925年《出口商协会法》和1925年《主要出口行业协会法》。然而，新成立的这个部门执行力仍然相当薄弱。

38. 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曾运用诸如“产业合理化”、“合理的经济结构”、“非理性竞争”之类的说法来解释国家需要淘汰掉市场上的输家。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时，曾经到过中国，当时就听到过这些说法，但没有认真思考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39. 这里指的是1931年4月颁布的《重要产业控制法》（The Important Industries Control Law）。

4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众非常不喜欢财阀家族，认为这些家族是权贵资本家，心中只有自身的利益。民众之所以支持军方，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政客们无法控制财阀，而是与财阀结成了肮脏的、腐败的联盟。一大批官员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而支持军方的。

41. 通产省的权力有多个来源。在战争期间，工商业委员会成了军需部，后来又变回工商业委员会，再后来又变成了通产省，并保留了对产业规划的控制权以及对战略行业的监管权，包括电力、机制造等行业。“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于1949年实施了《外汇及外贸管理法》（Foreign Exchange and Foreign Trade Control Law，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认为这只是一部暂行的法律，但它到1980年仍然有效）。该法赋予日本通产省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是对外汇配置的控制权。通产省还控制着其正式预算之外的大量资金，比如，它控制着多家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批权，这些机构包括日本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日本小企业融资公司（Small Business Finance Corp.）、日本工商业合作银行（Bank for Commerce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ves)、日本石油开发公司 (Japan Petroleum Development Corp.)、生产力总部 (Productivity Headquarters) 等。根据通产省的计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通产省控制的资金大约是其官方预算的20倍。参考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第78页。通产省在1949年拥有21 000名职员，到1974年减少到14 000人。

42. 关于通产省的技术集中许可制度，参考威廉·洛克伍德主编的《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企业》一书第459页。20世纪50年代，工业合理化委员会逐渐演变成了工业结构委员会。工业结构委员会采用的一些重要理念最初是由美国管理学权威德鲁克提出的。一些人认为商业工程学是好的、科学的事物，而有的人则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产业政策都是坏的、伪科学的事物。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第216页讨论了德鲁克对通产省的影响。

43. 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给川崎制铁公司免费划拨了300万平方米的土地，1953年，该公司在此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体化钢铁制造厂。

44. 日本国民总收入在1953~196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2%。相比之下，1886~1898年为4.1%，1906~1919年为6.1%，1931~1938年为6.8%。参考洛克伍德主编的《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企业》一书第89页。

45. 大多数工厂都位于现在的朝鲜，但殖民遗产也包含殖民地的军事人员、官僚和银行等机构。

46. 参考朴正熙所著的《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 (Our Nation' s Path: Ideology for Social Reconstruction) 一书第218页。

47. 参考朴正熙所著的《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一书第218页和《国家、革命与我》 (The Country the Revolution and I) 一书第120~121页。该书由Hollym于1970年再版。

48. 韩国纺织协会汇集了15家综合纺织企业，形成了一个卡特尔。其运作方式就像20世纪前10年里全日本棉纱工联合会的运作方式一样，迫使其成员升级设备，整合营销活动，关键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整体去购买原棉。参考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工业化》一书第61和66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也曾经通过货币大幅贬值来刺激出口，1961年贬值100%，1964年贬值50%。然

而，阿姆斯登指出，政府为纺织公司提供的生产补贴增幅更大。到20世纪60年代末，政府迫不及待地促进合成纺织品制造业，因为如果继续以进口棉花为原料，附加值太低，政府不愿继续提供补贴。

49.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50. 参考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工业化》一书第69页。

51. 关于出口企业的利率，参考禹贞恩 (Jung-en Woo) 所著的《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一书第162页。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分社于1989年出版。

52. 日本殖民时代，整个朝鲜半岛被称为“朝鲜”。朝鲜银行是日本殖民时代在朝鲜设立的中央银行，代表着经济权力的核心。但日本人允许朝鲜人供职于该银行。像这种朝鲜人获准接近权力核心的机构并不多见。到“二战”爆发时，该银行的职员中，一半是朝鲜人。参考禹贞恩所著的《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一书第30页。

53. 引自禹贞恩所著的《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一书第131页。

54. 参考世界银行编写的《韩国：产业过渡之管理》(Korea: Managing the Industrial Transition) 第1卷第45页。

55. 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xlvii页。

56. 韩国与危地马拉在197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略低于500美元。

57. 朴正熙做得非常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在1965年提高利率，这一高利率政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扭转。我将在第三部分讨论这一点。一般来讲，朴正熙忽略了美国和多边机构的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他结束出口补贴政策，他也没有采纳。但他与苏加诺、马哈蒂尔等东亚的领导人不同的一点在于朴正熙从来不与美国或多边机构发生公开冲突。

58. 这一段内容引自柯伟林 (William Kirby) 所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一书。该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此外,还引用了柯伟林所写的《近代中国的延续与变化: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计划(1943~1958)》(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一文,该文发表于《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24期(1990年7月)。

59. 根据这一变化,1936年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将近20%都出口到了德国。1938春季,德国撤回了在华顾问。

60. 参考柯伟林所写的《近代中国的延续与变化: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计划(1943~1958)》一文。

61. 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208页。

62. 参考R·肖特(R. Short)《公有企业的作用:国际统计对比》(The Role of Public Enterprises: An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omparison)一文。该文收录于198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忘录系列之83/84号文件。基于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台湾的国营企业在社会总投资中约占1/3。除了设立新的国营企业之外,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还把持了从日本殖民者手里接管的企业。而在韩国,这些殖民者的企业则被政府出售给了私人。

63. 比如,1957年,出口企业的贷款利率为11.9%,非出口企业的贷款利率则为19.8%。但台湾当局在提供出口信贷补贴上的力度没有韩国政府大,能够获得出口信贷补贴的企业较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台湾政府补贴的出口信贷只占据台湾信贷总额的6%左右。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59页以及郭婉容等人合著的《台湾成功的故事》一书第79页。对1962年至1976年这个期间的一项研究估计,台湾所有种类的出口补贴在数值上相当于该经济体的出口收入总额的10.6%。参考蒂博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所写的《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一文,该文收录于劳伦斯·劳(Lawrence J. Lau)主编的《发展模式:韩国与台湾经济增长的对比研究》(Models of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一书第160页。该书由旧金山的当代事务研究所于1986年出版。

64.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联华电子和台积电。联华电子是政府控制的，但有5个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台积电是政府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合资创办的，1986年该公司投资建立了台湾第一家专用集成电路制造厂。参考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第103页。

65. 参考郭婉容等人合著的《台湾成功的故事》一书第109页。根据作者计算，1956年到1961年之间，台湾制造业新增产量的22.5%用于出口，而从1971年到1976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68%。

66. 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70页。虽然韦德没有提出这个联系，但他在其他地方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的市场集中度比韩国高，意味着更少的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控制权。这表明台湾的大型国营企业不仅在出口方面比不上韩国财阀，而且在台湾面临的竞争也没韩国财阀那样激烈。关于日本中小企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出口详情，参考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第97页。约翰逊引用的消息源估计，日本小企业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介于50%和65%之间。

67. 韩国与台湾的数据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0年的最新数据显示韩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为20 800美元，台湾的是18 600美元。

68. 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323页。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1989年将其电信业务出售给了阿尔卡特-朗讯。美国通用电话电子公司在2000年与贝尔大西洋公司合并，组成了威瑞森无线公司。

69. 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6家最大的国营工业企业的销售额（绝大部分面向台湾市场）相当于台湾5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的销售额（主要面向出口市场）。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178页。

70. 此处系基于1981年的《财富》500强数据。如果研究一下大型的私有企业就会发现，韩国的现代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营业额就已经达到了80亿美元，而台塑集团的营业额还不到20亿美元。

71. 比如，台湾最大的电子企业——鸿海集团（苹果、惠普、戴尔的代工企业之一），在2009年的纯利润率只有3.5%。三星在2009年的净利润率为7%，2011年为9.75%。

72. 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34页。

73. 从1953年到1963年，日本的农业产出的增幅略低于50%，而从1880年到1915年，日本农业产出几乎翻了一番。

74. 参考查默斯·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第230页。

75. 参考大川一司 (Kazushi Ohkawa) 与亨利·罗索夫斯基 (Henry Rosovsky) 合写的《一个世纪的日本经济增长》(A Century of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一文，该文收录于威廉·洛克伍德主编的《国家与日本的经济企业》一书第71页。朴正熙在政变后大力增加农业投资，也是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朴正熙指出，“因为农民构成了一个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的市场，所以我相信增加农民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参考朴正熙所著的《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一书第222页。

76. 自从明治维新运动以来，东京大学，尤其是其法学院，成为了日本官僚的主要来源。1965年，日本的国家人事院开展的一项调查现实，通产省处级以上级别的官员中，73%都是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77. 引自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第108页。

78. 引自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第25页。约翰逊这样分析基于市场体制的发达国家与基于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的区别：前者的决策过程是由经济学家主导的，而后者的决策过程是由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政客主导的。

79. 参考韦德所著《驾驭市场》一书第203页。

80. 道奇本人从来没读过大学，也没有受过任何职业的正式教育。但他长期的银行从业生涯使其形成了很多与新古典经济学派相近的观点，比如主张自由市场、低通胀和平衡预算。

81. 被派往韩国的美国经济学家包括爱德华·肖 (Edward Shaw)、罗纳德·麦金农 (Ronald McKinnon) 和休·帕特里克 (Hugh Patrick)。对于这些经济学家的要求，朴正熙的典型反应就是实行进口限制措施，有选择性地削减关税，放开一些形式上的进口配额，但仍然实行大量非关税壁垒。关于详细的讨论，参考禹贞恩所

著的《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一书第102页。

82. 沃尔特·罗斯托在进入政府部门之前，先后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经济史。他在约翰逊总统时期担任的职位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这个职位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国家安全顾问。《经济增长的阶段》出版于1960年，其副标题为《非共产党宣言》。除了罗斯托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值得一提，即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刘易斯出生于原英属西印度群岛，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是以历史为基础的，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对美国的政策起到了很大影响。

83. 1946~1978年，美国对外经济捐赠和援助中，韩国收到60亿美元，拉丁美洲收到150亿美元，中国台湾收到24亿美元，菲律宾收到20亿美元，泰国收到8亿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的高峰期，美国对韩国的捐赠和援助金额更多。但菲律宾、泰国等都没有好好地利用这笔资金落实一套有效的工业政策，也没有实行严格的出口纪律。1949年之前，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当时的中国是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最大的外援对象。关于美国外援资金的数据引自国会收到的被称为“绿皮书”的年度报告，报告可以从下面这个网址上获取，
<http://gbk.eads.usaidallnet.gov/>。关于美国理特管理咨询公司（Arthur D. Little），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第182和208页。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管理咨询公司，但近几十年来被更大的同类公司超越了。

84. 参考罗伯特·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第225~226页。

85. 参考禹贞恩所著的《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一书第190页。

86. 这里的五位经济顾问指的是维佐约·尼蒂萨斯罗（Widjojo Nitisastro）、穆罕默德·萨德利（Mohammad Sadli）、苏布罗托（Subroto）、阿里·瓦尔达纳（Ali Wardhana）和埃米尔·萨利姆（Emil Salim）。这些人都曾经担任过部长职务。应该强调指出，这些人在早期受到的学术影响并不是来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是来自于拉格纳·努斯科（Ragnar Nurske）和亚瑟·刘易斯之类的经济学家。然而，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他们比东北亚的决策者们更加容易屈服。“伯克利派”经济学家在美国的主要老师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布鲁斯·格拉斯博纳（Bruce Glassburner）。本书第三部分将再次提到埃米尔·萨利姆。

87. 日本五条御誓文提出的其他承诺包括民主、阶级团结、社会平等以及结束陋习。

88. 当然，马来西亚比较富裕。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韩国和马来西亚在1962年经通胀调整后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110美元和300美元。这是该数据库开始发布数据的第一年。

89. “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一词起源于大卫·休谟（David Hume），凯恩斯在其所著的《货币、就业与利息通论》一书中也使用了这个词语，他给出的定义是“想要采取行动的自发冲动”，这种精神导致人类，尤其是企业家，更加乐观，能够迅速行动，而不只是完全被动地从数学角度计算自己成功的概率。

90. 在首尔，坐出租车去机场，74公里的距离需要花费50美元，而在台北，出租车40公里需要花费50美元。出租车费可以折射出不同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因为它是由政府定的，因此基本上可以决定出租车司机可以挣多少。

91. 参考朴正熙所著的《国家、革命与我》一书第159页。朴正熙喜欢引用歌德的名言——“天才是毅力的结晶”。

92. 关于对郑周永的人身攻击和风流韵事，可以参考唐纳德·科克（Donald Kirk）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Korean Dynasty: Hyundai and Chung Ju Yung）第20页和第2章。该书由纽约州阿蒙克市的M.E. Sharpe出版公司于1994年出版。对于郑周永的业余嗜好，科克指出，他如同朴正熙一样，读了大量历史书籍，不过他的主要兴趣在于领导人物的传记，包括丘吉尔、成吉思汗、林肯和几位日本实业家的传记。科克在该书第285页对郑周永的私生活做了如下概括：“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淡然与节制掩盖了放荡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如同其工商业生涯一样丰富而不可思议。”

93. 郑周永的这位弟弟被驻韩美军第八军的一名中尉雇为翻译。不久，现代建筑公司就垄断了第八军的大部分建筑工程。朝鲜战争爆发后，大部分美国企业开始撤出韩国，郑周永便趁机出手，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了这些企业的工程设备。

94. 在朴正熙实行出口纪律之前，很多大企业的业务都不在制造领域。比如，李秉喆的三星集团的早期业务主要集中在碾米业、制糖业、房地产业以及贸易行

业。我们稍后在第二部分将看到，在朴正熙之前，韩国企业的业务与东南亚企业的业务非常相似。

95. 西大门刑务所最后在1987年被关闭。1987年也是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Roh Tae Woo）宣布实行民主制度的那一年。

96. 虽然1961年政变的背后力量是朴正熙，但在政变后的前6个星期内，张都瑛（Chang Do Yung）出任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并兼任代总统。朴正熙把张都瑛软禁了一段时间，将其关进西大门刑务所，之后才将其释放。

97. 参考李汉沽（Lee Hangu）所著的《韩国财阀的历史》（The History of Korean Chaebol）一书。该书由首尔大明出版社（Dae Myeong Press）于2004年出版。该书只有韩语版。书中列举了在5月28日之后被捕的12家韩国企业的领导者，这些企业包括三湖海运公司、加平集团、大韩集团、远东集团、东力集团及东华工业集团等。作者还列举了其他三位收到逮捕令的重要企业家，包括三星集团的李秉喆。金瑞娥（Kim Hyung-A）在《韩国在朴正熙时代的发展》（Korea's Development under Park Chung Hee）一书中写道，5月28日那天有51位商人遭到逮捕，但大部分都在6月30日得到了释放。然而，最重要的13位商人直到同意组建经济复兴促进委员会之后，才在7月14日被释放。该委员会在7月17日正式成立。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金炳坤（Byung-Kook Kim）和文正仁（Chung-in Moon）在《韩国向出口导向型增长的过渡（1954~1966）》（The Transition to Export-led Growth in South Korea, 1954~1966）一文中写道，除了13位精英式的财阀领导人之外，还有120多位商人也受到了调查。该文发表于《亚洲研究期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0卷（1991年11月4日）。军事政变中的一位主要人物——金钟泌宣称，通过恐吓手段——而不仅仅通过惩罚手段来引导商人的策略主要是他想出来的。还应该指出的是，李承晚政府时期以及短暂的张勉政府时期就曾经做了一些产业规划方面的基础工作。从这方面来讲，朴正熙并不完全是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的。

98. 参考金瑞娥所著的《韩国在朴正熙时代的发展》一书第81页。

99. 参考金瑞娥所著的《韩国在朴正熙时代的发展》一书第83页。

100. 现代水泥公司最初于1964年投产，1965年首次实现水泥出口，出口对象是越南。也正是在1965年，美国作战部队到达了越南。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

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56页。美国为现代水泥公司提供的融资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该署前身为华盛顿的经济协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融资性质为优惠贷款。现代集团先后共获得425万美元的优惠贷款。

101. 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5章、第6章和第56页。另参考理查德·斯蒂尔斯（Richard M. Steers）所著的《韩国制造：郑周永与现代集团的崛起》（Made in Korea: Chung Ju Yung and the Rise of Hyundai）一书第47页。该书由劳特利奇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20世纪60年代，现代集团正是在越南赢得了其最大的一个合同，在越南同美军接洽的还是郑周永那位曾经为驻韩美军第八军做翻译的弟弟。现代集团在泰国承包的修路工程中，一个关键的高管是李明博，后来李明博成为了韩国总统。

102. 参考理查德·斯蒂尔斯所著的《韩国制造：郑周永与现代集团的崛起》一书第67页。

103. 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61页。同一时期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不足5%增加到了15%。

104. 下面的内容是基于我对当事人的访谈以及我在2010年7月12日对工厂的实地考察。

105. 浦项制铁的博物馆的网址为 <http://museum.posco.co.kr/museum/docs/eng/s91b0060001i.jsp>。

106. 参考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工业化》第296页。她引用了韩国钢铁协会发布的关于不同国家每吨钢的制造成本的报告：巴西为1 750美元、美国为820美元，日本为590美元，韩国浦项则为400美元。

107. 参考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工业化》第302页。新日本制铁公司前身是于1897年建成的官营八幡制铁所。其他技术供应商包括富士制铁公司和日本钢管公司。

108. 2009年，国际钢铁协会公布了世界各大钢铁企业的粗钢产量，数据如下：安赛乐米塔尔为7 800万吨，宝山钢铁为3 100万吨，浦项制铁为3 100万吨，新日铁为2 700万吨。安赛乐米塔尔的控股股东是印度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印

度控制的，但该公司总部位于伦敦。由于该公司长期举债并购，所以其大部分生产力也在印度之外。2012年，该集团的负债和产权比率是浦项制铁的4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该集团既是一个生产企业，也是一个杠杆投资工具。

109. 畅销的索纳塔轿车在西海岸拥有自己的工厂。

110. 我这次访问的时间是2010年7月13日。在三星集团制造业务部的总部，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三星是韩国价值最大的企业之一。三星集团在2010年拆除了最后一个原有的、破旧的厂区，取而代之的是玻璃钢结构的大厦，重新命名为“三星数码城”，里面有精心打理的绿色空间和篮球场，其28 000名员工再也不用穿制服了。这种不穿制服的情况在韩国并不多见。现代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最保守的财阀，目前仍然要求其员工在上班时穿上蓝色的外套和公司制服。

111.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从1976年到1985年，韩国工人平均每周劳动时间是53.3小时，而该机构调查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超过50个小时。现在，韩国工人平均每周的劳动时间缩短了，因为大部分大企业都采取了双休日的制度。

112. 引自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125页。科克曾经在很多场合见过郑周永的弟弟郑世永。郑世永现在已经去世。他生前长期担任现代汽车集团的总裁。郑世永说他自己对汽车行业并没有激情，这一点令科克感到很惊讶。

113. 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134页。在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给现代汽车集团批准了1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其中7 200万美元是离岸贷款，2 800万是本国贷款。而当时现代汽车集团的实收资本是500万美元。换句话说讲，如果做政府希望做的事情，获得的廉价信贷就是其实收资本的20倍。

114. 韩国经济企划院为了促进韩国技术学习而对其认为重要的产品设定了国内市场价格。汽车也是如此。由于同一型号的汽车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是固定的，由此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国内私营企业无法在价格上展开竞争，而被迫发展出口贸易，并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开展竞争。经济企划院设定汽车国内价格的依据是发动机排量。

115. 郑周永在生产开始之后透漏了出口目标。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135页。另参考理查德·斯蒂尔斯所著的《韩国制造：郑周

永与现代集团的崛起》一书第5章。现代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的另外一个大型项目就是在沙特阿拉伯的朱拜乐修建港口设施。曾经参与该项目的一位经理告诉科克说，郑周永曾经命令自己的团队将该项目的投标价格降低1亿美元，因为郑周永必须确保自己能够达到向朴正熙承诺的出口和外汇目标。郑周永对那位经理说：“我们必须实现这些目标，不然我无法面对朴正熙。”在低价拿下这个项目之后，现代建设集团给朱拜乐的建筑工人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让他们尽快赶工，结果导致工人奋起反抗，最后沙特军队都出动了。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83页。

116. 最初三菱的股份是10%，后来上升至12.6%。

117. 在那些对韩国工业政策提出质疑的高级官员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担任韩国经济部部长的金益济（Kim Jae Ik）。他认为韩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小，韩国汽车工业无法具备全球竞争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韩国人口比马来西亚人口多，但韩国的汽车市场却比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小。他在1983年被朝鲜人炸死。他曾经想要把现代汽车同大宇汽车合并起来。

118. 参考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工业化》第269页。在现代重工集团生产的船只过多而无法满足过高的销售目标时，现代商船公司就会出资购买现代集团生产的船舶。现代重工集团也从苏格兰工程师那里获得技术支持，很多设计方案都是通过收购苏格兰高文一家濒于倒闭的造船厂获得的。高文曾是苏格兰第五大自治市，是船舶制造业的重镇。

119. 亚洲地区的很多汽车公司都失败了，也有一些与国外汽车公司形成了合资企业，比如韩国的大宇汽车公司以失败而告终，台湾的大部分车企也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在长春、天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州等城市建立了合资车企。此外，马来西亚的宝腾汽车公司、泰国的暹罗汽车公司、印度尼西亚的埃斯特拉汽车公司等也均走上了合资之路。在1987年出版的《现代汽车公司史》第165页，郑周永写道：“如果现代汽车变成了合资企业，就会严重损害创造性和独立性，未来建立一个本地车企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而如果一个新的车企试图增加出口，不应该允许外国资本的大量入股。”

120. 现代汽车与福特汽车曾经以平分股权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制造发动机的合资企业。制造发动机对于一个新兴的、雄心勃勃的企业而言是最严峻的技术挑战之一。然而，现代汽车很快接受了三菱汽车提出的更为有利的发动机技术转让协议。

121. 就在郑周永家族同三菱汽车公司商议合资协议的同时，他们还在同三菱集团的造船业务部门商议造船技术的转让条款。但现代集团在造船业务方面的潜力让三菱集团感到更加紧张，所以三菱集团拒绝直接转让技术，最多只愿意同现代集团建立一个合资船厂，而且所造的船不得超过50载重吨。最终，郑周永家族放弃了同三菱集团在造船业务上的合作，转而通过欧洲顾问或通过濒于破产的欧洲造船企业获得造船技术。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98页和第132页。另参考理查德·斯蒂尔斯所著的《韩国制造：郑周永与现代集团的崛起》一书第94页。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工业化》第175页指出，在推出小马轿车之前，现代汽车集团获得了18份技术转让协议。现代汽车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开拓海外市场之前，又获得了30份技术转让协议。如同现代造船厂一样，现代汽车集团的很多基础性的组织工作最初也是交给了从现代建筑公司调来的经理们。

122. 关于现代汽车早期的质量问题，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134页。罗伯特·韦德在其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309页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小马汽车在韩国国内的零售价为5 000美元，而出口零售价为2 200美元。

123. 1980年，现代汽车集团的一个新工厂完成建设并很快投产，之后，小马轿车的销量迅速提高。大多数销量都是依靠韩国市场实现的，当时韩国汽车市场的保护政策非常严重，而且市场空间拓展速度非常快。此外，现代汽车集团还会削价把一些小马汽车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和加拿大。1985年，现代汽车集团在全球各地销售的汽车总量超过20万辆。

124. 从1987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代汽车集团的北美分部损失了数亿美元。其中销量最低的一年是1992年，北美分部在这一年内损失1.4亿美元。1987年，现代汽车集团在美国的销量为26.4万辆，到1992年，却降低到了不足10万辆。然而，现代汽车集团虽然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高，在欧洲市场上却游刃有余，因为当时欧洲市场上的平均汽车价格比现代汽车的价格高出20%左右，而欧洲汽车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采取的安全标准也比较低。1992年，现代汽车集团在欧洲市场上的销量为11.1万辆，与1991年相比增加了50%多，这预示着现代汽车集团在欧洲市场上的情况将会非常好。

125. 新进汽车集团在1972年曾经与通用汽车公司成立一家平分股权的合资企

业。大宇汽车公司的确竭力摆脱通用汽车公司获得技术独立，这也是双方在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上经常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美国方面在1992年以1.6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其股权。

126. 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实行了民主制度。后来，到1992年，郑周永参加了总统竞选，但以失败而告终。在竞选过程中，郑周永对最终胜选的金泳三发起了猛烈的个人攻击。在此之前，郑周永已经与金泳三的前任卢泰愚失和，卢泰愚是金泳三的政治导师，也是朴正熙在1972年暂停选举、宣布军事管制以来的第一个民选总统。郑周永政治人脉关系的恶化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现代集团获得的银行信贷越来越少。同时，韩国大宇集团在1992年收购了通用汽车公司在一家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开始在国内市场上对现代汽车集团发起猛烈攻击。

127. 三星汽车由时任三星集团社长的李健熙在1994年成立，为三星集团非核心类业务。雷诺-日产联盟于2000年9月购入三星汽车70%的股权，之后一直增加到了80%。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汽车一案最后因为中方的退出而归于失败。

128. 此次采访的时间为2010年7月13日。

129.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福特汽车还没有确认其2010年的全球销售数据，但与现代起亚汽车集团2010年的销售数据估计与2009年只有几千辆的差别。根据2010年销量排序，三个最大的汽车公司分别是丰田汽车（840万辆）、通用汽车（840万辆）、大众汽车（710万辆）。现代起亚汽车集团2010年的销量是570万辆，其中360万辆是现代汽车，210万辆是起亚汽车。参考2011年1月26日的《汽车新闻》（Automotive News）。

130. 参考理查德·斯蒂尔斯所著的《韩国制造：郑周永与现代集团的崛起》一书第84页。

131. 人们有理由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早期，泰国与马来西亚比较类似的一点就是也实行了有效的工业政策。泰国官僚机构在落实工业政策方面比马来西亚官僚机构更加行之有效，其中不仅仅是因为马哈蒂尔的独断专行削弱了马来西亚的官僚机构。然而，在我看来，马来西亚产业规划权力集中于一个领导人手里，并且集中精力推进几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大项目，使马来西亚的工业发展道路颇有分析价值。要比较泰国、马来西亚在“二战”后的工业发展历程，参考格雷格·费尔克（Greg Felker）所写的《泰国与马来西亚的工业投资政策改革的政

治因素》(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Investment Policy Reform in Malaysia and Thailand)一文。

132. 此处系基于我对当地一位亿万富翁的非正式采访。这位富翁表示，他就曾经为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提供过不止一次无须偿还的“贷款”。

133. 引自巴里·韦恩 (Barry Wain) 所著的《马来西亚独行侠：动荡时代下的马哈蒂尔》(Malaysian Maverick: 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 第3页。该书由麦克米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134. 关于马哈蒂尔的种族背景，他本人似乎也有点讳莫如深。他告诉他的传记作家巴里·韦恩说，可能是他的祖父或曾祖父从印度迁徙到了马来西亚，并且说他的祖母是“槟城的马来人”，暗示自己的祖母没有印度血统。巴里·韦恩推测，可能是他的祖父移民到马来西亚的，他本人可能知道这一点。他在担任总理期间，马来西亚媒体都竭力避免提到他与印度人的联系。马来西亚贵族中，很多人都有外国血统，比如东古的母亲是泰国人，但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色彩鲜明的政治传统要求领导人具有纯洁的马来血统。

135. 朴正熙的分析并非完全不受种族因素的影响，他对日耳曼这个民族的发展历程给予了特别的赞扬。然而，朴正熙主要担心的是历史带来的切切实实的教训。相比之下，马哈蒂尔在《马来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 这本书的前言中指出：“在思考马来人面临的问题时，我早期的想法可以说是为了回应翁姑·阿兹 (Ungku Aziz) 教授提出的一个挑战。翁姑·阿兹教授原本是马来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现在是该校的副校长。1966年，在吉隆坡的一个研讨会上，我们讨论马来西亚的学生考试成绩差的原因，我提出遗传和环境是引发这一问题的两个因素。”在之后的论述中，这本书继续以相似的方式去分析问题，几乎没有分析经济结构问题。参考马哈蒂尔所著的《马来人的困境》一书第1页。该书由新加坡唐纳德·摩尔亚太出版社 (Donald Moore for Asia Pacific Press) 于1970年出版。

136. 关于1969年5月13日的吉隆坡骚乱，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死亡196人，受伤439人，但非官方的数字更高。

137.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马哈蒂尔在毕业后做过很多生意，包括炒房、卖药、开加油站、在吉隆坡和该城市的机场之间做租车服务。马哈蒂尔首次访问日本是在1962年。他的评论是：“日本人的敬业和动力，很明显就能看出来。任何人都

会看到，日本人正在做着有益的事情以便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成为总理之时，我就决定采取日本和韩国的战略与方法来发展马来西亚。” 此处系基于2011年3月7日对马哈蒂尔的书面采访。

138. 此处系基于我2010年7月9日的采访。

139. 1981年，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 570美元，韩国为1 560美元。

140. 曾经担任马哈蒂尔副手的安瓦尔·易卜拉欣 (Anwar Ibrahim) 认为，在马哈蒂尔形成自己的发展理念的过程中，铃木一正是“一位非常关键的人物”。此处依据的是我在2010年7月8日对易卜拉欣的实地采访。马哈蒂尔本人这样评价铃木一正：“在落实马来西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铃木一正对三井集团运作过程的了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处系基于2011年3月7日当事人对我提出的问题做出的书面答复。

141. 马哈蒂尔把“向东看”政策描述为“效仿快速发展的东方国家，以便发展马来西亚”。他从技术角度上把这一政策定义为“攀登技术阶梯，发展钢铁等基础产业”。参见乔默 (K. S. Jomo) 等主编的《东亚的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 in East Asia) 一书第249~250页。该书由马来亚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关于马来西亚“向东看”政策与韩国“重化工业运动”的联系，参见该书第278页。

142. 朴正熙和马哈蒂尔的性格中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有清教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色彩。朴正熙在首尔关闭了大量象征着旧精英的颓废的酒吧和夜总会，马哈蒂尔也大力反对象征着马来西亚上层阶级和公务员阶级的酗酒、吸烟、赌博及高尔夫球等。然而，尽管马哈蒂尔在城乡交界地区长大，他却从来没有像朴正熙那样对农村生活感兴趣，也不了解农村生活。事实上，马哈蒂尔所著的《马来人的困境》一书的内在逻辑就是，马来土著居民之所以落后，正是因为他们是农村人。

143. 马哈蒂尔担任总理时，马来西亚重工业公司 (1980年创建) 的控制权就转移到了总理办公室。关于该公司的投资情况，参考林志鹏 (Chee Peng Lim) 所写的《重工业化》(Heavy Industrialisation) 一文，该文收录于乔莫主编的《日本和马来西亚的发展：在旭日的阴影下》(Japan and Malaysian Development: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一书第249页。该书由劳特利奇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144. 马哈蒂尔在1984年1月公布的国家农业政策只有13页。1985年，马来西亚的银行发布的房地产政策的篇幅是农业政策篇幅的4倍。参考乔莫所著的《马来西亚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Malaysian Economy)一书第207页和第210页。该书由麦克米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145. 此处系基于2011年3月7日当事人对我提出的问题做出的书面答复。

146.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alaysia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Authority)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后来制订的工业总体规划共计22卷。该规划受到了工业政策专家的普遍赞赏。然而，该规划完成制定的时间是1986年初，当时马哈蒂尔已经被宝腾汽车厂和柏华惹钢铁厂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马哈蒂尔对日本人启动的项目的兴趣从1984年弱化。参考马查多(Kit G. Machado)所写的《宝腾与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Proton and Malaysia's Motor Vehicle Industry)一文，该文收录于乔莫主编的《日本和马来西亚的发展》一书第291页。

147. 参考乔莫等主编的《东亚的工业政策》一书第279页。

148. 关于私营企业遭到排斥的情况，参考林志鹏所写的《重工业化》一文，该文收录于乔莫主编的《日本和马来西亚的发展》一书第249页。

149. 当被问及为什么宝腾汽车不能像韩国的现代汽车那样获得专利技术，而不得不同外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时，马哈蒂尔回答说：“我们在汽车行业几乎没有知识或经验。最好的方法是找一个在这个领域有经验的伙伴。三菱汽车是愿意帮助我们建造民族品牌的汽车，而不只是他们的汽车的复制品。”我的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马来西亚在汽车行业的经验不少于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在汽车行业的经验，而且马来西亚国内的汽车市场比当时韩国国内的汽车市场还要大。到1980年，马来西亚已经拥有了11个汽车组装厂。当被问及为什么马来西亚只设立一个汽车公司时，马哈蒂尔回应说：“我们必须继续进口和组装外国汽车，以避免遭到公开批评。马哈蒂尔在制定政策时总是想着如何避免公众批评，这不符合很多马来西亚人对马哈蒂尔的回忆。对于其他问题，马哈蒂尔或回避或兜圈子。此处系基于马哈蒂尔或在2011年3月7日对我提出的问题做出的书面答复。

150. 土著一词的含义是“土地的儿子”，不仅仅指马来西亚的马来族，还指其他土生土长的民族。如今在马来西亚，很少有有外来的国民。

151. 此处是基于我在2010年7月9日的采访。

152. 此处是基于我在2010年7月9日的采访。

153. 这是修订《投资协调法案》(Investment Coordination Act)与《投资促进法案》(Promotion of Investments Act)的结果。马哈蒂尔允许外商独资企业(有别于合资企业)的投资,不再要求外资企业把股份分给土著人,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站式审批服务。外国直接投资在1986年达到了5.25亿林吉特,在1990年达到了62亿林吉特。

154. 当马哈蒂尔为马来西亚经济注入新的刺激因素之际,1986年的工业总体规划却明确指出,马来西亚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吸引的那些从事加工业务的跨国公司并没有成功地促进马来西亚经济的技术升级。20世纪80年代晚期,马来西亚吸引的外资的最大来源是日本。日本在1985年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较之于日本伙伴的货币迅速升值。关于进一步的讨论,参考乔莫所著的《马来西亚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一书第134页。按照当前的货币价值计算,马来西亚在1980年的出口额是227亿美元,在1985年的出口额是296亿美元,在1988年的出口额是539亿美元。

155. 在1981~1985这段投资高峰期,投资资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了空前的36%,其中国家投资占据50%。从1986年到1988年,投资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国营经济部门的投资额仅占11%。参考乔莫所著的《马来西亚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一书第47页。

156. 从1992年到2001年,阿斯马特·卡迈勒丁(Asmat Kamaludin)担任马来西亚贸易和工业部的秘书长。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7月9日的访谈。曾经担任马哈蒂尔副手的安瓦尔·易卜拉欣戏谑地说:“马哈蒂尔读了一本书,就认为自己是专家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马哈蒂尔的主导下,易卜拉欣曾经被捕入狱,并遭到走过场一般的审判,结果在审判之前就定好了。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指责马哈蒂尔。但马哈蒂尔周围的很多人都一致认为马哈蒂尔的思想受到这本书的严重影响,而且只有这一本书。易卜拉欣的严谨与客观也给他带来了好名声。所以,他的评论还是很中肯的。我的依据是2010年7月8日的访谈。

157. 多媒体超级走廊的网站上载明:“多媒体超级走廊是一个政府指定的区域,只在促进马来西亚快速进入信息与知识时代。该走廊最初包括一个宽约15千

米、长约50千米的区域，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的双子塔延伸至吉隆坡国际机场，并囊括了普特拉贾（Putrajaya，一个规模宏大的新规划的行政区）和（新建的赛博加亚电子信息城）。后来，该走廊区域得到扩建，包括了整个巴生河流域（Klang Valley）。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出资救助了该走廊项目的开发商。走廊内很多较大的企业都是马来西亚政府利用财政激励手段从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吸引过来的跨国公司，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该走廊为马来西亚带来了什么重大的价值。韩国政府在其规划中明确指出让本国企业成为大容量半导体制造业的重要角色，与韩国不同的是，马来西亚从来没有明确说明该走廊应该重点做什么。

158. 当然，不能把宝腾华嘉同现代最新的第五代伊兰特相比，合理的做法是将其同1991年的第一代伊兰特或1995~2000年的第二代伊兰特相比。伊兰特和华嘉都是同一规格的汽车，标配都是1.6升的发动机。

159. 现代汽车集团在1968年开始运作汽车组装业务，在1991年制造出首辆自主品牌的发动机（伊兰特也是在这一年推出的）。宝腾汽车在1983年开始运作汽车组装业务，在2005年制造出首辆自主品牌的发动机，当时将其安装到了于2001年推出的宝腾华嘉轿车上。从开始组装汽车到生产出第一台自主品牌的发动机，现代汽车用了23年，宝腾汽车用了22年。

160. 杨肃斌家族的独立发电厂开了马来西亚国内同类电厂的先河，其年回报率估计在14%~25%之间。合同中要求马来西亚国家电力公司必须连续21年购买两个燃气电厂最少72%的电力，这是所谓的“照付不议”合同。马来西亚国家电力公司本来打算自己修建独立电厂，做了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比如铺设了很多向内输送燃气的管道以及向外输送电力的线路。埋单者是纳税人，但最后都转给了杨肃斌家族使用。他们最初的电价是每度15.2仙（sen，1仙=0.01林吉特），两周交一次电费（后来的独立电厂协议将电价降到了每度11.5仙）。从表面上来看，杨肃斌家族的独立发电厂的净资产收益率是14%，但一些分析人士通过计算认为其净资产收益率实际上高达25%。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政府与该家族签订的“照付不议”合同极度慷慨，提到了电价；第二，一些建筑和服务工作是由杨忠礼集团下属的一些私营子公司做的，而且国家电力公司做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提高了实际利润率。杨忠礼集团的网站上也认为这个合同非常有利可图，只是没有提到收益率是多少。马来西亚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161. 在2004~2010年之间，杨忠礼集团接管了一座在马哈蒂尔实行“向东

看”政策时期建立起来的水泥厂（当时共建立了两个水泥厂）。该集团原本已经在马来西亚欠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入股了两个水泥厂。这样一来，该集团就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水泥生产者。该集团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通过交钥匙工程获得的，主要技术供应商来自东南亚。

162. 关于郑周永跨越“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贸易战，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27页。林梧桐承认曾经操纵招标，参考其自传《我的故事：林梧桐》（My Story: Lim Goh Tong）第24页。

163. 在这个赌场中，林梧桐拉拢了几个合作伙伴，包括穆罕默德·诺亚·奥马尔（Mohamad Noah Omar）。穆罕默德·诺亚·奥马尔是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和第三任总理侯赛因·奥恩的岳父，也是现任总理纳吉布·阿卜杜勒·拉扎克的外祖父。这个赌场传统上一直拿出一些职位让马来西亚有权力的警察去挂名，其中包括一些高级管理职位。

164. 云顶集团在新加坡投资的是一个带有赌场的大型娱乐城——圣淘沙娱乐世界（Resorts World Sentosa），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提供创意。该集团其他主要的离岸投资包括收购英国史丹利休闲（Stanley Leisure）和美国的博彩公司，还收购了多家游艇企业。

165. 林梧桐的建筑公司名叫建发实业公司。该公司曾经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建筑公司，后来入股林梧桐的云顶集团。

166. 参考巴里·韦恩所著的《马来西亚独行侠》第93页。成功竞标的日本公司出价3.13亿林吉特，比马来西亚本国的建筑公司出价低出7 100万林吉特。一家马来西亚的工程公司被成功竞标的日本企业雇用过去，做了一部分工作，但这家工程公司的管理人员说日本人后来没有给他们转让任何技术。

167. 参考林梧桐的自传《我的故事：林梧桐》前言。

168. 宝腾汽车的老总——雅哈亚·艾哈迈德死于一场直升机空难之后，马来西亚土著企业家赛莫达逐步控制了多元重工业集团（DRB-Hicom Bhd）。此时，该集团已经卖掉了其在宝腾汽车的股份，但仍然保留了在汽车零部件生产业务上的投资。

169. 邱继炳的错误在于和马哈蒂尔的政敌拉沙里·哈姆扎（Razaleigh

Hamzah) 走得太近。郑周永敢于同韩国总统金泳三公开争吵，但邱继炳不行，他没有真正的商业地位，必须依附于自己的政治靠山，政治靠山倒了，他也就随之衰落了。东南亚的大亨们从来都无法摆脱对政客的依赖，而东北亚的大亨却可以摆脱这层依赖关系。

170. 马来西亚土著大亨旺阿兹米的Land & General公司曾经受到马来西亚前财政部长达因·扎伊努丁的保护，但最后还是破产了。

171. 克里希南旗下关键企业的总部都设在明讯大厦 (Menara Maxis)，在双子塔那个位置，而马哈蒂尔卸下总理一职之后，在双子塔的第86层占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

172. 在马来西亚的众多寡头中，只有克里希南一人成功地同马哈蒂尔及马哈蒂尔的劲敌拉沙里·哈姆扎保持着真正密切的关系。马哈蒂尔在巫统于1987年举行的内部选举中击败了这位对手，而他本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在马哈蒂尔之后，克里希南历经两位总理而保持着繁荣发展。

173. 此处系基于2011年2月期《马来西亚商业》(Malaysian Business)杂志的评估。关于郭鹤年的财富，也是基于该杂志的评估。

174. 郭鹤年在马来西亚的高管们的工作地点不在Wisma Jerneh大厦，这座大厦是以郭鹤年旗下的保险公司的名字命名的，位于“杨肃斌的十字路口”附近。

175. 这片别墅区基本上在雪兰莪皇高尔夫俱乐部 (Royal Selangor Golf Club) 北侧。对于吉隆坡的超级巨富和贵族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吉隆坡西边富豪名流云集的武吉东姑 (Bukit Tunku) 地区，亦称“肯尼山” (Kenny Hills)。

176. 陈志远是马来西亚其他亿万富翁非常讨厌的人，也许是因为这会让他们有更好的自我感觉。陈志远的现金流主要来自于马来西亚政府的私有化，包括一个国家彩票业的私有化。至少三个亿万富翁曾经在我面前用不光彩的词语描述过他，但我不确定实际情况是否真是如此。

177. 拉希德·侯赛因的企业是兴业集团 (RHB Group)。

178. 兴业宏愿城大厦的对面坐落着较为古老的喜来登酒店，这个酒店的建造者是与巫统有联系的玲珑集团 (Renong Group)。该集团的老板哈林沙艾 (Halim

Saad)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得到了政府的出资救助，但被解除了集团执行总裁一职。

179. 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7月8日对安瓦尔·易卜拉欣的访谈。马哈蒂尔在那天召开了一整天的内阁会议，以便给下属培训日本文化。

180. 根据马来亚共产党某战地指挥官的讲述，亨利·葛尼乘坐的劳斯莱斯轿车被枪炮逼停之后，他下了轿车，开始平静地、径直地走向了共产党人埋伏的高地。参考陈平 (Chin Peng) 所著的《我方的历史》 (My Side of History) 第288页。该书由Media Masters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181. 这是新加坡橡胶大王李光前 (Lee Kong Chian) 建立的橡胶企业的一部分。他曾经拥有东南亚最大的橡胶种植园和加工企业。

182. 我前去拜访时，当前的所有者拒绝同我见面，也不愿让我参观工厂。

183. 马来西亚国内就可以提供充足的天然气，这的确使得气基直接还原炼铁技术成为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技术，但选择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合作伙伴，之后又没有充分审视这个合作伙伴提出的建议，显得有些鲁莽。马哈蒂尔亲自负责同新日铁的谈判。

184. 1987年4月，日方同意赔偿4.67亿林吉特，但项目损失大约为13亿林吉特。不幸的是，由于日元自1985年以来迅速升值，日方的赔偿远远不足以涵盖马来西亚的损失。

185. 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7月7日的访谈。谭达文博士当时是槟城的南方钢铁公司的执行董事。该小组的另外两位成员是阿都干尼 (Wan Abdul Ghani Wan Ahmad) 和朱坚炫 (Choo Kin Hean) ，前者是马来西亚安塔拉钢铁厂 (Antara) 的执行董事，后者是马来亚瓦塔钢铁厂 (Malayawata) 的首席执行官。该小组将其报告提交给了马哈蒂尔，但一直没有公开。

186. 此处系基于马哈蒂尔于2011年3月7日对我提出的问题所做的书面答复。

187. 这家工厂位于马来西亚吉打州中部的牛仑 (Gurun) 地区，马哈蒂尔还亲自出席了这个工厂的落成典礼，并在讲话中提到了汽车行业所需的钢铁，很明显是在说谢英福将提供这种产品。但在给我的书面答复中，马哈蒂尔回避了这一点。在

牛仑的钢铁厂投产期间，马哈蒂尔还不顾一些公务员的明确建议而批准金狮集团主席钟廷森另外开设一家钢铁厂，因为钟廷森向马哈蒂尔承诺会提供能够满足工业与汽车所需的钢铁。钟廷森建立了钢铁厂之后，却把所有产品瞄准了国内建筑行业，与柏华惹钢铁厂生产的扁钢产品进行竞争。这个故事得到了很多公务员和业内人士的证实。

188. 这个数字包括从开始建设到谢英福1995年8月离职期间的资本支出与经营损失。他离职时，留下了未偿银行债务57亿林吉特，累计经营损失25亿林吉特。此外，还有从非银行渠道借来的债务。

189. 在诸多案例中，最令人震惊的也许就是谢英福与其好友郭繆顺（Kok Mew Shoon）的Man Shoon集团和下属企业之间没有经过公开招标的交易，交易金额多达9.57亿林吉特。审计公司普华永道在审计过程中也深感担忧，最后于1996年出具了3份审计报告：一份给马哈蒂尔，一份给安瓦尔，一份给马来西亚央行行长。虽然普华永道发现了Man Shoon集团与谢英福之间的不法交易，但没有提到二人的密切关系。后来是记者们在普华永道的审计报告遭到泄露之后才揭露了他们的关系。参考巴里·韦恩在其所著的《马来西亚独行侠：动荡时代下的马哈蒂尔》一书第174页，书中列举了谢英福的很多肮脏交易。马哈蒂尔在2003年辞去总理职务之后，以阿卜杜拉·巴达维总理为首的政府只是以“失信”这个罪名对谢英福进行了审判，但他最后被判无罪。

190. 阿布·萨西德·穆罕默德的一位长期高级雇员在描述谢英福时，认为谢英福是萨西德的“导师”。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7月前往吉隆坡对有关当事人所做的非正式访谈。

191. 根据柏华惹钢铁厂网站上的介绍，那两个新建的炼钢厂在1993年投产，而引进的新型电弧炉和其他炼钢设备在1996年才开始投入使用。在收购柏华惹钢铁厂的13亿林吉特中，8亿是欠菲律宾国家银行（PNB）的债务，5.3亿是购买方同意支付的现金。

192. 此处系基于我于2007年7月在吉隆坡的非正式访谈以及随后的一些信函。经过长期拖欠之后，阿布·萨西德在2010年上半年每个月向马来西亚政府支付200万林吉特。虽然这笔交易启动了10年之久，但他那笔5亿林吉特的现金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付清。2010年7月8日，在访谈中，安瓦尔·易卜拉欣对我说，马来西亚政府还在柔佛送给阿布·萨西德一大块儿土地以及一个大合同，以报答他接手了柏华惹钢铁

厂这块儿烫手的山芋。阿布·萨西德在2006年出售了一些在柏华惹钢铁厂的股权，当时披露的账目表明该钢铁厂还欠着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公司3.1亿林吉特。

193. 阿布·萨西德及其合作伙伴曾经是资产交易员，在卖出柏华惹钢铁厂股权的时候，他们还保留着不可赎回、可转换、无担保的债券，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之后的10年里可以在任何时候回购柏华惹钢铁厂的股权。

194. 阿布·萨西德最初是做汽车零部件交易的，其买家主要来自公共部门，包括警察、军队和福利国家。这是他进入运输业的前奏，与柏华惹钢铁厂的业务上的交叉。

195. 关于细节，请访问柏华惹钢铁厂的网址
<http://www.perwaja.com.my/home/Home.php>。

196. 艾丽斯·阿姆斯登在其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工业化》一书第291页指出，浦项制铁分四步建成的910万吨钢铁产能的预算成本为36亿美元。其中，第一步于1970年开始修建。按照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当时的36亿美元相当于2009年的199亿美元。按照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对1996年马来西亚政府为柏华惹钢铁厂冲销的100亿林吉特债务进行调整，则相当于2009年的55亿美元。今天，柏华惹钢铁厂的钢铁产能仍然维持在年产150万吨左右。马哈蒂尔的传记作家巴里·韦恩估计柏华惹钢铁厂的全部成本至少有80亿美元。

197. 1984年，马来西亚已经每21人有一辆汽车（这种普及率在除新加坡以外的东南亚国家中算是最高的了），相比之下，韩国每146人有一辆车，台湾每51人有一辆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来西亚当时收入差异较大，与东南亚其他国家比起来，少数富裕人群在早期经济发展阶段的汽车保有量比较多。参考乔莫主编的《马来西亚的工业化：政策、表现与前景》（Industrialising Malaysia: Policy, Performance, Prospects）第275页。该书由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近年来的汽车保有量数据显示，韩国在2005年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赶上了马来西亚。2005年，韩国大约每4个人有一辆汽车，韩国汽车市场是马来西亚的两倍，因为韩国人口较多。

198. 马哈蒂尔没有意识到国内竞争有利于他的工业发展规划。他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宝腾是第一家国有汽车厂，等它做得相当不错的时候，我们再设立第二个国家汽车厂，生产排量只有0.6升的汽车，不和排量较大的宝

腾汽车竞争。”这句话是马哈蒂尔在2011年3月7日对我提出的问题做出的书面答复。从表面上看，私营部门也可持有派洛多汽车公司的股票，比如，私营部门的马来西亚联合汽车厂在1993年持有该公司38%的股份，但最后马来西亚联合汽车厂被国有的菲律宾国家银行控制了。其他国家机构持有30%的股份，日本大发汽车持有32%的股份。宝腾汽车成立以来，马来西亚重工业公司持股70%，三菱持股30%。

199. 马哈蒂尔在1981年10月访问日本期间同三菱达成了一个框架性的协议。1991年再度访问日本期间，马哈蒂尔又开始同日本大发汽车探讨合作事宜。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在马来西亚的代表是铃木一正。铃木一正得到了马哈蒂尔的长期信任，所以大发汽车的很多国际贸易活动都是通过三井株式会社操作的。

200. 1982年，现代汽车与三菱汽车达成技术转让协议很久之后，现代汽车为了筹措现金，的确曾经将10%的股份卖给了日本人，后来又提高到了12.6%，但日本人仍然不能插手现代汽车的运营。

201. 此处系基于马哈蒂尔在2011年3月7日对我提出的问题的书面答复。

202. 马哈蒂尔本人也曾经进入房地产、出租车和贸易行业。详情参考巴里·韦恩所著的《马来西亚独行侠：动荡时代下的马哈蒂尔》一书第15、16和55页。

203. 关于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考乔莫的《宝腾华嘉：马来西亚的汽车，三菱获利》（The Proton Saga: Malaysian Car, Mitsubishi Gain）一文和马查多所写的《宝腾与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Proton and Malaysia's Motor Vehicle Industry）一文，两篇文章收录于乔莫主编的《日本和马来西亚的发展》一书第11章和12章。宝腾汽车公司所需的钢铁中，大部分都来自三菱汽车公司在日本的钢铁公司。宝腾汽车公司的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赫德·纳兹米在早年就参加了马来西亚筹办国家汽车厂的项目，在之后的25年里一直时断时续地从事汽车行业。提到宝腾汽车本土化的问题，他回忆起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访问三菱汽车公司推荐的零部供应商的情况。他说，三菱汽车公司在吉隆坡的执行官们之前给他们造成的印象是这些零部件供应商是独立的企业，但很快情况就清楚了，三菱推荐的企业实际上都是三菱汽车公司的供应商，而且受到三菱汽车公司的影响。穆赫德·纳兹米说到自己对日本合作伙伴的期望，情不自禁地说自己当时还是个年轻人，太幼稚了。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7月5日的访谈。关于马哈蒂尔，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当初的幼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险些拨付10多亿美元的公款与中国建立一个生产发动机和汽车的合资企业。根据熟悉这笔交易的人所说，三菱汽车公司及其顾

问们极力劝说马哈蒂尔相信这笔投资会让宝腾汽车公司能够生产出使用宝腾发动机的汽车。而实际上，三菱是想趁此机会卖掉一个发动机生产线，这款发动机从商业角度来讲已经被实践证明为一个败笔了。日本人就想要马来西亚人自己出钱组建新的汽车公司，趁机将自己不想要的发动机生产线卖给马来西亚人。当马哈蒂尔即将和中国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签署合作协议之际，有人向马哈蒂尔道出了实情。马哈蒂尔改变了主意，而是同中国签订了一个没有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后来当事方就忘记了这个备忘录。这笔交易中的一个关键顾问就是林启明（Rin Kei Mei）。在此之前，宝腾汽车和三菱汽车之间签署的那份存在严重缺陷的合作协定中，林启明曾经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204. 三菱汽车公司的合同从来没有公开过。关于美国的出口计划，参考乔莫主编的《马来西亚的工业化》一书第280页。美国企业家马尔科姆·布瑞科林（Malcolm Bricklin）已经和马哈蒂尔达成了在美国销售宝腾华嘉的协议，但他没有获得必要的联邦政府及州政府的批准。

205. 对于从外国进口到马来西亚的汽车套件，宝腾汽车公司可享受免除40%关税的优惠，其他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可免去50%。1989年，即日本管理层接管的第二年，宝腾汽车公司首次实现赢利，但实现赢利的主要原因是记账方式的调整，宝腾汽车公司提高了给其分销商的价格，因此把收益计入了损益账户。

206. 此处系基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在1989年的“经济型轿车排行榜”。引自乔莫主编的《马来西亚的工业化》一书第280页。乔莫在该书第260页指出，宝腾汽车在进入英国市场第一年的销量，开创了新进入者的历史记录。

207. 1996年10月，宝腾汽车公司及其大股东雅哈亚·艾哈迈德成功收购英国莲花汽车公司80%的股权。

208. 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7月5日对马哈里·宾·东古·阿里夫的访谈。他说，宝腾汽车每年支付给三菱汽车的零部件费用最高时多达20亿林吉特。2004年12月，宝腾汽车支付给MV奥古斯塔公司7 000万欧元。这个意大利企业当时正在开发一款低成本的迷你型车体，不需要使用模具。马哈里相信他也能推出一款成本在1万林吉特的迷你型轿车。

209. 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7月5日的访谈。

210. 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7月5日的访谈。

211. 在金融危机期间，马哈蒂尔的长子默尔占（Mirzan）经营的海运企业负债严重，被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国际海运公司收购，而该公司又要求国家给予财政救助，而且想把烂摊子甩给马来西亚石油公司。整个过程都是不透明的，但结果肯定要纳税人埋单。

212. 根据东盟自由贸易区的CEPT减税计划的规定，日本在泰国的工厂生产的汽车达到了40%的自制率要求之后，就应该优先进入马来西亚之类的市场。到2003年，宝腾汽车的自制率已经达到了90%，但仍然不具有全球竞争力。宝腾汽车与派洛多汽车由于得到了政府的保护，在2008年之前可以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并继续享有马来西亚消费税退还50%的优惠待遇，每辆汽车的零售价享受15%左右的政府补贴。如同东盟其他协定一样，减税计划除了双边谈判之外，也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

213. 阿卜杜拉·巴达维与其他的精英略有不同，因为他的父亲在马来西亚争取独立的岁月中就已经是一位卓越的宗教领袖了。2009年，纳吉布·拉扎克出任总理一职，他是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之子。

214. 2004年12月，马来西亚宝腾汽车公司出资7 000万美元收购意大利MV奥古斯塔公司。收购该公司57.75%的股权。然而，一年之后，宝腾以区区1欧元的象征性价格将该公司股权贱卖给一家不知名的GEVI SPA公司，而MV奥古斯塔公司1.07亿欧元的债务也转移给了GEVI SPA公司。这笔交易亏损5亿林吉特，成为普腾损失最大的单项买卖。

215. 这句话引自贾亚塞克拉（S. Jayasankaran）所著的《新道路：小处着手》（The New Way: Think Small）一文。该文发表于2003年11月6日《远东经济评论》第15页。

216.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马来西亚的赢家就是马来西亚与日本大发汽车建立的合资车企派洛多。马来西亚政府要求派洛多提高汽车的自制率和出口量，但遭到了大发方面的抵制（与三菱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同宝腾汽车建立的合资车企的情况如出一辙）。为了应付马来西亚政府，派洛多一年在海外市场象征性地销售了5 000辆汽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宝腾最高时曾经在海外销售38 000辆汽车。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马哈蒂尔允许大发增持派洛多的股权并加强对派洛多管理层的控制

权，导致马来西亚方面在该合资车企中更加被动。马哈蒂尔离职之后，派洛多的零部件供应中，30%左右仍然靠进口，同时还享受着马来西亚政府给予“民族汽车”的减税政策。派洛多的市场份额在2005年左右超越了宝腾的市场份额。

217. 宝腾汽车公司后来发布的新车型Inspira，就是以三菱蓝瑟为基础开发出来的。

218. 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171页。正如科克所指出的那样，在韩国，没有人听从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建议。

219. 引自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韩国与后工业化》第281页。文中提到的这位经理隶属于现代集团的造船厂，但他那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在现代集团具有普遍意义，是很多人都认同的。

220. 现代与宝腾的不同之处在于产量。因为韩国集中精力发展出口贸易，现代汽车集团生产的汽车在1992年就达到了500万辆，也就是其成立之后的第20个年头。宝腾与派洛多这两家马来西亚汽车公司合并在一起计算，直到宝腾成立之后的第25个年头，汽车产量才达到500万辆。

221. 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实行市场开放政策，但韩国仍然继续采用非关税壁垒，产生了很多严重的影响。韩国会用一些非常奇怪的环境标准和其他标准来打压汽车进口，保护本国汽车市场，早在2006年就已启动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之所以拖到2011年底才最终议定并签署，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2006年，双方开始谈判时，美国每年向韩国出口大约6 000辆汽车，而韩国每年在美国销售的汽车超过70万辆（这个数字包括韩国在美国工厂组装的汽车）。

222. 与马来西亚的协议是郑周永于1993年亲自出面敲定的。协议内容包括在马来西亚组装现代汽车，发动机利用进口的现代发动机，而车体的零部件由马来西亚本土制造。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协议也都是大概在这个时间点缔结的。参考唐纳德·科克所著的《韩国王朝：现代与郑周永》第175页。

223. 马哈蒂尔在1981年出任总理之际，该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是1 570美元，韩国则是1 560美元。在2008年，马来西亚是7 250美元，而韩国是21 530美元。

224. 劳资关系缓和至少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事情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然

有很多的罢工事件，而且经常会出现暴力行为。

225. 长期担任苏哈托经济顾问的埃米尔·萨利姆是伯克利派经济学家。他说：“马哈蒂尔把宝腾搞起来了。这对苏哈托的影响很大。苏哈托的反应是‘如果一个拥有2 500万人口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萨利姆说，苏哈托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追求工业化，另外一个诱因就是印度尼西亚在1985年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粮食自给自足。苏哈托把每个人都叫了过来，说：“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必须是工业化。”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12月19日对萨利姆的访谈。

226. 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12月19日的访谈。埃斯特拉国际公司长期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经营得最好的企业。

227.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英国财团怡和洋行控制了印尼的埃斯特拉汽车公司，而且截至2010年，怡和洋行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收入都是依靠这个企业实现的，但它往往对此保持沉默，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会让印尼人产生反感。我在参观派洛多汽车公司期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该公司在技术上依赖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下属的大发汽车公司。马来西亚的经理们告诉我说，每当他们向政府抱怨出口量太低时，政府就会告诉他们他们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滞后于印尼的埃斯特拉汽车公司，他们必须先达到埃斯特拉汽车公司的标准，才能大幅增加出口。然而，事实上，埃斯特拉汽车公司自己却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增加出口量。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12月19日的访谈。

228. 哈比比在德国攻读学位，获得了航空工程学博士学位之后在那里工作了10年左右，于1974年回国。1976年，印尼组建P·T·Nurtanio航空航天公司，哈比比之后开始主持管理工作。1985年，P·T·Nurtanio在整合了国内的科研和生产力量之后，改组为印度尼西亚国营飞机工业公司（IPTN）。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度尼西亚国营飞机工业公司更名为印度尼西亚航空航天工业公司（Indonesian Aerospace Inc.），员工被裁减到不足4 000人。它继续制造小型飞机，利用套件组装直升机，为空客和波音制造飞机零部件，生产一些军用品，但是该公司原有的那种勃勃雄心已经不再。

229. 日本是空客与波音的重要分包商，制造某些复杂的飞机零部件。虽然日本最初在航空工业领域的政策失败了，但也催生了一些技术成果。

230. 参考末广昭在《泰国资本的积累（1855~1985）》一书第185页和第208

页。另外，泰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Thai Industries）会长帕隆·伊萨拉瑟纳（Paron Issarasena）这样描述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外国资本在泰国投资的情况：“这些资本到泰国利用普及特惠税制度，然后离开泰国，流向为其提供更多特权的国家，没给泰国留下任何好处。”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对。这句话刊登在1989年1月12日的《曼谷邮报》（Bangkok Post）上。

231. 1962年，菲律宾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210美元，1970年仍然是210美元，而到1970年时，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情况改善了许多。菲律宾在1980年超过了泰国，但到1990年菲律宾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690美元，泰国则是1 410美元。印尼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赶上了菲律宾，后来又被甩到了后面，但之后又赶上了，2008年，两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略低于1 900美元。

232. 参考罗纳德·道尔所著的《灵活的僵性：日本经济在1970~1980年之间的产业政策与结构调整》（Flexible Rigidities: Industrial Policy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1970~1980）一书第27页。该书由伦敦的阿斯隆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相似地，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认为成功的发展需要一个“多维度的谋略”。

233. 参考威廉·麦金森（William Megginson）与杰弗里·内特（Jeffrey M. Netter）合著的《从国家到市场：对私有化的实证研究》（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sation）一文，该文刊登于《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第39期（2001年）第321~389页。

234. 日本从1961年开始提高关税，这在部分程度上弥补了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合组织的要求下放松外汇管制带来的影响。日本于1964年加入上述两个组织。威廉·洛克伍德主编的《国家与日本的经济企业：政治经济增长论文集》一书第491页指出，全面上调关税的行为悄然展开了。其他一些历史案例也说明了在发展过程中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具有积极意义。比如，从1878年开始，在至关重要的工业发展阶段，德国加强了对本国市场的保护。

235. 参考罗纳德·道尔所著的《灵活的僵性：日本经济在1970~1980年之间的产业政策与结构调整》一书前言及第3章。关于钢铁，参考申璋燮所著的《后发国的经济学：德国、日本和韩国的赶超、技术转让与制度》（The Economics of the

Latecomers: Catching Up,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stitutions in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一书第49页。

236. 参考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所著、由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Edward Elgar) 于1995年出版的《各国经济表现之诠释》一书第124页。

237. 参考比尔·艾默特 (Bill Emmott) 所著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的《太阳也西沉》 (The Sun Also Sets) 一书第157页。

238. 参考比尔·艾默特所著的《太阳也西沉》一书第26页。

239. 通产省于1982年设立了负责发展生物技术的部门。另外一个取得了有限成功的部门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航空航天部门。

240. 1996年, 日本14家城市银行倒闭。1997年11月24日, 日本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轰然倒台。这些都是第二轮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日本政府被迫对新生银行 (Shinsei) 和青空银行 (Aozora) 采取了国有化措施, 但在此拒绝全面清理该国银行业。2003年, 脆弱的银行业再次拖累了日本政府, 迫使政府为大和银行 (Resona) 注资。

241. 关于更全面的探讨, 参考张夏准与申璋燮合写的《后危机时代韩国企业改组情况评估》 (Evaluating the Postcrisis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Korea) 一文。

242. 参考张夏准与申璋燮合写的《后危机时代韩国企业改组情况评估》一文。

243. 韩国消费者也体验到了个人债务带来的压力。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韩国家庭会把可支配收入的25%储蓄起来, 而到2011年, 这个比例降到了20%以下。韩国家庭的债务主要是房屋抵押贷款, 大约是其年收入的1.4倍, 达到了美国的水平。

244. 参考张夏准与申璋燮合写的《后危机时代韩国企业改组情况评估》一文。

245. 参考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所著的《各国经济表现之诠释》一书第124页。

246. 印度理工学院共有16个学院, 各学院独立运作, 共有1.5万名左右本科生

和1.2万名研究生。

247. 也可以换个角度来分析印度的经济结构。该国制造业贸易赤字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而其服务业的贸易盈余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服务业不能弥补制造业在印度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248.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 (Alfred Chandler) 最为人熟知的工作就是研究了大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彼得·诺兰 (Peter Nolan) 等学者也强调发挥东亚地区大企业的作用。

249. 艾丽斯·阿姆斯登准确地讲诠释了美国经济政策的两面性。他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全球化的发展，有两类不同的政策，一类是普度众生的，一类是独善其身的。前者指奉行自由主义政策，后者指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参考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逃离帝国：发展中世界的天堂地狱之旅》一书第1页。该书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第三部分

金融业：金融管制的意义

1. 参考海曼·明斯基 (Hyman P. Minsky) 所著的《稳定不稳定的经济》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一书第106页。

2. 参考亚历山大·葛先克隆 (Alexander Gerschenkron) 所著的《历史的连续性及其他随笔》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一书第137页。该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

3. 德国在19世纪30年代已经开始加速发展了，但在1848年之前，德国还没有股份制银行，直到1870年之后，这类银行才开始大量涌现，直到更晚的时候，这些银行的专业化程度才有所提升。

4. 参考加布里埃尔·托尔泰拉 (Gabriel Tortella) 所写的《1829~1874年的西班牙》 (Spain 1829~1874) 一文，该文收录于美国埃默里大学资深经济学教授龙多·卡梅伦 (Rondo Cameron) 主编的《银行业与经济发展：一些历史教训》

(Ban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Lessons of History) 一书。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分社于1972年出版。1856年，西班牙通过了一部鼓励开设投资银行的法律，但投资银行的活动受到现有公司法的制约。托尔泰拉估计，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铁路投资是工业投资的两倍。

5. 在经济学家们使用的会计系统中，一个国家内，加上输入资本或减去输出资本之后的储蓄与投资是相等的。换句话讲，如果没有国际资本流动，每一美元的投资必然是由一美元的储蓄为基础的。

6. 参考沃尔特·罗斯托所著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第36页。罗斯托认为，“经济腾飞”的最低要求是投资率要达到10%。他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在于其投资率是否提高到了10%或者更高。”

7. 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亚洲各经济体的储蓄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最高比重分别是：日本41%（1970），韩国39%（1988），马来西亚39%（1996，在1998年又提高到了42%），泰国36%（1996），印度尼西亚略低于33%（1989），菲律宾略低于28%（1977年，菲律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经济危机，自那之后，储蓄率呈现出攀升趋势，并在2000年攀升至35%的新高峰）。世界银行没有提供台湾在这方面的数据。

8. 参考禹贞恩所著的《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一书第195页。该书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除了阿根廷与智利之外，乌拉圭在20世纪70年代也实行了银行业私有化政策，结果导致本国企业集团纷纷争夺。拉丁美洲外债危机过后，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于1982年也实行了银行业私有化政策，导致大批银行落入到本国企业集团手中。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寡头们通过把持金融机构而迅速暴富，之后开始利用这些机构去购买矿产资源。关于俄罗斯的情况，参考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所著的《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The Oligarchs: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New Russia）一书。该书由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关于东南亚银行私有化的情况，参考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所著的《亚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一书。该书由伦敦Profile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9. 在态度开始松动之前，日本也曾经在国际社会做出过一些让步。比如，1963年和1964年，日本先后接受了《关税与贸易协定》第11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8条的规定。日本承诺不会因为国际收支差额而实行贸易控制措施。查

默斯·约翰逊认为，日本迎合国际社会要求而做出的努力“纯粹是为了改善公共关系而做出的表面姿态。”参考查默斯·约翰逊所著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第279页。该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

10. 相对较高的利率只是名义利率。国内投资者只关心经通胀调整后的、真实的利率，而与国内投资者不同的是，外国投资者要把他们的资金收入国内，所以他们只关心他们国内的通胀率。当亚洲国家的货币出现显著升值时，其就会为外国资本撤出提供便利。

11. 1987年降低到5%。参考青木昌彦 (Masahiko Aoki) 与休·帕特里克 (Hugh Patrick) 所编的《日本的主银行制度》(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第1章。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12. 参考青木昌彦与休·帕特里克所编的《日本的主银行制度》第37页的表1.6。

13. 政府故意让国内的公司债券问题变得复杂化，提高民众购买公司债券的难度，以便通过主银行体系来维系自己的影响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债券在20世纪80年代才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关于这个时期融资模式的变化，参考《日本的主银行制度》一书第9页。

14. 日元快速升值可以追溯到美日于1985年9月签署的《广场协议》。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250左右，到1988年变成了1:125。在这段时间内，日本央行的官方贴现率从7%降低到了2%。1989年末，日经225指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值（接近于39 000），是1985年9月的3.1倍。城市土地价格指数在1990年9月达到最高值，几乎是1985年的4倍。

15. 参考禹贞恩所著的《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一书第43页。韩国的央行是在美国派往韩国的经济顾问的监督下设立的，最初独立运作，但朴正熙的干预导致央行丧失了独立性。

16. 20世纪60年代，韩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均每年增加17%，20世纪70年代平均每年提高19%。20世纪70年代晚期重化工业如火如荼的时期，再贴现率达到峰值。

17. 参考禹贞恩所著的《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一书第113

页和第157页。她援引了1980年的一份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时70%的家庭储蓄都流向了非法的场外交易市场的借贷者手中。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场外交易市场的规模是正规金融市场规模的30%，场外交易市场的绝大部分贷款都流向了企业。关于优惠贷款，参考禹贞恩《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一书第11页和斯蒂芬·海格尔等人合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里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一书第33页。该书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20世纪60年代，场外交易市场的贷款规模与正规金融市场贷款规模的比例还不到40%，但20世纪70年代晚期，由于韩国启动了重化工业投资计划，优惠贷款发挥的作用也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一比例提高到了70%左右。

18. 参考艾丽斯·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第78页，。

19. 参考禹贞恩所著的《迅速崛起：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金融》一书第103页。根据禹贞恩的计算，在1965~1969年，经过利率变动进行调整之后，伦敦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比韩国低13%。在这一时期内，韩国从国外获得的贷款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4%提高到了21%。

20. 关于延期偿付场外交易市场利息的总统令发布于1972年8月3日，当时韩国的经济危机已经趋于尾声。总统令期满之后，债权人才能收取一定的债务利息，但利率遭到大幅削减。在暂停支付利息期间，韩国工业迅速恢复元气，到1973年，出口量提高了73%。参考阿姆斯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一书第96页。

21. 关于韩国的资本管制，参考张夏准所写的《韩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Korea）一文。该文收录于《剑桥经济学期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年第16卷第139页。

22. 韩国从美国银行获取的贷款最多，因为美国银行的董事会认为美国政府绝不会让自己的盟国破产。1976年12月13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一位银行家的话说：“美国政府会为韩国政府、韩国股票以及韩国其他的一切提供担保。”

23. 韩国外债之所以呈现出增长趋势，与该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稳定国内金融体系有关。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亚洲金融危机之间，韩国爆发了四次金融危机，两次发生在1969~1970年，一次发生在1972年，一次发生在1979~1981年（当时国际社会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一次发生在1986~1988年（20世纪80年代中

期，亚洲经济处于衰退期）。参考斯蒂芬·海格尔等人合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里的政治学》一书第23页。

24. 韩国货币在1971年有过短暂的贬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期间也多次贬值。虽然货币贬值会刺激出口，但长期贬值会导致外债负担难以承受。

25. 1979年，该国前十大的财阀的销售额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到1984年提高到了2/3。参考韦德所著《驾驭市场》一书第306页。

26. 20世纪80年代，利率虽然被提高了，但仍然受到管制。财阀的债务水平意味着它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承受市场汇率的负担。第一次银行私有化发生在1981年。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10年间，前五大国有商业银行都被私有化了，而且政府批准设立了一些新银行。参考斯蒂芬·海格尔等人合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里的政治学》一书第23页和禹贞恩所著的《迅速崛起》一书第195页。

27. 韩国政府在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本国股市时，非常明智地采取了谨慎态度。如同台湾地区以及现在的中国一样，韩国政府也设定了一次性入市资金的规模，并且根据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情况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当市场上突然出现消极情绪（如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那样），或者外国资本突然大规模撤离市场之际，这种“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有利于降低韩国承担的风险。关于韩国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参考斯蒂芬·海格尔等人合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里的政治学》一书第45页。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1972年朴正熙实行的暂停支付利息政策那个时期。财阀总是设法控制这些机构。1982~1983年，韩国政府批准设立了数十个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这类机构在韩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与在泰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非常类似。关于财阀游说政府放松金融管制的情况，参考阿姆斯特登所著的《亚洲的下一个巨人》一书第135页。到1996年，韩国主要的财阀联盟——韩国工业联合会如此疯狂地希望政府放松金融管制，以至于准备了一份报告，呼吁废除国防与外交以外的所有部委。这份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从20世纪80年代起，财阀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并购发展壮大。

28.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韩国政府的公共债务总额是该国国民总收入的25%。然而，外债的绝对规模从1994年的440亿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1 200亿美元，几乎都是短期债务，因此，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需要偿还。参考张夏准编写的《东南亚的发展经验：奇迹、危机与未来》一书第269页。

29. 韩国政府对本国五大财阀的重组被戏称为“大手笔”，这次重组影响了8个业务部门的17个大型子公司。

30. 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的平均总储蓄额（包括家庭、企业与政府的储蓄）为其生产总值的30.5%，韩国则为17.5%。参考韦德所著的《驾驭市场》一书第59页。中国台湾与韩国的区别在于家庭储蓄的规模不同。

31.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比韩国高3 000美元，之后双方差距逐步缩小，到1996年，差距缩小到了1 500美元以下。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差距再次拉大。自1999年之后，双方差距再次缩小，从2005年开始，韩国开始超越台湾。2010年，韩国领先台湾2 000美元。

32. 韦德在《驾驭市场》一书第67页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虽然从雇员数量来看台湾企业的平均规模比韩国小了50%，但台湾上游产业的供应商的集中程度比韩国高，换句话讲，台湾的上游企业中，寡头比较多。

33. 关于信贷配置的情况，参考禹贞恩所著的《迅速崛起》一书第170页。关于台湾，她指出，台湾333家企业获得的信贷总额在全台湾信贷总额中所占比重为18%。我认为，这个比例应该接近30%左右。当时，储蓄机构占据台湾金融体系资产的2/3。设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交通银行和中华开发公司（China Development Corp.）宣称旨在做工业金融和长期信贷。然而，实际上，二者更像是普通的商业银行。

34. 请注意，印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采取了主银行制度，但没有像韩国和日本那样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印度缺少的是出口纪律。参考亚洲经济发展和计划研究所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巴特（V. V. Bhatt）所写的《印度的主银行制度》（Lead Bank Systems in India）一文，该文收录于青木昌彦与休·帕特里克所编的《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巴特写道：“出口导向型战略不仅对主银行和企业施加一定的约束，还对政府施加了压力，促使政府把出口作为政策重点。”

35. 中国台湾的“中央银行”估计，从1965年到1988年，私营企业在台湾本土的贷款中，55%来自于金融机构，35%左右来自于场外交易市场。数据引自斯蒂芬·海格尔等人合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里的政治学》一书第79页。

36. 1987年，迫于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的压力，台湾取消了汇率管制。台湾

当时的外汇储备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紧随其后的是德国（560亿美元）。台湾大多数外汇储备都集中在了“央行”，因为“央行”强迫金融体系将外汇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汇率移交给自己，而使用本地货币予以兑换。为了控制大量发行本地货币产生的通胀效应，央行可以用债券支付，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不允许银行提取准备金。20世纪80年代，除了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之外，台湾银行还将储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24%的高水平。近来，中国大陆的央行也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类似水平，因为它奉行低息货币政策。

37. 比如，可以参考罗德里克（D. Rodrik）所写的《产业组织与产品质量》（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Product Quality）一文。

38. 从1980年到1990年，个人贷款在台湾的银行信贷总量中所占比重从20%提高到了40%。从1987年初到1990年末，台湾的房价指数提高了5倍。从1985年到1990年初，台湾证券交易指数从略高于600点的水平增加到了12 000点。之后多年间，房价指数一直居高不下，但证券交易指数出现了极大的波动。

39. 数据引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关键的发展阶段，韩国的平均储蓄额是其国民总收入的24.1%。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在有数据可查的6年间，菲律宾的平均储蓄额是其国民总收入的24.8%。

40. 这个问题可以相对地看。东北亚国家的政府实行出口纪律和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之后，招致了很多债务，但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它们每投资一美元所带来的债务相对较少。

41.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最高达到了19%。

42. 此处基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关于菲律宾偿还外债（即还本付息）的数据，直到1970年才可获取。以美元现价计算，1970年菲律宾每年要支付3.07亿美元，到1986年支付总额达到了30亿美元。

43.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韩国的外债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在1985年达到了最高水平，超过了50%。菲律宾在马科斯执政后的前15年间远低于这个水平，直到1981年才达到这个水平。当时，菲律宾经济已经开始崩溃了。到马科斯执政的最后一年（1986年），由于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产出和出口萎缩，外债形势急剧恶化，占据了国民总收入的90%多。虽然后来参照拉丁美洲的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

进行了债务重组，但之后债务问题一直是菲律宾经济的一个重担。参考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与苏珊·柯林斯 (Susan Collins) 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与经济表现》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第三卷《国别研究：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土耳其》。该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44. 1962年，菲律宾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210美元，韩国是110美元。到2008年，菲律宾是1 890美元，韩国是21 530美元。

45. 要知道，在1914年之前的50年时间里，美国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政策最严厉的经济体。平均关税税率是欧洲国家的两倍。在设立菲律宾国家银行 (PNB) 之前，菲律宾的银行被英国殖民者开设的银行把持着，这些银行只从事风险低的贸易金融领域。哈里森所说的那句话引自保罗·哈奇克罗夫特 (Paul Hutchcroft) 所著的《分赃式资本主义：菲律宾银行业的政治学》 (Booty Capitalism: The Politics of Banking in the Philippines) 一书第66页。该书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46. 事实上，美国与菲律宾先后签订了三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每一个协定都对两国经济关系起到了同样的塑造作用。1909年的《佩恩-奥德里奇关税法案》 (Payne-Aldrich Tariff Act) 在两国之间建立了自由贸易。之后，双方于1946年签署《贝尔贸易法案》 (Bell Trade Act) ，于1954年签署《劳雷尔-兰格雷协约》 (Laurel-Langley Act) 。从本质上来讲，这三个协定都确立了菲律宾在蔗糖和椰子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早在19世纪就已经确立了下来。在20世纪30年代，菲律宾出口到美国的农产品占其出口总量的80%。

47. 关于菲律宾国家银行第一次倒闭的情况，参考保罗·哈奇克罗夫特所著的《分赃式资本主义：菲律宾银行业的政治学》一书第67页。关于1949年的经济崩溃，参考该书第30页和第71页。

48. 1967年，马尼拉海外银行 (Overseas Bank of Manila) 倒闭。1976年，Genbank银行倒闭。20世纪80年代中期，另外四家银行倒闭。还有很多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也倒闭了。

49. 朴正熙认为马科斯的做法是一个有用的先例。在赢得了三次选举之后 (选举过程不透明) ，朴正熙便假借所谓的“维新宪法” (Yushin Constitution) 开

始实行独裁统治，直到1979年10月遇刺身亡。

50. 1967年，菲律宾央行的确曾经规定“出口导向型产业”可以优先获得再贴现，但其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工业及农业产品，导致再贴现贷款的滥用。参考保罗·哈奇克罗弗特所著的《选择性滥用：菲律宾优惠贷款配置的政治学》

(Selective Squander: The Politics of Preferential Credit Allo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一文，该文收录于斯蒂芬·海格尔等人合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里的政治学》一书第183页。保罗·哈奇克罗弗特得出结论认为，菲律宾的再贴现政策“完全不存在选择性”。除了再贴现政策存在瑕疵之外，菲律宾还运用了其他形式的优惠贷款，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为本国企业的海外工资提供政府担保，即由央行承担海外融资涉及的汇率风险，另一个是强制性地吧政府储蓄存储在某些特定的银行（比如丹丁赖以发家的那些银行）。

51. 参考伊莱·雷莫洛纳 (Eli Remolona) 与马里奥·兰伯特 (Mario Lamberte) 合著的《金融改革与国际收支危机：菲律宾的案例 (1980~1983)》(Financial Reforms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is: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1980~1983)。该文收录于《菲律宾经济与商业评论》(Philippin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986年第23期第113页。

52. 1979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前往菲律宾，以期解决该国不断恶化的经济问题。它们提出的一个建议是进一步发展股市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参考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0年联合发布的《菲律宾：金融方面》(The Philippines: Aspect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53. 本段的数据指的是贝内迪克托的共和国种植园主银行 (Republic Planters Bank)。贝内迪克托还控制着贸易商皇室银行 (Traders Royal Bank)。马科斯直接控制的银行主要是安存银行 (Security Bank)，这家银行从菲律宾央行那里获得的优惠待遇比其他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多。参考保罗·哈奇克罗弗特所著的《分赃式资本主义》一书第164~165页。

54. 参考保罗·哈奇克罗弗特所著的《分赃式资本主义》一书第80页。

55. 1981年的危机开始于臭名昭著的杜威迪 (Dewey Dee) 跑路案。他本人从事银行业务，跑路后留下8 500万美元的银行欠款（这是经通胀调整后的数额）。菲律宾人曾经送给杜威迪和他的三个合作伙伴一个雅致的称号，即“启示录中的四骑

士”。在这段危机期间，四家菲律宾银行被国有化。在1984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内倒闭的银行包括太平洋银行（Pacific Bank）、菲律宾退伍军人银行（Philippine Veterans Bank）等。

56. 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82年的700美元降低到了1986年的520美元。

57. 关于菲律宾国有银行债务减记的情况，参考保罗·哈奇克罗弗特所著的《分赃式资本主义》一书第188页。1986年，菲律宾政府的国内债务是880亿比索，到1990年，增加到了2 910亿比索。

58. 参考汉密尔顿 - 哈特（Natasha Hamilton-Hart）所著的《亚洲国家与亚洲银行家：东南亚的中央银行业务》（Asian States, Asian Bankers: Central Banking in Southeast Asia）一书第119页。该书由康奈尔大学于2002年出版。

59. 从1975年开始，银行必须将其信贷总量中的20%投向土著贷款者。关于非常有限的出口再贴现，参考汉密尔顿 - 哈特所著的《亚洲国家与亚洲银行家》一书第117页。

60. 1977年，房地产业贷款在信贷总量中所占比重为22%，1988年为36%。参考乔莫所写的《马来西亚大崩溃：谁之错？》（Malaysian Debacle: Whose Fault）一文，该文收录于张夏准等合编的、由帕尔格雷夫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金融自由化与亚洲危机》（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and the Asian Crisis）一书，引用位置在该书第105页。

61. 参考韦德所著《驾驭市场》一书第42页。

62. 马来西亚在1989年出台的金融改革法是《银行与金融机构法案》（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到1992年，又出台了《证券法案》（Securities Act）。

63. 吉隆坡综合指数直到2007年才恢复到了1997年的水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力推动贫穷国家发展股市，与世界银行1989年发布的《金融体系与发展》报告具有密切联系。关于“金字塔式股权结构”和其他金融游戏的更加全面的探讨，参考乔·史塔威尔所著的《亚洲教父》一书第5章。

64. 关于马来西亚的数字引自乔莫所写的《马来西亚大崩溃：谁之错？》一

文，该文收录于张夏准等合编的《金融自由化与亚洲危机》一书，引用位置在该书第106页。

65. 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1996年，马来西亚的国民总储蓄额在其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为39%，韩国则为35%。

66. 对于个人或组织持有银行股份的限制适用于所有新设立的银行以及部分原有的、可能被并购的银行。但在涉及PhileoAllied银行时，这一规定就被忽视了。

67. 在危机之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即该国央行，主导了金融业重组，21家商业银行、12家投行、25家财务公司被重组为10个金融集团。

68. 1998年9月之后，马来西亚重新实施了资本管制措施。马哈蒂尔下台之后，大部分管制措施都在2004年和2005年取消了。

69. 这四大金融集团都是以其核心银行为基础不断发展壮大的，这些具有核心地位的银行包括盘古银行、曼谷都市银行（Bangkok Metropolitan Bank）、大城银行和曼谷联合银行。20世纪70年代，曼谷联合银行在私营银行中的地位被泰国农民银行超越了。参考末广昭在《泰国资本的积累（1855~1985）》一书第155、248和287页。

70. 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盘古银行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性放贷主体，甚至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具有重要地位，恰恰是因为政府政策没有大力引导该银行去支持泰国发展出口导向型。关于盘古银行的更多信息，参考乔·史塔威尔所著的《亚洲教父》一书第94页。

71. 关于央行与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关系，参考多纳（R. Doner）与昂格尔（Unger）合写的《泰国经济发展中的政治与金融》（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Thai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该文收录于斯蒂芬·海格尔等人合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里的政治学》一书第97和104页。

72. 泰国商业银行在不同部门间投放信贷的数据，引自多纳与昂格尔合写的《泰国经济发展中的政治与金融》一文。

73. 从1983年到1986年，32家财务公司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救助，15家倒闭。还有3家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74. 泰国于1990年5月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8条，该条涉及货币兑换。

75. 末广昭在《泰国资本的积累（1855~1985）》一书第245页给出了这样的计算结果：泰国银行储蓄总额在1957~1967年间增加7.6倍，在1967~1977年间增加6.6倍，而在这两个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均增长了2.5倍左右。关于总储蓄额的数据引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76. 1987年到1996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真实增长率平均为9.2%，而从1951年到1986年则平均为6.5%。

77. 关于房地产信贷的数据，参考雷诺（B. Renaud）等人合写的《房地产繁荣如何解体金融机构：现在可以做什么？》（How the Real Estate Boom Undi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at Can Be done Now?）一文。该文收录于威特（J. Witte）与克贝勒（S. Koeberle）合编的《泰国的竞争力与可持续的经济复苏》（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Recovery in Thailand）一书。

78. 根据彼得·瓦尔（Peter Warr）的计算，1973~1986年，在泰国的储蓄投资总额中，流入泰国的短期资本所占比例为2.1%，1987~1996年是22.8%。参考彼得·瓦尔编著的《危机后的泰国》（Thailand Beyond the Crisis）一书第13页。该书由伦敦劳特利奇-柯曾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79. 参考彼得·瓦尔编著的《危机后的泰国》一书第5页。关于削减预算的情况，参考巴素·蓬拜集和克里斯·贝克所著的《泰国的危机：新自由议程与当地的反应》（Thailand's Crisis: Neo-liberal Agenda and Local Reaction）一文。该文收录于《金融自由化与亚洲危机》一书第89页。增值税从7%提高到了10%，燃油税及一些公用事业产品的价格也有所提高。在1998年上半年，泰国非耐用品的销量下降了10%到15%，而耐用品的销量则下降了50%到7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供了一笔172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附带有诸多条件，提出了很多要求。

80. 3.5%这个数字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泰国政府的第1份意向书，时间是1997年8月。-7%这个数字出自1998年8月的第5份意向书。意向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为其成员提供资金时采用的一个正式机制。双方在意向书上写下他们将要做的事情，并在签署之后进行交换。

81. 1997年7月到1999年7月之间，共有7家银行和11家财务公司被国有化。

82. 林绍良于2012年去世。我这次拜访他位于雅加达的家时，他还在世。

83. 林绍良在1938年到达爪哇岛，当时22岁，和一位兄弟一起工作。

84. 苏哈托政治地位的上升开始于1965年9月30日的那场政变。当时，苏哈托率领一帮陆军官兵武力推翻左翼总统苏加诺，杀死大概50万印尼共产党员（也有可能更多）。1967年，苏哈托出任印尼代理总统。1968年3月正式出任总统。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哈托就已经是蒂博尼哥罗师（即中爪哇驻军的代名词）的指挥官了。由于他利用职务之便亲自经营一些军工企业，或者容忍一些未经批准的军工企业，结果受到了惩罚，从1959年到1960年被贬到了位于万隆的军事人员与指挥学院进行授课。林绍良在20世纪50年代与苏哈托的关系不是特别密切，但二人却建立了联系，林绍良经常性地给这位未来的总统管理的“基金会”捐赠一些财物。

85.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苏哈托的长女哈蒂扬蒂（Siti Hardiyanti Rukmana）和长子西吉（Sigit Harjojudanto）控制了中央亚细亚银行30%的股份（发行股票200万股，被他们二人控制了60万股）。李文正（Mochtar Riady）持有18.7%，后来在1990年全部出售给印尼三林集团。我在2010年12月前往印尼访谈了中央亚细亚银行几位现任和前任董事，他们都确认了文中提到的关联方借款的规模。很多贷款者都是以空壳公司的名义获取的，所以掩盖了贷款的真实流向。

86. 即便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夕那段投机风潮最严重的时间，林绍良治理下的中央亚细亚银行贷出去的本金和利息都能得到清偿。李文正的管理方式较为保守，后来，到1990年辞职并开始经营自己的财务公司。20世纪90年代，林绍良之子安德烈在打理该银行时也采取保守策略。1997年，该银行的房地产投资仅占其投资总额的15%，远低于其他银行。

87. 此处采取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8 000印度尼西亚盾。这是1997年7月到2012年7月的平均汇率。

88. 关于林绍良被拍卖资产的价值，只是一个评估数据。根据印尼央行行长苏德拉查·吉万多诺（Soedradjad Djiwandono）所说，关于林绍良的那部分资产究竟拍卖了多少钱，没有一个权威的记录，因为资产是被印度尼西亚银行重组机构（Indonesian Bank Restructuring Agency）拍卖的，但拍卖所得直接进了政府

预算，没有发布什么正式的会计报告。媒体估计资金回收率是53万亿卢比的40%左右，一位博士生写的论文通过计算，得出了更高的比例，即48%。参考玛莲·迪勒曼（Marleen Dieleman）所写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战略如何创新？》（How Chinese are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es of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Southeast Asia?）一书第161页。该书由莱顿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89. 苏加诺热衷于修建宏伟建筑。正是以他为首的评审团选择了基督教徒建筑师弗雷德里克·西拉班（Frederich Silaban）去设计伊斯蒂赫拉尔清真寺。他把印尼民族独立纪念碑放在了市中心的独立广场公园的中央位置，这个公园的前身是荷兰殖民者修建的康尼格斯普兰（Koningsplein）阅兵场。

90. 正式地讲，这座纪念碑的名字是“青年纪念碑”（Youth Monument），前面的那一个是“迎宾纪念碑”（Welcome Monument）。

91. 苏加诺的三个开发银行是印尼国家工业银行（Bank Industri Negara Indonesia）、印尼国家银行（Bank Negara Indonesia）以及印尼人民银行（Bank Rakjat Indonesia）。关于信贷配置的情况，参考安德鲁·麦金太尔（Andrew J. MacIntyre）所写的《印尼金融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Developing）一文，该文收录于斯蒂芬·海格尔等人合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里的政治学》一书第129页。比如，印尼央行——印度尼西亚银行的数据显示，在1956年，进口商获得的信贷总额是1.3万亿印度尼西亚卢比，而出口商获得的信贷总额是4亿印度尼西亚卢比。从1953年到1957年，进口商获得的信贷总额大约是出口商获得的信贷总额的两倍。

92.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大亨的银行都获得了政府救助，但很多人事后并不偿还政府的救助金，其中最恶劣的一位可能就是林德祥（Sjamsul Nursalim）了。他至今仍然躲藏在新加坡。林德祥的妻子在香港见识了贝聿铭为中国银行设计的大楼之后十分羡慕，后来请他设计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商业银行（BDNI）的办公大楼。

93. 在苏哈托漫长的统治中，伯克利派的五位经济学家先后担任了不同的部级岗位。

94. 在20世纪70年代，印尼开建的大项目包括国有的喀拉喀托钢铁公司

(Krakatau Steel)、杜迈市炼油厂和阿沙汉炼铝厂。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83年，在全国未偿还银行信贷中，一半左右都是央行的直接贷款和再贴现贷款。苏哈托在其统治末期，任命哈比比为副总统和法定继承人。

95. 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12月17日的访谈。苏德拉查是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并非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他在学术观点与私人关系上都与伯克利派经济学家们有着密切联系。他的岳父是尼蒂萨斯卓 (Widjojo Nitisastro) 的导师苏米特罗·佐约哈迪库苏莫 (Sumitro Djojohadikusumo) 。

96. 像中央亚细亚银行这样谨慎的银行中，没有任何一家会贷款给汤米·苏哈托 (Tommy Suharto) ，因为他非常不可靠。苏哈托的子女跟国有银行的常务董事们走得非常近。据说，当时国有银行在决定是否发放贷款时，经常根据申请者是否持有高级官员准许放贷的信函。这种信函被称为“神圣的信” (sacred letter) ，实际上就是对是否贷款做出的指示。这种做法不足为奇，它始于苏哈托，韩国的朴正熙也使用过这类手段，至今在浦项制铁的博物馆里还展览着一封这样的信件。这封信要求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为浦项制铁的老板朴泰俊 (Park Tae Joon) 提供全面支持。但不同的是，在韩国，朴正熙在强迫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同时，也对贷款者提出了增加出口的要求。

97. 参考拉迪乌斯·普拉维罗 (Radius Prawiro) 在1989年向印尼管理发展学院 (Indone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所做的题为《运用市场经济的智慧》 (Back to the Wisdom of the Market Economy) 的演讲，以及亚当·施瓦茨 (Adam Schwarz) 所著的《一个等待中的国家：印尼对稳定的追寻》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 s Search for Stability) 一书第56页 (由圣伦纳兹的乔治·爱伦和昂温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关于印尼在1971年几乎取消了所有资本管制措施，参考安德鲁·麦金太所写的《印尼金融的政治学》一文，该文收录于斯蒂芬·海格尔等人合编的《发展中国家金融里的政治学》一书。本段的银行数据引自印度尼西亚银行 (印尼央行) 前行长苏德拉查·吉万多诺所著的《印度尼西亚银行与危机：内部人的观点》 (Bank Indonesia and the Crisis: An Insider' s View) 一书第53页。该书由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于2005年出版。

98. 虽然郭说锋 (Tommy Winata) 的父亲像许多东南亚大亨一样是靠为军队建造兵营起家的，但他更愿意说自己是通过吃苦起家的，比如他经常告诉记者他最初卖过冰棍，做过洗车工等苦难经历。他与军方以及雅加达警方的深厚关系给予他强

大的力量。郭说锋在私下总是小心翼翼地否认他曾经参与过毒品交易。今天，Bengkel Nightpark娱乐城已失去了昨日的光彩。

99. 这里提到的借壳上市指的是最初郭说锋受够了一家拥有婆罗浮屠酒店的政府企业。郭在开发区的项目后来被剥离出去了。雅加达证券交易所直到1995年才开始在新地点办公。

100. 参考乔·史塔威尔所写的《苏玛银行与埃斯特拉国际公司合作的内幕》(Inside the Summa-Astra Affair)一文。该文收录于1993年4月期的《亚洲企业》(Asia Inc.)杂志。

101. 1976年被迫下台之际，苏哈托留给国家石油公司105亿美元的债务。他自己创造的私有领地还包括太平洋银行，后来该银行由于长期从事鲁莽、非法的关联方借款而不得不要求政府救助，后来，苏哈托将该银行交给女儿经营。

102. 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非常快。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银行信贷总额中，国有银行及央行提供的信贷一直占据75%到90%的比例。但到了1990年底，在银行信贷总额中，该国私营银行占据了36%，外资银行占据了42%。在1992年左右，私营放贷主体占据了主导地位。参考安德鲁·麦金太尔所写的《印尼金融的政治学》一文。

103. 关于进一步的讨论，参考乔莫主编的《东南亚的工业化》(Southeast Asia's Industrialization)一书第11章，第292页。到20世纪90年代初，制造业的出口额首次占据了印尼出口总额的一大部分，但这掩盖了内在的出口结构的缺陷，其中一个就是外资企业从事的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然，从宏观经济学家角度看，所有的出口都是被视为平等的。

104. 此处系基于我在2010年12月17日的访谈。

105. 此处系基于我在2011年12月19日的访谈。埃米尔·萨利姆(Emil Salim)是一位非常开放的、有魅力的绅士。然而，在两个小时的访谈中，在讨论印尼经济问题时，他反复使用新古典主义学派的“效用”一词，似乎没有意识到印尼在经济结构方面的窘境。这让我很惊讶。印尼与东北亚的经济发展历程存在令人惊讶的对比。

106. 参考乔·史塔威尔所写的《苏玛银行与埃斯特拉国际公司合作的内幕》一

文。

107. 参考欧诺克 (O' Rourke) 所著的《改革运动》 (Reformasi) 一书第57页及285~286页。另参考汉密尔顿 - 哈特所著的《亚洲国家与亚洲银行家》一书第54页。

108. 苏哈托家族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但对于他们来说，做起来容易多了。陈子兴 (Hendra Rahardja) 的银行是恒荣银行 (Bank Harapan Santosa) 和库拿国际银行 (Bank Guna International)。他欠印尼央行的钱是危机期间央行为其银行提供的流动性信贷。他逃离了印尼，从来没有服过刑。

109. 参考汉密尔顿 - 哈特 (Natasha Hamilton-Hart) 所著的《亚洲国家与亚洲银行家》一书第3章。

110. 截至1997年7月，私营银行的外债总额达到了550亿美元 (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16%)，其中超过340亿美元的债务的偿还期限都不到一年。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

111. 1997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小幅上涨到了1 130美元，因为印尼在前一年年底爆发了金融危机。1998年，人均国民总收入降低到了680美元。2005年增加到了1 170美元。

112. 参考吕克·莱文 (Luc Laeven) 所著的《东亚银行的风险与效率》 (Risk and Efficiency in East Asian Banks) 一文。

113. 按照资产规模排行，印尼最大的三家银行仍然是国有的，中央亚细亚银行位列第4名，第5到15名都是外资控制的。此外，印尼还有100多家非常小的私有银行，这些银行把业务重点集中于利润空间较大的消费类贷款而幸存了下来。危机过后，银行间的竞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涉及的制度都没有降低借贷率。2010年12月，虽然印尼央行规定的基准借贷利率是6.5%，但印尼银行面向企业的短期贷款利率却高达13%到14%。

114. 熊彼特对这一现象的阐释可能是最著名的了。他写道：“银行家在本质上是属于一种发展的现象.....使新组合的实现成为可能，他好像是以社会的名义授权人们去组成这种新的组合。他是交换经济的主宰。”参考熊彼特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书第74页。我参考的版本是雷德

弗斯·奥佩 (Redvers Opie) 翻译的英文版本，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34年出版。

第四部分

中国何去何从？

1. 参考李向前、韩钢所写的《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记录》一文，该文最初发表于《百年潮》 1999年第3期第4~11页。重印后收录于由谢春涛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写真》第192页。

2. 中国再生产水泥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污染，装料工作需要人工完成。中国洛阳的玻璃制造工艺比较著名。参考乔·史塔威尔所著的《中国梦》(The China Dream) 一书第192页。

3. 说句公平的话，世界银行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组织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还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让中国的决策者接触到了不同的经济理念和政策选择。然而，这个互动过程完全是由中国主导的，任何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被过滤掉了。我的个人感觉是，世界银行内部的一些人倒也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当时世界银行每年一度的《世界发展报告》呈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世界银行派往中国的代表们却能把那些理解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们带到中国去，让他们参加学术会议，甚至在1987年还组织了一批由韩国人组成的高级别访问团去访问中国，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韩国是如何协调计划 and 市场的，而且这次访问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组织起来的。中国在经济发展思想上不依赖西方，这一点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是不同的。

4. 这种做法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这样做的不止中国。

5. 从1980年到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9%。从1987年到1996年，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5%，但在1996年之前的28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7.3%。

6. 正如第一部分中所讨论的那样，这个时期找不到可靠的数据。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布的官方数据指出增长率是70%。比如，参考曾经担任中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的张根生所著的《中国农村改

革决策纪实》一书第324页，该书由深圳海天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1949年的粮食产量是1.132亿吨，1953年是1.668亿吨，1956年，即实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前夕，是1.927亿吨。根据他的数据来推断，中国粮食产量在7年内增加了70%。一些非中国的学者认为1949年的粮食输出多于1.13亿吨，因此，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粮食产出有了大幅增长，但增长幅度可能要小一些。尽管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但我倾向于后面这一种观点，我想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区实行小农耕作模式时生产了很多粮食。

7. 数据来源于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参考乔·史塔威尔所著的《中国梦》一书第33页。中国粮食产量的统计数据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土豆和大豆这两类农产品。土豆和大豆也是中国人食谱上的主食。每户农田规模平均超过了1/3公顷这个数据引自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对中国17个最为重要的农业省份进行的调查。在其他一些农业不太发达的省份里，农业生产规模较大。

8. 参考《邓小平文选》第3卷（1982~1992）第370页，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9.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年的数据，中国每公顷土地的水稻产量为6.59吨，世界平均水平为4.2吨。每公顷土地的小麦产量为4.75吨，美国产量为2.99吨，世界平均水平为3.02吨。

10. 对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产糖量，参考史塔威尔所著的《中国梦》一书第33页。广西甘蔗产量的最新数据均来自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CEIC）的“中国经济数据库”。在20世纪90年代，当糖在台湾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农作物时，中国的甘蔗平均产量分别为80吨/公顷，而在菲律宾大约是55吨/公顷。

11. 中国大豆进口额的数据引用自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的“中国经济数据库”。这里的讨论采取了简化模型。中国一些大型的水稻种植农场现在掌握在私人手里。中国的大豆种植被历史上善变的政府政策扰乱了，导致大豆种植区域一直向北转移，而且政府在大豆种植科技推广、大豆加工、大豆营销等方面做的工作不太有效。

12. 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和得克萨斯大学发布的家庭收入差距评估数据库。得克萨斯大学的数据试图弥补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在统计方式上的不足。两个数据库揭示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农村

收入数据是以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中国调研数据为基础的。

13. 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到，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两个“普遍性趋向”。

14. 中国法律禁止地方政府直接筹集资金，因此它们只有通过投资公司来从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

15. 自1999年以来，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共合作开展了5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中期。最新一轮的调查中，调查人员在17个农业大省访谈了将近1 600个农户。调查结果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0年之间，37%的农村发生过征地现象，被征走的土地用在了非农业用途上，这一比例比2005年调查时高出了27%。截至2010年，24%的农村发生过土地出租现象，被租用的土地一般用于商业性的农业生产活动。

16.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10年的数据显示，平均来讲，政府每次征地的规模为560亩（约合37公顷）。但很难获得真正精准的数据。虽然农户的土地被征收了，但他们只知道政府在征地，却很少知道征地的详情和细节。地方政府也不愿意承认它们到底征收了多少土地，因为这会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地方政府的征地频率越来越高。

17. 关于本段提到的平均补偿金额，参考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10年发布的关于中国的数据。中国法律规定的土地租赁期最长为30年，所以政府计算征地补偿时采用的年限不会超过30年。按照每个农场的平均规模为5.6亩，平均年租金每亩为人民币290元，那么按照租期最长30年来算，赔偿金额最多为人民币48 000元。这相当于一个理论上的最高值，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精米价格在撰写本文时为人民币1.5元每斤，或者说3元每公斤。根据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80%的农民家庭都至少有一个成员在非农领域就业。

18. 长城汽车设立于河北保定，最初从事农业机械修理；万向集团是从浙江余杭起家的，最初从事农业机械制造；娃哈哈发端于浙江杭州的上城区；远大集团始建于湖南郴州。除了万向集团的前身设立于20世纪70年代之外，其他几个都是成立于80年代。

19. 说句公道的话，中国太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太多，中国政府不可能像中国台湾和韩国那样迅速地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来安置他们。今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步萎缩，因此农村劳动力会有更大的工资议价能力。但从1978年到现在，一个仍然存在的事实是，中国大陆仍然没有像台湾地区、日本、韩国那样优先考虑农村人口的福利。

20. 参考刘遵义等合写的《没有输家的改革：中国双轨制并进的解释》（Reform without Los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一文，该文收录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年2月第108卷第1期第120~143页。黄亚生所著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一书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状况及农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1. 1993年的总理是李鹏。1994年1月，朱镕基开展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税源减少。朱镕基总理于2003年卸任。

22. 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之后，中国才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使其管理地方国企。官方数据表明，国企工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7 000万下降到了21世纪头10年中期的不足3 000万。

23. 国企大裁员时（1998~2001年），我正在写《中国梦》一书，《中国梦》一书的一个严重不足就是没有对这次大裁员进行深度剖析。

24. 参考《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25. 国企的利润总额中，大部分都是由国资委监管的那些国企创造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国资委监管的国企的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所有国企的利润总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2010年国资委监管的央企利润总额约是1.1315万亿元，全国国企2010年实现利润19 870.6亿元。

26. “减震器”（shock absorber）一词是借用葛艺豪（Arthur Kroeber）的说法。中国资源类和服务类寡头企业的利润规模十分庞大，这在它们的市值上得到了体现，其市值远远超过了制造企业的市值。2011年9月30日，15家市值最大的国家垄断公司是：中石油，2 250亿美元；中石化，930亿美元；中海油，750亿美

元；中国移动，2 000亿美元；中国联通，490亿美元；中国电信，520亿美元；中国人寿，660亿美元；平安，430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2 070亿美元；中国银行，1 140亿美元；中国建设银行，1 550亿美元；交通银行，410亿美元；中国招商银行，370亿美元；中国神华，790亿美元；中铝，140亿美元。

27. 当时，中石化最咄咄逼人，切断了广东省的汽油供给。

28. “二战”之后，美国上市企业发放的红利占企业净利润的50%左右。

29. 比如，在火电设备、建筑设备和机床领域，都有五六个大型国企相互竞争。在造船和电信基础设施领域，也有五六个大型企业相互竞争。铁路行业只有两个大型制造企业。

30. 2011年8月23日，24家市值最大的、与国家有联系的工业企业包括：海油工程（石油机械），33亿美元；中海油服（石油机械），87亿美元；中联重科（建筑设备），126亿美元；徐工集团（建筑设备），73亿美元；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国防/航空），41亿美元；中国一重（工业机械），40亿美元；国电南瑞（工业机械），62亿美元；中集集团（工业机械），71亿美元；山东威高集团（医疗设备），21亿美元；迈瑞医疗（医疗设备），26亿美元；华锐风电（风力涡轮机），85亿美元；新疆金风科技（风力涡轮机），51亿美元；东方电气（电力设备），64亿美元；特变电工（电力设备），43亿美元；中国西电（电力设备），35亿美元；保定天威（电力设备），33亿美元；浙江正泰集团（电力设备），28亿美元；上海电气（电力设备），55亿美元；中国南车（铁路设备），70亿美元；中国北车集团（铁路设备），60亿美元；中国造船（造船等），176亿美元；中船集团（造船等），66亿美元；扬子江船业（造船等），32亿美元；中兴通讯（电信设备），93亿美元。

31. 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05年第1204号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每年发出的政策性文件都会从零开始编号，以表示它发出了多少个文件。那些为中国企业提供“指导”的敏感文件不会公开。事实上，文件的目录有可能被列为国家机密。

32. 在工业装备领域，国家发改委还规定了一些比较具体的目标。比如，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大型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要达到95%，中型煤矿80%，小型煤矿40%。

33. “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最早是陈云在1980年提出来的，邓小平表示赞同。但现在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34.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是三峡水电站项目、南水北调项目和其他像许多大型电力、路桥项目的资助者。作为一个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宣称自己的不良贷款率是全国最低的。根据公开报道显示，2009年，国家开发银行不良贷款率是0.94%，而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是1.5%到4.3%。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审批制度是中国最严格的。所有大规模贷款都要由陈元亲自签字。

35. 国家开发银行2007年底的外债余额是180亿美元，2008年底是650亿美元，2009年底是98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也是一个重要的外国贷款提供者，支持位于中游产业的中国企业。在2009年12月一个典型的交易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借给巴基斯坦铁道部2.03亿美元，来支持巴基斯坦购买277辆中国制造的机车。

36. 中国铁建、中国路桥集团等中国国有建筑企业通常是各有专长，这些企业现在归国资委监管。

37. 之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2010年，西屋电气（现在被日本的东芝公司控制着）曾经在同意向中国转让重大技术的前提下赢得了一个协议，为中国供应4座第三代AP1000型核反应堆。据报告，该公司在签署合同后，向中国移交了75 000份技术文件。详情请参考2010年11月23日的《金融时报》。

38. 三一重工的专长是混凝土泵车的生产，借助这个优势，它可以扩大生产规模，然后在由国企垄断的轮式机械行业占据一席之地。这类似于日本本田公司的发展历程。尽管日本通产省不希望出现更多的汽车制造商，但它仍然实现了从生产摩托车到生产汽车的转型。

39. 《华盛顿邮报》报道，华为在国内扩张之际，从中国建设银行多次获得大笔融资，其中有一些钱一直没有归还。这表明中国对私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参见约翰·庞弗雷特（John Pomfret）所著的《电信企业的历史表明美中缺乏战略互信》（History of Telecom Company Illustrates Lack of Strategic Trust Between U.S., China）一文，载于2010年10月8日的《华盛顿邮报》。

40. 华为公司宣称任正非持股比例不到2%。

41. 华为2008年被迫放弃收购美国企业3Com的计划，2010年被迫放弃收购摩托

罗拉的无线网络业务，2011年被迫剥离其之前收购的美国企业3 Leaf的股份。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华为在其市场的销售也提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

42. 这笔投资只是用于修建高速铁路，中国还另外斥资数千亿美元来扩大铁路网络的其他部分。2011年开通的主要高铁线包括广州—深圳线、北京—上海线和北京—武汉线，以及上海—成都线的剩余部分。现在乘火车只要4.5小时就能从北京到上海，行程1 400公里。

43. 中央政府派出的谈判人员根据规划中的制造与技术获取进度，先后同庞巴迪、川崎重工、西门子和阿尔斯通进行谈判。2010年一位部级官员自豪地对中国一个国家级的新闻机构说，在之前多次竞标中失败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已经同意将一项技术转让的费用降低一半以上，以换取同中国的合同。这位官员解释说，任何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全球性企业必须同意全面的技术转让，实现本地化生产、创建一个中国品牌，并制定合理的价格。他声称中国用5年的时间，走完了世界用40年走完的高铁发展道路。中国两个主要的火车制造商是中国北车与中国南车。

44. 引自周翊民在2011年6月21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的讲话。

45. 比如，中国中铁正在引领着委内瑞拉的高铁项目，中铁建设正在引领着土耳其的高铁项目。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学到的经验反馈给国内的设备制造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46. 总体来讲，国有企业在这一时期的净出口额迅速转为了负数，2000年略有增加，但到2000年就减少了1 530亿美元。这反映出上游国企进口石油、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的数量以及制造企业进口的设备有了大幅增加。这些数据是否反映出中国过于扶植国企的产业政策存在更根本的弱点，也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47. 参考托马斯·麦克劳 (Thomas McCraw) 所著的《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思想精要》(Essential Alfred Chandler, 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 一书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所著的《战略与结构》(Strategy and Structure,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 一书。

48. 比如，博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Cerberus, 美国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之一) 在控制着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时，就积极地同中国地方政府拥有的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就小型车生产业务分包的问题进行谈判。英国石油公司的太阳能子公

司也将生产太阳能电池的业务外包给了中国供应商。

49. 比亚迪的传统汽车在中国的年度销量增加到了50万辆。数据来自《纽约时报》。

50. 2008年度，比亚迪从深圳市政府那里获得的财政补贴分别为3.59亿元（略多于5000万美元），为其税前利润的1/4。该公司在之后几年也得到了类似的补贴。所有数据来自该公司公开发布的损益表。

51. 尚德获得的主要补贴是无锡市政府划拨的启动资金以及用于修建生产设备和总部的廉价土地。

52. 2011年，中国宣布了首个全国统一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高于利用不可再生能源发的电的价格，以补贴太阳能装置的安装成本。结果，国内太阳能电站从2012年中期开始迅速增加，每年太阳能发电量从2011年的1.5千兆瓦增加到了2012年的4千兆瓦（预计全球总量为30千兆瓦）。

53. 2011年8月19日，市值排名靠前的私营企业包括：三一重工（建筑设备），190亿美元；吉利（汽车），22亿美元；长城汽车（汽车），39亿美元；比亚迪（汽车），20亿美元；英利绿色能源（光伏），8.24亿美元；尚德太阳能（光伏），9.19亿美元；海尔上海（家用电器），13亿美元；海尔香港（一个单独的家电器企业），27亿美元；比亚迪电气（手机电池和外围设备），6亿美元；联想（电脑），60亿美元；汇源果汁（不含酒精的饮料），8.4亿美元；蒙牛（食品、乳制品），70亿美元；新希望（化肥、农业饲料），11亿美元。

54. 参考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所著的《中国特色的制度：适合别国吗？》（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 Can It be a Model for Other?）一文。诺顿指出，中国国企的总资产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而在法国，国企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

55. 中国三家政策性银行的资产在中国银行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大约为8%，因为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很多债券，这与商业银行不同。政策性银行把债券卖给商业银行来筹资。中国的三家政策性银行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截至2011年底，这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未偿贷款总额为人民币8.3万亿元，而整个银行体系的未偿贷款为人民币55万亿元。数据来源于政策性银行的

年报。

56. 关于国家开发银行，参考《中国的超级银行》（China's Superbank）一书。

57.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允许国企倒闭的同时，央行还将存贷款利差扩大到了4个百分点，之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这就确保了中国银行的高利润率。根据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银行的效率并不高。根据路透社在2012年2月18日发布的计算结果，2011年中国银行的累计利润达到了1 650亿美元。

58. 这个数字是经过非常粗略的计算得出的，仅仅是象征性的。这会耗掉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和需要中国外汇储备和减去当前账户余额。大规模未经批准的资本外流似乎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晚期，之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资本流入。

59. 2011年3月31日，汉妮·桑德尔（Henny Sender）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中国金融：影子银行的存在》（Chinese Finance: A shadowy Presence）一文指出，中国央行已经开始统计所谓“社会融资”的数据，这一数据不仅包含了银行信贷，还包括了其他各种形式的表外借贷。这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央行”早些年试图监督银行信贷以及场外交易市场的信贷如出一辙。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近年来，非银行贷款融资占据社会信贷总额的50%左右。最大的非银行类放贷主体是信托公司，其收取利率是银行利率的两倍。

60. 2009年中国银行体系信贷投放达9.6万亿元（1.4亿美元），2008年为4.9万亿。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从国家设定的基准利率的0.85下调至0.7，现金首付比例从总额40%减少到20%，享受免税转售政策的最低房龄从五年减少到两年。

61. 2009年，给中国制造企业带来利好的其他临时性补贴包括将小排量汽车的购置税削减一半，并投入资金450亿元，补贴家电汽车摩托下乡及汽车家电以旧换新。这些补贴的主要受益者是中国国内的制造企业。

62. 参考2011年6月《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第41页对债务形式的计算。截至2010年底，中央财政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截至2010年底，中国政府债务约为28万亿人民币，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官方债务、政策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估算

额、铁道部债务以及实施最近一轮银行股份制改组的成本。铁道部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政策性银行债券13%，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占据27%，另外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10%。

63. 从2010年初开始，中国的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进入负利率时代。2011年和2012年，储蓄一直在退出银行，但退出速度还不至于立即带来风险。

64. 从1961年到1986年，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几乎没有变动，1961年为40：1。随着政府开始对汇率实行“有管理的浮动”，1973年调整为38：1，1978年为36：1。在1987年美国迫使台湾地区实行自由浮动政策之前，汇率几乎没有变动。

65. 2012年9月，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5%。截至1987年底，台湾地区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其生产总值的58%。然而，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大陆的出口能力是台湾的两倍。以出口为目的的来料加工业务肯定会带来外汇盈余。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几乎50%的出口都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而在台湾地区这个比例只有25%左右。

66. 央行是通过一种叫作“冲销”（sterilization）的操作来回笼资金、减少市场流动性的，具体操作包括提高准备金率与出售债券，二者都能起到减少可贷资金的作用。但2008年那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国内通胀上升，这要求政府提高国内利率，而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较低。所以，政府当前这些干预措施会给她带来痛苦。

67. 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时间，台湾地区都处于经常账户盈余的状态，最多的时候是在1986年，达到了生产总值的21%。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最多时是在2007年，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10.1%。应该指出一点，即我本人不赞成严重压低汇率的做法。汇率过高也不是好事，中国和其他许多东亚国家在过去这么多年里也发现了这一点。

68. 中国财政部的2012年预算表明，政府计划拿出大约1 110亿美元的经费作为国内公共安全开支，包括警察、国家安全机构、武装警察、法院和监狱，而拿出大约1 060亿美元用于国防。国内公共安全开支比2011年增长了14%。

1. 参考罗纳德·哈利·科斯 (Ronald Harry Coase) 所写的《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一文，载于1992年9月的《美国经济评论》第173页。该文实际上也是他在199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获奖演说。

2. 意大利在1950年推出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计划，对农田灌溉、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拓展领域投入了巨资。此外，意大利还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和金融体系。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意大利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快，从1950年到1963年，平均每年增长5.8%，从1963年到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5.0%。关于意大利和日本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相似之处，参考理查德·J·塞缪尔斯 (Richard J. Samuels) 所著的《马基雅维利的后代：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导人及其遗产》 (Machiavelli' s Children: Leaders and Their Legacies in Italy and Japan) ，该书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3. 黑监狱是独立于正规司法体系以外的拘留中心。官方否认黑监狱的存在，但人们知道很多这样的场所，不仅知道其名字，还知道地点。

4. 这里的5亿人口涵盖了越南在内的5个国家。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